

# 十年学潮纪实

Shinian Xuechao Jishi

(1979~1989)

船夫著

北京出版社



● 1979——校舍骚动

● 1980——竞选风潮

北京出版社 船 夫 著

# 十年学潮纪实

● 1985——新“九一八”

● 1987——元旦震荡

● 1988——阿柴事件

● 1989——北京风波

F08923



## 致读者

---

1979年至1989年这10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方针取得巨大成就的10年。但是，由于国际和国内大小气候的影响，又由于大学是一片“多雨的云彩”，因而伴随10年改革开放的脚步，学潮时起时伏，并在1989年最终发展为社会动乱和反革命暴乱。

笔者亲身经历了这10年中发生的主要学潮，并搜集了少有关史料，据此写成本书，希望借此帮助读者了解其概，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自觉维护社会稳定，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由于笔者材料所限，这本书仅以北京的学潮为主，兼及全国，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作者

1989年12月26日

---

此书臭不可闻，文笔太次！

性质：~~拙劣~~的政治宣传品。

很幼稚、可笑

拙劣也比花艳子

### 目录

第一章 校舍骚动.....	1
二 新时代.....	1
三 生在苏醒.....	1
第三章 文化的春天.....	7
一、待兴谁为先.....	11
二、看突发.....	13
题.....	13
第五章 阿鼻的信号.....	18
第一节 作——罢课——游行.....	20
一、“水”面八方.....	31
二、从“求”在学生.....	36
三、到天.....	37
第二节 从“后”.....	41
一、柴庆丰化了.....	41
二、借题发看社会.....	44
流产.....	
风压.....	47
星不止.....	47
.....	47

作为一个88年的后辈，从一种理解了  
很多信息总比什么都知道好。



二、必要的调整.....

三、政治体制改革未雨绸缪.....

## 第二节 狂飙般的运动.....

一、困惑种种.....

二、打破常规.....

三、暴露了什么.....

四、唇枪舌剑议中国.....

## 第三节 严肃的启示.....

一、一次早夭的民主试验.....

二、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挑战.....

## 第三章 新“九一八”.....

### 第一节 打破平衡的砝码.....

一、改革呈现艰难.....

二、日本到底是谁.....

三、校园中的缺口.....

### 第二节 纪念的歧义.....

一、“不能再容忍下去了”.....

二、在这敏感的一天里.....

三、不变的主旋律.....

四、校园难归宁静.....

### 第三节 同情与责备.....

一、谁人不爱国.....

二、远瞩须高瞻.....

三、民主的真谛.....

<b>第四章 元旦震荡</b> .....	131
<b>第一节 震前景观</b> .....	131
一、众望归一的“兴奋点”.....	131
二、逆流扑面而来.....	135
三、不断躁动的情绪.....	137
<b>第二节 南北共震</b> .....	142
一、来自南方的冲击.....	142
二、北京的反响.....	146
三、“示威去”.....	156
<b>第三节 震后思考</b> .....	164
一、学生们怔住了.....	164
二、问题出在哪里.....	170
<b>第五章 阿柴事件</b> .....	174
<b>第一节 偶然中的必然</b> .....	174
一、“水过鸭背不透毛”.....	174
二、从“救世主”到“救自己”.....	178
三、到天安门广场擦皮鞋.....	182
<b>第二节 从刑事案件到政治事件</b> .....	186
一、柴庆丰被害.....	186
二、借题发挥.....	190
流产的示威.....	198
“风压倒西风”.....	198
“星期三”.....	203
.....	206



<b>第六章 北京风波</b> .....	216
<b>第一节 山雨欲来风满楼</b> .....	216
一、西方的“软着陆”.....	216
二、滚滚寒流急.....	217
三、祸起萧墙.....	222
<b>第二节 在祭奠的旗下</b> .....	224
一、导火索.....	224
二、“最来情绪的”冲击.....	227
三、跪交请愿书.....	230
<b>第三节 “4·26”社论前后</b> .....	234
一、一叶知秋.....	234
二、“高自联”一瞥.....	236
三、旗帜鲜明的表态.....	239
<b>第四节 动乱升级</b> .....	243
一、中央的两种声音.....	243
二、舆论界怎么了?.....	246
三、“5·13”大绝食.....	249
四、真假关心.....	253
五、黑云压城.....	256
<b>第五节 发布戒严令</b> .....	262
一、重重阻挠.....	262
二、“国中之国”.....	
三、拼死挣扎.....	
四、“反腐败”?.....	
<b>第六节 血染京都</b> .....	

---

一、是谁燃起暴乱之火·····	277
二、暴行令人发指·····	279
三、广场的悲与喜·····	283
四、从无序到有序·····	285
<b>结 语</b> ·····	291
●最大的失误是教育·····	291
●大跃进式的民主实践必致动乱·····	295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持之以恒·····	300
●警惕“和平演变”·····	302
●“这个党不抓不行了”·····	306



## 第一章 校舍骚动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恢复了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新一代大学生戴着令人羡慕的校徽走进了大学的校门。但是，校园的生活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由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有待解决；与此同时，在思想解放浪涛的冲击下，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也相伴而生，种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反映在大学校园中便形成了躁动不安的校园小气候，使之成为中国异常敏感的社会神经。因此，1979年10月，北京发生了由校舍问题引发的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主体的学潮。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首次学潮。

### 第一节 新时代

#### 一、理性在苏醒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在北京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随后，中央又处置了“四人帮”在上海的追随者预谋发动的武装暴乱，并迅速将粉碎“四人帮”事件通知全党和全国人民。自此，历时10年

之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但是，由于长期“左”倾路线的影响，相当多的人们的思想仍然被禁锢在“左”倾教条主义的藩篱中，并未意识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正在面临着一次重大的转移。因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仍然被继续贯彻执行。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中首次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提出，说明“左”倾僵化思想仍然在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占据着主要位置，其在实践中贯彻的结果是十分有害的。一方面，由于“四人帮”打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号干了很多祸国殃民的坏事，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要求就无法予以揭发批判，“文革”中的大量冤、假、错案就无法重新审查、平反。另一方面，对形成于50年代末、大大发展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路线，也无法进行批判和反思。思想和路线是非无法澄清，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就很难统一，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就无法实现。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不仅需要在政治上、组织上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死党的反革命罪行，更需要从思想路线上发动一场拨乱反正的重大斗争。

5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同中央两位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稍后，邓小平同志又在党中央一次会议的讲话中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一个思想体系，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



而不能只从个别词句上来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还列举了大量实例来说明，毛泽东同志在不同时间、不同条件下对同样问题的讲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如果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把毛泽东同志的话奉为“句句是真理”，就会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甚至割裂、歪曲、损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充分表现出了他既勇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又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某些现成结论的实事求是精神，打开了解放人们思想的闸门，成为思想理论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理论武器。

在邓小平同志重新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导下，新时期思想解放的第一声号角终于吹响了。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理论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11日，这篇文章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新华社于当日全文播发；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发。文章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凡是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有许多地方还是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许多新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研究，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要研究现实的确切事



实，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只有这样，才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才能逐步前进。

这篇文章的公开发表如同一声惊雷，在凝滞已久的中国大地上立即引起了连锁反应。于是，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持续10年之久的万马齐喑的局面终于被万马嘶鸣的新景观所代替。沉睡多年的理性开始苏醒了。

6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他认为：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他批评“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还强调：“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严重的任务。”这个讲话，无疑是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强有力支持。

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正确思想路线指导下，广大理论工作者冲破了来自各个方面的重重障碍，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结合林彪、“四人帮”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大搞反革命活动的实际，从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用深入的理性分析揭露了林彪、“四人帮”歪



待马  
中国  
“问  
久的  
多年  
井话  
发的  
地或  
正确  
育的  
践相  
张只  
般就  
违步  
及  
“我  
皮精  
的任  
。大  
理  
义的  
泽东  
文化  
”歪

曲、割裂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极大危害，发挥了思想解放先锋队的作用。

7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同志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其中提出了“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文章认为：党内出现林彪、“四人帮”这样的反党集团，而且他们能隐藏得这么深，造成这么大的危害，从党内生活来检查，同民主集中制不健全是有关系的。文章还强调：要实行民主集中制，把党内党外的民主生活活跃起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切实实行“三不主义”。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上，陈云、叶剑英、胡耀邦、胡乔木等同志从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提出了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意见和建议。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篇讲话用很大的篇幅论述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意义，其中谈到：

“解放思想是当前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



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上述重要的思想观点实际上成为贯穿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中的基本精神。

在思想解放洪流的冲击下，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给人们的精神枷锁被一个个打破了。1978年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1月16日至20日，中共江苏省委、浙江省委和河南省委也分别作出决定，郑重宣布：1976年清明节前后南京、杭州、郑州等地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都是革命行动。对于参加当地革命活动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上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



真  
导，  
要创  
子，  
一点  
众有  
音，  
制。  
导人  
变。  
三中  
加给  
，中  
天安  
，完  
迫害  
南省  
、杭  
是革  
一律  
上坚  
地、

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迅速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审查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提出要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并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确定了中纪委的根本任务是维护党规党纪，切实搞好党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结束了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革”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中国开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强国富民之路。

## 二、科学文化的春天

“10年动乱”的结束为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呼唤着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同中央两位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鉴于长期存在的轻视科学技术、歧视科技人员的错误思想观念，邓小平同志还强调：“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

人也是劳动者。”这里，邓小平同志纠正了“左”的错误认识和林彪、“四人帮”强加给知识分子的各种诬蔑不实之词，明确地提出知识分子是劳动者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还看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其他战线都比较快地恢复了正常秩序，唯有教育战线积重难返，于是，下决心亲自解决这个难题。1977年8至9月，他在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同教育部<sup>①</sup>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时，两次谈到了教育战线拨乱反正问题。他说：“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他针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最先提出了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功过的问题。

所谓“两个估计”，指的是1971年在姚文元、张春桥的直接参与下起草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政治结论。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中，这种荒谬的估计成了“四人帮”向教育战线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头上经常挥舞的两根大棒，给教育战线的工作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强烈要求推翻“两个估计”的错误结论。但是，问题很难解决，因为《纪要》是经过毛泽东画了圈的。按照当时还盛行的“两个凡是”的观点这是不能动的。另外，对于知识分子的那个结论也是早在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就讲过的。他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

<sup>①</sup> 现国家教育委员会。



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在当时的形势下，要推翻“两个估计”十分不易。

邓小平同志则明确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建国后的17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他说：“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就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方面来说，应该怎样估计呢？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年培养出来的？”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打破了教育战线的“左”倾禁区，成为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先声。

根据新时期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要求，教育战线首先对招生制度进行了改革。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新华社消息：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进一步改革招生制度，招生对象包括应届高中毕业生，招生条件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和择优录取的原则，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省、市、自治区命题，县（区）统一组织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1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公正的批评〉终于作出来了！——关于董金铄批判张铁生的调查报告》和

董金铄1973年写的批判张铁生的两封信，进一步把“四人帮”别有用心地吹捧“白卷英雄”，破坏周恩来同志主持对教育战线工作整顿的计划，压制、打击人民群众正义呼声的罪行公诸于众。这一系列正本清源的工作步骤很快扭转了教育系统的沉闷局面，广大知识分子的情绪豁然开朗，教育体制改革的工作很快展开。1977年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陆续进行了高等院校招生的统一考试，全国应考人数达570万，创造了建国以来参加高校招生考试人数的最高纪录。

1978年寒假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后首批经过统一考试被录取的27.3万大学生陆续步入了各高等院校的殿堂。这是一批极为特殊的大学生，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来自工厂、部队、农村、边疆。大概由于行色匆匆，许多人还没有来得及脱去带补丁的工作装，身上仍然蒸腾着劳动的气息，手上挂着厚厚的老茧。也有一些刚刚走出中学校门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脸上带着那掩饰不住的稚气。这些新学生中，有的人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考上了高中、初中，按照惯例，他们早已应该大学毕业了。但是，十年浩劫的磨难使他们年届中年、甚至当了父亲或母亲才上大学。有人说他们是不幸的一代，然而，从他们走进大学校门、重新获得了学习权利的那天起，他们又找回了那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华，幸运地成了新时期大学中的第一批“宠儿”。

1978年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会上，邓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阐述了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问题；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问题和在科学技术部门中怎样实现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还根据广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事实，对我国知识分子队伍作出了评价，他说：“从政治立场这个基本方面来看，绝大多数科学技术人员应该说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的力量。”这次大会的召开，向全国人民宣布：长达10年之久的寒冬已经过去，一个百花争艳的科学文化的春天已经到来！

4月22日，邓小平同志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就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和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此后，在党中央和各地方党组织的重视、支持下，教育事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的大好局面。

### 三、百业待兴谁为先

粉碎了“四人帮”，国家的政治形势迅速好转，中国人民欢欣鼓舞，一种积存了多年的愿望在中国人民的心中逐渐升腾起来，人们强烈地要求把丢掉的10年时间夺回来，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事业再发生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许多人却很难看到新的矛盾和困难已经悄悄地来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面前。

最为严重的是，“10年浩劫”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农业、重工业、轻工业、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防建设等各行各业都急需要发展。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文化大革命”的遗留

问题逐渐暴露并趋于尖锐化，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过程中，一些新矛盾、新问题的出现在群众中产生了某些消极的影响。

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各地进京上访的人们逐渐增多，有的要求重新审查、更正自己的案件性质；有的要求平反后尽快落实政策，安排工作或回城定居；有的要求退还“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的东西或房屋。一时间，火车站、国务院和各部委的信访办公室门庭若市，拥挤不堪。少数人借此机会组织请愿团进京上访，用根本不可能实现或短时间内很难实现的条件给党中央和政府施加压力，企图制造社会动乱。另一些人则借解放思想之机，散布怀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言论，造成新的思想混乱。此外，由于林彪、“四人帮”及其各地代理人的专横跋扈、贪污腐化、奢侈糜烂的作风在群众中曝了光，所以引起群众的极大愤慨。人们还很自然地把“四人帮”的行为与自己身边的官僚主义现象联系起来，因此，对官僚主义的不满议论在部分群众中比较热烈，这也往往成为少数人借机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论调的借口。刚刚稳定下来的政治形势又出现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对于这些新暴露出来的问题，党中央采取了澄清思想是非与尽可能地解决实际问题、教育争取多数群众与打击个别坏人相结合的方针。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针对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提出了中国在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阶段，理论宣传机构也重点分析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



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意义，统一了群众的思想。同时，邓小平同志继续强调坚决执行“三不主义”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倡导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民主和法制，以克服现实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弊端。这些措施很快扭转了一度出现的思想混乱局面。然而，由于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和新生的社会矛盾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彻底解决，所以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形成新的不安定因素。

## 第二节 矛盾突发

### 一、一号难题

1977年第4季度，高等院校陆续恢复招生以后，各校都开足马力尽可能地多招收学生，准备更多、更快地培养出国家急需的建设人才。这一年，全国大专院校招生总数达27.3万人，打破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招生记录。1978年春节过后，当大批新生欢欢喜喜地进入学校之后，一个并不引人注目，却积淀已久的问题终于暴露出来——校舍危机。

按道理讲，1977年招生属于原有高校恢复招生，校舍都是现成的，各校招生人数多未超过“文化大革命”前的最大容量，不应该出现校舍紧张的问题。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高校曾被取消，另一些院校迁往外地或合并，不少高校校舍已不同程度地被工厂、部队和其他单位占用达数年之久。因此，当“文化大革命”后高校恢复办学时，不少学校实际上是徒有虚名，其办学条件已是今非昔比了。仅以北京地区为例（1979年10月统计），当时，共有17所“双管”和市管高等院校的校舍被其他单位占用，总建筑面积达596245平

平方米。这些学校复校或迁回北京后，占房单位陆续退还86677平方米，却仍有509568平方米未予退还，大体分布情况请见第15至17页表格。

由于80%多的校舍被外单位占用，致使这些学校复校后的用房极其紧张。例如：1978年底复校的北京农学院因其校舍的95.94%被外单位占用，致使1979年招收的106名新生到10月底还不能报到，学生和家长意见很大。北京农业大学为了挖掘校舍潜力，封闭了部分厕所作为办公室或教师宿舍。当时全国农业科技方面的一级教授、一级研究员共16名，北京农大有7名，其中有4名一级教授全家人挤在1间房子里。至于住集体宿舍的“爸爸屋”、“妈妈屋”更是普遍现象。教学用房和教师生活用房的极度紧张，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大家都尽了极大的努力忍耐着这些艰苦条件。此时，房子，成了办学中最大的难题；房子，成了这些学校校内矛盾的焦点。

为了改善办学条件，中央和各有关方面尽可能地采取多种办法解决校舍问题。例如对于校舍几乎全部被占用的北京农学院，就另选校址，重建新校。而绝大部分学校则在原址复校。1978年国务院专门就退还高等院校校舍问题下发了166号文件，要求各占房单位在1979年8月底以前将所占校舍全部退还给有关院校。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文件的精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某些占房单位还设法把已经占据的房子“充分”利用起来，以作长期打算。客观的困难，人为的障碍使得校舍矛盾越来越突出，1979年暑假结束，新学期开学后终于演成了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主的北京地区多所高校的校舍骚动。



高等院校校舍被占情况表

单位:平米

学校名称	总建筑 面积	原被占 校舍面积	已退还 面积	现被占 面积	被占用 校舍占总 面积%	占用校舍单位	备注
北京化工学院	85530	26660	1767	24893	29.1	中国科学院情报研究所	
北京农机学院	103000	70736	7400	63336	61.49	一机部、农业部、农机部、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国 家地震局地球物理所、河北 驻京办事处	
北京林学院	83289	49268	700	48568	58.31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环 化所、半导体所、农科院、清 华、北大	
北京农学院	27000	27000	1150	25850	95.74	北京电影学院	
中央民族学院	90000	5897		5897	6.55	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北京农业大学	120082	88588	6641	81947	68.24	国防科委507所、七机部五 院	

续表

学校名称	总建筑 面积	原被占 校舍面积	已退还 面积	现被占 面积	被占用 校舍占总 面积%	占用校舍单位	备 注
北京中医学院	67817	20010		20010	29.5	北京基建工程兵指挥部 00069部队 6 支队, 00072 部队 7 支队、河北北京师院	
中国人民大学	151646	73256	28084	45172	29.78	第二炮兵	已有初步 退还方案
北京轻工业学院	49579	41855	1735	40120	80.92	轻工业部 9 个单位、纺织 部 3 个单位、北京工艺美术 服务部	
北京气象专科学校	30363	30363	3200	27163	89.46	中央气象局	
北方交通大学	103000	20000	13000	7000	6.79	铁道部党校、建厂局	
北京邮电学院	142484	22630	500	22130	15.53	邮电部 508 厂	



续表

学校名称	总建筑面积	原被占校舍面积	已退还面积	现被占面积	被占用校舍占总面积%	占用校舍单位	备注
北京广播学院	44000	18000		18000	40.9	中央广播事业局	已有初步退还方案
北京化纤学院	23000	23000	1700	21300	92.6	北京齿轮厂	已有初步退还方案
中央财金学院	44114	38842	7300	31542	71.5	北京卷烟厂	已有初步退还方案
北京政法学院	33345	31700	8500	23200	69.57	北京市艺校、歌舞团、曲艺团	
北京经济学院	43949	8440	5000	3440	7.82	北京市针织总公司	
合计	1242198	596245	86677	509568	41		

17

## 二、人民大学的信号

中国人民大学是建国初期以老解放区的原华北大学为基础创建的一所文科大学，1963年经中央批准确定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至“文化大革命”前，该校已建成为独具特点、水平较高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人才、经济管理人才和高等学校的政治课师资。1971年11月该校被撤销，教师或分散转入其他院校任教，或转业改行。一部分校舍拨交给北京师范大学管理、使用。不久，第二炮兵部队领导机关又进驻了原人民大学校园。

第二炮兵部队是60年代末建立的新兵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现代化的新型部队。它自建立以来一直没有选到理想的机关驻地。人民大学撤销以后，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二炮机关迁入人大校园，共占用房屋73256平方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人民大学是首批被考虑恢复的学校。1977年人大招收了数百名新生，但因没有教室和宿舍，暂时分散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经济学院上课。1978年6月20日，教育部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恢复中国人民大学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其中就人民大学的校址、建制、规模、招生人数及师资、教学设备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关于校址和专业设置问题，报告中写道：在北京原址恢复中国人民大学，仍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恢复原有12个系，并增设3个系，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原名国际政治）、中国历史、中共党史、法律、计划统计、财政、贸易经济、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经济信息管理、中国语言文学、新闻、档案等15个系。关于校舍问题的报告中提出：该校



及附属单位拨交北京师范大学、二炮等单位的房屋、土地，应全部退回该校。目前急需的教学、生活用房，拟商请二炮将占用的校舍适当调整紧缩，在7月底前先行退还一部分，其余部分逐步退还。争取1978年招收1700名新生。

经过研究，国务院于当年7月7日批复了教育部的报告，并作为国发〔1978〕129号正式文件下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国务院的批复中说：“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关于恢复中国人民大学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望遵照执行，……希望各有关方面对恢复和办好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给予积极支持。”

当月，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恢复。

根据国务院〔1978〕129号和166号文件的精神，中国人民大学校方与第二炮兵部队有关部门磋商了退还校舍问题。到1978年10月，二炮机关从占用的73256平方米房子中退出19200平方米。这样，人民大学1977年和1978年招收的1300多名学生勉强入校开学。但是，由于房屋奇缺，学生中有600多人走读，住校的学生每8人挤住在一间12.7平方米的风子里，全校仅有一个可容纳200人的阅览室，许多教研室、研究所、实验室因没有工作间而无法正常工作，甚至连用巨额购进的教学用电子计算机也因没有房子安装而无法使用。此外，学校教职员的生活住房也相当困难。当时，按计划应从外地调回教师142户，因为分配住房困难只调回40户，且大部分挤住在办公室和临时搭起的棚子里。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教学、科研工作的进行。对此，学生和教职员都很有意见。而二炮机关由于搬迁困难等原因，并未按国务院文件的要求继续退房。



在这种情况下，从1979年1月开始，人民大学校方先后给教育部、北京市委、中央军委总后勤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国务院等领导机关呈送正式报告15份，给二炮领导机关发公函4封，并给军委当时的有关领导人写了信。这些报告、信函的主要内容都是要求二炮在当年7月底即79级新生入校之前退还15000平方米校舍，以解燃眉之急。而到暑假之时，二炮只退出了5000平方米的“办公楼”。无奈，人民大学只好将原计划招收的2000名新生压缩到760人。

7月20日，人民大学学生会以全校学生的名义给二炮领导机关写信，要求退还部分校舍以保证新生按时入校开学。9月份，其他大学已相继开学，唯独人民大学的新生还分散在全国各地，他们纷纷致信致电学校询问情况，迫切要求早日报到。面对学生来信，人民大学领导心急如焚，一筹莫展。9月12日，人民大学7位副校长联名致信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反映学校面临的困境，希望有关方面尽快帮助解决。考虑到部队的实际困难，信中将原来要二炮近期退还15000平方米宿舍的要求改为1万平方米，同时把二炮退出的“办公楼”抢修改成教室和宿舍。这样，到10月6日，79级新生才进了人民大学的校门。但是，学生食堂仍然没有，只好临时在室外用砖砌几个灶眼，生火做饭。几百名新生就在这露天饭场中蹲着吃完一日三餐。

10月的北京已是秋风萧瑟，飘零的白杨树叶片片带着寒意，跌落在炉灶旁，偶尔也落进同学们的碗里。同学们望着北风卷起的尘土和没有着落的校舍，心中的不满迅速升温，很快便发展成为公开的抗议行动。

### 三、大字报——罢课——游行



治  
关  
告、  
校  
之  
只  
领  
。散  
早  
莫  
领  
。10  
办  
主  
时  
天  
。愿  
首

1978年11月和1979年1、2月份，人民大学学生曾因为校舍问题在校内张贴过3次大字报，一些情绪偏激的同学甚至提出要举行罢课、游行。当时，校系党政组织及时对学生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暂时把事件平息了下来，但闹事的苗头已初露端倪。1979年9月24日，人大与二炮在基建问题上发生争执，冲突中人大一名老工人受伤。学生知道这一消息后情绪激烈，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0月6日，新生入学后，学校后勤部门和学生部门考虑到学生健康问题，准备进一步充分利用大阅览室，白天上课，晚上自习，中午和晚餐时给新生作饭堂用。10月8日上午，学校一位负责同志到露天饭场看望新入学的同学，在路过饭场附近的大阅览室时他向同学们透露了学校的打算，并征求了在场同学的意见。不料，这却引发了一场声势不小的事端。

当天，新闻系二年级一些学生最先贴出了《大阅览室危在旦夕》的大字报，其言词之烈，颇具煽动性，其中写道：“此阅览室是我校唯一的阅览室，新生入学前已是拥挤不堪，现在学生骤增，大家已为越来越差的学习条件担忧。不料今日校方不和二炮力争，反向学生釜底抽薪，新生要食堂，老生要阅览室皆属合理。对比二炮，仅几个球员就据我偌大食堂之现状，难道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吗？”

新闻系的这张大字报不亚于一根燃烧的火柴棍，点起了同学们的心头之火。很快，大字报、小字报纷纷贴了出来，多数内容是指责二炮，责怪校领导，号召同学们自己为校舍而努力“斗争”。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一张大字报这样写道：“我们再不能默默无闻了！委屈不能求全，忍让更要遭殃，人大

学生不做草包，要做人！站起来，为争取我们最基本的学习条件斗争！”

整个校园沸腾了，学生群情激愤，到处议论纷纷，正常的学习无法进行了。

人大党委极其重视学生的行动。10月8日下午，人大一位党委副书记马上找来新闻系、语文系党总支的负责人了解详细情况，要求两位系领导做好学生工作，防止事态向坏的方面不断扩大。同时，另一位副校长马上找到总务处、团委和学生处等有关部门一起研究79级新生的饭堂问题，最后决定以总务处的名义贴出通知：“第六、第九两个教室兼做新生临时开饭的地方，保证不影响上课。”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通知一贴出，学生马上贴出新的大字报说：“教室变成了牺牲品。”事态进一步发展。

这天晚饭时，大学生们的议论更加热烈。而议论的中心已从如何进一步敦促校方通过组织途径解决问题变为决心组织学生去抗议了。当晚，哲学系和新闻系的20几位同学商议决定，分头找各系同学到哲学系二年级教室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并决定将此行动通知学生会。不久，当一位同学找到校学生会3位学生干部来到会场时，已有30余名学生集合在那里了。讨论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校舍问题学校领导无力解决，教育部不能解决，二炮不想解决。只有我们学生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同二炮采取不同形式的斗争。”当即，有几名同学提议用罢课、上街游行或者强行占领食堂和一些宿舍的办法争取校舍，并强烈要求校学生会能出面领导这场斗争。学生会的3位干部答应次日上午向学生会主席汇报这些意见，并表示可以将原已定下的10号召开校学生会全体委员、系学



习  
常  
一  
解  
的  
委  
决  
新  
一  
室  
心  
组  
议  
步  
学  
里  
解  
协  
同  
办  
学  
，  
学

生会主席及部分班长联席会议提前到9日下午召开，重点研究校舍问题。会后，学生各自散去，一夜无事，但大家都在关注着校学生会的动作。

9日上午，新闻系学生迫切地贴出大字报，把8号晚上各系学生串联会的情况报道出来。同时，语文系学生也贴出一张大字报，声明该系学生从10号起开始罢课。人大校方事先并不知道这些情况，从大字报中得悉消息后，学校党委马上紧急召开各系党总支书记会。会上党委领导说，学生要求二炮尽快退还一些校舍是合理的，但是校党委明确反对学生罢课，更反对游行。校党委的领导还指出：华主席马上就要出访欧洲，必须考虑政治上的影响。学生要这么做，对华主席出访是很不利的。因此要求各系领导一定要教育学生顾全大局，不要罢课游行。另外，人大党委还通过电话把学校的情况紧急向教育部、北京市委作了汇报，并同时向二炮通告了学生的行动。

下午1点，学生会联席会议准时召开，校学生会主席主持了这次非常会议。会议讨论的重点是如何解决校舍问题。到会的学生干部情绪非常激烈，一致要求学生出面领导这场争取校舍的斗争，不要辜负同学们的希望。这样，校学生会被推上了舞台。接着大家进一步商讨斗争的方式。会上提出两种方案：

第一方案：罢课、上街游行、向国务院递交请愿书。理由：这样做是为了贯彻国务院（78）166号文件精神，捍卫党中央、国务院的威信，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利。

第二方案：用“和平占领”的办法收回必要的食堂和宿舍。理由：二炮不会主动退还校舍，和平占领少量房子不会

有什么问题。

讨论中，开始主张第二种方案的人较多，认为这种方案解决得快。但有人认为这样干容易被人说成打砸抢，有理讲不清，弄不好会和战士发生冲突，后果难以预料。最后以系为单位投票表决，以14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罢课游行的方案。联席会上规定，任何个人无权更改会议的决定。当时，学生会负责人没有参加投票。

9日下午的学生会联席会还通过几个决定：10日上午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宣布罢课，下午上街游行并到新华门交请愿书；分头起草文件、拟定标语口号，发动全校同学连夜写标语、糊小旗，做好一切准备；10日晨6点再召开学生会联席会，通过各项文件，落实上午全校大会的议程。

在学生会联席会召开的同时，学校正在举行新生入学仪式，学校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下午5点左右，2位学生会主要干部到大会场向在场的3位副校长汇报了学生干部开会的情况。3位领导当即明确表示反对罢课、游行，并要求他们去劝阻同学们。这两位同学表示为难，说：“会上已做出决定，任何人无权更改联席会议的决议，谁要反对就要被说成是‘学贼’”。但他们仍然向同学们传达了学校领导的意见。

情况紧急。傍晚7点，校党委紧急召集系总支书记会议，要求与会者在万分紧急的时刻，继续到同学中去做说服劝阻工作。

晚8点，学校通过电话向北京市委、教育部、总参、总政、总后及军委值班室第一次告急，并派出3位副校长分头前去详细汇报或电话联系，请求上级务必在10日上午派人来人大帮助就地解决问题。



接到人大的告急报告后，晚9点，北京市委教育部派两位同志来到人大，听取了人大党委的汇报，并转告人大，市委已决定10日上午派市委常委刘祖春同志来校。

晚10点，教育部研究了人大的情况后，电话通知：对于人大的紧急汇报，方毅副总理指示“请教育部汇报国务院，同时劝说学生不要上街，更不能冲击部队、与战士冲突，有事可双方商议。”10日上午派一副部长来校参加协商。

晚10点半，总参通知：“已向耿、杨、王首长作了汇报，已要总后、二炮连夜解决人大校舍问题。”接到这些答复电话后，人大领导马上同二炮电话联系，说明事态紧急，希望二炮帮助学校解决问题，这时已是9号晚11点。电话打到二炮政治部值班室，值班员说：“向上级汇报了”。

夜深了，整个北京沉睡在深秋的静谧之中，只有人民大学的校园没有安眠。领导在忙于劝阻学生和向上级汇报、告急；学生在准备着明天的罢课大会和游行。深夜11点，来自人民大学的又一轮告急电话拨到了有关上级单位。与此同时，3位副校长把当天下午参加学生会联席会议的全体同学找到一起，恳切地说：“你们要求二炮退还部分校舍是合理的，但是你们采取罢课、游行、请愿的办法是不对的。我们和二炮的房子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只能协商解决。一定要从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特别是华主席即将出国访问，要注意国内外影响，不能罢课、上街游行。不然的话，就会引起国内连锁反应，影响社会秩序，影响安定团结。”他们还告知同学们，学校已连夜向上级机关派出3位副校长去汇报大家的要求和学校的困难，明天上级派负责同志来学校帮助就地解决问题，希望同学们理智些。

学生们听了校领导的劝说和通报后表示：如果10日中午12点以前能够满足我们的最低要求即立即答应退还一个食堂，退还一层东风楼学生宿舍，再拿出一个退还全部校舍的规划，就不罢课、不上街。之后，校学生会负责人解释说：“我们这些人是粉碎‘四人帮’后才获得进大学机会的，现在学习任务这样重，时间如此宝贵，难道我们愿意罢课和上街去游行吗？实在是被逼得没法了。”

就在校领导和学生干部谈话时，有的学生已开始在校会议室门口及校园里贴大字报，主要有：《决不允许校方扼杀学生的正义行动》、《今夜为何瓦解军心如此卖力》、《招安风紧》、《罢课临于危厄》。

经过短暂的休息，按9日的规定，10日晨6点，第二次学生会联席会准时召开。会上，首先传达了校党委的指示，与会学生表示：如果在上级领导帮助下，中午12点以前能满足要求，就不上街游行。会上，推举出由8名同学组成的学生代表团，然后又通过了向二炮加码的要求：

- (1) 24小时内归还一个食堂，交还大教室的管理权；
- (2) 三天内归还一栋学生宿舍和退还办公楼时留下的6间教室，并让出体育馆（原学生食堂）；
- (3) 10月12日中午以前拿出一个归还全部校舍的规划。

8点半，根据刚结束的联席会通过的具体议程和有关文件，全校学生罢课宣言大会在图书馆楼前广场举行。会议全部由学生负责主持，议程如下：

第一项：宣读国务院（78）166号文件；第二项：介绍二炮占用校舍及归还情况；第三项：宣读《罢课宣言》；第四项：宣读《致党中央、国务院的请愿书》；第五项：宣读给各



高校的呼吁书；第六项：学生代表发言；第七项：研究生代表发言；第八项：宣布行动计划及罢课纪律；第九项：呼口号。

会间，由于临时发现给各高校的呼吁书丢失，没能按原计划宣读，会后也没有印发其内容，而是派一些学生带着校学生会的介绍信前往各校联系。

大会结束后，全校学生在校内举行了游行。

与此同时，校党委领导也在焦急地等待各级领导前来帮助解决问题。由联席会推举的8名学生代表则静候在学校会议室里，等待领导接见，听取会议结果。他们等待的时限是中午12点。楼外的空地上还聚集着数百名学生，等候着学生代表的回音，上街游行的一切准备已经就绪。此时，双方形成了短暂的对峙。

8点，北京市委常委刘祖春同志到。

8点半，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张承先同志到。

9点半，二炮副司令员贺进恒同志到。

10点半，军委总后勤部营房部负责人到。

会议立即在张承先同志主持下开始。会上，市委、教育部、总后勤部的同志都表示希望二炮克服一下困难，帮助人大解决眼前的问题，避免学生上街，事态扩大。二炮的同志则强调自己的难处，说：如果总后勤部能给调拨钢屋架，近期可腾出1100平方米的食堂和一个可容800人的大教室（两家已合用）。经再三商量，二炮答应让出部分宿舍，但数量和退还的具体时间没有确定。

这时，时间已到了11点15分，等候在会议室里的8名学生代表有点不耐烦了。他们向学校领导提出了抗议。11点

20分，各位领导到会议室与学生代表会面。他们希望学生不要罢课游行，有事慢慢商量，通过组织途径，困难总会解决的。学生代表当面向二炮的代表提出第二次联席会通过的向二炮加码的3条基本要求，二炮的代表不能做出明确答复。时针逼近12点了，楼外的同学开始骚动。会议室里气氛紧张到极点。大家看着时间走向12点。

屋里的会谈没有结果，楼外的同学在不断催促。一个学生喊：“别跟他们耽误时间了，他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学生会还是带着我们去游行吧，12点啦。”无奈之下，学生会主席含泪带着8名学生代表退出会场。在场的4位副校长急追出来，试图再次挽留学生，但已无济于事。

当天下午2点，人民大学学生相继赶到民族文化宫前的广场上集合。1000多人的游行队伍举着标语、漫画和人民大学的校旗向天安门广场走去。这次游行的准备时间虽然仓促，但组织得仍然比较严密。学生会专门派人与沿途的交通警察联系，以避免妨碍交通，还组织了纠察队在游行队伍前后左右维持秩序，防止外人或坏人进入学生队伍。另外，还有一些同学沿街刷上许多标语。

这些游行学生引起了外国记者的注意，一瑞士记者看到学生举着“反霸权”的标语，走上前问：“你们干什么？反霸权是什么意思？”外语系一教师答：“学生游行主要是宿舍、食堂等房子拥挤，部队住得宽，和他们谈不通，学生是给中央送信去的。标语上写的反霸权，主要是指他们不及时退房的态度，不是指国际上的反霸，也不指其他什么。”

记者问：“你们是否反对政府？”学生回答：“不是反对政府，学生是为了房子。”美联社记者问：“游行为什么？”又问



“你们学校住的是什么部队？”学生回答：“学生是为房子，学校住的就是部队。”美联社记者问：“是否政府让你们出来的？是怎样组织的？”学生回答：“是学生自己组织起来的。”

路透社、法新社的记者问话和学生的回答都与前面差不多。只是塔斯社和古巴的记者上前问话时，没再得到学生们的回答。

学生游行队伍经西单到达天安门广场，绕广场一周后到达新华门前。按照联席会原订的计划，递交请愿书后立即返回学校，但没料到又出现了意外的曲折。

原来，学生队伍到达新华门后，值勤战士向里面通报了情况。接到报告后，从新华门内出来一位同志。他说：“这里不接请愿书，同学们到国务院接待站去吧”；后又说：“我可以代你们把请愿书交给党中央、国务院。”这时，有学生提出要中央领导人来接。对方问要哪一级领导。学生说党中央、国务院办公厅的负责人就可以了，并表示：“我们只交信，不需要当场表态。”那位同志说：“我可以代表办公厅接下来。”学生队伍中立刻有人高呼：“坚决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出来接见。”那位同志只好进去了。

新华门外的学生僵持不下，一半人主张按原计划交了请愿书赶快走，一半人坚持要领导人出来才能交请愿书。两种意见各执一词，相持不下。学生会就地召开联席会讨论，最后投票表决，8票对8票，几次表决结果都如此。学生们在这里站了好长时间了，5点以后，路上行人越来越多，继续呆在要道上肯定会影响交通。大家一时没了主张。这时一位研究生出了个主意。于是，学生会主席宣布：“把交请愿书改为向中央发电报，把我们的要求直接告诉中央领导同

志。我们的游行请愿到此结束。”说完，立即把队伍带离新华门。晚7点，学生回到人民大学校园。当天下午，还有少数学生来到了二炮领导人的居住地拍照，提出反特权、反官僚主义的口号，但这一行动很快被制止，没有产生很大的不良影响。

晚8点，学生会联席会召开第三次会议。根据白天罢课游行的教训，他们感到需要加强集中领导，否则到了关键时刻意见分歧，很难控制。因此，会上决定建立最高执行委员会，由校学生会部长以上干部和3名学生代表共12人组成。还有同学提议加强宣传、扩大影响，并说：上午已有同学建议召开记者招待会，经学生会主席同意后，已向部分新闻单位打了招呼。会议认可了这个计划并决定派一些同学到各校联系。

会后，一些学生分别到北大、清华、钢院、邮电学院、体育学院5所高校邀请他们的学生会代表参加人大的记者招待会。11日下午，校学生会又派出党史、工经、财政3系部分学生分头到中央音乐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北京建工学院、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北京工业大学、北京中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sup>①</sup>、北方交通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经济学院、北京师范学院、北京化工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第二医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这18所院校去做宣传解释工作。学生会对外出学生作出两点规定：（1）外出时要持学生会介绍信；（2）联络目的主要是介绍情况，以求得同情和声援，不能

<sup>①</sup> 现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与其它院校搞联合行动。

经事后调查，外出联络的人大学生主要与各校学生会或团委联系，介绍人大罢课游行情况，一部分学生作了口头介绍后即离去，也有的学生张贴了校舍被占情况的大字报和油印的“罢课宣言”、“请愿书”或把带去的宣传品委托该校学生张贴。这种串联活动在其他学校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些同样存在校舍问题的学校也有部分学生准备学习人大，用类似的办法解决问题。后因人大问题迅速得到妥善解决，没有酿成各高校的联合行动。

#### 四、惊动了四面八方

人民大学学生为争取校舍而罢课、游行的行动捅破了天。游行的当天晚上8点，国务院的有关领导立即召集有关方面开会，商议二炮退还校舍问题。人民大学有2位副校长到会。会上，国务院和军委有关同志介绍：9月12日人大7位副校长写给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报告已在10月8日由耿飚同志批示，二炮再退还人民大学1万平方米的房子；另外，二炮已原则上答应近期内先退还6000平方米。会后，人大的两位副校长立即返校传达会议精神。

与国务院会议的同时，人大在校的3位副校长紧急召开了各系党总支书记会，分析了学生的思想动态，估计学生可能还会有新的行动。为了积极引导学生，会后，几位校领导找来了学生会最高执委会的同学，告诉他们10号下午，学校和二炮双方仍然在继续商量校舍问题。然后又问：“同学中有什么新的动向？”有的学生说：“今天的请愿书没递成，同学们情绪仍很激烈，骂学生会太软弱，有人提出要通电全国各高校请求声援。”说着就拿出了已经拟好的电文草稿：



“全国各高等院校学生会及全体同学：人大告急！第二炮兵继续占用我校67%的校舍，拒不退还。60%的同学已经走读一年。宿舍、食堂拥挤不堪。新生在露天就餐。全校唯一的仅能供100人使用的阅览室即将撤销。为争取基本的学习条件，全体学生于10月10日开始罢课。吁请声援。”

看完这份电文，几位校领导当即表示反对搞全国通电。为了防止电文发出后造成严重后果，学校与邮电部长途电信局取得联系，要求如有人民大学学生去发全国通电，请收下电文和费用，不要发出。直到10月23日，长途电信局业务组负责人证实：并没有人大学生去发全国通电。

在汇报中，还有的学生讲了有人提议要去占领食堂和宿舍，并准备于次日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情况。夜11时，前往国务院参加会议的2位副校长回到人大，向学生会最高执委会的同学们传达了会议精神后严肃指出：“中央和国务院是关心我们的。你们今天上街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中央非常担心会引起连锁反应，破坏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局。我们要充分认识这一点，可不要再脑子发热了，赶紧复课。”执委的同学当即请示：“已经通知的记者招待会怎么办？”校领导说：“我们的问题中央已经帮助解决了，明天记者招待会不要开了，赶快通知人家不要来了。”学生说：“现在已凌晨两点，来不及通知了。”最后大家决定记者招待会还是开，国内记者参加，外国记者临时堵住不让参加。

其实，在学生会执委会决定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并没有请外国记者，只是用电话与《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几家新闻单位联系过，但考虑到下午游行时不少外国记者在场，已经知道要召



于记者招待会的消息，估计外国记者可能会不请自到。因此，学生会组织部分英语专业的学生在学校门前准备阻拦外国记者入会。

10月11日上午9点，记者招待会在第九教室举行。会上，学生会主席首先介绍了罢课上街游行的目的及罢课宣言等几个文件的内容，并说明人大的校舍问题在国务院的关怀下已经基本解决；然后是另外2位同学介绍人大校舍被占用和归还情况；接着是自由发言。

广播学院一学生问：“听说二炮已经在地下修了工事，如果二炮搬走会不会影响国防建设？”

人大学生答：“有关军事问题我们学生不了解，但我们相信，中央决定人大在原址复校时，一定会考虑到了这些问题的。”师院一学生问：“你们今天的招待会为什么不邀请民间刊物记者来参加？”答：“我不了解这个情况。”这时一个青年人站起来说：“我是民间刊物《今天》的记者，我就来了嘛！”

据查，这个青年是10日下午在新华门前从一些学生的议论中得知这一消息混进人大的，没人邀请他。人大学生也没人认识他。整个招待会时间不长，记者们没有提更多的问题。

在记者招待会举行的同时，人民大学校外也在进行着一次实际上的答外国记者问。

上午9点左右，日本共同社一记者由中国翻译陪同，先在门口拍照。学生上前阻拦，日本记者表示想参加招待会。学生说：“我们是中国记者招待会，不请外国人。”记者又想去看大字报，答：“校内驻有部队，不能进入。”记者说只到右侧

(学校区)看大字报,答:“学校和部队有交叉,是不能进的。”

上午11点半,英国路透社记者晏关文出示记者证,要求入内采访,英语师资班两学生上前阻拦。

晏:“你们学校的生活及学习条件如何?”

答:“学校自复校以来,由于校舍困难,带来一系列问题,同学们食宿、教员备课都有困难。新生不得不露天就餐。”

晏:“既然有中央文件让他们撤离,为什么不撤走?”

答:“可能部队有他们自己的困难。”

晏:“他们有没有地方搬迁?打算往什么地方搬?”

答:“部队搬迁问题,上级有安排。”

晏:“部队在此驻军多少人?”

答:“我们不清楚。”

12日中午,一美联社记者到校门口要求采访。美联社记者问:“你们对这次罢课有什么感想?”

答:“很有成果,问题已经解决,感谢国务院帮助。”

12日下午4点,晏关文第3次来到门口,又有3位学生拦住了他。

晏:“你们是否要求部队立即全部撤走?”

答:“我们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知道部队有他们自己的困难。”

晏:“如果你们不上街,中央是否帮助你们?”

答:“这个问题你们可以翻翻《人民日报》,上面转载过国务院的有关通知。”

晏:“是否打算继续罢课?”



答：“一旦部队答应校学生会提出的初步要求，为退房作出满意的答复和计划，立即复课。”

晏：“人大是什么时候复校的？”

答：“1978年7月。”

记者招待会一事过后，人民大学党委领导再次与学生会干部谈话，要求他们一定要做好同学们的思想工作，绝不能把事态扩大。还针对一些学生提出要“反特权，反官僚主义”和10日下午部分学生到二炮领导人住地拍照一事提出：一定不能借反官僚搞政治运动，一定要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并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中共北京市委。

11日下午，学生最高执行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结束事态问题，通过了几条决议：

(1) 3项基本条件(10日联席会通过的3个条件)达到就立即复课；(2)条件不要太苛刻，要考虑对方的困难；(3)不搞“反官僚、反特权”运动，全校学生要十分统一行动；(4)不搞串联；(5)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

11日晚7点，第4次学生会联席会召开，传达了执委会议定的几项决议和二炮原则上答应近期先退还6000平方米的消息。大多数学生干部同意执委会的决议，相信二炮的许诺。只有少数人怀疑二炮口头答应的事能否兑现，担心校学生会要妥协，所以仍错误地主张要去抢占食堂和宿舍。大多数人不赞同这种非法行为。经过激烈的争论，联席会同意执委会的决议，等待二炮落实退房的消息。事态这才缓和下来，但学生的情绪还很激烈。

晚8点，二炮政委会见了人大的3位副校长，告诉人大的同志：按照中央军委退还1万平方米的指示，二炮已落实



退还 8000 平方米，还有 2000 平方米即将落实。3 位校领导一听很高兴，9 时返回学校，马上向学生会的干部传达了这一消息，同学们也十分高兴。学生会联席会马上决定连夜草拟复课标语口号，并于 12 日派人把 10 日贴在街上的标语覆盖住。这些新的标语有：“衷心感谢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复课”、“安定团结，办好人大”、“发奋为四化而学习”、“发扬革命传统，加强军民团结”等。13 日上午 8 点半，全校学生召开主题为“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办好人民大学，为四化努力学习”的复课大会。随即各系复课，教学秩序恢复正常，校园又归于宁静。

13 日下午，教育部召开了重点大学和其它一些大学、团中央教育部、北京市一些单位参加的会议。教育部的领导和中央主管教育科学工作的方毅同志传达了邓小平、李先念同志的指示。王震同志也就人大的问题发表了意见。这些讲话既介绍了在校舍问题上，中央和各有关方面积极想办法予以解决的情况，又严肃批评了罢课游行的错误行动，要求各校认真吸取教训，防止不安定因素再度发生。此后，各校传达了中央精神，形势很快好转。

#### 五、问题不仅在学生

人民大学学生因校舍问题举行罢课、游行后，除少数教职员明确支持学生外，相当部分干部、教师采取了静观、默许的态度。学生的自发行动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刻的主客观原因。

自 1978 年 7 月人民大学正式恢复以后，原属人大的教职员纷纷调回学校，但由于校舍奇缺，教学、生活都很不方便。广大教师干部深受其苦，心中意见不少，但身为教师



又不便发作。学生起来后，一些教师认为：“学生闹没事，闹大了上级就会重视，问题就会解决”。另外，在解决校舍问题过程中，一些干部、教师亲身感受到现实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认为学生罢课游行也是对官僚主义的冲击。正是由于多数教职工有这样的认识，更使得少数支持学生的人的能量大大增加，助长了学生的情绪。例如，10月9日晚，在游行准备工作中，有关同志同意为学生打印标语口号和“罢课宣言”、“请愿书”，并给游行学生提供了校旗、门旗、红旗，默许学生使用广播器材和司机开汽车送学生游行。游行之后，又有教师贴出10张大字报，4条大标语，对学生表示同情和支持。其中有《坚决支持，强烈呼吁》，号召“全校教工立即罢教，支持同学的正义斗争”，“坚决要求校工会立即发表声援同学斗争的宣言，并向全国高校教工发出呼吁，请求声援”。还有“坚决支持同学要求二炮退还校舍的正义行动”等大标语。

一些教师也参加了学生组织的校内外游行，并发表了在学生中影响很大的演说。11日上午，在记者招待会的自由发言中，一位名望较高的教授说：“同学们的行动是完全合理的。同学的这次行动，它的意义不仅是解决房子问题。鉴于二炮的恶劣作风，这里还涉及到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些教师、工人的发言起到了鼓动学生坚持闹下去的作用。这些现象说明，出在学生身上的问题，往往同教师有关系。

#### 六、连锁反应

人民大学的校舍风波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高等教育工作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因此，在这次事件出



现前后，其他院校的校舍争端也发生连锁反应，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和北京林学院。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在“文化大革命”前是财政部与北京市双管的经济管理类院校，“文化大革命”中停办。1970年9月，北京卷烟厂在该校址建成投产。财金学院恢复后，因校舍被工厂占用，学生只能在临时房屋内上课。800名学生挤在一个很小的食堂内用餐。当时，原财院的一座教学楼（共有大小教室28个）并未被卷烟厂派上用场，800名工人用的是原设计可容纳2000人的大食堂（是原财院的学生食堂）。国务院〔78〕166号文件下发后，国家计委、财政部也于1979年联合下发了545号文件，其中就归还校舍问题作了明确规定。根据这两个文件精神，财院校方曾多次与厂方交涉，要求烟厂先将空楼和宽余的食堂退还，并适当解决学生的运动场地问题，但始终没有结果。为此，学生和教师都很不满。

10月10日，人民大学学生为了校舍问题上街游行一事造成很大影响，事后又有人大学生去财院散发《罢课宣言》和《请愿书》，这给财院学生以很大刺激。有的学生提出：人大上街后争回了校舍，财院为什么不去市委请愿呢？于是，财院部分同学开始酝酿于次日上街的事。10月11日晚，财院领导得知学生12日要去北京市委请愿的消息后，曾劝阻学生不要上街。学生则认为，现在的学习条件实在太差，一定要向北京市委的领导反映一下情况，才能够通过市委责令卷烟厂退还财院校舍。在无可奈何之下，财院领导要求学生只派少数代表去北京市委反映情况，学生同意。但是，12日晨又有学生贴出通知，要全体同学集合到市委去请愿。财院领导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办法并深入学生中去劝说，还提



突  
市，被一大原务联。  
烟地  
事  
于  
色，劝  
责学  
12  
财提

出：多数学生去上课，学校负责派车护送学生代表去市委反映情况。但这些工作为时已晚，不少学生已经骑车出发了。上午9点左右，财院300余名学生在市委门前集合，要求市领导接见。到下午3时，市革命委员会<sup>①</sup>一位副秘书长接见了学生。学生向这位领导反映了校舍问题和要求，副秘书长答应学生，由市委派一个调查组前去财院和烟厂调查情况，就地解决问题。得到如此答复后，学生离开市委，又在长安街举行游行，沿途吸引了一些外国记者，下午5点半学生回到学校。13日休息一天，14日复课。

北京林学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迁往外地。高考制度恢复后，国务院批准林学院迁回北京。为此，林学院向国务院呈送了要求在原址办学的报告，但直到1979年10月16日，林学院向北京市委反映本院学生与外单位职工发生冲突的情况时，仍然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批复。实际上，林学院原校舍的95%以上被外单位占用，学院只有很少的机构留在院内。1979年林学院师生回京人数不断增加，校舍更趋紧张。这年3月份，当时的林业部长曾召集占用林院校舍的农科院、林科院和林学院三方协商退还校舍的问题。这次会议明确规定：农科院所占林学院的房子、土地均属林学院所有，应逐步退还。会议还商定为解决林学院的急需，农科院先期腾出林学院森工楼第四、第五两层。到5月份，农科院腾出了第五层的大部分房间，而把第四层作了新的安排。6月份，农科院又私下把林学院的14亩土地兑换给半导体所，对此林学院师生极其不满。当时，林学院师生和农科院人员

<sup>①</sup> 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临时政权机构，后成为地方政权机构。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即地方各级政府。



之间曾多次出现冲突的征兆，都由于领导及时做工作，没有酿成事端，但矛盾并没有解决。为此，林学院领导曾多次向林业部和国家农委报告情况，希望领导尽快帮助解决问题。

10月份，林学院的校舍矛盾终于演成了一场激烈的冲突。10月8日，住在森工楼的几名学生在四层楼道里理发，农科院有人出来干涉。学生说：“你们是占用我们的校舍，我们在楼道里理发为什么不行？”双方争吵起来。学生又说：“你们用房那么宽裕，我们连放书桌的地方都没有。”农科院却有人说：“陈景润在厕所里搞研究，你们也可以到厕所去学习。”学生一听，七窍生烟。

同一天，林学院木工系77班学生发现森工楼501房间有里外两间，中午只有农科院4名女工午休一下，其余时间空着。9日，这个班的学生和农科院的人商量：学生用外间自习，里间仍由农科院的人午休。农科院的人不允。这天下午，学生将课桌搬进外间学习，双方发生争吵。林学院老师及时赶到，避免了更大冲突。10日中午，林学院学生开门等着农科院女工来休息，不见人来。下午2点，农科院几名青工抬着两个铁文件柜，抱着一些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要争占这间房子，学生不允。农科院一青工动拳打了林学院的学生，并用椅子、暖气片继续打学生，幸有他人拉住，未造成伤人。

农科院青工动手打人后，林学院学生更加激愤。10日被打学生所在班的同学贴出“严惩打人凶手”的标语。这时，人民大学罢课、游行的消息及人大致华国锋主席的信和罢课宣言传到林学院，学校内马上贴出大标语，声援人大学生为校舍而采取的行动。个别班级贴出“强烈要求党委解决起码的



学习条件”的标语，校内人心浮动。当晚又有学生撬占了农科院的13间房子，使矛盾更趋白热化。12日早晨8点，水土保持系77级20余名学生找院领导请愿，提出要罢课，同时又贴出“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166号文件”、“林学院神圣校园不容侵占”等标语。中午，林业系的学生干部又开会，商量罢课的事，经院、系领导全力劝阻事态才未进一步扩大。

在这段时间里，农业大学、农业工程大学、北京化纤学院<sup>①</sup>等被外单位占用了校舍的院校，也都程度不同地与占房单位发生了冲突，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以后几年，这些学校的校舍问题逐步解决或缓解后，因校舍问题而引起的风波才算基本平息下来。但直到今天，有个别没有彻底解决校舍问题的学校，还不免因此而引起一些小的磨擦，但这毕竟已不是高校工作中的主要矛盾了。

### 第三节 问题的背后

#### 一、矛盾为何激化了

高等院校的校舍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如何为高等教育提供必要的办学条件的问题，而在刚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百业待兴的形势下，这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其中大量的历史遗留旧案一时很难理清。因此，在当时解决这些问题是很不容易的。例如，“文化大革命”中撤销中国人民大学，二炮机关进驻人民大学校园，这都是经过国务院和有关部门批准的，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决定的。而“文化大革命”后，在原校址恢复中国人民大学也是经过国务院批准的，这

<sup>①</sup> 现名北京服装学院。

是新时期党的任务所要求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占房单位与被占房单位双方并不存在谁是谁非、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因此，因校舍问题而引起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通过协商的办法予以解决的。其他被占学校的情况也多数如此。

象这样本来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得到解决的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偏要闹到罢课、游行的激化程度呢？从客观上讲，刚刚恢复的高等院校办学条件极其艰苦，教职工和学生的生活环境更不尽人意，这是实际问题。从主观上看，领导机关和干部身上存在的官僚主义和群众中的“文革”遗风加剧了因客观困难而引起的不满情绪。例如，在学校办学条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某些占房单位不能顾全大局，而以自己有合理占房理由为借口，宁肯占着空房子，也不肯尽快将房子退给学校，更不愿意克服自己的困难，挤一挤，多让出一些房子给学校用。甚至还有某些人想借此给上级施加压力，向组织要条件等等。另外，人大校舍风波也暴露出在某些领导机关和干部身上存在的办事拖拉、人浮于事的官僚主义作风的严重性，以致于贻误了解决问题的时机，致使事态扩大。例如，在人民大学学生酝酿游行、罢课前的10月8日，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飏同志就已经在人民大学7位副校长写给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信上作了重要批示，要二炮先退还人民大学1万平方米校舍。为此，二炮也向上级写了报告，进行退房子的准备。但是，这份批复和二炮准备退房的情况并没有立即转给人大党委，甚至在人大学生已经决定10日游行、9日晚人大党委到处告急时，这份批复依然没有人拿出来，直到10日学生罢课游行、在社会上和国内外造成了很大影



响之后，人民大学领导才知道中央和有关领导已就人民大学校舍问题作了明确指示，而这个批复精神的传达则对于平息事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见，官僚主义作风在人大学生罢课、游行问题上实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正如 1980 年 8 月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所说：“官僚主义……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公文旅行，互相推诿……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官僚主义作风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人民大学的校舍风波还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文化大革命”的遗风和林彪、“四人帮”的影响还在群众中存在着，正如方毅同志批评的那样：一些人搞串联，人大房子就是人大的问题，为什么要通电全国，为什么要到北京各大学去串联，这完全超出了本校范围，是向中央施加压力。还有有的学生跑到二炮领导同志住地去照相，这不是“文化大革命”中冲领导人的做法吗？而且回来后在学校煽动，把口号越提越高……这是把自己置于同人民对立的地位了。

除此之外，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还有很多做法反映出了“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影响仍然在群众中存在着。例如，当学生的情绪被鼓动起来以后，在 10 月 10 日清晨 6 点的学生会联席会议上，与会者又不顾客观条件的可能性，通过了向二炮部队加码的要求。10 月 10 日游行之后，在准备向全国通电的电文稿中，又夸大实际情况，把学校只是准备在开饭时间用阅览室做临时餐厅的计划，说成是“全校唯一的仅能供 100 人使用的阅览室即将撤销”（后这份电文没有拍发）。这种无限上纲、夸大其词的作法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广大学

高志力  
会做学  
身子  
不拍  
影子  
至



生要求缓解实际困难的本意，很容易被少数心怀叵测的人借题发挥，制造社会动乱。这说明，从思想上肃清“文革”遗风的任务还是长期的、艰巨的。

## 二、从学生上街看社会

大学校园是个小环境，但这个小环境常常是社会大环境的最敏感的一部分。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人们都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解放感，思想异常活跃，认识很不统一。这种状况既为打破极左路线的精神禁锢创造了条件，也为少数人宣扬否定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思潮与无政府主义提供了社会环境。社会上的错误思潮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到知识分子集中、异常敏感的高等院校中来，形成校园小气候。

当时，由于理论界、文化界在揭露“四人帮”罪行、特别是在探讨“文化大革命”产生根源的过程中，比较多地涉及到了我国的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另外，一些被解放、平反的干部重新安排工作后，很快为自己和家庭创造了舒适的工作、生活条件，这与大量尚未妥善处理的历史遗案形成强烈的反差，很多群众在要求解决政治平反、经济待遇等问题时又切身感受到了官僚主义的存在，这使得整个社会形成了对官僚主义和干部特权的不满情绪。某些文学作品中对于这些问题的揭露、批评更加剧了这种不满的社会心态。于是，当校舍矛盾尖锐起来之后，大学生很自然地就把校舍问题与官僚主义、干部特殊化问题联在一起，少数人进而提出了脱离群众本意的一些过激口号，使事态呈现出扩大化的趋势。由此可见，因为校舍问题而引起的校园骚动，是当时复杂的



社会心态的一种反映，是中国政治的大环境作用于校园小环境的结果。

人民大学的校舍风波虽然由于党中央和北京市委的妥善处置很快便平息了，但是其社会影响是很不好的。其消极后果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第一，罢课游行干扰了党的重点工作的进行。1979年是我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在经历了10年的动荡之后，在许多历史遗留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赢得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对于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是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这个形势的得来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罢课、游行事件出现之后，安定团结的局面一度被破坏，美国的宣传机构立刻向世界播发了这条新闻，在国内外都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一些本想与我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外商因为害怕政局动荡而采取犹豫、观望的态度；同时，也为敌视我国党和政府的国内外敌人提供了造谣诬蔑的口实。因此，党中央对于人民大学校舍问题的态度是：一方面集中全力解决——军委给二炮下死命令，让战士住帐篷，不惜损失搬出来；另一方面也严厉批评了这种不顾大局、不顾影响的错误行动，明确提出：此风不可长。

第二，首开闹事先例，客观上助长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风气。由于官僚主义的阻隔和其它因素的影响，党中央对人民大学校舍问题的批示没有能够迅速传达到人大师生中间，直到罢课游行事件出现之后批示精神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才传达下来，这在客观上证实了事前一些教师关于学生闹一闹能够引起领导重视、有利于问题解决的判断，也给其他院校学生“不把问题闹激化就解决不了”的印

象。因此，人民大学游行之后，又出现了中央财金学院学生到市委门前请愿和林学院学生撬占房间的事件。此后，为校舍、伙食和其他一些因教学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而引起的贴大字报、罢课、罢餐等问题也接连发生。

第三，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了场所。在人民大学校舍事件中，虽然只有少数人提出了过激的口号并且及时被批评制止，但是，这些口号的提出却反映了在一少部分人中潜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思潮，即把建国以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归结于社会主义制度，把经济、政治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和干部工作中的问题归结于共产党的领导，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主张“多党制”和资本主义化。这股思潮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表现得愈发突出了。



## 第二章 竞选风潮

中国人民大学的校舍骚动虽然很快平息了，然而，由此而引起的一连串思索并没有结束。相反，伴随着中国现代史上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进展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人们对中国经济、政治问题的思考也更加深入。社会主义传统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是否存在弊端，应不应该改革？中国改革的方向是什么？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如何搞？这些问题成为当时理论界、思想界普遍关心、争论的问题，也是困扰着思想政治工作干部和广大群众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1980年，我国各地区相继进行了县级人民代表的普选工作，由此而引发了北京、上海等地部分高等院校学生的竞选风潮。

### 第一节 树欲静而风不止

#### 一、布朗运动现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从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上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肯定了思想解放运动的积极意义，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重大转移。全会公报的发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信心。一个既安定团结又生动活泼、蒸蒸日上的新局面正逐渐形成。

1979年初，党中央就农业问题发布了一号文件。它成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由于党的改革政策在全国农村广泛贯彻，我国的农村经济开始呈现出多年少有的大好形势。工业生产、教育、科研的工作秩序也迅速恢复。与此同时，思想解放运动也向着更深更广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在继续深入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同时，为了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探讨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良好途径，1979年1月开始，《新华月报》以《社会主义法制问题》为题目，组织思想理论界人士展开了热烈讨论。

理论上的繁荣、发展，大大推动了实际工作中拨乱反正的步伐。2月，文化部党组作出决定并经中宣部批准，公开为“文革”中被打成“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文化部大错案平反，指出不存在所谓“文艺黑线”问题和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同志为代表的“黑线代表人物”的问题。这一重大决定彻底推翻了多年来压在文化界、文艺界广大干部群众头上的一座大山，使许多老作家和艺术家焕发了青春。广大中青年作者更是放开了手脚，勇于进取创新。因此，在不长的时间里先后出现了一大批反映时代精神、在群众中赢得积极反响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的以深刻的历史纵深感歌颂了革命战争年代老一辈革命战士献身中国革命伟大事业的英雄事迹；有的描绘了在“10年动乱”中人民群众与“四人帮”的尖锐斗争及其在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种种复杂的社会矛盾，控诉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给我们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极大灾难和损失。这些作品的出现，既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时代大潮的产物，又反过来影响、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



但是，思想解放的路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同任何群众运动的内容、影响都存在着消极的方面一样，这次思想解放的闸门一开，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况。少数人借思想解放的旗帜，宣扬背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的思想观点，甚至利用大量的“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大作文章，鼓动闹事，挑起事端，企图破坏安定团结的新局面。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在社会上造成的消极影响却很严重。因此，有人把思想解放过程中这种伴生的社会现象比喻为物理学中的“布朗运动”现象<sup>①</sup>。这种从根本上背离改革方向的错误倾向在1978年5月“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展后不久就已出现。当时，北京有一些人借思想解放之名在西单路口东侧北面开辟了所谓“民主墙”，张贴反映各种思想观点的大字报。此外，北京、上海、天津、贵州等地也有人创办《探索》、《四五论坛》、《沃土》、《北京之春》、《渤海之滨》等自发刊物和“中国人权同盟”、“兴中会”、“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振兴社”、“解冻社”等自发组织，散布怀疑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的情绪，甚至谩骂攻击党中央领导人，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功绩。

例如，《探索》的主编魏京生就公然违反宪法，以撰写散发反动文章为手段，妄图推翻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他在文章中诽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比江湖骗子的膏药更高明的一些膏药”，诬蔑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煽动群

<sup>①</sup> 悬浮在液体或气体中的微粒所作的永不停止的无规则运动；温度越高，布朗运动越剧烈。



众“不要再相信独裁者的‘安定团结’，把怒火集中在制造人民悲惨境遇的制度上”，要“把权力从这些老爷们手里夺过来”。这些内容都曾分别出现在“西单民主墙”上、登在《探索》中，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还有少数人无视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拨乱反正、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成绩，耸人听闻地提出“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上海有个“中国人权小组”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非法组织“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分裂人类的。“民主讨论会”中也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的所谓“社会改革”，也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甚至公开扬言要解决“四人帮”没有解决的那些老干部。这些非法组织中的一些人扬言要到外国去“政治避难”，有的人甚至秘密同蒋特机构发生联系，接受外国人经济资助，策划破坏活动。

与此同时，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残余势力和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也有所增加，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的闹事现象。有些坏分子不接受党和政府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鼓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闹事，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各种流氓集团和刑事犯罪分子的犯罪活动也出现了上升趋势。这些不安定因素的存在和发展随时都可能导致新的社会动乱，断送思想解放运动



的前途和刚刚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妨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因此，采取积极的措施，排除各种干扰，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成为深入进行拨乱反正工作、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精力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为此，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讲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从根本上划清了解放思想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社会主义改革与资本主义化的政治界线，这对于纠正现实中存在的“左”的和右的偏差、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形势起到了指导作用。

4月7日、11日、19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党的领导是实现四化的根本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四化需要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阐述了党的领导与四个现代化的关系。5月8日，《光明日报》也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分清两条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分析了解放思想与鼓吹资产阶级右倾思潮这两条思想路线的界线和为了顺利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和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意义。

5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周扬同志在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中针对着当时思想解放运动中的偏向，提出要坚决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没能从思想僵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一种是从右的一端，假借“解放思想”之名，拣起几句支离破碎



的资产阶级陈言滥语，当成新武器，用来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革命的法制和革命纪律，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

在加强舆论导向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政府还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对制造事端的头面人物进行了打击。3、4月间，北京、上海、贵州等省市的公安机关，先后逮捕或收容审查了《探索》、“中国人权同盟”、“兴中会”、“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振兴社”和“解冻社”的主要头头，对其他自发组织中有违法行为的人也分别进行了拘留、警告和正面教育。这些措施使那些热衷于宣扬错误思想观点的人受到震慑，自发组织、自发刊物的活动有所收敛。

必要的调整保证了思想解放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深入发展。与此同步，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在各地方代理人罪行的工作也有很大进展，5月25日《人民日报》以《要为真理而斗争》为题报道了在“10年浩劫”中被杀害的优秀共产党员，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女干部张志新烈士同林彪、“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事迹。这篇报道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震撼。人们的思考开始超越对林彪、“四人帮”罪行的揭露、控诉，转而去探究在我国产生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和“文化大革命”这样全民族的大灾难的深层原因了。这段时间里，报纸上先后披露了“四人帮”及其帮凶生活腐化、草菅人命、迫害干部与群众的罪行和一些地区少数基层干部违法乱纪的问题，在文艺创作中，象《在社会的档案里》、《将军，请不要这样做》等一批有争议的作品也相继问世。这在当时更引起了人们对于“权力与腐败”、“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怎样抑制腐败”等问题的思索。于是，两种思想解放观、两种改革观的斗争再



毛  
反  
法  
，  
查  
制  
主  
拘  
想  
。  
发  
行  
理  
党  
人  
人  
而  
先  
千  
，  
故  
对  
收  
再

一次尖锐起来。

9月，有人在学术刊物上专就言论自由问题发表文章，批评“要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学术问题可以讨论”的观点“妨碍着我们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主张对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都进行充分的讨论。于是，民主、自由问题又成了这段时间讨论的热点。有的人总是爱把民主问题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谈，给青年和群众造成一种印象，好象民主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与社会主义无缘。有的人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帜，主张要揭露谁就可以揭露谁，要批评什么就可以批评什么，谁要反对这么做就是不民主。这时，一些自发组织和自发刊物的头面人物认为“气候回温”，形势对他们有利而又重新开始活动。北京西单“民主墙”上的大字报又急剧增多。高校中各种思想的撞击也很激烈。

——自从我国高等院校恢复招生考试制度后，社会上一些自发组织、自发刊物的骨干人物陆续考入高校，这使得社会思潮与高校学生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大学生中的思想问题比较突出，轻视思想政治工作、厌倦政治课学习的现象在不少学生中出现。学生中的自发刊物、报纸也迅速增加。10月，北京、天津、福建、上海、广东、武汉等地高等院校的8个学术团体向全国发出倡议书，自发成立起“全国大学生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接着，全国13所高校的自发刊物又联合创办了大学生的刊物《这一代》。相形之下，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却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这首先表现在政工干部队伍衰减上：许多老政工教师纷纷改行“跳槽”，后继乏人的问题也很突出。有的政工干部对舆论宣传很有意见，认为有些文章、报道贬低了政治工作的作用和政工干部的价值，造成了轻视政治工作的社会

气氛，使政治工作者的积极性下降。思想政治工作的落后状况使得高校学生中出现的思想认识问题不能得到及时引导，而是通过学生自发刊物传播开来。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校园环境下，10月份爆发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舍风波。

## 二、必要的调整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在高校和社会生活中都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恶果，确实到了非抓不可的地步了。为了打击少数坏人、教育多数群众，10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自发刊物《探索》主编魏京生案件。这位被台湾当局赞扬为“青年反党斗士”的魏京生除了主办自发刊物进行反革命煽动外，还在197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越进行自卫还击战开始后的第4天向外国人提供了我国参战部队指挥员的姓名、出兵数目、战斗进程和伤亡人数等军事情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2条、第6条及第17条规定，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15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3年。

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又发出通告，对在本市张贴大字报作出暂行规定。通告中说：为了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维护社会秩序，便于处理大字报提出的建议和合理要求，防止匿名、化名者利用大字报进行违法活动，规定自12月8日起实行对大字报的管理规定，即凡在自己所在单位以外张贴的大字报（包括小字报），一律集中贴在月坛公园内的大字报张贴处，并向附近登记处填报真实姓名、化名、住址和单位，禁止在“西单墙”和其它地方张贴。

1980年1月，有同志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提出：过去盛极一时的所谓“社会主义大民主”即“四大”实质上是无政府主义



百秋  
导，  
和校  
  
造成  
打击  
民法  
被台  
物进  
越进  
及部  
事情  
革命  
期徒  
  
市张  
主权  
要  
2月  
以外  
的大  
止和  
  
盛极  
主义

和专制主义的混合物，是丝毫民主成份也没有的反民主的暴行。实践证明，闹无政府主义的人往往打着“要民主，争自由”的幌子，破坏无产阶级纪律。这篇文章比较早地对“四大”的作用问题提出了质疑。

1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安定团结与社会主义民主》一文，分析了安定团结与发扬民主的关系。其中说道：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安定团结，不是一种随便什么样的政治稳定状态，不是暂时的安定与表面的团结。它所需要的是长期的和巩固的安定团结，是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社会主义民主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问题。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是全体人民享有管理国家的最高权利。从社会主义国家阶级实质说，社会主义民主意味着对少数敌人专政、保护人民利益和社会主义在人民内部是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统一。正如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实践过程一样，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也是一个实践的过程，需要在党的领导下，长期艰苦奋斗。一方面，加强民主要以维护安定团结为前提，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另一方面，不能把安定团结设想为一个无矛盾的静止状态，而应看到它是一个在民主地解决各种矛盾中不断发展、巩固的过程。

2月12日，胡耀邦同志在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的讲话中，结合当时几个有争议的剧本，针对新时期话剧、电影剧本创作中存在的一些新问题、新情况，讲了在文艺创作中如何正确看待领导我们的、我们自己的党；如何正确地看待我们这个社会；如何正确看待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如何正确看待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如何正确看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如何正确看待我们社会生



活中的阴暗面等重要问题。他认为，文艺创作中必须注意：不能不加选择地把任何偶然性的东西都当作艺术的真实去表现；不能把暂时性的东西写成一成不变的、永恒的东西，而应该反映出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1980年4月，全国人大五届常委会第14次会议根据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的建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第45条的议案（取消文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这是在总结30年来“四大”在我国民主建设中作用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决定，因而，得到了多数群众的拥护。但是，由于“10年动乱”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及为扭转思想混乱局面而采取的措施不理解或存有抵触情绪，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观点。

### 三、政治体制改革未雨绸缪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经济建设也取得了很显著的成绩。

1980年元旦过后，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讲话，提出了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四个问题：第一，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第二，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有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此外，在这篇讲话中，邓小平同志还讲了坚持党的领



意、去、表、而、据、修、改、大、辨、我、国、到、了、响、乱、局、己、的、权、”中、国、很、显、以、上、实、现、条、坚、团、结、四、干、部、的、领

导，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改善党的领导，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这反映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同年2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又把这一思想作为会议的主题。会议公报指出：“会议的主题是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这是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最重要保证。”为了体现这个精神，全会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对党员条件做了严格的要求，同时对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了比较完善的规定。全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考虑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需要，对党的干部制度作了一系列新的规定，包括废止干部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为了加强党内的法纪法规建设，全会还讨论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此作为对党章的具体补充。为了实行集体领导、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会上还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设立了中央政治局的经常工作机构——中央书记处。全会还提出，要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这些决定使党的建设向着制度化、法规化的方向迈了一大步。

8月18日至2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党和国家政治制度改革问题。会上，邓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还谈到，中央经过多次酝酿，正在考虑逐步进行如下重大改革：（1）中央将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



的建议。(2) 中央已经建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3) 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不再由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发指示、决定。(4) 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5) 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6) 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制相结合的制度。这篇讲话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党和国家政治制度改革问题这一信号,在理论界、思想界、知识界引起了极大关注,报刊上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日渐增多。10月16日、17日、18日,《光明日报》连续摘登了该报编辑部召开的首都部分理论工作者座谈会的发言。这个座谈会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着我国正在进行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问题展开的。发言的题目有:《改革政治制度,需要研究政体问题》、《健全法治是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保证》、《研究世界政治是改革的需要》、《对官僚主义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要改革,就要重新总结历史经验》、《深批“左”倾理论,为改革扫清道路》、《要从制度上保证劳动者当家作主》、《政治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实现民主化》、《改革,归根到底是人的解放》、《学术研究只能服从真理》、《官僚主义的问题必须从制度上解决》、《改革是历史的必然》、《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方针

坚持下去》等。

一、困惑和  
高等院校

因此,改革开放  
地在大学生身上

1979年10月  
思想政治工作

曾专门就加强思  
想理论界的

稳定,这使得思  
想政治教育的成

到很好的解决。

当时,不少  
制改革后出现的

价提高等现象  
性,某些理论界

很大影响,以致  
有些政工干部

当青年中  
决这个问题的

信仰危机实质  
摆脱党的领导、  
否定“集中指



坚持下去》等。其中的很多观点、提法是以前未涉及过的。

## 第二节 狂飙般的运动

### 一、困惑种种

高等院校历来是各种社会思潮最集中、最活跃的地方。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斗争集中地在大学生身上反映了出来。

1979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校舍风波出现以后，高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的问题受到了有关领导的重视。高校系统曾专门就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进行过研究。但是，由于改革时期大量新的社会现象一时还不能被广大群众理解、认识，思想理论界的许多新观点难以检验，文艺、宣传工作也不很稳定，这使得思想政治工作者感到十分困惑。所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并不显著，青年学生思想混乱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当时，不少政工干部反映，高校师生普遍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出现的土地承包经营和商品经济活动的增多以及物价提高等现象不理解，甚至以为这是倒退。舆论宣传中的片面性，某些理论界名人、学者的错误观点也对学生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以致形成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危机。有些政工干部说这是“小气候抵不住大气候”。

当青年中确实存在着“信仰危机”而基层干部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些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却说：“所谓信仰危机实质上是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当社会上有人鼓吹摆脱党的领导、“不要官方控制”的时候，某些报纸上又发表文章否定“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一提法，在大学生中产生了消



极的影响。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讨论通过取消“四大”之后,有些学生错误地认为取消“四大”就是取消了民主。当学生中一些人收听港台的“福音广播”,认为“马列主义也不过是一种宗教,还不如人家道理讲得透”的时候,一些刊物又发表了《还〈圣经〉的本来面目》一文,宣传“不要把它看成迷信的产物”。当高等院校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近代史教育的时候,电视台却播出模糊敌我界限、美化日本侵略者的电视剧。当学校的党团组织教育学生“学雷锋、创三好、树立革命人生观”的时候,又有人提出要从“德”的标准中去掉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内容,主张淘汰“红”的概念。一些名人在高校演讲时提出“对德的概念要重新考虑”,“三好和培养人材有矛盾”,要学生树立成名成家的思想,“抓紧时间多念书,不要争什么先进集体”。报纸上也发表文章批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口号,开展“评三好与出人才的矛盾”的讨论。有人在讲“人才学”的课程时,说雷锋是木材的“材”,而不是人才的“才”,说雷锋做的事机器人都可以做。在一些文艺作品中也常把政工干部写成思想僵化、蓄意整人的官僚主义者和靠“耍嘴皮子混饭吃”的没出息的人,使政工干部产生严重的失落感。

## 二、打破常规

中国的改革比较早地注意到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现代化经济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配套、衔接问题。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同志在论述解放思想时就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以后,他又多次谈到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中国民主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

化等问题  
为了  
大会这一  
表大会第  
民代表大  
国全国人  
加强地方  
设机构,  
生。这是  
革措施首  
了研究怎  
文章。

198

的初次学  
阶段,这  
事项只作  
间往往出  
民代表他  
当年  
生文艺消  
息。原天  
选人提名  
明,并给  
选民座谈  
已。与山  
子,帮且



化等问题。

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权力机构的作用，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决定加强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增设省、县两级人代会的常设机构，规定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人民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这是对建国以来我国选举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这一改革措施首先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关注。于是，报纸上很快发表了研究怎样发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作用的文章。

1980年，全国各地陆续进行直接选举县、区级人民代表的初次尝试。由于直接选举地方人民代表的工作尚处在摸索阶段，选举法和各地方制定的选举法细则，对选举中的有关事项只作了原则上的规定，某些条文不够明确、具体，人们之间往往出现理解上的分歧。因此，通过什么方式、途径产生人民代表候选人的问题，便成了这次选举工作中的突出矛盾。

当年5月，北京部分高校学生干部前往上海观摩“大学生文艺汇演”，返京后带回了上海复旦大学学生竞选的消息。原来，复旦大学师生在参加宝山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提名的过程中，有6名学生发表了竞选人民代表的声明，并纷纷公布自己的简历，用发表竞选口号与纲领、召开选民座谈会、回答选民问题的方式向选民介绍自己、推荐自己。与此同时，赞成他们竞选的学生也自动组织起工作班子，帮助竞选人准备、组织各种座谈和演讲等群众活动，广



泛介绍竞选人事迹，评论竞选形势，预测竞选结果。这一大胆的举动立即在全国高校引起强烈反响。接着，湖南师范学院又发生了部分学生因反对领导指定了部分人民代表候选人而举行罢课、游行、串联，甚至绝食和通电外地高校学生组织呼吁声援一事。这些不守常规的行动在北京高校师生中引起了纷纷议论。有人说：竞选是资产阶级假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有人问：现在讲发扬民主，厂长可以竞选，车间主任可以竞选，人民代表为什么不能竞选？也有的人认为：竞选促进了选民与代表之间的交流，这就是促进了民主。还有一些有志于竞选的学生则在悄悄地准备竞选材料。

9月份，北京市各区人民代表的选举工作开始，议论、争论终于变成了行动。10月16日早晨，北京大学第一分校历史系七八级的一位学生（《北京之春》成员），最先在校园里贴出了要求竞选海淀区人民代表的小字报（“竞选宣言”）。10点以后，该同学又贴出了他的《竞选纲领》和《如果我当选，我将干什么》的文章，其中主要内容包括：

（1）关于分校体制的改革，学生的分配方向。（2）关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方面的问题，如：“联系一个吃饭的地方，图书馆目前图书少，应多弄书。阅览室应延长开放时间。”（3）改善学校的环境，要求把北大一分校前面的土路修成马路。（4）如当选人民代表，争取将插队知青的工龄问题加以解决。（5）政治的改革。

这篇竞选纲领立即成了全校师生议论的中心。很快，校园里又出现了一些支持竞选的板报和文章。中午，该校团委一位学生干部（1976年“四五”运动英雄）贴出了给全校师生的一封信，推荐上述那位竞选者为海淀区人民代表候选人，信中详

详细介绍  
次日下  
会上，  
后历史  
民主作  
对政治  
人竞选  
池水中  
月，北  
北京师  
学院、  
等17月  
表选  
主  
额，是  
级一  
学生自  
的情况  
布“选  
又有  
①



详细介绍了该竞选人的经历，工作表现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次日下午4时，校学生会出面为竞选者组织了一次答辩会。会上，该竞选人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其中包括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看法；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功过评价；对民主体制的理解；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对政治课改革和对政治运动改革等问题的看法等。

几天后，北大一分校地理系的一位学生也宣布参加竞选，但最终没有成为正式候选人，而第一位竞选者则成功地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

北京大学第一分校这个仅有2年校史的市属院校最先有人竞选的消息在各高校中引起的震动，恰如在本已不平静的池水中又投入了一块巨石，立即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进入11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钢铁学院<sup>①</sup>、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经济学院、北京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分校等17所高校都有学生出来竞选。竞选高校立即成为区人民代表选举工作中最令人关注的现象。其概况如下：

北京钢铁学院 钢院全院为一个选区，有3个代表名额，是竞选活动开展得最早的院校之一。10月22日，机制系78级一学生以黑板报的形式公布了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寄给该校学生的一封信，其中主要介绍了4、5月间复旦大学学生竞选的情况。这封信在该院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29日，在该校公布“选民榜”的当天，这位学生也贴出了他的竞选宣言，随后又有3位学生宣布竞选。在整个竞选过程中，他们共举行了

<sup>①</sup> 现名北京科技大学。



3次答辩会，参加者绝大多数是学生，每次约四五百人。12月12日正式投票结果，一位60岁教授和炉系一竞选学生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但仍然有一代表名额未当选。12月18日进行补选，仍然未选出第3位代表，代表名额空缺一人。

北京师范学院 师院的选举工作也是师生混合进行，全校应有2个代表名额。11月1日，历史系77级一高干子弟首先在学校门口张贴了《竞选声明》，这一举动打破了自选举工作开始后师范学院的平静气氛。接着，中文系、政教系也有同学分别声明竞选。提名工作结束后，历史系、政教系、中文系各有一名竞选人脱颖而出，成为候选人中最有实力的竞争对手。由于这3位同学分别来自高干家庭、京郊农村和内蒙边疆（共产党员），因此，有人把他们称为“贵族代表”、“草民代表”、“党代表”。他们身后都有一批支持者。竞选活动前期，校内的大字报多是介绍竞选者个人经历、政治态度等内容，虽然也有少数对竞选人进行指责和攻击性的不署名大字报，却未引起大的风波。12月3日，在预选投票前，“贵族代表”突然发表了对“党代表”的《声明》，指责“党代表”在竞选期间经常出入于院方的某些办公室，言外之意是说“党代表”参加竞选是院方内定候选人使然，指责院选举办公室在处理竞选问题时有偏袒之嫌。与此同时，又有人在学生一食堂门前贴出《我们不要党代表》的大字报，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党代表”针对各种责难立即贴出了《对声明的声明》等几篇文章，力图澄清人们的非议。院选举办公室也为此而做了一番调查，但由于预选日期已近，终无力挽回影响。经历了这场争执之后，“党代表”在部分选民中出现了“信任危机”。12月11日预选投票结果，“贵族代表”得票名列榜首，

“党  
“草  
格  
时  
时  
候  
海  
过  
的  
的  
表

区  
批  
的  
系  
政  
民  
出  
又  
作  
判  
音  
《



人。生当月18人。全弟选举也、中、的竞和、活态度署名“贵”在“党公室主一火上明》而经。任危首，

“党代表”却从第2轮提名时的第3位落居正式候选人之外，“草民代表”从原来的第4位跃居第3，获得了代表候选人资格。事后，当不少选民回味起“贵族代表”与“党代表”之争时，不禁对其中的某些竞选动机产生疑问，因而在正式投票时态度发生了变化。12月18日正式投票结果，处在第2位的候选人——化学系一副主任得票跃居第一，超过半数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而“贵族代表”和“草民代表”的票数均未超过半数。12月25日全校再度投票，“贵族代表”与“草民代表”的得票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最终失去了当选区人民代表的机会。师范学院竞选结果：5名主要竞选人无一成功，代表名额空缺一人。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学生与教员各分一个选区。学生选区共有选民6084人，应选代表2人。11月3日，北京大学第一批竞选的3位学生同时宣布竞选，并贴出介绍自己政治观点的大字报。他们分别来自经济系、国际政治系和技术物理系。3天后，哲学系一同学宣布加入竞选。当天下午，国际政治系候选人举行第一次答辩会，到场听众约500人。《人民日报》有记者到会采访。11月7日，哲学系一研究生贴出《竞选宣言》并于当日下午与选民见面，回答问题。此后，又有国际政治系、中文系、哲学系、法律系、经济系、图书馆系等十几名学生相继登上竞选擂台。各种规模、形式的答辩会、演讲会、谈话会也几乎每日可见。与此同时，文科系部分学生先后创办了以反映竞选动态为宗旨的小型刊物：《竞选动态》、《竞选短波》、《历史的一页》、《观察》，还组织了“北大竞选资料汇集小组”等。

11月6日，北京市委下达《关于当前选举工作中几个问

题的通知》，就选举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下达了原则性的指示。11月10日晚，部分竞选人（或代表）和《竞选动态》等3个刊物的代表召开会议，就竞选中可能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会上否决了一些人关于起草《告全市高校同学书》的建议，决定委托《竞选动态》编辑组起草由全体与会竞选人签名的《告北大学书》，正面阐述他们对北大竞选活动的看法。会上还决定，今后各竞选人之间要加强联系，不互相拆台，不搞人身攻击，不搞小动作。

北京大学的十几名竞选人讨论最多的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在多次辩论中逐渐分化出了所谓“务实派”与“务虚派”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根据面临的实际条件（人民的民主素质和经济发展水平）一步步展开；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只有对长期以来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够实现高速发展经济的目标。在竞选过程中，尽管双方没有展开大的正面论战，但认识上的分歧却是显而易见的。直到12月中旬投票工作结束以后，这场争论才暂告一段落。12月11日北大学生选区正式投票。选举结果是，哲学系一研究生竞选成功，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12月18日，在补选投票中，另外2名候选人均未过半数。北大学生选区另一名代表名额空缺。

北京大学的竞选活动中，有一些竞选人还就某些专门性问题起草了书面意见并发起成立组织。如自发刊物《北京之春》一成员（竞选人）草拟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建议草案）》，经济系、法律系、国际政治系的一些学生撰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印刷、发行法（草案）》。一女竞选人以研究妇女解放问题的名义发起成立了“中国女性研



究学会”。这些活动虽然一度引起较大反响，但很快就在党组织的制止下销声匿迹。12月底，北京大学的选举工作结束。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的区人民代表竞选与校学生会主席的竞选是并行的。9、10月间，校学生会在筹备召开学生代表大会时曾经酝酿过学生会选举方式改革的问题。10月29日，工程物理系77级和电机系77级的2名同学利用一次讲座开始前的机会，当众宣布要竞选学生会主席。次日，其中一学生贴出竞选宣言，提出学生会要具有独立性，发表了对学校各方面工作的看法。这个行动引起了同学们的兴趣。11月5日，30名学生贴出文章，要求用竞选方式选举产生学生会主席，并得到许多同学的响应。于是，校学生会决定由学生代表大会来确定选举办法。事先，学生会拟定两套学生会体制方案和选举办法，由每班选定的一名学生代表向全班同学征求意见，然后由学生代表投票决定。其学生会体制方案是：第一，由选举产生的、按系学生人数分配名额的委员组成学生会的委员制；第二，由选举产生学生会主席，再由主席挑选2至4名副主席，然后由正副主席共同挑选各部部长，再由正副主席、各部部长与各年级选派的一人共同组成常务代表会议的组阁制。选举办法的方案是：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

最后，经由189名学生代表组成的学生代表大会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以119票通过了组阁制方案，以150票通过了直接选举办法。清华大学选举海淀区人民代表的工作是从8月中旬开始的，当时学生选区共有选民5161人，应选代表2人。这恰与学生会主席的选举同时进行，两者都是先广泛提名，然后由每个系定出一名候选人向全校推荐，也允许同学自荐。经过这些程序后，共产生学生会主席候选

当票字答票半  
另  
个民当民是生草  
· 得制  
票出代  
有

人4名，海淀区人民代表候选人13名。

12月5日，经过预选投票，电机系77级、经济管理系、化工系77级各有一名学生会主席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候选人。12日，在选举学生会主席的表决中，工程物理系77级的一位共产党员当选为学生会主席。此后，电机系一位共产党员和经济管理系的一位研究生竞选成功，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

中国人民大学 人民大学选区共有选民5460人，有2个代表名额。其竞选活动发起于11月6日，先后有6名学生参加。北京市委通知下达以后，人大党委及时向党员传达，并要求党员不参加竞选，一些原已参加竞选班子的党员立即宣布退出。参加竞选的多是非党、团学生。选举工作中期，虽然又有党员、学生干部宣布竞选，并成为候选人，但在选民中的影响不很大，正式投票时落选。在竞选中答辩、演讲十分活跃的语言文学系一研究生竞选获胜，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另一当选者是校工会的一位干部。

在竞选活动中，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同学创办了《竞选之声》黑板报，专门介绍竞选进展的情况。

北京航空学院 北航选区应选代表3名。11月7日，当选举工作进入酝酿候选人阶段时，先后有3位学生出来竞选，学校方面采取了既不提倡也不压制，立足于做好工作，不受其影响，只要不违反选举法就和其它候选人一视同仁的态度。前期的选举工作比较顺利。但是，12月10日，在5名正式候选人早已确定、距投票时间仅仅半小时之隔的时候，又有三系一学生违反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在交通要道路口和选举地点贴出了5份声明竞选的小字报。结果，除一名候选人



当选外，其余4名候选人均未过半数。12月24日，在补选投票之前，该学生又贴出2份指责校选举办公室违反选举法的小字报（该学生所提问题市选举委员会已于22日上午作了明确答复），在选民中引起不良影响。第二次投票结果，该学生得票数虽然从第一次投票的第6位跃居首位，但仍然没有超过半数，不能当选。

航空学院选区选举结果是，选出正式区人民代表一人，另外2个代表名额空缺。

中央民族学院 民院与民族歌舞团、民族印刷厂同为一个选区，共有选民5002人，应选人民代表2人。11月10日，历史系78级一26岁的湖南土家族学生贴出《竞选宣言》。当天下午他便在历史系选民会上作了竞选演说，赢得与会选民的支持。五、六天后，又有4位同学声明竞选。他们有的是著名学生干部，有的是少数民族同学。在竞选中，民院学生普遍关心民族问题。他们认为，民主改革必须同民族政策改革联系在一起。他们要求改革现行民族学院的培养方向，“不仅要培养一大批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还要培养“与我国的第一流的专家并驾齐驱的人材”，“这是民族教育取得完全独立的标志”。此外，竞选人还就他们对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发表了意见。

12月16日，民族学院与民族歌舞团、民族印刷厂同时投票，民族学院一位副院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和第一个站出来竞选的学生的得票数分别超过半数而当选为海淀区人民代表。

北京师范大学 师大的竞选活动从11月14日开始，陆续有14名学生竞选。由于师范院校的特点，竞选人在《竞选宣



言》、演讲、座谈、答辩中除阐述了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改革和政治问题以外，还比较多地发表了对我国教育制度、体制和师大培养目标等问题的见解。师大的选举工作于12月下旬结束，3位代表全部选出，其中一名代表系参加竞选的研究生。

北京经济学院 经济学院应有区人大代表一人，在选举过程中，先后有劳动经济系、工业经济系和物资管理系的3名学生竞选，但均未成为候选人。最终选举结果，无一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经济学院人民代表名额空缺。

此外，北京医学院、北京商学院、人民大学第一分校虽也有人竞选，但均告失败。

在这次竞选活动中，北京共有17所高校近百名学生参加竞选，其中北京大学18人，清华大学13人，中国人民大学6人，北京师范大学14人，师范学院7人，民族学院5人，北大一分校2人，钢铁学院4人，经济学院3人，北京医学院一人，北京商学院3人，北京航空学院6人，人大一分校3人。除此之外，还有邮电学院、北方交通大学、人大二分校若干人。另外，也有一些中途退出或活动不多、知名度较低的竞选人。在参加竞选的同学中，有1976年“四五”运动的积极分子，有自发组织、自发刊物的活跃人物（6人），有共产党员（18人）、共青团员（34人）、学生干部，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有男同学也有女同学。他们抱着各种不同的想法参加竞选，其中多数人的动机是想通过亲身参加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这样的民主实践，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民主化道路，但也有少数人想借竞选讲坛出风头，提高个人知名度，宣传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因此，在竞选过程中各种不同观

点、  
选举

借此  
期申  
研究  
选利  
自发  
串联  
竞选  
个问  
料。  
出其

校等  
工厂  
竞选  
上，  
验”  
右的  
否则  
形象  
维护  
下要  
避的



点、政见的争论比较激烈。12月底，北京市各区人民代表的选举工作陆续结束，竞选也随之告终。

### 三、暴露了什么

竞选活动中暴露出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少数人试图借此之机发展具有广泛社会联系的横向组织，以为今后的长期串联作打算。12月18日，北大少数学生发起成立《中国女性研究会》，邀请了外国记者、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外校一些竞选积极分子参加。12月19日，部分高校竞选人（多是1978年自发组织、自发刊物成员）发起在师范大学一学生宿舍召开串联预备会，会上决定于12月27日在人民大学正式召开各校竞选人串联会，讨论竞选总结、两代人的鸿沟、政治改革3个问题，并决定由到会人分头起草上述3个内容的文字材料。这些串联活动使得少数怀有不良动机参加竞选的人暴露出其真实面目。

27日（星期六），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大一分校等校几个自发组织成员，串联北京10余所高校学生和少数工厂工人约80余人在中国人民大学集会。与会者分别就各校竞选情况、两代人的鸿沟、政治改革等问题发表了意见。会上，一个持有自由化观点的竞选人介绍了他竞选成功的“经验”。他说：据北大调查统计，只有30%的人比较激进，51%左右的人是赞成稳健的、稳重的改革的。我想我应该稳重一点，否则选票就拿不下来。作为权宜之计和策略，我就尽可能把形象扮得温和一点、稳重一点。答辩时，我坚决坚持四项原则，维护安定团结，在安定团结前提下要求民主，在四项原则前提下要求改革。我对一些尖端性的问题如魏京生问题，都采取回避的外交辞令。尽管有些人不满，但我料定他们会投我的票。



这次串联会议从下午2点开到晚上9点35分。会间有人要求通过“会议纪要”、“竞选总结”、“政治改革的意见”（给党中央的一封信）等3个文件，并准备向社会散发，扩大影响，与中央“对话”等，但因到会的清华大学学生代表反对而没有通过。

29日（星期一），部分院校竞选人在北京大学一学生宿舍继续开会，讨论27日会上议论的3个文件，意见仍很难统一。于是决定次年1月5日在清华大学由当选的海淀区人民代表（竞选当选的学生）讨论提案。会后，有人提出他们很难与清华大学学生代表达成一致，建议撇开清华代表，提前于次年1月4日在师范学院另外召开串联会。

1981年1月4日（星期日），北大、北大一分校、经济学院、钢铁学院、民族学院、北京医学院、师范学院7所院校的10名竞选人在师范学院一学生宿舍开会，讨论给中央写信和竞选总结两件事。会上，师范学院一竞选人起草的信稿中主要写了两个内容：一、我们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二、竞选中涌现出一批人才，是干部苗子，请党中央重视这些人才。会上，有的学生提出：这种活动是不合法的，不同意通过给中央的信。于是，会议没有任何结果地结束了。

1月5日，当选海淀区人民代表的8名学生在清华大学开会，讨论修改后的“竞选总结”和“区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草案），均未获得一致意见。

1月8日，又有9名竞选人在师范学院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北大一竞选人起草的“竞选总结”。此后，他们曾计划将此材料广泛扩散，征集更多人的签名以形成社会影响。

1月9日，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意见，中共北京市委召

集北  
生串  
系列  
出如  
气壮  
误思  
作；  
不得  
不得  
非法  
法组  
些刊  
不允  
间、  
合。  
底，  
观点  
的辩  
热烈  
步骤  
“文化  
到尖  
象比



人要  
党中  
向,与  
有通  
主宿  
准统  
人民  
们很  
是前  
经济  
院写  
稿竞  
才。  
给  
学  
论  
计  
召

集北京大学等10所高校党委书记会议，讨论少数参加竞选学生串联集会问题及处理意见。会议认为，少数竞选学生的一系列活动是“西单墙”、自发组织活动的继续和发展，据此提出如下处理意见：一、要动员全体党员和干部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二、进一步加强对少数错误思想严重的学生和自发组织成员的个别争取和教育挽救工作；三、在党、团内讲清道理，明确宣布：党员、团员一律不得参加非法串联集会、签名和印刷、散发非法材料等活动，不得参加非法组织。

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就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发出指示，要求严厉取缔各种名义的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决不允许这些组织以任何方式活动、这些刊物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以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联，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在中央和北京市委坚决、有力的制止下，到1981年1月底，竞选人之间的串联活动渐渐消失。

#### 四、唇枪舌剑议中国

竞选与以后的历次学潮相比较，以其理论上、政治上不同观点的激烈交锋而见长。在那短短的一个多月中，大大小小的辩论会、演讲会、座谈会见于各校。会场上，与会者情绪热烈，辩论双方唇枪舌剑，旁征博引，分别就中国改革方向与步骤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问题、毛泽东同志的功过问题、“文化大革命”问题、民主自由问题等进行了广泛的论争。遇到尖锐问题时，往往是台上台下各执话筒，直抒己见。这种现象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拨乱反正以来人们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



认识上的分歧，实际上这也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两种改革观的大论战。这场争论对高校后来的学潮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影响。归纳起来，这场争论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的：

第一，关于改革。改革，这个新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在各行各业人们思想深处引起的反响是非同一般的。因此，每个竞选人都毫无例外地用比较多的笔墨阐述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但人们对改革的认识上却存在着原则上的分歧。例如：一部分同学认为，改革必须是“建设性地批判地面对现实”，这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调整过程。他们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已经确立了“一条旨在解放生产力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可是，我们的政治经济结构中，有某些部分也束缚生产发展”这就是我国必须进行改革的原因。

他们还认为，改革是一个涉及到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系统工程，“必须全面进行”。但是，“经济改革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影响的国家，改革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要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限制和制约，其中最大的制约就是经济的发展水平。因此，“只有经济改革才能最有效地或者说从根本上突破封建因素对中国的束缚”。他们认为：改革是一个客观的过程。“政治改革要以促进社会繁荣稳定和人民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为目的”。在政治改革中，凡是能够从本国实际出发，“符合这个历史进程，提出正确的口号和要求，建立相应的民主制度的人们就会赢得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凡是不了解这个进程，自以为是地照搬别人做法的人们必然会给国家带来混乱和停滞。”因此，“改



革的方式应尽可能地缓和与稳妥。”特别是在当前的国内外环境下，一系列的“改良”远远胜过一次惊天动地的“革命”。他们还呼吁同学们在谈论改革问题时，千万不要忽视了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不要忘记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想得更多的是什么，不要总是“抱怨人民群众觉悟低，不理解和不支持自己的改革愿望”，而应该立即停止叹息和责难，放下架子到工农群众中去寻找自己与社会现实的结合点。这样才可以冷却知识分子“不切实际的一时狂热，从而使我们具备持久的积极性，这种结合乃是历史潮流的结合”。

而另有一些竞选人则强调改革的“破坏性”，尽管他们也在讲经济战线、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相互关系，讲生产力水平是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最终决定因素，然而，他们在具体分析中国改革实际状况的时候却又不适当地强调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一名竞选人在他的演讲中忘记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为了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他把解放思想在改革过程中应有的提前量不适当地提到了高于一切、压倒一切的位置上去了。他在一次演讲中说：“经济重不重要？重要！我始终认为很多问题的根本解决取决于经济，因此经济是基础。但是我们是不是解决任何问题都必须从经济入手呢？不一定！我们盖房子当然要从地基开始盖起，先是地基然后是一层、二层、三层……这是一般常识。可是同志们别忘了我们现在是在改革。我们正在拆房子，拆房子却是要从最顶一层拆起的。这最顶一层，就是言论专制、思想禁锢。”可见他并不是把改革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过程，而是看作一次需要从基础上“拆除”、“打碎”的对抗性行动过程。



接下来他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有人说我们不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思想就不能得到解放，言论就不可能自由。这话对不对？对！但也不完全对。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在苏联、在东欧，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大致相同，可为什么波兰的工人就能够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而其他国家的工人就做不到这点呢？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波兰工人的思想比其他国家工人思想要解放。波兰的工人有战斗性，他们有战斗的传统，战斗的勇气，最重要的是他们有战斗的觉悟。”这里，他把波兰因改革中的某些挫折而引起的社会动荡作了完全积极的解释。这种极端偏激的观点反映了少数大学生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毒害的严重程度。

第二，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解放思想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根本区别之一，也是竞选争论比较多的问题。许多竞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在几十年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还有几千年的封建影响，如果想立即实现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根本不可能的。“超乎条件的允许，想快，实际只会慢”。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了30年的今天，要想稳定地发展经济，“中国不需要也不可能实现根本制度的逆转，这种逆转本身就是一场大灾难。”因此，中国的改革必须“在改善党的领导的前提下，由党来领导实现这一目标，加速这一进程。”有的同学说：中国共产党是目前能够代表中国最大多数群众利益的政治集团，虽然“许多年来，我们的党犯了严重错误，中国人民对此很不满意，有不少人感到伤了心，意见是很大的。但有人如果据此以为人民要抛弃这个党那就大错特错了。人民批评党，就象母亲批评儿子一样，他们是希望我们的党前进的。

我们的  
会以  
靠那些  
地的  
民族  
强大  
的思  
讲其  
出“不  
还有一  
“优越  
中，无  
人都承  
浩劫，  
是，在  
社会  
“文化  
为：“  
“建立  
人民自  
中看到  
机主要  
以革命



我们的党也在不断剔除自身的痼疾，这一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目共睹的事实。我坚信，中国的事情要办好，不能靠那些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轻浮的人们，还是要靠顶天立地的共产党。靠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这一点已被中华民族从列强铁蹄下的解放所证实，这一点还将被中华民族的强大所证实。”

但是，由于社会上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在高等院校中影响比较深，少数竞选人在演讲会上大讲其“祖宗三代没有一个党员”，竟博得掌声。有人则公开提出“不要党代表”、“选举工作要独立于党的领导之外”等观点。还有一些竞选人不谈中国国情，大肆鼓吹“多党制”的所谓“优越性”，主张在中国实行“多党制”。

第三，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竞选过程中，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的评价问题也是每个竞选人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竞选人之间的共同点是都承认“文化大革命”在客观效果上是我们国家的一次灾难和浩劫，是我们党和人民应该深刻总结、永远记取的教训。但是，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发动原因和产生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等问题的认识上也存在着不同观点。有的学生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少数领导人错误发动的浩劫。有的学生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该是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其任务就是“建立一套使实际掌握着生产资料的国家或当权者真正代表人民的民主制度”，并且推测毛泽东同志正“是从苏联的镜子中看到了官僚主义的危险”，所以，“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主要是好的，但由于他用一种落后的思想去指导革命，所以革命失败了。”有的同学把“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社会历史



根源归结为“两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仍然改头换面地在各式各样的中国人头脑里占据着统治地位”。

至于对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多数学生认为：应该全面地看待毛泽东同志。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巨大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晚年的错误也是严重的，但他仍然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有个别同学提出：“毛泽东同志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伟大的中国革命家”。这种观点的论据是：

（1）在社会主义时期中，毛泽东同志主要是注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对社会发展的矛盾关系，而没有注重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2）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同志既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模式建立巴黎公社和苏维埃式的政权，也没有“采取当时历史上最先进的民主制，还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制。这样就领导中国事实上建立了一种专制性的政治体制，就是保留了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带领农民打天下那样一套政治思想工作方式和政治体制”；（3）毛泽东同志对待文化遗产不是采取扬弃的态度。以上观点在竞选中曾受到很多同学的批评。

第四，关于民主自由。民主自由问题历来是两种思想、两种世界观分歧的交点之一，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们总是把民主自由当作旗帜，以此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利和王牌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而无产阶级又有着自己的民主自由观，这个问题也是竞选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有的同学认为：“民主化是一个客观进程，其制约条件就是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国民教育制度。”因此，“经济上的民主和政治上的民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其中经济的民主是

内容，政  
超社会历  
学举例说  
天这样的  
民主形式  
几百年得  
确实比较  
们的大多  
勤，一切  
民主却被  
之内，而  
单——私  
纵选举已  
也没有可  
然没有什  
本条件，  
状况来看  
如果忽视  
或者一些  
疑会影响  
政治改革  
另外  
会发展才  
的影响，  
好话、切  
然否认在



内容，政治的民主是形式。”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超经济、超社会历史（在阶级社会里也没有超阶级）的民主。有的同学举例说：在生产水平极低下的奴隶社会就不可能提出今天这样的民主要求。又比如“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民主形式（仅仅是形式）是大有可取之处的，资产阶级摸索几百年得出这么一套严密的条文，这一制度对资产阶级来说确实比较民主。政府官员、议员是他们选出的‘公仆’，代表他们的大多数的利益，当他们不满意时，可以撤换、罢免、弹劾，一切都在一个严密的制度下有条不紊地进行。可是这种民主却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被限制在有钱人的范围之内，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实际享受不到，原因很简单——私有制的存在。以美国为例，资本家集团利用金钱操纵选举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没有钱的老百姓既没有可能当选，也没有可能决定谁当选。所以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劳动人民显然没有什么实际的民主。”真正的民主制的实现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经济的高度发达，二是公有制。从中国目前的状况来看，要搞政治改革，健全民主政治就必须搞经济改革。如果忽视中国的现实可能性，“把那些将来才能实现的措施或者一些根本不合乎中国实际的措施硬要搬到现在来做，无疑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从而给经济改革带来障碍并最终妨碍政治改革的进行。”

另外，也有一些竞选人主张绝对的、超越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自由。一名竞选人闭口不谈舆论导向在实践中的影响，鼓吹绝对的言论自由“那就是发表各种言论的自由，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统统包括。”他甚至公然否认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垄断舆论的事实，否认资



产阶级所谓言论自由的虚伪性，把资本主义的民主捧为最公允、最“先进的”制度。他还主张舆论独立于党、政的监督之外，主张搞“多党制”的“互相监督”。有的竞选人提出中国要补资本主义的课。有的竞选人表示反对在宪法中取消“四大”，说宪法中虽已取消“四大”，但并不意味着“四大”非法。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包括有“四大”的内容，因此，不应该取缔西单“民主墙”这种形式。少数竞选人提出“反对任何人以政府的名义对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进行干涉和任意侵犯”。由此，他们公开为因反革命煽动罪而被判刑的魏京生鸣冤叫屈。还有个别竞选人别有用心地煽动：“历史上从来没有暴君独裁施舍民主自由的先例，任何民主、自由、进步的力量都是对反动势力的否定。与此相反，我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美国黑人争取平等的斗争、波兰工人的罢工斗争，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这些观点对当时的以至于后来的一部分大学生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上述这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文章多被北京大学竞选资料汇集小组整理汇编，以《开拓》的书名打印收藏。

### 第三节 严肃的启示

#### 一、一次早夭的民主试验

1980年北京部分高等院校的竞选活动以11名竞选者当选为区人民代表的结果而告终。从表面意义上看，竞选似乎是被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所承认和接受了。据此，有人认为竞选这种方式是成功的。但是，也有人认为，竞选虽然一时间轰轰烈烈，竞选出的人民代表却没有对社会改革、对高校工作、对大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的解决产生任何作用，相反却暴露

出了严  
夭的民  
第  
致竞选  
一定的  
是有利  
数同学  
曾向同  
的政治  
把竞选  
他们把  
否定社  
会以后  
认识，  
向了背  
但它不  
是高校  
竞  
所认识  
产党员  
露出的  
的民主  
充分显  
切关注  
革满怀  
青年是



出了严重的问题。因此，从更深的意义上讲，竞选是一次早夭的民主实验。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根本上讲，少数人扭转了选举工作大方向是导致竞选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我们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范围内，采用自荐的方式参加选举或许是无可非议的，是有利于探讨我国民主建设道路的。事实上，参加竞选的多数同学也是抱着这样的积极愿望和良好动机的。不少竞选人曾向同学们公开表示，个人是否当选事小，实际地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建设是最终的目的。但是，也有少数人把竞选看作是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好机会、好讲坛。他们把不少大学生的注意力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扭转到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上去。这些观点极端偏激的竞选人走上社会以后出现了分化：有些人经过社会实践的锻炼改变了错误认识，有些人则沿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路越滑越远，以至走向了背叛国家利益的道路。这种背叛行为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但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何消除这种恶果的重复发生，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竞选中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在当时就已被不少人所认识。选举工作结束以后，北京大学一位二年级学生（共产党员）在写给党委的一封信中指出了这次竞选的意义和暴露出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做了深刻分析。他说：“学生区的民主选举工作结束了。在一个多月的辩论中，北大的学生充分显示了具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对我国政治、经济、教育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改革满怀着坚定信念的优秀品质。许多言论说明，我们这一代青年是最少保守思想的一代，将能够担当起继往开来的历史



重任。同时也要看到，一个多月的辩论集中地暴露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同学们的认识还存在着重大歧异，诸如关于党的领导、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关于建国30年来的教训、‘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方案、步骤等等。用资产阶级反封建时期的理论冒充马克思主义，还颇能混淆视听；否认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观点还仍有市场。这种现象是不奇怪的，因为酝酿改革的时期正是各种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各种思想的激烈争论将成为社会改革的前奏。但这种现象是值得重视的，它说明在新的形势下，从最普遍的常识到最复杂的社会问题都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作出最有说服力的回答。我们的思想阵地需要马克思主义去占领”。这个同学的认识反映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同学的思想状况。他们不同意少数人用否定我们党和国家的基本东西去哗众取宠。

第二，大学生脱离社会实践，盲目欣赏高谈阔论是竞选失败的重要原因。1980年，参加高校竞选的大学生中虽然有不少人是在社会实践中锻炼过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未涉世事的“三门”学生），但是，由于知识分子固有弱点的作用，使得整个竞选活动充斥着一种膨胀的空谈气氛。学生中普遍存在着重“宣言”，轻实际；重口才、风度，轻政治倾向和风格的现象。一些敢于用武断、吓人的判断哗众取宠的人往往博得掌声，而那些比较理性、冷静、更接近中国国情的分析则可能被视为“没魄力”、“不过瘾”而引不起重视。因此，当选的人民代表并不都是学生中的最优秀分子，其中还有宣传严重错误观点的人物。这种校园文化圈与社会实际的强烈反差，从基础上注定了高等院校学生竞选将一事无成的命运。



第三，竞选人本身的民主素质不高是竞选不成功的又一因素。在竞选中，一些竞选人为了多捞选票采用了人身攻击、吹吹拍拍、纠缠个人恩怨等资产阶级选举活动中不健康的做法，引起了不少正直学生的反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竞选的实际效果。这种情况表明，在所谓“民主意识相对较强的高校学生”中，其自身的实际状况也与他们所追求的东西相差甚远。

## 二、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挑战

高等院校学生竞选活动是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社会大背景下、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初始阶段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事件。事前，各级党组织和政治工作干部的思想准备都是很不充分的。因此，事情出现以后，各校采取的具体对策也不尽相同。通过竞选中的工作实践，广大政治工作者普遍意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政治工作模式需要改革，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

首先，宣传舆论工作不利。宣传工作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解放思想以来，由于一些从事报刊、新闻、宣传工作的同志没有树立用正确的舆论引导群众思想倾向的牢固意识，曾几度出现宣传舆论倾斜的问题，这使得党中央的声音、精神不能准确地贯彻到群众中去，有时还使群众产生误解。在竞选过程中，一些竞选人对政治改革的看法和言论自由等问题上的偏激观点都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找到影子。这说明，改革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首先端正宣传工作方针，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其次，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落后。在竞选活动初期，各学



校普遍感到突然，不知所措，一般采取了不支持也不反对的冷处理对策，但这并没有给竞选降温。相反，一些本无意竞选的学生误以为党组织赞成竞选，想以此推动民主化进程。这部分人中的积极分子也贴出了“竞选声明”，参加竞选的人数反而增加。少数竞选人还以介绍自己的机会搞大鸣大放，散布了各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观点。形势的变化向高校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提出了随机应变、坚持真理的新要求。有的学校党组织适应这种要求，支持共产党员站出来竞选，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例如清华大学化工系78级的一名学生在竞选中发表了一系列损害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言论，而且得到一部分同学的支持。这个系77级学生党支部的十几名党员开会分析了形势，认为这是有人向党挑战，必须挺身而出，给予反击。他们决定推选一名党员学生参加竞选。这个党员表示，只要党需要，自己随时可以参加斗争。第二天，他就参加了竞选。由于这个党员思想、学习、作风都比较好，在同学中有一定的威信，他一站出来，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那名发表错误言论的学生竞选失败了。

在竞选过程中，各种思想的交锋异常激烈。少数竞选人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下宣扬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多党制”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甚至提出要同“现代的专制主义做斗争”等等。一些共产党员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同这些错误言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在北大的一次辩论会上，一名竞选人在台上引经据典大谈所谓绝对的言论自由，一名党员候选人在台下手持话筒与他争辩。这种理论上的斗争近乎白热化。当时，有些同学问那位党员：“作为竞选人，你在公共场合搞这样的大动作是否会丢选票呢？”他

说：“争  
问题的  
斗争经  
惑的心  
中的选  
员竞选  
他竞选  
向，重  
和绝  
大同

参加  
传播  
来太  
就相  
没有  
总结  
大胆  
种的  
主的  
的教  
灵活

高校  
入学  
许多



说：“我不仅要为个人负责，更重要的是为历史负责，对重大问题的分歧决不应妥协。”他还针对广大学生热情高涨而政治斗争经验不足，容易被某些竞选人的理论、风度、口才所迷惑的心理，用法国人民的惨痛历史教训告诫同学们：珍惜手中的选票，以防投给路易·波拿巴式的政治骗子。还有些党员竞选人，面对台下极富嘲讽的提问，郑重地说：“我和其他竞选人有共同的感觉，就是在这次竞选中有不好的倾向，这种倾向对竞选是不利的。我希望少数同学要以大局为重，以大多数同学的利益为重。”这些共产党员为了党的利益和绝大多数同学的利益而参加竞选斗争的真诚态度得到了广大同学的钦佩和欢迎。

从竞选的实践来看，凡是有共产党员和学生骨干站出来参加竞选的院校，其思想理论交锋就比较激烈，错误思潮的传播就受到限制；凡是没共产党员参加竞选或共产党员出来太晚的院校，一些错误观点的传播者在群众中受到的批评就相对少一些。那些对自由化观点持否定意见的学生也因为没公开的代言人而不能充分发表意见。因此，一些院校在总结竞选工作时深切地感到：在有竞选活动的情况下，党员大胆地参加竞选是有利于加强党对选举工作领导的，这是一种主动出击的领导方式。这段工作的实践说明，面对活生生的教育对象，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必须更新，必须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理论性与针对性的统一。

再次，思想政治工作内容陈旧。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课是高校向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的主要途径。1978年春节后入学的新一代大学生在解放思想的洪涛中，思想异常活跃，许多在50或60年代大学生那里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他们

眼中都成为问题。特别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下，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成为他们怀疑的对象。显然，面对新一代大学生中出现的新情况，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课在内容上应当改进，唯此才能增强吸引力和说服力，达到教育的目的。但是，高校中的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课并没能适应新情况而改进内容，用的还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教本。大学生对这种马列课普遍不感兴趣，所以也难以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

不政在这题在

期动做但学次靖解



下，  
他们  
已，马  
引力  
基础  
大革  
以也

## 第三章 新“九一八”

1985年9月，在北京大学校园中，爆发了一场规模不大不小、以抗议日本首相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对华经济政策为主题的学生运动。9月18日下午，近2000名学生围聚在北大校南门，呼喊<sup>为什么</sup>着，要求到天安门广场进行示威游行。<sup>不呢？</sup>这种非理智的要求无疑受到了劝阻和制止。于是，爱国的主题消隐了，“民主与自由”的永恒旋律再度奏起，并波及部分在京院校及其它个别省市。

### 第一节 打破平衡的砝码

直到1985年，喧嚣不已的校园宁静了将近5年。这一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青年精神状态的最好时期。代替不安与躁动的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做贡献”的行动口号，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但是，1985年下半年，突然爆发了影响广泛的、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主体的“九一八”学潮。从此之后，学潮年年不已。这次学潮难道真的仅仅是抗议日本对华经济政策和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的单纯行动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到底是什么打破了维持5年之久的平静。

#### 一、改革呈现艰难

当校园中书声朗朗的时候，中国正在经历着建国以来最深刻的变革。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使这一时期的中国呈现出一种多变的特点。敏感而又缺乏经验的青年学生处身巨变，既新奇又不安，社会改革中的每一次震动都可能诱发他们作出强烈的反响。1985年，几个震源叠合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党确定了拨乱反正和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方针。在青年学生们为思想解放运动奔走疾呼的同时，农村经济改革已经有条不紊地拉开了序幕。多种经营及集市贸易的恢复，各种形式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使死气沉沉的农村经济很快焕发了活力。在这个基础上，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大会确定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目的，坚持国营经济为主导地位的多种经济形式，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不断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一切很快收到了成效。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农业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的转变。城乡渠道不断疏通，为日益增多的农产品开拓了市场，同时满足着农民对工业品、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需求。农业经济的欣欣向荣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形势的好转，城乡居民普遍感到了生活水平在提高。

但是，改革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提倡高指标、强调刺激消费、把消费放在生产前面的错误主张。一时间，报刊舆论纷纷宣传“能挣会花”是现代人的主要标志之一等观点。没多久，经济发展严重失控，社会总分配远远超出社会总供给。1985年初，生活日用品，特

别是各类食  
除上  
许多不完  
杂的，有些  
分配建立  
分配的腐  
不断地加  
中，总是  
而气不壮  
这一  
不到，他  
的骚动与  
二、  
1985  
二次世界  
新闻舆论  
略暴行及  
当带着这  
的“小日  
情是很复  
从  
年中日  
到历史  
出口额  
于我国  
义与贪



长最  
理变，  
作  
到  
调  
走  
多  
制  
82  
明  
改  
多  
制，  
村  
的  
办，  
农  
城  
程  
面  
代  
社  
特

别是各类食品大幅度涨价，人心不稳。

除上述失误之外，我们必须看到，改革本身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当然，造成这种缺憾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有些失误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不完善使利益的重新分配建立在一个不公平的基础上，特别是利用权力参预物质分配的腐败现象，使群众中由于对改革不理解而产生的不满不断地加剧着，也使我们的党和政府在推行改革政策的过程中，总是受到干扰，总是要为内耗付出代价，总是有些理直而气不壮。

这一切，作为最敏感、最激进的青年学生们不可能感受不到，他们的内心平衡不可能不被扰乱，由此引起他们情绪的骚动与行为的冲动。

## 二、日本到底是谁

1985年正是这样一个敏感的年度。这一年是世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40周年，中国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国内外新闻舆论等各种宣传机构都在回顾、声讨40年前德、日的侵略暴行及非人道行径。这一切无情地勾起了人们的痛苦回忆。当带着这种回忆的中国人看到当年以军备强大而凌辱过自己的“小日本”，今天又以经济的强盛骄傲地立于中国之侧，心情是很复杂的。

从1983年以来，中国与日本进出口贸易始终逆超。1985年中日贸易进出口总额比1984年直线上升了40多个亿，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164.4亿美元，其中进口额108.3亿美元，出口额56.1亿美元，两项逆差52.2亿美元。不仅如此，由于我国经济技术发展的长期落后，信息不灵，再加上官僚主义与贪污腐败作风，使一些日本商人乘机向中国市场倾销了

一批过时淘汰的机械设备和低质劣等商品。这一切使中国既痛恨国内某些干部给国家经济建设带来巨大损失的腐败作风，又痛恨“精明的小日本”坑害在二战后原谅了他们历史罪行的仁义之友的恶劣行为。特别是有关宝钢的问题，当时，对于宝钢工程是否上马一事争论的十分激烈：选地是否得当、投资的效率和建成后的生产能力等等，都是争论的焦点。这种可行性论证中的争论，很快对社会产生了影响，引起了关心国事的人们的普遍不安。风言风语开始出现了，其中最让人不满的一条消息是：“宝钢一期工程被日本人讹走了20多亿的美分”。

实际情况是：宝钢第一期工程只花了不到127亿人民币，其中包括了折合成人民币的27亿多美元，即使加上第二期工程的概算，宝钢总投资也远远不到200亿美元。宝钢的选址，是经过充分论证的。在当时只能有两种选择：一是选在虽然地质较好但地处偏远的地方，一切辅助条件都要从头创造；一是选在现定的上海宝山。经过反复权衡，有关专家认为：从宝钢的发展前景来看，一方面这种大型重工业企业的建设必须有相当的工业基础为依托；另一方面，必须有相对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宝钢所采用的是最先进的设备，生产原料必须是含铁量很高的富铁矿石。这种矿石只能依靠从澳大利亚进口，港口的作用至关重要。上海，恰恰具备了这两个优势。至于宝钢建设初期求成心切、投资过快的失误，从1980年后中央对此尽可能地采取了调整措施，一部分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而且从长远战略考虑，建成宝钢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在事实不明的情况下，真实的和虚假的混在一起，只能是真假莫辨。一时间，宝钢问题成了关心



国经济建设的人们的热门话题，也成了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最大例证。在这种形势下，青年学生们轻易地接受了中央高级领导人中存在着“亲日派”的说法。据此，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我们工作中的一些偏差和不成熟的地方归结到所谓“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身上。

在我们反省自身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正在不断抬头，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倾向和影响确实存在。1982年，日本文部省不顾中国等东南亚国家的一致强烈反对，违背事实地修改日本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抹杀侵华历史，特别是对“南京大屠杀”真相予以掩盖，拒不承认“大屠杀”的提法，有意缩小死亡人数。对此，我国政府立即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在国际舆论的压力和维护中日关系的大局下，日本政府不得不做出了“改正”的承诺。

继教科书事件之后，日本政府又做出了另一件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举动——中曾根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是日本人供奉军神的宗教场所，共列有246万人的牌位，其中绝大多数是日本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历次内乱外战中的阵亡者，其中包括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在日本，平均每户人家都有一两人的牌位被供奉在靖国神社，成千上万的遗族遗属每年都去祭神，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的宗教活动。二次大战后，日本实行政教分离，靖国神社内的大小军魂不再受国家的祭祀。但是，自从1975年开始，日本历任首相均以私人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直到1985年8月15日，以日本首相中曾根为首的日本内阁成员改换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了世界人民、特别是东南亚人民的普遍义愤。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是经远东

靖国神社



特别军事法庭判定的历史罪人。他们的双手沾满了世界人民的鲜血，是世界人民的公敌。中曾根等人居然对他们表示哀悼与崇敬，这是任何爱好和平的人民都难以接受的。对此，我国政府通过多种途径，包括我国领导人发表谈话、外交部部长发言人发表谈话，多次表明了自己的严正立场和鲜明态度。中曾根在谈起参拜问题时也多次表示，要继续对历史进行“反省”，承认自己在做出这一举动时没有考虑到照顾中国等东南亚国家人民的感情。但他们毕竟是不顾国际舆论的谴责与压力，一意孤行地做出了公职参拜之举，这已经很清楚地表明在日本政府内部右翼势力的增强。

这种令人担忧的倾向还有另一个明显迹象，就是日本的军费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确保德、日不再成为日后对国际和平的威胁力量，同盟国立即着手制定计划，对两国进行长期军事占领，剥夺日本的海外领地，并将其防务开支限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以内。这种低防务费使日本的资金得以集中用于发展经济，而军事上只要寻求美国等国家的保护即可。直到1952年盟军结束军事占领，日本的防务费支出是零，而它的经济却迅速发展了起来。在这一时期，日本国内和各个地区也反对政府大规模增加防务开支。30年代的过分军国主义化、战时的巨大损失，特别是对原子弹攻击的恐怖记忆，使这一代日本人对战争及战争工具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感。军国主义势力受到人民的一致反对，日本的全方位和平外交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随着更年轻、更自信的一代日本人的出现，战争的记忆已经淡漠，日本民族主义和武士道精神又重新抬头，右翼势力开始活跃。到1984年时，日本的军费开支已经接近了国民生产总值1%

的最高限，  
支。如果按照  
包括在内的话  
同时考虑到日  
民”状况，不  
的增长比  
了全世界、特  
这些事  
渴望着能有  
与“反日”有  
三、核  
作为高  
同时也是各  
学科的综合  
未流传的  
这是不是  
这是一个  
1980  
专门发出  
有关问题  
肆无忌惮  
阶级自由  
法，继续  
当时  
的一次  
和社会



的最高限，而且这种军费开支是用于纯军事目的的各项开支。如果按照北约国家的计算方法，将退伍军人的养老金也包括在内的话，那么，日本早就打破了这一限制。如果我们同时考虑到日本多年以来经济增长的高水平和他的“小国寡民”状况，不难想象，其人均军费开支的增长比其军费总开支额的增长比例要大的多。这种情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全世界、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普遍关注。

这些事实强烈地刺激着每一名中国青年学生的心。他们渴望着能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担忧与愤恨，这个日子必定要与“反日”有关。

### 三、校园中的缺口

作为高等学府，大学不仅仅是各种学术信息的集散地，同时也是各种思潮的汇合点。在一所诸如北京大学这样的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里，我们可以接触到在社会上流传的和尚未流传的种种思潮，这是由大学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但是，这是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对其不加以引导而任其自由传播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严肃问题。

1980年的竞选事件以后，党和政府于1981年2月20日专门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依法取缔了各种非法组织和刊物，清除了肆无忌惮传播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病灶”。但是，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严重的人，利用他们所占据的阵地，变换手法，继续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

当时身为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方励之曾在1985年3月的一次演讲中明确提出：“在一个大学的环境里，探索自然界和社会真理是要比外边更加开放，没有任何思想可以作为正







后，高校在校生人数逐年直线上升。仅北大一校，1984年9月新生入学后，在校生人数就达到了12300多人，是1949年在校学生人数的5倍，是1978年在校学生人数的2倍，比“文革”前在校学生人数最多的1960年还多1100多人。但是，与这种增长相比较，学校政工干部队伍却始终无法消除数量不足、素质下降、思想不稳、后继乏人的问题。以这次新“九一八”学潮的发源地北京大学为例，1985年全校共有28个系，25个党总支，有11名专职党总支书记，并且全部都在50岁以上，其中5人已到了离休年龄。在38名总支副书记中，也只有11人基本上是专职，正副书记专职人员只占35%，还有8个系的正副书记均非专职人员。此外，党委学生部也仅有专职干部6人。管理1万多名团员的北大校团委共有专职干部13人，其中还包括了2名文艺社团的教师，平均每人要管理700余人。28个系的团总支书记中只有3名专职人员，其余的一部分是兼职，一部分是由教师中的青年党员轮流“值班”，大多数人每年要教一门课，每学年度还要带学生到外地实习，没有多少剩余精力抓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长期以来极左思潮的影响，人们产生了恐“左”症，看不起政工干部，对政治工作十分厌恶，更没有人愿意做政治工作，认为搞政工的都是“业务上不行的”，“没出息的”，“只会耍嘴皮子”，影响了政工干部的形象。那些留校搞政治工作的教师本来都有自己热爱的专业，往往是因为一些个人原因被迫留下的，如想留在北京、考研究生方便等等，因此，大多数都很不安心，盼着尽早从事专业工作。1981年至1983年，北京大学先后从毕业生中选留了38人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到1985年

欲要人不想  
除非已莫恶



时已有 18 人离去，一部分考上了研究生，一部分转去搞教学。

除以上原因外，政策不落实也影响政工人员的积极性。大学的学术气氛浓厚，因此不免存在只重专业的倾向。我们的有关政策不仅没有注意在这种环境中保护扶持政工干部，反而强化了这种倾向。在评职称、晋级等待遇上，政工干部都明显“吃亏”。仍以北大为例，班主任的工作必不可少，但却没人愿意干，因为它不仅影响业务学习、耽误时间、分散精力，而且还在评职称时不算工作量。50 年代毕业、在北大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 833 人中，1985 年 10 月以前，已评教授的 34 人，副教授 418 人，共占 54.3%；而从事政工工作的 72 人中，任处长以上职务的 8 人，仅占 11%。60 年代毕业、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 946 人中，已评教授的 3 人，副教授 102 人，讲师 826 人，占 98.4%；而从事党政工作的 86 人中，任副处长以上职务的有 36 人，占 41.9%。70 年代毕业、现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 173 人中，已评讲师 141 人，占 81.5%；从事政工工作的 14 人中，任副处长职务的 1 人，仅占 7.1%，还有 163 名具有大学学历从事党政工作的干部既无行政职务，又无专业技术职务。由此可见，在校人员纷纷流向教学科研领域是极其自然的，而且是受到政策鼓励的。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的陈旧也是造成学生思想混乱的原因之一。一般来说，对学生的思想工作是通过 5 条途径来实现的：（1）政治课，（2）德育课，（3）教师的“教书育人”，（4）党团组织生活，（5）日常的思想政治工作。综合来看，这几项工作都存在较大漏洞。许多学校的德育教研室在 1985 年前后才刚刚设立，未能发挥很大作用，而政治课则往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最初的方式在于：执政者的个人的及整体的素质修养及形象塑造上。因为这种修养和塑造，能在有形无形之间形成强大的感染力和吸引力，使自然能够取得民众的理解和拥护。任何一种强加于人的理论灌输只会引起接受者的反感，而若灌输者表里不一，言行相反的欺瞒，则更会引起完全相反的效果，甚至初

往是照本宣科，脱离中国现实，大讲一些已成定论的观点，<sup>表的效果，</sup>对于学生实践中一些弄不明白的问题和一些重大理论是非问题<sup>——古今中外人心向背历历可数</sup>补益甚微，造成同学反感，在政治课上“油盐不进”。“教书育人”是教师责任心的表现之一，在只重专业的空气中，很少有人认真地身体力行，特别是有些青年教师本身就深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利用一些机会在学生中散布一些错误言论。党团组织活动的作用也存在削弱的趋势。学生党员数量极少，组织发展缓慢，使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扩散不出来。学生对入党也不热心。在“九一八”学潮中最为激进的北大物理系83级共有本科生155人，党员只有3名，占学生总数的1.9%，82级有本科生150人，党员3名，占2%。两个年级写入党申请书的只有20余人，占6.7%。团的组织生活制度也很不健全，很多团支部除了游园、文艺等活动几乎没有政治学习性的组织活动，有的就连团费也由团支书代垫，什么时候想起来了，再还给支书。至于政治学习，往往是系里下放到班里，班里下放到人。每周半天的政治学习经常被专业课挤占，有些学校的政治学习还由学生自行在宿舍进行。学生对于政治学习有要求，希望了解国际国内形势，但远远不是学校组织的几场形势政策报告所能满足的，因此，只好自己看报刊，翻资料，甚至道听途说，难免会得出片面的结论，也容易轻信大字报上的言论。社会不良思潮的侵袭和我们对之放任自流的态度，已经冲开了一部分学生的思想防线。

从1982年开始，在校学生的主体成份渐渐地发生了变化，77、78、79级大学生中的“文革老三届”们相继离校，继之而来的是一批批高中应届毕业生。这些学生大都是由小学升



中学、由中学升大学，只等将来大学毕业由国家分给一只“铁饭碗”的三门学生。他们的年龄普遍偏小，一般十七八岁，再小还有十五六岁的，没有什么复杂的生活经历，基本没有深入接触过社会，既不了解中国改革近几年来走过的艰难之路，也不能通过对现实的鉴别与比较认识到社会几年来的进步与发展。他们政治上不成熟，带有浓郁的激进的理想主义色彩，缺乏正确判断是非的能力，易于偏听偏信，经不起任何微小的波动和挫折，容易冲动，也容易消沉。受中学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响，他们在中学时代就产生了明显的回避社会工作的倾向，特别是一些被老师列为重点对象的同学，自知上大学有望，更是埋头学习，生怕被其它工作影响，老师和家长也尽量减少他们的“额外负担”。因此，这些学生中所谓“高分低能”者不乏其人，有工作经验和号召力的学生干部及党团员工作骨干很少。从党团员的数量来看，团员数量接近100%，却很难体现出其先进性。党员数量却是凤毛麟角，这些党员基本上都是原来的在职人员，年龄较大，在思想状况、心理素质、情趣爱好上都与三门学生有较大差距，加上人少力微，先进作用也不易突出。

这些学生初入高等学府时，心情往往极为复杂，对自己和学校都抱着很高的希望。特别是象北京大学这样的一流名牌大学，录取的学生基本都是各地的一流尖子。这些尖子在自己的家乡受到百般的青睐与关照，被认为是一方的骄傲。有些来自小山村的学生，其祖祖辈辈都没有出过一个能到北京去念书的人，当他荣登榜首后，全村杀猪宰羊，送红封贺喜，临行时村长、支书亲自饯行，由村民们敲锣打鼓送到火车站，其荣耀可想而知。至于家长则更不必说，每年送新生



P98 - P102 所写大学生生活状况确实真实，而且十分深刻，20年来，大学校园的基本氛围确是如此。有心人可以对照一下自己走入大学校园是否也是如此的。入校的“孺子牛”不比学生数量少多少。每年的8月底到9月初，在各高校和北京火车站的新生接待处，学生昂首阔步于比比大前、家长肩扛手提于后的景象随处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产生的不是真正的责任感，而是一种盲目骄傲、甚至不可一世的情绪，他们憧憬着学校现代化的浪漫的生活，吟诵着“天生我才必有用”，踌躇满志地踏进各个高等学府。

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学校的生活远非他们所想象的，既不现代派也不浪漫，而是单调紧张，也许还有些杂乱无章。同学们之中藏龙卧虎，山外有山，大多数人都失去了自己引以为荣的尖子地位，不少农村籍的同学在繁荣的大城市生活方式面前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学生们的心理构成了微妙的两方面：一方面迫使自己屈从于他们所不愿接受的种种现实，承认自己已经失去了以往的宝座，并为此感到深深的压抑，渴望着寻求新的机会，发泄自己的感情，重新引起别人的注意。另一方面，他们仍很看重自己的大学生身份，并以此为骄傲，甚至自负。在新“九一八”学潮之后，曾有一位北大学生在思想调查中毫不隐讳地谈到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北大从来都是民主与科学的发源地，没有北大也就没有了新思想，在世人混沌的时刻，只有北大人是清醒的。北大人肩负着警世的历史责任。不仅如此，在北大学生之间也存在着这种盲目自负的心理，普遍的是理科学生看不起文科学生，认为文科学生水平低，是考不上理科才去考文科的。这种情绪在各高校学生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越是所谓的高等名牌、历史传统深厚的学校，这种情况越突出。它使许多学生过分自信，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特别是批评意见。这无疑增加了教育引导的难度。

自己20岁的师兄，所思所想所感所闻竟如此相同！20年来整个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何大学校园这片奇异的空间有此特殊的性质？大学为何具有何具有这般魔力，大学生为何就是这么一个极特殊的群体？愿与君共议！

因为党教育得好！

公元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上述种种之外，还有一个非常令人为难的问题总是使学生们不满足，这就是经济条件——缺钱花。不能不承认，大学生本身就是清贫的一群，他们自己没有任何固定收入，在勤工俭学尚不普及、也没有条件大规模进行的情况下，他们只能两手空空，靠国家和家庭的供养。因此，他们的经济状况在理论上讲是脆弱的。按照国家标准，在1984至1985年学年度开学之前，一个学生最高标准可享受助学金22元，最低标准可享受助学金6元。但是，一个学校的普通伙食标准，一个月约需35元左右，与助学金相比，不足的部分只好由家庭供给了，这对于一个收入不高的家庭着实是一种负担。因此，一些学生看着自己的同龄人由于提前参加了工作而每月能拿到大把的人民币，自己虽“贵”为大学生，却每日低头算计着这几张可怜的伙食费，心中难免产生酸溜溜的不平感。

这种物质与精神不成比例的状况到1984、1985年又有所增长。首先是1984年底，教育部公布了助学金制度改革办法，规定今后要将国家的经济资助与学生学业状况结合起来，将助学金逐渐过渡为奖学金。在此之前，根据教育部、财政部1983年的有关规定，各院校已于1984年暑假开始停发回家同学的假期助学金，引起了许多同学的不满。在当时的情况下，助学金的数额本来就不高，还要从中节省出一部分资金来转化为奖学金，所有享受助学金同学的收入普便又减少了2至4元，但是，奖学金的发放面却相对较窄，只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几，而且数额也较低，一等奖每学年100至200元不等，按学期集中发放。这项改革刚刚实行，立即在学校中引起骚动。1985年1月，先后有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

范学院的  
会收费高，  
它问题，  
确有困难  
不久  
来的经济  
国务院不  
主要是与  
时，城镇  
元补贴。  
次紧缩。  
改革是  
括大学  
堂在物  
的方法  
然不能  
育、舞  
—  
消费。  
上、而  
“躺在  
若想右  
要请客  
一次，  
要吸火  
学外



范学院的学生就此问题发难，并由助学金问题涉及到了“舞会收费高、滑冰收费涨价、伙食质量差、医疗水平低”等其它问题，并有人号召罢课、罢餐，后经学校调解，决定给予确有困难的83、84级同学以假期补贴，风波才暂告平息。

不久，这根已经上满的发条又被紧了一次。随着数年来的经济过热，1984年国民经济严重失控，导致了1985年国务院不得不进行1979年以来的第二次大调价。调价范围主要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肉、蛋等副食品。在调价同时，城镇居民每人可享受7.5元补贴，在校大学生可享受9元补贴。无疑，这是对学生们本来就不宽裕的经济生活的又一次紧缩。虽然大多数同学对于调价表示充分理解，认为物价改革是整个经济改革中最关键的一步，但是，这毕竟也对包括大学生在内的群众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些大学的食堂在物价上涨后，为了稳定菜价就采取了少放肉甚至不放肉的方法。这样，虽然菜价没有变，但菜的质量低了。学生仍然不能满意，普遍反映9元钱补贴不够，特别是一些诸如体育、舞蹈等特殊专业的学生意见更大。

一方面是实实在在的阮囊羞涩，一方面却又是惊人的高消费。随着学生自负心理的增加，很多人希望自己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生活上也应该“帅”起来。曾几何时，校园中形成了“躺在汇款单上的高消费”的风气。一般来说，几个亲朋好友若想在一起聚一聚，名目多得是：过生日要庆贺，交上朋友要请客，“有朋自远方来”要接风，“西出阳关”要饯行。如此一次，少则几十元，多则上百元并不罕见。除此之外，男生要吸烟，女生要买漂亮衣服和化妆品，学习要买书、买用具，学外语要有录音机，春游要有照相机，平时当然谁也不能不

吃饭，节假日还有送不完的礼物、寄不完的贺年片。如此算来，维持一个“体面的”大学生的生活，每月大约需要近百元钱，这与助学金及奖学金所能提供的数额简直有天渊之别。偏偏这种赶时髦、比气派的风气在贫寒的校园中愈演愈烈。都是同学，谁也不肯服谁，谁也不肯输谁的面子，家里无力支援的，节衣缩食，想尽办法也不能“掉了自己的价”，甚至有人因此而走上了犯罪道路。这种学生本身无固定收入却偏要盲目攀比、追求高消费的矛盾，使学生本来就很窘迫的经济状况变得更严重了。它对学生情绪的影响很大。

同志!!看问题不要片面

## 第二节 纪念的歧义

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内因、外因，种种矛盾因素急速地交织作用着，旧有的平衡不复存在，历史又面临着新的选择。究竟走哪条路？成与败，兴与衰，生死不明。敏感而又脆弱的大学生们焦灼不安地坦露了自己幼稚的感情。1985年9月18日，新的契机形成了；然而，这在任何一种意义上都不是54年前反日运动的再现。

### 一、“不能再容忍下去了”

不同于以往的革命传统纪念日，不同于一年一度的“九一八”，1985年的“九一八”纪念日成了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关注的焦点。9月13日下午3点，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在校园中贴出了第一张关于“九一八”纪念日的大字报，并标以《我们该怎样纪念“九一八”》的醒目标题。

——这张大字报全文不足600字，其中以近2/3的篇幅一一列举了1985年以来日本国内少数右派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现实。文中写道：“只要世界人民的抗议没有达到某种程度，日

本帝国  
这对中  
包括日  
大字报  
我们中  
对日本  
流，却  
大  
绪更为  
百名日  
们，不  
种事①  
这  
动性的  
据宪法  
中午，  
们是中  
并进一  
民英雄  
方面的  
学生！  
开和  
①



本帝国主义分子的胆子就越来越大，行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这对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全体东南亚人民以至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自己，都是不可轻视的潜在威胁……”为此，大字报中显而易见地针对“九一八”纪念日活动提出：“今天，我们中国人民可以不念旧恶，与日本人民友好往来。但是，对日本政界少数人掀起的美化侵略战争、复活军国主义的逆流，却不能再容忍下去了。”

大字报贴出不久，即有另一位同学在下面加注了一条情绪更为激烈的批注：“我们北大曾经友好地接待过中曾根和几百名日本青年，但友好的举动并未感动这个海盗民族。同学们，不要再沉默了。难道我们北大的学生只敢因晚上关灯这种事<sup>①</sup>而示威游行吗?!!” 这说法何错之有!

这张大字报的贴出对于广大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富于鼓动性的号召，立即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当日晚，北大校方根据宪法取消“四大”的条款，将这张大字报揭下。但是，14日中午，物理系研究生会又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不要忘了我们是中国人》，将13日晚学校的做法称为“见利卖国的行为”，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要在9月18日到天安门广场集会，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的号召。这种偏激的情绪立即引起了多方面的反响，“我们该怎样纪念‘九一八’”，成了校方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意见分歧的焦点。

考虑到9月18日全国党的代表大会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和学生情绪中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明显偏激倾向，对于

①1984年12月10日，北京大学学生曾为反对学校实行灯火管理制度进行小规模游行，并向校长请愿，后经协商，校方同意通宵开放一座教学楼的电灯，以利同学夜读。



“九一八”纪念活动问题，中共北京市委提出以下4点意见：

(1) 由北京大学校党委正面号召全校师生认真学习党代会文件，把师生的注意力引到学习活动中来；(2) 在校内组织一些适当的纪念“九一八”活动；(3) 由学生会组织学生给中越边境两山英雄写慰问信；(4) 坚决制止继续写大字报和到天安门献花圈。按照上述精神，北大校党委和团委积极组织纪念活动并对学生做说服解释工作。9月16日，校研究生会和学生会联合发出公告，宣布于1985年9月18日在校内举行大型纪念会，内容包括：(1) 悼念死难同胞和烈士仪式；(2) 自由演讲；(3) 通过给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9月18日为“国耻日”的建议；(4) 通过北大学生致中曾根的信。上述内容基本上吸收了几天来学生所提出的具体要求。物理系研究生会也随之贴出通告，宣布在两会出面组织之后，不再以组织者的身份出现，以支持两会的工作。一部分较为理智的教师与学生也表示反对过于偏激的盲目排外行动。

9月15日，一张署名“北京大学部分青年教师、研究生”的大字报表现了相当的冷静和理智：“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改革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建立新的经济体制和创造民族新文化是我们一代人的职责……义和团拳民的盲目排外情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民族主义情绪的膨胀在今天的客观效果是复活封建文化，对抗对外开放，为某些宣扬封建奴隶道德的社会倾向帮腔；如果民族主义被用来掩盖国内的许多矛盾，掩盖那些真正会决定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话，那么这不应该是我们去助长的。近些天来，有许多同学提议到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以北大一万多名同学的名义通电全国高校，电讨

日本军... 我们... 就... 会... 是... 更... 有... 为了... 还于9月... 了国际开... 但是... 释工作... 解和不... 什么要... 们偏偏... 日、16... 不良政... 一... 在天安... 是精神... 我们干... 缺乏真... 安门去... 报提出... 强国，... 9... 遭到多... 大字报... 会的公



日本军国主义等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不赞成这些活动。我们认为，可以在9月18日这天，举行一次大型座谈会，就‘九一八事件’看中国当前的形势和现实问题，这样将会是更有意义的工作。”

为了帮助学生正确理解我国的对日外交经济政策，北大还于9月16日专门邀请了外交部亚洲司的有关同志到校做了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的报告。

但是，可以看出，市委的4项意见及北大校方的说服解释工作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一部分学生表示出不理解和不满。他们认为：学生不过贴了几张大字报，你们为什么那么紧张。我们的行动是爱国的，你们要压我们，我们偏偏坚决要求去天安门广场。在这种情绪驱动下，北大15日、16日大小字报增多到30余张，极个别的已带有一定的不良政治倾向。

一张未署名的大字报号召：“不能半途而废，要冲出去，在天安门自由讲演。改革、现代化不仅在于科技，更主要的是精神的现代化和理性的光芒。有目共睹，整党收效甚微，我们干部官僚主义、求稳怕乱思想严重，对自己民族和人民缺乏真正的爱和同情心。利用这次党代会召开的时机，到天安门去……去游行！”另一篇署名为“‘九一八’组织者”的大字报提出行动的目的在于：“纪念死难同胞，打倒贪官昏官，科学强国，尊重知识。”

9月16日校研究生会和学生会的公告贴出之后，立即遭到多份大、小字报的围攻。当天，一份署名“84植生”的大字报就以《读公告后的感想》为题进行激烈反对，指责两会的公告：“每个人都不难看出这明明白白是一张‘招安’……”



企图把我们学生的热情锁在小小的校园内，让它自生自灭，以便大家都‘清清净净’地过日子。”另一张署名“北大人”的大字报索性喊出：“学生会不是学生的学生会！改组学生会，使之真正体现学生的而不是他人的意志！”此外，在16日下午介绍国际形势的报告中，多次有人起哄、鼓倒掌，喊“嘘”，2/3的学生中途退场。许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被斥为“卖国”、“不是中国人”、“奴才”、“讨好官方的势力鬼”等等。

9月17日，围绕着应该不应该去天安门的问题，争论更加激烈。下午，丁石孙校长就纪念“九一八”活动的问题向全校2000名学生干部发表了近一个半小时的讲话，从维护社会安定、保证党代会顺利召开的角度，申明大义，劝阻同学们的过激行为。讲话过程中，与会学生鼓掌达20余次。讲话刚刚结束，当天下午就出现了观点对立的两种大字报。

一份署名“八五级新生”、题为《高度警惕坏分子》的大字报认为：“会不会有对现实不满、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恨之入骨的坏人趁此游行之机，大搞破坏，制造一起反革命事件呢？同学们，我们想一想，如果混入我们游行队伍中的坏人在天安门广场大喊反动口号，毁坏广场上的公共设施，甚至对执行正常的执勤任务的武警大打出手，这一切责任不都得负在北大人身上吗？”

可见，丁校长的这次讲话对相当一部分同学产生了影响。他们开始冷静考虑上天安门广场游行可能造成的后果了。但是，也有另一部分同学已很难把握自己的情绪，将丁校长的讲话诬蔑为“鸡毛蒜皮，离题万里，扰乱我们视听的废话”，嘲笑丁校长是“无知”与“幼稚”。



天，  
的，大  
便，  
下午  
”，  
“卖  
。  
并论  
逐向  
维护  
且同  
代。  
【字  
大  
主义  
反伍  
设责  
向。但  
的，  
，

有一篇署名“北大人”的无标题大字报这样写道：“作为一个北大人，作为一个充满热血的中国青年，我一定要以我个人的名义去天安门，去纪念为抗日而献身的先辈！同学们，快做好一切准备吧，在一个堂堂的社会主义国度里，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是可以到天安门的，我们有这样的权利和自由，这是任何人都剥夺不了的！”

而且，这种情绪还存在着向外扩散的趋向。17日晚，有北大学生到清华张贴了张小字报，号召清华9月18日与北大一起行动。到17日中午止，人大已出现大、小字报15张。另外，还有人以“北大学生会的名义分别给上海、南京、合肥等地打电话，要求声援。此时，这种去天安门广场的意见无疑占了上风。据事后有关部门调查，在被询问的青年教师及学生中，即使是自己没有去天安门广场或根本没打算去广场的，也都认为走出校门、到天安门广场去示威是正确的，它不仅仅是学生爱国的标志，而且是“公民的权利”。

就在同学们怀着急躁的情绪要奔赴广场的时候，极少数人却想利用这种情绪将学生运动导入邪路。在9月17日贴出的大字报中，出现了新的动向，除上述情绪偏激的大字报进一步增多、强化外，有极少数大字报开始散布反动思想，挑动学生将矛头指向党和政府的领导，攻击我国目前的对日政策是卖国主义的，要看到“北京的腐败”和“我们身上正流着的血”，要行动起来，“横扫一切汉奸走狗卖国贼”，“坚决要求亲日派下台”等等。还有一张小字报竟影射党代会是“短代会，断代会”。

9月17日，在北大校内新华书店前的宣传橱窗上发现一份署名“中国人”的小字报，别有用心地煽动说：“向本届党



代会提出抗议书，年青的朋友们，路正长着哩！谁能拯救中华？腐败的政府，末日将要来临。落后、屈辱、挨打的根本原因在哪里？？？老爷们不正在开会吗？圣地不可不去！！到天安门去，任何人也不可阻挡！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试问江河大地，谁主沉浮？物及必反，腐败必溃！”

这份小字报一经贴出，立即有学生予以反驳。哲学系82级的学生接连贴出《该冷静了》、《“九一八”断想》和另3篇未署名文章，提出：“坚决抗议居心叵测的人利用纪念活动借题发挥，制造混乱，使北大蒙受耻辱。”“北京大学同学的言行应经得起历史检验。强烈谴责所谓‘中国人’的错误言论。”

经过揭发检举，有关部门很快查明这份小字报的作者是一位姓黄的安徽农民。他于1985年8月26日独自来京，利用北大管理制度不严的漏洞，混入北大社会学系偷听课程，在北大图书馆、教室偷宿，并有偷窃自行车等行为。这种情况表明，事情正在起变化，个别人阴谋利用一些学生的冲动情绪，制造破坏性的政治事件。在这种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面前，大多数同学还是有基本的判断是非的能力的。

9月17日，北大研究生会、学生会及所谓的游行董事会分别张贴通知，宣布自己所组织活动的时间、地点及各类事项。无疑，双方都决心将这场争论进行下去，而且要用行动代替辩论。

## 二、在这敏感的一天里

由于几天来，北大党委坚持贯彻中央疏导教育、不激化矛盾的方针，依靠广大党政干部、团委和学生会骨干及任课教师，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再加上校规的

的来，大  
动上已表示  
到18日上午  
言论，声称  
必亡”。冲突  
按照17  
事项及口号  
是：乘车同  
18日清晨走  
的教学班仍  
坚持要到天  
多人聚集在  
圈。物理系  
队，准备  
但站出来  
旗，准备  
并表演  
稳住了。  
天安门。  
不少干部  
况持续了  
的人突然  
出发！”尽  
高振臂一  
方转移至  
情况下，



约束，大多数同学虽然在思想上还未根本解决问题，但在行动上已表示不去天安门，可仍有少数人坚持要“冲出去”。直到18日上午，还有人在校园中张贴大字报，散布对日过激言论，声称必须要去天安门，“任何人不得阻挡”，“挡道者必亡”。冲突已经在所难免。

按照17日所谓游行董事会发布的《“九一八”游行注意事项及口号》，18日集会的地点是图书馆前，进城的方式是：乘车同学上午进入城内，骑车的同学下午1点出发。从18日清晨起，陆续有学生分散离校前往天安门，上午有课的教学班仍然按计划进行正常教学。下午1时10分，一批坚持要到天安门广场游行的同学，包括众多的围观者约1000多人聚集在图书馆前，其中有一部分人佩带白花，并抬着花圈。物理系的同学还举着系旗。这时，有人站出来组织纠察队，准备维持沿途及广场的纪律。许多围观者鼓掌、起哄，但站出来报名参加的人很少。正当物理系的一名同学举起系旗，准备带领队伍出发时，一名学生会干部及时将旗夺下，并发表演讲，劝阻同学们不要去广场游行示威，暂时将事态稳住了。随后，双方陷入僵持，有几名学生发表演讲，鼓动去天安门。也有一些同学宣传不能去的道理。辩论非常激烈，不少干部及教师赶到现场，做学生的说服劝导工作。这种状况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2点15分左右，有一个不明身份的人突然上台高呼：“废话少说，要去天安门的成4路纵队出发！”尽管学生们事后都表示并不认识这个人，但他当时登高振臂一呼，将学生的注意力立即从相互辩论、力图说服对方转移到游行上来，人群立即自南校门涌出。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为防止大批情绪激动的学生冲出校门，造成恶劣的



社会影响及国际影响，干扰党代会的召开，学校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决定暂时关闭南校门（其余4扇校门仍开放），由在场的团委及学生会干部手挽手组成一道人墙，将学生拦在了校内。

这时，南校门外聚集了近千名围观群众，秩序十分混乱，校门外的交通几乎全部阻塞。校门内学生情绪已达到顶点，许多学生对前来劝阻的干部、教师进行围攻、谩骂、起哄，仍有中文系等几名同学继续演讲，鼓动学生到天安门去，并指责关闭校门是违宪行为，妨害了公民游行、集会、言论的自由。在这一片混乱中，海淀公安分局的民警及时出动，在校外的马路上维持公共交通秩序，疏散围观群众，以防止形成内外呼应的局面，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在整个过程中，所有执勤民警都没有进入学校，更没有采取拘捕或其他强制性行动。一些师生则继续在校内进行劝阻工作，特别是对几位情绪最为激烈、仍在继续演讲的同学，坚持耐心地讲道理，避免发生正面冲突。同时，团委的几名干部带头组织聚集的学生唱起了《国际歌》，正确引导学生的爱国情绪。经过艰苦的劝说工作，一直到下午3点30分左右，一些学生的激烈情绪才稍有缓解。在这种情况下，丁石孙校长及时向全校学生发表广播讲话，全文如下：

“同志们：

现在北大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有一些同学出于爱国热情，要纪念‘九一八’，校方已经接受同学们的要求，在五、四广场举行纪念大会，请同学们前往参加。

现在有些学生在校南校门集结，坚持到校外去进行活动，这是错误的。校党委昨晚已经做出决定，不要到校外活动。



这是经党中央和市委批准的，请同学们要执行这一决定，党团员要带头模范地执行。我郑重地请同学们考虑，不要一时冲动做出错误的行为，要警惕少数坏人利用你们的爱国热情做出后果严重的事情来。”

这篇态度鲜明、措词中肯的讲话使学生们慢慢冷静下来，首先是围观者开始逐渐散去；之后，一些坚持要去天安门的同学也离开校门。大约4点30左右，南校门前恢复了平静，校门重新开放，前后关闭共约2小时。

几乎在丁石孙校长发表广播讲话同时，大约下午4点左右，已于上午分散离校的300余名北大学生在天安门集结，准备在广场上游行，并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此时，正值欢迎加纳和新加坡两国元首，按照迎宾惯例，应将天安门广场的游人引出场外。北大学生到达后，广场执勤和管理人员向他们宣读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的通告，指出：“未经人民政府批准，在天安门广场不准游行、集会、讲演，不准书写、散发、张贴、悬挂、铺摆任何内容的宣传品”，劝告他们依法离开广场。但是，这些学生拒绝听从劝告，执意要进入广场举行活动。为了避免矛盾激化，造成更不好的影响，经请示北京市政府，执勤人员同意了学生们进入广场的要求，但责令他们必须整队分批进入，并始终保持良好秩序。学生们按照要求，有秩序地进入了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后立即退场。在退场过程中，有部分学生呼喊了“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复辟”、“爱国无罪”等口号，直到金水桥，自行解散回校。这不挺好吗？

就在北大校园内部分学生冲击南门、沸沸扬扬地号召到天安门去的时候，下午3点，由校研究生会和学生会组织的



“北大学生纪念‘九一八’大会”如期在五四广场举行。3000余名学生有组织地汇集在一起，纪念“九一八”事件54周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克强、团市委副书记张虹海等同志参加了大会，并到学生中去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大会进行过程中秩序良好，没有受到少数同学在校南门的过激行动的影响。

在这一天里，北京市其它所有院校都比较稳定，除有个别人单独到天安门参加了北大学子的献花圈队伍外，没有发生新的有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广大市民对北大学子的行动也感到很难理解，认为他们是“又胡折腾”。由于矛盾没有被进一步激化，因此，从直接效果上来看，这次学生的校外游行示威活动并未造成大的社会影响。

### 三、不变的主旋律

9月18日过去了，虽然在北大校方及有关部门的有效工作下，事态没有严重化，但是，被拦阻在南校门内的同学还没有从心里服气。从9月18日夜开始，一轮新的大字报论战又开始了。这一阶段的运动虽然在校内进行，但由于提出了具有一定倾向的政治要求，极少数人乘机从中鼓噪煽动，因此，社会影响并不小于前一时期。

从大字报的情况看，9月18日直至9月27日左右，北大部分学生的纪念“九一八”活动又有了新的发展，双方的矛盾从“去不去天安门”转为“为什么不能去天安门”，从而引出一系列对北大校长丁石孙及有关参与劝阻学生的团委、学生会干部的围攻，和对所谓民主与自由的呼吁与阐发，至于声讨日本军国主义、抗议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等内容的大字报已形同点缀。

9月18日当天，所谓游行董事会就贴出了《有感于



“九一八”纪念游行未遂》的大字报，指责学生会干部是“没人性的、没良心的‘容克’”，是“奸贼”、“高级走狗”、“狗家伙”，主张“踢开学生会行正义”，用他们的说法：“学生会不是学生的代表，而是学生的贵族。他们从未真正为学生办过一件好事，没有一件使北大人引为骄傲的事情是学生会发起领导的。”

还有人在校内公开张布所谓“学贼名单”，点名攻击5名积极做劝阻疏导工作的团委及学生干部。另一份题为《〈每日新闻〉快讯》的大字报则采取低级的手法对这些干部和学生进行极其无聊的人身攻击。9月20日，在一份未署名的大字报中，作者露骨地将18日丁石孙校长的广播讲话与1976年四五运动时吴德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相提并论，并隐喻地以《历史的回声》作为大字报的标题。还有一些大字报指责在“九一八”纪念活动期间，北大校党委、学生会、团委等“夸大事态，谎报军情”，“无中生有，居心何在”，“唯恐天下不乱”等等。9月19日和9月22日，分别有人贴出大字报《弹劾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监督法院判决书》，“控告”北大校长丁石孙、团委及学生会干部违反宪法，并“判决”分别停止他们政治权利10年、8年、4年等。这一部分大字报的基本格调都极不严肃，带有很强的哄闹性质，数量较大，每天都出现十几份，围观者甚多。这就乱透了。

不是大学  
生该做的

与此同时，还有一批大字报则开始从“民主与专制”的角度做政治文章。由于这次学潮中北大校方掌握政策分寸比较好，始终没有和学生发生大的正面冲突，于是有些学生只得在大字报中大肆渲染所谓铁门紧闭、军警林立等景象，声称学生在这次活动中表现了“完美的自制力”，由此引发出政府与学



校践踏宪法、压制民主、实行专制的错误观点，并将9月18日称为“北大的不尊重法律和民主的‘校耻日’”。在这些大字报中，有的是出于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对宪法及其根本作用缺乏正确的了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诸如《“九一八”与宪法》、《纪念“九一八”的随想》等等，虽然其中含有错误的观点，但基本思路是积极的、建设性的。但是还有一部分大字报则带有明显的过激情绪和煽动性。

9月20日，同时出现了几份关于“民主与专制”的大字报，字里行间表达出一种激烈的挑战意味：“民主与专制战于北大，专制胜！但这没有完！专制受奠祭的时刻也该到了！”“我要我民主，我要我民主！堂堂中华民主不可无！我们要大声疾呼，还我民主！还我民主！”“外面虽是秋风肃肃，然而北大的民主春笋象雨后一样何其多，民主的趋势方兴未艾，正以雷霆般的脚步走过来……”

9月21日，北大又出现了几份内容更加偏激的大字报，其中一份题为《我的话》的大字报直接对建国以来党的领导提出质疑：“在黑暗的、专制的年代里，中国人民渴望光明，渴望自由，他们坚信：‘秋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么！’是的，春天来到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已经36年了。可是，正如鲁迅先生曾经预言过的：‘春天过去了，秋天还要来的！’”

另一份题为《跨过绿色的封锁线》的大字报，措词具有很强的挑动性：“多少天前我们就在准备着去流几滴血了，甚至有激烈的几个同志准备好走进囚车了……但是没有风暴，也没有血与火的炫目的光芒，我们就这样被默默地奸污了。没有一丝受辱的痕迹……甚至没有幽默的暴力的痛苦，没有枪声与36伏的电压……压抑与扼杀的无形巨手不知从哪个方



面会突然夺去我们年轻的生命，甚至不容忍我们痛苦地呻吟几声，也没有一口舒缓的空气拯救我们的窒息。或许有一天转眼我们就被剥夺尽一切，然后赤裸裸地如猴子一般地被当众戏耍……”

这些大字报的数量不大，也不能代表绝大多数学生的思想，但是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影响极其恶劣。9月18日之后，虽然有一部分学生的情绪愈加激烈，但是，也有一部分同学开始冷静了下来。

9月18日当天，即有人贴出大字报对这次行动表示质疑：“每一次，都象奔腾的火山爆发，偶尔有一两个持不同观点的，马上就有人贴大字报冷嘲热讽，争论谁是不是中国人，谁有愧于北大人等，而不是进行正常的观点交锋，似乎唯有永远激进，永远游行，永远指责上层领导人，才是北大学生运动的本色，以致每次运动都是清一色的激进者……”

极少数人别有用心的蓄意煽动也引起了一些同学的高度警惕，他们在大字报中不无忧虑地指出：“但是不可否认，存在少数人，他们是风头主义者，乃至居心叵测者，是他们企图把我们的这一抗议日本军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的运动引向畸形。他们极不负责地、卑劣地攻击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校方工作的深入，这些正面意见逐渐占了上风。9月22日之后，大字报逐渐减少，虽然还有极少数人仍在不断煽动，提出“‘一二九’再见”等等，但学生的情绪已经普遍开始平静下来。

在这一阶段，人大、清华、北京外语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化工学院、北京工业学院等院校也



张贴少量大字报，或声援北大，或抗议日本对华贸易及政策等等，均未酿成突发事端。部分外省、市高校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影响。9月26日，西安交大少数同学以大字报的形式贴出了北大来信，即有人开始酝酿上街游行。28日，看完学校放的电影《谭嗣同》后，1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有人烧了几家商店门前写有“日本照相器材展销”的横幅，有人乘机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煽动性演讲。10月1日，西安交大、西北大学、西北电讯工程学院等校约3000多名学生也分头上街游行，并在新城广场、火车站前散发传单，进行演讲。在成都，10月14日至16日连续3天晚上，四川师大、华西医科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以及四川大学、成都科大等校总计3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17日晚，聚集在人民南路围观学生游行队伍者多达万人以上。他们堵塞了交通。有人乘机滋事，拦阻过往车辆，先后损坏4辆汽车，1辆摩托。值勤民警先后扣押了其中肆意滋事分子45人。在四川省委及学校的反复劝阻下，学生们自动停止了这次游行。

中国的最高学府出现了暂时的不安定状况，这正是海内外极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所求之不得的，内乱的迹象又为他们带来了一线乱中取胜的希望。北大“九一八”学潮的情况传出去以后，短时间内，部分院校陆续收到了从国内外投寄来的和在校内宿舍等处投放的反动传单和信件。据不完全统计，从1985年11月到1986年1月学校放寒假之前，这种事件共达11起之多，主要内容都是攻击四项基本原则，歪曲和诬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干扰、破坏改革事业的，其根本目的就是阴谋挑拨党同人民与青年的关系，利用青年人思想上的一些弱点，企图进一步制造事端，扩大影响。

11  
京九一  
用打着  
动，挑  
会和示  
力，迫  
1  
学院  
中国  
京大  
等校  
西安  
北京  
后在  
传单  
北大  
学并  
民主  
的会  
削会



11月13日，北京大学学生宿舍发现了一份署名为“北京九一八信箱一二九分箱何道小组”的反动传单。此传单采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继续利用学生的爱国情绪进行煽动，挑唆学生们利用11月20日庆祝女排胜利之机搞飞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提前纪念“一二九”，企图向党中央施加压力，迫使党的13大修改路线。

11月20日、26日、29日，农业工程大学、北京外语学院图书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连续分别收到由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主办的反动刊物《中国之春》，其中刊载了“北京大学部分学生致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歪曲报道了北大等校9月18日及其之后的情况，煽动中国留学生“声援北京、西安和武汉大学生的正义行动”。

11月28日至30日，北大、北京工业学院、人民大学、北京外语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6所院校都先后在学生宿舍门上的留言袋里或把手处发现有人投寄的反动传单《浪潮先锋》。这份长达7000余字的反动传单通篇鼓吹北大的“九一八”学潮“喊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诬蔑政府和学校对于学潮的和平劝阻是把民主运动当作反革命来镇压，并且极力鼓动“要成立一个能够领导民主事业向前发展的全民性的民主组织——中国促进民主联合会”，“建立真正的民主化联合政体”，企图成立非法组织，和我们做长期的斗争。

12月4日，清华大学收到一封寄自河南某市保温瓶厂的反动信件，攻击我国现行的社会制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受到最严重政治剥削的工人阶级，只能被利用到派系斗争中”，并歪曲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表现为工人阶级与官僚阶级的矛盾”。

一言中的



大特小怪  
12月5日和27日，在北京大学学生宿舍和北京联大纺织工程学院也分别收到了署名“HGH”（中华革命同志会）的反动传单和油印的《新声报》，攻击中国没有民主和自由，并利用确实存在的高干子弟经商问题、物价问题、知识分子待遇问题和知青遗留问题进行了用心险恶的挑拨和煽动。

12月8日，北京大学学生会收到一封署名为“自由青年运动联络人黄自清”的反动信件，诽谤“中国人民不需要专制的‘共产主义’，这种丑恶、腐败的制度是人类历史的耻辱！”攻击四项基本原则“是那些专制、特权阶级用来欺骗人民、镇压人民大众的杀手铜”。

1986年1月3日，人民大学中文系又发现一张从香港寄来的署名为“北大文史哲研究组”的油印传单《穷则变、变则乱》，直指邓小平同志的名字进行恶毒攻击，说什么“唯有取消四个坚持，打破社会主义的条条框框，让中国全面开放，真正开放，让人民自由发展，彻底改变封建式的专政路线，才能把中国真正搞活。”

这些反动刊物与传单的出现表明了北大新“九一八”学潮的深刻背景和社会效果，这是许多爱国学生所始料不及的。

#### 四、校园难归宁静

为了帮助学生们进一步澄清模糊认识，沟通政府与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思想，中央有关部门、北京市委、各部委的领导人从9月底开始，陆续与学生进行了一系列对话接触，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虽然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这些交流在“九一八”之前进行会收到更为良好的效果，但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迟到的交流仍然在学校中引起了相当的共鸣。

1985年9月28日，国家教委、中宣部、团中央及北京市委



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北大问题座谈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鹏、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作了重要发言，帮助同学们对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后果做了客观的分析。李鹏同志在肯定广大同学爱国热情的基础上，特别指出了当前的形势已经与54年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于中日经济交往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应该用经济的手段来解决，如果还采取“五四”、“一二九”时的一些做法，就会有碍安定团结，就不是爱国而是损国了，同时指出：“要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除了需要有共同的理想、宪法准则和四项基本原则作基础，还要有严格的纪律和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我们应该一方面以法制的办法解决我们工作中确实存在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坚决反对“大民主”的作法，这也是为社会主义法制所不能允许的。这次会后，大多数同学都表示对“九一八”学潮的背景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认为它的产生确实不是孤立的，同时也承认采取贴大字报的方法确实是不可取的，容易被坏人钻空子。中央和政府在这次运动的评价基本上是是非清楚，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另一方面，学生也还存在着相当的委屈心理，认为在全校贴出的几百张大字报中，只不过有四五份内容反动的，将这个问题说得过于严重容易让社会上产生误会，分不清这次运动的主流与支流。

这次会后，有35名各部门的领导深入到21所高校与师生座谈：10月3日上午，李鹏与国家教委副主任杨海波到清华大学；10月15日下午，冶金部长戚元靖、副部长林华到钢铁学院；10月17日下午，卫生部副部长顾英奇到北京医科大学；11月2日下午，蒋南翔、荣高棠到清华大学；11月4日下午，化工部副部长林殷才、王珉到北京化工学院；



11月11日,水电部副部长杨振怀到水利电力经济管理学院;11月15日晚,国家安全部部长贾春旺、副部长王珺到国际关系学院;11月20日下午,航空工业部部长莫文祥、副部长王昂到北京航空学院;司法部部长邹瑜、副部长蔡成到中国政法大学;11月25日,国家气象局副局长章基嘉到北京气象学院;12月2日上午,农牧渔业部部长何康到农业工程大学;12月4日,国家出版局局长边春光到北京印刷学院。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工作情况是:10月26日下午,市长陈希同、副书记汪家镠到北京工业大学;11月1日下午,市委书记李锡铭、副书记徐惟诚、汪家镠、市长陈希同、副市长陈昊苏、陆宇澄到北京大学;11月8日,段君毅、汪家镠到北京师范大学;11月8日下午,市委常委陈元到北京财贸学院;11月10日上午,副市长孙孚凌到北京化工学院;11月14日,副市长封明为到中国政法大学;11月15日下午,副书记金鉴到北京经济学院;市委常委李其炎到北京体育师范学院;11月16日下午,副市长黄超到北京农学院;11月30日下午,副市长韩伯平到北京师范学院。

在座谈中,有关领导同志重点讲解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对社会上流传的一些思潮和北大“九一八”学潮的认识,了解了同学们在各方面的思想动向,同时视察了各校的工作、学习情况,听取并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这在当时学生情绪较为压抑、对立心理尚未完全消失的情况下,起了很好的缓解作用,受到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欢迎。不少同志表示,要是能早点下来,这样问一问、讲一讲就好了。

北大虽然相对平静了,但影响学生情绪的各种因素并未完全消除。9月以来,校园中大小事端不断发生,有的是政



治性的，但绝大多数是因为伙食、校舍等实际生活问题和社会治安问题所诱发的，其中还有两起留学生罢餐、罢课事件，这些不安定情况的发生一方面可以说是北大“九一八”学潮的惯性使然，但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大学生们受当前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对目前社会变革时期所出现的种种社会矛盾的一种共同情绪，具有相当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这些事件主要有：

第一，政治性游行示威活动。除北大“九一八”学潮之外，11月22日，北京部分高校的维族学生到天安门广场游行请愿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这一天上午8点30分左右，中央民族学院的200余名维族学生，包括北师大、师院、北大等院校的少数维族学生共约340余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活动，并到新华门前递交了请愿书。整个活动中没有呼口号，没有演讲，队伍中打出了6条横幅，分别是“反对在新疆进行核试验”、“重视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新疆需有真才实学的民族领导人”、“重视制定新疆少数民族人口政策”、“新疆无须刑事犯开发”、“坚决支持新疆学生运动”。后经国家民委、统战部和民院的反复劝说教育，事件于当天和平解决。

第二，因生活问题而引起的贴大字报、罢餐、罢课及游行。从10月7日北方交通大学学生贴出小字报反映食堂饭菜价高量少起，到本学期结束，共有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学院、北京化工学院、北京机械管理学院、人民大学、北京农业工程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联合大学外语师范学院先后就食堂饭菜质量、价格、卫生、开饭时间等问题贴大字报，短期罢餐等，均由校方通过说服教育、改进工作而圆满解决。但是，在这些事件中，始终有人借题发挥、乘机煽



动。10月20日，北师大曾出现一张题为《师大真要成为吃大》的大字报，宣扬“北大是为国，师大是为吃”，“每一个真正的师大人快站出来吧！呼喊吧！动荡澎湃吧！”11月7日，又有人在北京机械工程学院通过大字报煽动知识分子应该“抨击时弊，剔除邪恶，扶持正义，伸张真理”，反映出在这些行动背后，始终有人想把事态扩大，把生活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另一个焦点是校舍问题。这方面的详情已在第一章中详加介绍了。除此之外，还有北京工业大学、北京经济学院、北京外语学院、北京化纤学院、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学院等院校为开放自习教室、供暖、熄灯、考试等问题张贴大小字报，均很快平息，未造成更大影响。

第三，由治安问题引发的较大波动。这也是这一阶段较为突出的问题。10月15日、16日，北京化工学院连续两次发生校外青年滋扰校园、打伤学生的事件，引起学生强烈不满。16日夜，几百名学生围住校保卫处和行政楼，不让民警将肇事者带走，直至凌晨3点多钟。第二天，即有人贴出大字报，宣称“不愿沉默的人起来吧，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等。在北京钢铁学院、北方工业大学、首都医学院、北京工业大学等校内也发生了类似事件。这反映我们在大学管理上确实存在着漏洞，给了那些唯恐天下不乱者以可乘之机。

第四，留学生罢餐罢课事件。11月11日至20日、11月21日至23日，曾有北京医科大学30多名留学生和清华大学的少数非洲留学生因食堂菜价及卫生问题罢餐。12月1日，上海2名苏丹留学生酗酒后在公共汽车上与售票员发生冲突，并动手打了售票员。司机将车直接开到派出所，请民警解



决。这2名留学生事后诬蔑民警殴打他们，造成12月2日上海的非洲留学生到市高教局游行，并打电话通知北京，要求在京留学生配合行动。12月3日，语言学院、清华大学、钢铁学院、北京医科大学、北方交通大学等6所院校的苏丹学生34人开始罢课，共持续5天。留学生学潮是在改革开放、增加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它的产生与国内学生的各类运动有很大不同。伴随着各国留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加，今后此类事件还会时有发生，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带来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

以上种种不安定情况的暂时终结，是以寒假的到来为条件的。学潮的主体学生们分散了，但产生学潮的根本原因并没有消除，当学生们再次聚合在一起后，新的行动几乎是在所难免的。

### 第三节 同情与责备

在改革开放时期的10年学潮史中，“九一八”学潮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影响上都不入先首，但是它却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这场学潮实际上在客观上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如何正确看待对外开放条件下的民族工业问题。另一方面，则是问题的要害所在，这次学潮的产生受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深刻影响，部分学生在爱国主义问题上非常偏激，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包含着对我国对内对外政策的不满。一些人感情用事，不顾大局，没有组织纪律观念，提倡以“四大”为基础的绝对民主，坚持要搞游行示威和其它过激行动，结果在一部分同学中造成了混乱，给极少数人以可乘之机，进行煽动，把广



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导入错误轨道，引出了与学生良好初衷相悖的结果，以至于扭曲了这次学潮的爱国主义意义。

### 一、谁人不爱国

爱国主义这个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很广泛，它不仅意味着一个人要爱他所生所长的故土，爱这片故土所养育的人民，所形成的民族，所孕育的文化，同时也意味着要爱由此而必然出现的国家。历朝历代，历邦历国，不论哪个阶级都强调爱国主义，这是一面极具普遍意义的旗帜，具有最强的聚合力。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爱国主义的具体含义是非常丰富的，有时甚至会模糊不清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首先弄清它的确切含义，然后再自觉地站到这面旗帜之下。

爱国主义是一种对祖国的纯朴的忠诚和热爱，是对本民族利益的维护与发展。但是，任何事物也不能走向绝对。我们不能脱离爱国主义的阶级与历史的内容。无产阶级所强调的爱国主义是与国际主义所共容的，是在致力于发展全世界、全人类利益的基础上，求得本国利益的繁荣与发展。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认识这一点，而是将所谓本国的利益抽象化、绝对化，置于其它国家的利益之上或对立面，那么必然会产生由阶级压迫为特征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以孤立、保守、排外为特征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从表面看，狭隘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只有一步之隔，但在性质上，它却是爱国主义的大敌。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思想都可能把爱国主义的行动导向自己的反面。

改革开放的历程进入 1985 年，中国又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一切关心民族发展、希望祖国繁荣的人民都对未来抱着极大的信心。当改革遇到挫折、实践发生偏差的时候，很多

人。可  
任。部  
分人  
偏差。  
“丁  
字报，  
的死  
所以  
然是  
要握  
不过  
一  
产党  
的最  
这次  
旗号  
目前  
京的  
至反  
警惕  
义，  
过激  
仁”  
生运  
用。很  
可



人，特别是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年大学生们都感到了自己的责任。可以认为，这正是爱国主义的一种体现。但是，相当一部分人却在怎样才算真正的爱国主义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思想偏差。

“九一八”学潮的总题目就是爱国，最先贴出的一批大字报，其主要内容也是通过纪念“九一八”，悼念抗日战争中的死难同胞，抗议日本国内极少数右翼分子复活军国主义，所以得到了很多同学的支持与共鸣，在这之中发挥作用的显然是学生单纯的爱国热情。但是，有少数同学进而认为，只要握住了爱国主义这面大旗，在爱国的题目下作什么文章都不过分，于是很快将运动导入了两种错误的轨道：

一种是爱国主义的阶级意识的淡化。我们的国家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这一历史时期的爱国主义的最显著特征就是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这次学潮的后期，显然有极少数别有用心者利用爱国主义的旗号借题发挥，那些诸如将党代会诬为“断代会”，攻击我国目前的对外政策是“卖国主义政策”，煽动学生们“要看到北京的腐败”，看到“腐败的政府末日将要来临”等十分错误甚至反动的言论就是证明。相当一部分同学对此并没有足够的警惕，并没有认识到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中所包含的阶级意义，反而一再力求造成一种压人的声势，谁要不同意他们的过激言行，就被指责为“不爱国”、“不是中国人”、“麻木不仁”等等，特别是“九一八”之后，甚至还出现了“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说法，这对极少数人的乘机煽动起到了保护的作用。这种对爱国主义实质的模糊不清的认识是十分危险的，很可能导致根本性的错误。



另一种错误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这在本次运动中表现得极其明显。有不少同学表现出了一种盲目排外和妄自尊大的情绪，忍受不了日本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更忍受不了日本商人从中国获取利润，将这种现象夸大地称为“经济侵略”，将日本民族侮辱性地称为“海盗民族”、“小日本”，显示出一种闭塞的狭隘心理。事实上，只要对外开放，与别国进行贸易，就必须会互有盈亏，有顺差，有逆差，作为主权国家之间进行的相互贸易都是根据双方各自的需要进行的，根本不存在谁侵略谁的问题。如果是贸易出现逆差就是被侵略，那么，1984年美日贸易逆差高达500多亿美元，是不是就意味着美国受到了日本的严重经济侵略呢？而我国对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大部分都是顺差，那么难道我国也是一个经济侵略者了吗？在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上，“九一八”学潮中充满爱国义愤的学生们所表现出来的恰恰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而是一种层次较低的爱国情绪。他们平时最强调开放，但对于开放的具体内容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却毫无心理准备，以至于在改革开放的大题目下犯了狭隘民族主义的错误。

对于爱国主义的模糊认识和曲解，是“九一八”学潮的失误之一。

## 二、远瞩须高瞻

中国有一句气概不凡的成语：高瞻远瞩，到了民间它被通俗化为：站得高，看得远。顾名思义，一个人要想构造未来，预见远景，必须要首先站在一定的高度上，全面了解现实的情况与要求，高瞻是远瞩的基础。对于现实的任何背离与短浅认识都会把人的美好愿望变成永远不能实现的幻想。

“九一八”学潮的基础是广大青年学生的一片忧思爱国之



情，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失误，看到了我们对日贸易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希望通过自己的呼吁与行动引起政府及国人的注意。这种动机本无可厚非。但是，我们也应该指出，这些用心良苦的青年学生们却极其错误地忽视了当时国家的整体需要。

从当时情况来看，国家最迫在眉睫的整体需要是两个：一是安定团结的局势，一是发展社会经济，这代表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所有的局部利益都应该服从于它。但是，许多学生却没有也不肯看到这一点。北大是一所具有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光荣传统的学校，曾经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历次青年运动的先锋。可是有的学生却不能正确地理解这种传统的本质，错误地认为“能闹”、“敢闹”就是北大的光荣传统，每次遇到问题，无论事情大小、性质如何，总是希图通过“闹一闹”来解决，很少考虑因此给社会的整体形象带来的影响。这次学潮中，就有人执意要上天安门搞游行示威，而且到处串联，甚至鼓动北京高校联合，通电全国，以便搞起一个全国性的运动。不管这些人是出于什么动机，有着多么合理的名义，这种做法本身则是在破坏社会安定。经历了10年动乱之后，人民已经深切地体会到安定的局面来之不易，它是我们一切未竟事业的基础，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理由进行破坏。作为青年知识分子的大学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心任务。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党制定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这就要求除了维护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之外，我们还必须创造一个合作的国际环境，以保证我国对外经济外交



政策的顺利实施，这也是许多学生们在一时的义愤之中没有顾及的。从总体上来说，我们与日本之间的问题还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就应该用经济手段来解决，而不应轻易地辅以政治力量。至于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确实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我们只能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9月18日当天，只有二三百名学生到天安门广场针对日本搞了个不大的动作，就引起了国外的种种猜测，有人认为学生的举动可能反映了中国党和政府的意图，或者中国的政治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失控。日本方面显然更加敏感，有报纸认为这显然是得到当局支持的，也有人认为中国年轻的一代正在重新评价1972年以来的中日关系，进而担心我们的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可以想见，这次行动如果没有被及时地加以控制，将会造成多么大的政治影响，将会对我们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造成多么大的阻力。因为对若干个具体问题的不满而断送掉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途径、新前景，无疑是目光短浅、因小失大的举动。

不了解在破坏大局稳定的前提下所取得的任何局部成功都是毫无意义的，这是“九一八”学潮的失误之二。

### 三、民主的真谛

民主既是人的权利，又是一种国家形态。它是人类社会相对于专制的巨大进步，是专制的死敌。但是，这并不是说民主是绝对的，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受任何社会制约的。首先，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总是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从来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民主，只有具体的阶级的民主。其次，民主是与法制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没有健全的法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法制是民主的保证，民主必须受法制的制



约。脱离了这两点，任何民主都只能流于无政府主义的混乱，结果是对民主的根本破坏。

随着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人们逐渐打破了“四人帮”强行套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初步实现了民主的重生。但是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一些实施民主的做法，而要求整个民主意识的深化，达到全面的制度的民主。这是学生运动所最为钟爱的一个主题，无论历次学潮具体诱因如何，最终总要归结到这个大的主题之下。“九一八”学潮亦是如此，它反映了青年知识分子对旧有的矛盾状况的不满和对未来新局面的渴望。但我们也有责任指出，在“民主”这个问题上，学生们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我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理想、宪法准则和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建国立业的基础，这是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民主。任何背离这一根本利益的言行都是对民主的破坏。在这次学潮中，极少数人利用学生的激烈情绪，发泄对党的领导的不满，有意无意地干扰党和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这些思想、言论从根本上是与社会主义的民主思想相抵触的，不能作为人民的民主权利而受到保护，特别是有相当一批同学追求那种抽象的绝对民主，将宪法所规定的人民有言论、结社、集会等项自由理解为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原因，想怎样干就可以怎样干。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与唯我主义的表现，是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曲解与违背。

这种认识上的错误，会直接导致行为方式上的错误。在这次学潮中，从始至终采取的都是“大民主”的方式，在校园中到处张贴大字报，进行演讲，竭力组织大规模的游行，扩



大声势等等。这种“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做法是1980年在宪法中就明确规定取消了的。法律的权威对于同学们竟毫无约束力。这种反民主的形式给了少数人可乘之机，他们混在缺乏警惕的学生中间，利用大、小字报歪曲事实真相，进行造谣、诬蔑、煽动和捣乱，使学生们的情绪久久不能平定。至于人身攻击性质的大、小字报更是时有出现。谁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与做法，一日之间就可遭到数张甚或数十张大、小字报的围攻，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国家的利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但那些享受了“民主”的人却不必负什么责任。这种使少数人感到满足的“民主”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权利为代价的，与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民主的精神是完全相左的，也是与广大同学要求民主的初衷相左的。它只能延缓中国民主建设的进程。

当然，就大多数参加学潮的同学来说，其动机是良好的。他们所要求的民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世界的潮流。但是，如果我们不抓住法制建设这一关键环节，在今天这种形势下仍然采取“大民主”的方式去进行民主建设，那就不是为科学与民主而战，而是站到了时代的对立面；不是爱国，而是损国；不是民主，而是破坏安定团结了。

对于民主的片面理解与实施，是“九一八”学潮的失误之三。

新  
学潮席  
个月左  
响较大  
有着根  
继爆发  
治、经

一

19

对当前  
惊人，  
北京高  
主义是  
吃得饱  
只要政  
反映人  
1986年  
纪录，



## 第四章 元旦震荡

新“九一八”事件之后的第14个月，一场更为猛烈的学潮席卷了全国18个省、28个市的高等院校，并持续了一个月左右。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范围较广、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学潮，其性质与新“九一八”事件有着根本的不同。两次性质不同的学潮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爆发，决不是偶然的，是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深刻的政治、经济思想根源的。

### 第一节 震前景观

#### 一、众望归一的“兴奋点”

1986年大学生寒假返校后，谈论最多的是回乡见闻和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他们通过亲身感受，普遍认为农村变化惊人，城市市场繁荣，春节过得愉快。一位来自贵州农村的北京高校学生说，现在经济发展了，过去贵州流传着“社会主义是吃不饱、饿不死”的说法，已被人们改为“社会主义是吃得饱、富得起”。来自烟台农村的学生反映，那里的农民说只要政策不变，过2年给邓小平立一个牌位。城市学生普遍反映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市场繁荣，物价也稳中有降。1986年北京的春节不同于往年，燃放鞭炮的数量达历史最高纪录，大年三十晚上12点，北京城的爆竹声足足响了半个小



时之久。大学生一致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人们心情舒畅、生活美满，同时反映了改革已成为人们的最大愿望和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趋势。

大家在异口同声肯定改革的同时，也反映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使年轻的大学生们陷入了深思，他们那相对稳定的情绪中隐含着不安的因素。这些问题主要有：

(1) 经济发展不平衡，有些地方仍很贫困。(2) 农业生产出现萎缩情况，表现在不少地方的农民弃农经商，土地成片荒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学生们认为：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经济搞活，致富门路增加，经商比务农富起来的快；另一方面是有些农民害怕政策会变，恢复联产承包以前的政策，不愿意搞农田基本建设和进行农业投入。这种现象也使学生提出农村的经济改革将如何深化等疑问。(3) 不正之风盛行，不少地方整党走过场。部分地区的学生反映经过整党，党风有所好转，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反映地方上不正之风仍很严重。有的同学说，凡是手中有权的干部都利用自己掌管的那部分权力搞不正之风，现在申请宅基地、营业执照、生孩子报户口等都要送重礼。老百姓对那些“地头蛇”是敢怒不敢言。(4) 封建腐朽的东西沉渣泛起。其表现首先是全国赌博成风，赌注最大的达上万元。其次是封建迷信活动猖獗，求神、拜佛、算卦问卜无所不有，杭州灵隐寺大年三十这天就有2万多人去烧香拜佛，80%是青年人。第三是婚丧嫁娶铺张浪费严重，花费多在5000至上万元以上。四是社会风气日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金钱化”现象严重。寒假归来，学生普遍感叹基层是“没钱不办事，不送礼不办事，不请客不办事”。“地位高的不能没权，地位低的不能没钱”的说

法，在大  
回到了  
的深化  
大  
和政府  
革是难  
程。邓  
时说：“  
域，也  
革。”6  
再次  
应包  
个标  
在应  
革”。“  
的改  
有什  
制改  
治体  
的是  
目标  
的关  
解决  
政治



法，在老百姓中很有市场。

大学生正是带着以上对改革形势的满意与不安的情绪，回到了校园。他们期待着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关注着改革的深化与发展。

大学生发现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党和政府早已看到，并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单纯依靠经济体制改革是难以奏效的。这样，政治体制改革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邓小平同志在1986年5月20日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时说：“城市改革实际上是全面的体制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科学、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涉及政治体制改革。”6月10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中央领导人汇报经济情况时再次谈到：“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应作为改革的一个标志。”“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提到日程上来。不然……必然会拖后腿，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因为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

邓小平同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不仅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方向和前途，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注。此后，政治体制改革政策的研讨方兴未艾，并着手解决业已成熟的问题。7月10日至12日，根据党中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指示精神，中央和北京市党政机关、



首都理论界、中央党校共约百余人，在中央党校召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会议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探讨和研究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在这次会上，与会者首先肯定了7年来党和国家在领导制度改革方面做出的努力，如书记处的设立、宪法的进一步修改、提拔中青年干部、纪律检查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的成立等等。这些都为政治体制改革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中心环节、核心问题等也进行了研讨。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致认为，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实现权力的合理配置，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现代化的政治组织机构。核心问题是理顺党和国家政权组织及其它社会政治组织的关系，以使国家政权组织和其它社会政治组织能够充分地、独立地进行活动，从而正确地解决和平建设时期如何科学地、有效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这个重大问题。6月到7月，北京市委统战部先后到北大、清华、人大等校，组织部分教授和共产党外的知识分子，召开座谈会，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及突破口。

7月31日，万里同志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指出：加强软科学研究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改变旧的不适应现代化要求的决策方法是我国政体改革的重要环节；促进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发展软科学需要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必要的物质条件。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了在现代化建设

中、马  
系、中  
革更大  
改革时  
1986年  
治、经  
学生参  
为政治  
进行全  
特别具  
而掀起  
思热自  
可行性  
提供  
原则。  
化的  
共产  
平同  
同志  
个现  
坚持  
人中的



政治  
发展  
系列  
党  
宪  
问  
践  
中  
分  
品  
与  
且  
行  
事

中，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民主与法制的关系、马列主义的指导作用等问题。

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政治体制改革表现出了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大的兴趣。因此，当党和政府着手研究和实践政治体制改革时，中国知识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马上出现热潮。1986年10月11日至12日，北京大学研究生会召开了“政治、经济、文化协调改革理论研讨会”。百余名理论界人士和大学生参加了会议。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全方位改革的观点，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应与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改革相一致，进行全方位变革。这一观点的提出，立刻引起了强烈反响，特别是在中青年知识分子及研究生、大学生中产生共鸣，进而掀起了对我国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反思热。这一文化反思热的出现，客观上转移了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本身及可行性的研讨，同时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散布自由化言论提供了环境，而这些自由化言论的矛头则集中指向四项基本原则。

## 二、逆流扑面而来

1986年，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打着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幌子，肆意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引起了党内一些同志，特别是邓小平同志的注意。1986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提醒人们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不要忘了“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同时，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他说：“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



……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10年20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但是，邓小平同志的警告并没有引起人们、特别是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致使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开来： who?

首先，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将矛头指向我国的政治制度，声称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失败的，30多年来共产主义运动是失败的。《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在11月7日上海“改革中社会问题学术讨论会”上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能够象样的说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以充分展示的而且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这样一种国家，一种制度。这样一种模式，现在还拿不出来。”诬蔑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封建主义的变种和翻版，“事实上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的出路就在于私有制，在于‘全盘西化’”。

其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竭尽全力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鼓吹实行多党制。上海作家王若望则更加露骨地说：“党改革以后将是怎样的形势呢？请允许我再开放、宽松一点说，要实行多党政治。”他们攻击中国共产党已变成一官僚阶层，不再代表人民利益了。党的领导是封建统治的延续，是一党专政，是老头集团统治。而改革一党专政、四项原则，才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所在。经济的多元化要求政治也要实行多元化，即多党制。

其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指导地位，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更是一贬再贬。方励之早在1980年全国

第二次  
马克思主  
马克思主  
成的。“  
学社会主  
年，方励  
义至多  
其  
资产阶  
15日在  
的，这  
统治必  
命与体  
济，自  
依附在  
“美国  
在  
抵制措  
内迅速  
年9月  
国历史  
发展的  
雁《中  
化社会  
的关键  
三



第二次科学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就曾说到：“现在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任危机，这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僵化，用过时的结论得到失败的结果而造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其内容都已落后于时代了，应当改造。”到1986年，方励之则更为直接地宣称：“在百家研究范围里马克思主义至多只是一家，没有居于一切之上的指导地位。”

其四，关于民主和自由，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极力美化资产阶级民主，主张抛弃人民民主专政。方励之1986年11月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话中提出：“三权分立我想是可能的，这是民主化必须做到的，民主社会是多元制的，单元的统治必然会造成独裁、专制！”王若望在杭州第二届“新技术革命与体制改革”座谈会上说：“资本主义的要点，就叫自由经济，自由生活，民主自由，而我们中国社会主义都是把人们依附在户口簿上，工作证上，而这恰恰是封建制度的特点”。“美国的民主政治，我们不如它，包括选举”。

在这种攻势下，我们的报刊宣传不仅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抵制措施，反而出现倾斜，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泛滥。较为突出的是：南方某市的青年报于1986年9月9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给资本主义“平反”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的文章，鼓吹“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种社会形态是不可逾越的”；9月12日发表了刘宾雁《中国—直进行着—场无声的充满血和泪的大辩论》，丑化社会主义制度；10月4日发表了方励之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党制还是多党制》。

### 三、不断躁动的情绪



由于大学的特点和大学学生的弱点，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把大学看成是他们传播自由化思潮的特区，把大学生当作他们的主要传播对象。1986年，自由化思潮泛滥，舆论倾斜，各种思潮纷纷流入高等院校，登上了大学的讲坛。例如方励之，1985年只在北大、科大讲过一次话，而1986年却在上海交大讲了两次、华东化工学院讲了一次，同济大学讲了一次，宁波大学讲了一次。象北京广播学院这样一所不太大的学校，1986年一年各种报告会、讲座就有30多次。另据不完全统计，到了1986年10月至12月下旬，北大、清华、师大共举办演讲、研讨会等20多场。这些报告把自由化观点一股脑儿地塞给学生，在学生思想上造成极大混乱。

1987年1月，几位青年政治工作者对北大、清华、人大、师大4所高校部分大学生思想状况进行了调查，发现大学生程度不同地卷入了政体改革研讨和文化反思热中。由于他们存在着一些对现状的不满情绪，又不知如何改变，因此不少学生接受了乘机而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据调查显示，大学生有四个不满意：一对改革速度不满，认为改革进展太慢，阻力大、收效小；二对民主权利不满，认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实际上能行使的民主权利甚微；三对党风不正不满，认为虽然抓了大案要案，但人们仍对以权谋私的现象忿忿不平，特别是对提拔重用高干子女的问题意见很大；四对知识分子政策落实状况不满，认为雷声大、雨点小。

由这四个不满引出了大学生的四个反思，他们得出的结论多是来自报刊和某些人的讲演所宣扬的观点，没有多少独创。这四个反思是：第一，对中国革命根本教训的反思。他们认为中国革命所以遭受“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乃是由于中



分子作他各属上海次学全大服人学于此是生

国革命超越了历史阶段，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洗礼。因此，封建主义在我国根深蒂固。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自身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政治力量强行推动的结果。今天的改革步履艰难的根本原因正在这里，社会上不正之风的根源也在这里。中国应当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

第二，对两种社会制度对比的反思。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资本主义制度腐朽，是一种纯理论的说教。实际上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上都是落后的，在政治上是不民主的，在体制上都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弊端。而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上是先进的，政治上要比我们民主，体制上比我们灵活的多。

第三，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他们认为，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是落后的，是“文革”出现的根源，也是不正之风难除、改革受阻、民主的政治障碍以及世袭制、拜权主义的根源。中国只有彻底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实行全盘西化，改革才能彻底，进步才能加快。

第四，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他们认为，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建设民主政治，不仅不能起指导作用，相反起着禁锢人们思想的作用。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人类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学派，应当允许其他学派同马克思主义平起平坐。有的同学说，毛泽东思想是斯大林主义和封建农民意识的混合形态。据统计，持以上观点的大学生绝非个别。北京某大学100多人，有一部分学生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仅仅是套话、旧话；有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一个学派，不是指导思想；有一部分人不同意繁荣社会科学仍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No!

但真理只有一个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不仅使一部分学生对四项



基本原则发生动摇，而且对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方法论、道德观等许多方面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人生观方面，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是极端个人主义者。不少大学生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主张以自我为中心，心目中只有自我，一切离不开我的大有人在。他们否定共同理想，认为只要爱国就行了，不一定非要树立社会主义理想。就连大学生自己也承认：“大学生修养较差，个人主义特别严重”，“极端个人主义在大学生中不是支流问题，而是普遍思想。”在价值观方面，不少大学生认为人生价值在于索取，或在于取得地位和金钱，为人民服务在他们看来已属遥远的过去，雷锋则被称为“疯子”和“傻子”。在 worldview 方面，唯心历史观成为一些大学生观察社会的基本观点，主要是：个别杰出知识分子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用文化道德、民族性解释社会发展的多元论历史观，用个人本能和社会本能相协调的观点分析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关系的实证主义。在方法论方面，不少大学生接受证伪主义，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笃信科学的唯一任务就是揭示事物的结构；否认事物的本质，认为本质是假大空的东西；坚持只有横向对比才是科学的，反对纵向对比；坚持认为只有求异思维才是创造性思维，而一切求同思维都是保守的思想，等等。在道德观方面，不少大学生主张道德虚无主义，认为人的行为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因而无道德可言，或认为对自己有利的行为就是道德的。

1986年，世界性民主潮流在国际政治舞台涌动，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出逃，海地独裁政治的瓦解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无不冲击着学生们的价值观念。他们已不再满足于观念的变更和空而论道。多数学生的情绪由不安转向不满而隐



含着冲动，表现出极为强烈的参与意识。特别是，一些素怀偏激情绪和观点的大学生，此时发出了一种虽然微弱但却危险的声音，并在这种声音的引导下，产生违宪行为，最后走向反动。北京大学历史系83级学生李裁安和84级学生张晓辉，酝酿成立反革命组织，起草了反动的《青年马克思派宣言》，在学生中散发。《宣言》对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等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还提出了“青年马克思派”的任务及推翻共产党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

《宣言》宣称：“共产党，像一只巨大的黑色蜘蛛，把它的网延展到四面八方，……主动用暴力横蛮地以自己的意志，代替万物的步伐，把它所统治的世界变成了彻底的黑暗之国……”“共产主义制度，在它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用恐怖和暴行作为路标，留下这样无情的结论：共产主义的失败。现在的任何制度，恐怕都不会比这一铁血怪物更加无耻，更加残暴、更加需要狠狠地打击了。”“青年马克思派必须强行使用非法的民主宣传，求得尽可能多的支持，以形成具有一定影响的民主势力。它最主要的工作，在于把影响注入军队之中，使士兵脱离自己的依附状态，进而组成自己的秘密组织”。

1986年11月4日，张、李二人因反革命煽动罪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由于二人刚刚开始行动即被逮捕，因此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但是，这件事情的出现，说明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下，大学生已由思想混乱和情绪躁动向错误的行动发展。一旦出现适当的机会，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煽动下，一场政治性学潮的发生便很难避免。



## 第二节 南北共震

### 一、来自南方的冲击

1986年底波及全国的学潮，是从安徽科技大学开始的，起因是不满区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办法。

12月1日，中国科技大学校园内出现了《致科大选民的一封信》，称人民代表大会是“少数人的橡皮图章”，号召人们“为真正的民主进行斗争”，由此揭开了学潮的序幕。

12月4日晚，科大在礼堂召开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大会，约有2000多学生参加。会上，8名学生登台演说，并提出要把科大建成“民主特区”。方励之也发表了一番煽动性演讲，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讨论也好久了。有好多人说突破口放在什么地方，我想群众通过这件事表明，我们会找到怎样来进行这场改革的办法的”。他强调说：“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由争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觉悟，争取到才是牢靠的，否则得到了会被收回去的，像我们这样的做法可以说不是没有外来压力的。”他还说：“这次会议，应当成为我们科大民主化进程的一个起点。我再次保证，我们要保护这样一个民主化的环境。”这番话，表明了他支持学潮的态度，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12月5日，科大部分学生到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等校串联，贴出了当天下午游行的告示，并在市中心贴出《告同胞书》。下午1时，科大部分学生与上述学校的学生共计4000多人汇合游行。他们一路高呼“不要恩赐的民主”、“真正的民主靠我们奋斗”、“打倒封建独裁”、“打倒官僚主义”、“孙中山万岁”、“要民主民权民生”等口



号。队伍行至市府广场时，由科大学生宣读了《游行宣言》。  
3时30分，1000多学生涌进省委大院，提出“报道学生游行集会、成立合肥地区大学生联合行动组织、保障学生的政治自由和人身安全”等三项要求。5时左右，学生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陆续返校。

12月9日，在科大学生的串联、鼓动下，中午12时，安徽工学院、安徽大学、安徽中医学院、合肥大学、合肥联大、安徽教育学院以及安徽建筑学校、合肥幼儿师范等校共3000多学生，再次上街游行。标语有“二千年帝制百姓无权老爷作主，卅七载共和人民当家官僚滚蛋”、“为民主‘送丧’、为自由‘致哀’”、“摧毁封建堡垒”、“打倒专制独裁”、“改造中国”、“真正的民主靠我们战斗”等等。围观群众达上万人。下午3时，2000多学生冲进市政府办公大楼，占据楼顶约两个小时。上午4时，安徽大学2000多学生在《安徽日报》社聚众闹事，给报社施加压力。在闹市区，科大学生演讲至深夜。同日，在武汉，武汉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中南财大、华中师大等校学生3000多人，两次上街游行，冲进省政府大院起哄、示威，直至深夜12时。12月5日和9日的两次游行，将学潮推向第一个高潮。伴随游行示威，安徽、湖北、四川、湖南、陕西、天津、上海等高校相继出现措辞强烈、内容反动的大小字报、标语口号，其矛头直接指向四项基本原则。

12月9日，科技大学校园内出现题为《一党专制是阻碍民主的主要障碍》的传单，咒骂说：“中国共产党已成为阻碍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如果说一个事物他们产生、发展和壮大有其一定必然性的话，那么无疑他们走向腐朽和消亡也将是历史的必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对指导人类



的社会实践起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它只是一门科学，不是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只能与其它社会科学具有同等地位。”“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绝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其地位只能与其他政党同等。”

随后，安徽、武汉等地学生开始向外地串联，学潮热点转到上海，波及杭州、南京等地，形成第二个高潮。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想突破北京，造成更大影响。

12月7日，安徽科技大学游行之后，上海同济大学出现了第一张介绍合肥“一二·五”游行情况的小字报《争取民主自由》，提出“科大在行动，我们怎么办？”的问题。随后，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不断出现大字报，煽动学生19日上街游行。上海交大还成立了由马列主义双学位班学员和计算机系研究生等10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提出游行口号是“唤醒民众，争取整个社会的民主”、“改革欺骗的选举制度、改革陈旧而极大压制了人民创造力的户籍制度、改革由国家行政手段统治的新闻广播制度、改革侵犯个人利益的档案制度”等。

12月18日，同济大学校园内贴出一张题为《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死亡》的大字报，鼓动“不安于现状的同学在星期五（12月19日）游行站出来”，“到外滩向市政府请愿：（1）改变人大代表选举制度；（2）要求新闻自由；（3）保证游行者人身安全。”部分同学还到复旦去串联，要求声援。

同日下午1时至6时，上海市长江泽民到交通大学与学生对话。会场十分混乱，只要讲到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党



的领导，台下就是一片嘘声。10余名学生先后上台演讲，提出“当今的社会制度严重扼杀了人的个性”，“这几天发生在交大的一系列事情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个别人还说：“长期以来我们受着少数官僚的沉重压迫，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人权”，“共产党搞的是愚民政策”等。

19日下午2时40分，以同济大学、复旦大学部分学生为主的游行队伍来到外滩市府大厦。半小时后，他们转向人民广场，与交大等校学生汇合。游行队伍喊着：“反对官僚、争取民主”、“自由万岁”等口号，打着“学生万岁”、“团结奋斗”等横幅。到广场后，大部分学生坐在市人大办公楼铁栅栏外，连同围观者，人数约2万左右。4时半左右，五六百学生不顾民警劝阻，冲击市人大办公大楼，强占正在进行宣传的公安局广播车。同济大学有人提出4条要求：（1）江市长讲话，承认这次民主运动是正义的、爱国的、合法的；（2）承认大学生有贴大字报的自由，游行合法；（3）《解放日报》、《文汇报》要如实报导这次学生运动；（4）江市长必须保证游行者的的人身安全。晚7时15分，游行队伍第二次来到市府门前，要求与市长对话。8时20分到12时，副市长叶公琦等与学生代表进行谈判。市长江泽民公务结束后，于深夜接见学生代表，劝他们返校。但是，不但围坐学生未走，而且同济、交大等800余名学生携带大衣、棉被、面包等又陆续赶来声援，学生增至2000余名。这时，人群中出现了殴打民警、砸玻璃等现象，还有一些青工和成年人在那里煽动不满情绪。20日凌晨，上海市公安局发出第一号、第二号通告，要求学生迅速撤离广场，学生拒绝服从。凌晨5时45分，公安机关组织2000余名干警，采取行政措施，疏散了现场的人群，并派车将学生



分别送回学校，保证了城市交通畅通和正常的社会秩序。

22日至23日，上海同济、交大、复旦、医大、华东化工学院、上海建材学院等20所高校的学生，连续上街游行，口号主要有：“还我人权”、“还我自由”、“严惩打人凶手”、“打倒法西斯”、“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等，并出现煽动罢课、罢工、罢市的大字报和标语，形势更加严峻。

与此同时，浙江杭州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杭州师范学院、浙江医科大学等校先后收到中国科技大学要求声援的信，并陆续上街游行。江苏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工学院、南京师大等校也出现大小字报，学生涌上街头。湖南、武汉、黑龙江等地，也先后出现了声援上海学生的大小字报和游行。

## 二、北京的反响

在安徽等地学潮不断升温的同时，北京部分高校也出现了一些大小字报，主要内容是介绍科大学生游行情况，鼓动学生不要沉默，起来声援。

12月10日，清华大学贴出一份题为《还我民主——皖省政府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的大字报。11日晚9点，北京大学出现4份介绍科大闹事的小字报。少数围观学生在那里打着手电，点着蜡烛高声朗读，还有些人在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12日，北大出现9份小字报，其中一份出自校外者之手的小字报提出“民主要靠自己争取，北大在民主运动中不能走在前列，将愧于北大传统和民主历史。”一位力学系86级学生在上午8时贴出一份小字报，提出“北大是历来以民主著称的，这次面对民主的浪潮，理（应）积极地响应，更重要的，民主意识早就被压抑在我们心头。为了

中共  
识之士，事  
共商大字报  
的大字报  
应该沉默  
游哉的日  
也。”

12日

力学系学

游行，声

些学生骨

动员他位

这位发

二天，《

响冷漠。

表示：

于当夜

15

书》及

给予的

等。同

的民主

份小字

站在民

连

大小字



中华，起来吧！我们准备先成立北大民主促进会，望北大有识之士，不论学级高低，请于今日下午5点相会于43—230共商大事。”同日，署名生物系学生的一份《给北大学生的信》的大字报说：“在这个一贯反对恶势力的先锋之地，我们还应该沉默吗？”“我们的愚昧正遭他人耻笑而不自觉过着悠哉游哉的日子，吃着好大米饭就觉得满足了……真是枉为人也。”

12日下午5时，北大十几位学生聚在一起开串联会。那名力学系学生提议用10至20天时间，到各校串联，最后到天安门游行，声援科大。到会的同学只有4人真正支持游行。而一些学生骨干在他们的讨论中，从各种角度指出游行的错误，动员他们不要以这种方式去争取“民主”。串联会开到晚10点，这位发起人表示要将自己的观点贴出去，由学生们评估。第二天，《民主活动目标之探索》便以学术文章的面目贴出，可反响冷漠。14日，这位学生在同美联社记者谈话中改变了态度，表示：我们不要游行，对民主问题可以开展学术讨论。他并于当夜撕下了自己的大字报。

15日，人民大学出现一份科技大学的《告全国高校同学书》及3幅游行照片。17日，人民大学贴出标语“民主不是给予的，是争取到的”、“同学们行动起来，为了民主自由”等。同日，清华大学出现3份大字报，其中提出“清华大学的民主自由到了崩溃的地步”。18日，北京钢铁学院也出现6份小字报，说“北京的冬天太冷，希中老年教师学习方励之，站在民主的行列里。”

连日来，北大、清华、人大、钢院及北航等校继续出现大小字报和标语，煽动学生情绪。如“我们北大人血总是热



的，这些字写满了五四以来的我校史册”、“坚决支持上海3万学生游行”、“无民主就无四个现代化”等等。

上海大规模游行之后，《美国之音》等外电进行了报道，称上海市政当局派出武装警察进行干涉，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逮捕学生300余名等等。谣言传来，刺激了北京学生的情绪。北大校园22日贴出了一份《沉睡的“北大荒人”醒醒吧!!!》的大字报，提出“北大的同学们，我们不能躺在‘五四’、‘一二九’的光辉历史上沉睡！”“历史已成为过去，奋斗开拓是明智之举！”“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同胞们起来为时不晚！”23日，清华、北大、钢院共出现26份大小字报，其中北大力学系一位学生在《对学生游行的反思》中说：“在目前的不民主气氛中，学生能找到的唤醒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政治素质的最好办法，只有游行走上街头，走入农村。”钢院一份署名“钢院学生”的大字报中提出“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的”，“反对大小官倒，不要党制统治。”

23日，清华大学部分学生率先上街游行。早6点左右，清华大学一名学生在校内北院、十饭厅前的布告栏内贴出《告清华同胞书》，声称“科大在争民主！交大、同济在争人权！”“我们的同龄人，为了争得令人神往的民主，拖着疲倦、饥饿的身躯，在寒风中遭受着警察的殴打！”7点40分左右，这位学生见大字报被撕，又贴出《再告清华同胞书》，说“正义何在，公理何存，我们不要做哑巴”。“我们是人，我们要争做一个健全的人！父母给了我们一张嘴，祖国、人民给了我们一张嘴，难道仅仅只用它来吃饭吗？”下午3时，这位学生与其他5位同学一起贴出集会海报，提出当晚6点30分在大礼堂前集会，“就民主问题进行广泛讨论”，署名是“清华集

会筹备组”  
生参加，  
下午  
了一些学  
进行。晚  
时，少数  
不少人为  
“学生的哥  
校游行。  
院学生会  
但是，学  
面有几十  
当清  
内发生争  
北大干扰  
这样僵持  
右，一个  
保持秩序  
队伍  
争自由、  
援科技大  
要站在旁  
进入北大  
后，又恢复  
游行队伍  
行至中关



会筹备组”。他们还在北大、钢院贴出通知，要求这两校学生参加，并准备宣传品。

下午6点30分，部分学生来到礼堂前聚集，北大等校也来了一些学生。由于礼堂内正在放映电影，集会无法在礼堂内进行。晚7点左右人群来到礼堂前草坪上，约有二三千人。这时，少数学生开始发表演讲，大喊民主、自由、言辞偏激，不少人为之叫好。礼堂前广场秩序混乱。有人在演讲中鼓动“学生的事由学生管，不要学校管”。还有个别人煽动学生出校游行。有人喊“如果今天不去北大，我们就白来了。”这时，院学生会主席几次上台讲话，劝说学生马上散去，不要游行。但是，学生不听劝阻。约1000多人开始向西门移动。队伍前面有几十个人手挽手，唱着歌，打出“民主”的标语。

当清华的游行队伍于晚8点30分来到北大西门时，人群内发生争论。队伍中的学生党员和学生干部劝阻大家不要进北大干扰，但个别情绪激动的学生反复鼓动队伍进入北大。这样僵持了15分钟，队伍三进三出北大西门。约8点40分左右，一个手持短筒喇叭、戴黑框眼镜的同学高喊：“请队伍保持秩序，我们进入北大，走大道，从南校门出去”。

队伍进入北大后，一路唱《国际歌》、呼口号，如要民主、争自由、要求新闻自由、要求办报自由、声援上海学生、声援科技大学等。队伍一边走，一边喊：“北大人醒一醒，不要站在旁边看。”北大许多学生在图书馆自习，听说游行队伍进入北大后，大多反应比较冷淡。图书馆经过15分钟的骚动后，又恢复了平静。只有少数学生加入游行队伍。晚9时20分，游行队伍从北大南门出校。在随队学生骨干的劝说下，队伍行至中关村丁字路口时，部分学生相继离队返回学校。队伍



在路口停了几分钟后，游行队伍在部分学生的要求下，向人民大学走去。

晚9点40分左右，队伍来到人大。他们不听人大学校领导的劝阻，几次冲撞已经关闭的校门。这时校门口已经聚集了3000人左右。为了不使校门被挤坏，压伤周围的同学，晚10点20分左右，人大领导打开了学校的侧门，部分人大学生拥挤在校门前打听情况。由于学生干部、学校领导及学校广播的再三劝阻，人大学生没有呼应游行队伍，只是围观。临街的学二、三楼街口许多同学在观望，校门口招待所的屋顶上也站满了围观的学生。这时，游行队伍只剩五、六百人，向南行至北京图书馆附近时，还剩近400人。由于白石桥有两条武警封锁线，游行队伍无法通过，各校学生便于夜12点30分左右开始返校。到24日零时30分，少数聚集在首都体育馆、人大门口的学生才全部散去。

针对23日晚的游行，清华大学党委通过学校广播站，广播了校长办公会通过的《重要通报》，指出“12·23”事件是一起有损安定团结、干扰学校正常秩序的错误事件，并召集了学生班长、团支部书记以上干部会通报情况，表明态度。多数学生对学校的《重要通报》和学校领导的讲话，没有严重抵触情绪，认为上街游行没什么意思，“水平太低”。但也有部分学生认为，学校的《通报》言词激烈，口气强硬，有恐吓色彩。大多数同学对学校清理大字报表示反感，认为这只能增加对立情绪。对于上街游行，有的说：“闹事虽影响安定团结，但冲一冲也会有作用”。有的说：“游行近期效果不好，但远期效果好”、“20年后看效果”等。但是，参加游行的同学，有的觉得到北大、人大后受到冷遇，脸上无光，



有凄凉感、冷落感、不安感。

北大部分同学对游行的看法是：空洞地喊争取民主的口号，而没有具体的目标和内容，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也有的同学说，我们不是不想使中国早一点实行民主，但我们怕给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带来压力，给改革在短期内造成困难。更多的同学说，“北大一向不跟别人后面跑。北大崇尚独创，低水平的东西我们不屑于参加”。

尽管这次游行没有被大规模地发动起来并造成重大影响，但部分学生的情绪却没有平静下来。各校继续出现大小字报，且数量不断增加。从24日到27日4天里，北大、清华、师大、钢院、人大、北航、工大、农大、北方交大、广播学院、外语学院等校，共有大小字报和标语200余份。特别是，不少大字报言辞更加偏激，极少数人将矛头指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有的大字报说：“目前的改革没有抓住要害，要搞私有制，中国要补资本主义的课。”有的大字报说：“视30年经验，一党制解决不了问题。”为了切实保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贯彻落实宪法的规定，以保障公民在运用宪法规定的权利时有法律准绳，26日，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3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共有10项具体条文。全文如下：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依法行使游行、示威的权利，维护首都的公共秩序，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公民依法举行的游行、示威，本市各级人民政府予以保护。

**第三条** 举行游行、示威的组织者应当在五日前到游



行、示威地的区、县公安机关提出书面申请，跨区、县的到市公安机关提出书面申请，说明游行、示威的目的、人数、时间、地点、路线，并注明组织者的姓名、职业、住址。

第四条 市、区、县公安机关对于游行、示威的申请，除违反宪法、法律规定，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的以外，应予以许可，同时，公安机关根据维护交通、治安秩序的需要，可以改变原申请的时间、地点和路线，并可提出相应的要求。

第五条 市、区、县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游行、示威的申请报告的次日起三日内，做出许可或者不许可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组织者。

第六条 游行、示威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游行、示威应当按照许可的时间、地点和路线等条件进行。

游行、示威的组织者，应当负责维护游行、示威队伍的秩序。

游行、示威不得扰乱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秩序。

游行、示威不准携带和使用武器、凶器、易燃易爆等危害公共安全的物品。

游行、示威不得扰乱治安、妨碍交通，不得沿途涂写刻画、张贴标语，不得破坏园林、绿地、公共设施。

第七条 公安机关对于许可的游行、示威，应当负责维护交通秩序和治安秩序；对于违反本规定的游行、示威，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劝阻、制止。

第八  
得或者抗  
法犯罪活  
第九  
第十  
对于  
普学生来  
出“游行  
议，地方  
民主自由  
学生在1  
的请求，  
看来则  
无  
合宪法  
游行法  
会和它  
情况下  
员会备  
至198  
这次制  
自己的  
定。其  
冲着学  
由。但  
需要



第八条 对于在游行、示威过程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或者抗拒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或者进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由公安、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九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解释。

第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对于这个《规定》的公布，不少学生有误解，以为是冲着学生来的。有的学生认为游行法规制订程序不合法，提出“游行是涉及公民的权利自由问题，应由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地方人大常委会无权制订。”有的学生认为，游行法规给民主自由加上了框框，实际上是不让游行。北京大学的几名学生在12月27日《规定》公布当天，挑衅性地提出政治性游行的请求，鉴于当时的形势，校方劝其撤回。而这在一些学生看来则成了《规定》实质上是不让游行的佐证。

无需讳言，这个游行法规确有不完备的地方，但它是符合宪法的，也是必要的。首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有权制订游行法规。我国宪法第100条规定：“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情况下，可以制订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依照上述规定，北京市人大及其常委委员从1980年至1986年先后制订了25个地方性法规。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这次制订游行法规，同样是依照宪法和法律的上述规定行使自己的职权。游行法规的内容，也完全符合宪法的有关规定。其次，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制订游行法规是必要的，并非冲着学生来的。宪法第35条规定：我国公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公民如何行使这一权利，除了宪法的原则规定外，还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做出具体规定，才能使这一基本权利



落到实处。例如，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婚姻自由，同时又制订了《婚姻法》，对婚姻自由加以具体化，保证了公民正确行使婚姻自由的权利。世界许多国家和城市对于游行示威的自由，都有具体的法律规定。例如，日本就先后制定了《东京关于集会、集体游行和集体示威运动条例》、《大阪市关于游行和集体示威运动条例》和《京都市关于集会、集体游行和集体示威运动条例》等。最后，游行法规决不是给民主自由加上了“框框”，否定了公民游行示威的权利。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什么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利和自由。资产阶级宪法对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也是通过规定加以限制的。例如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4条即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我国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作了充分的规定和切实的保障，同时又规定了行使这些权利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宪法第51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游行法规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它是为了使宪法关于公民游行示威与自由得到准确的实现，使公民的这一基本权利得到正确的行使，而不是否定公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如果说有人把民主、自由理解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本身就是对民主、自由的误解。同样，在理解社会主义民主时，更应正确地理解民主和法制、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权利和义务的关系。

极少数人利用一些学生对游行法规的误解，乘机发起进攻，煽动学生与政府的对立情绪，试图挑起更大的事端。27日，北大国政系4名研究生贴出《告北大同学书》，提出“关于示威游行的规定的公布，使我们的权利又一次遭到了阉



制! 北大人, 你们在想什么? 想做温顺的奴隶吗? 你们甘愿让自己窒息以至死亡吗?”北京师范大学29日出现署名“读者”的大字报, 挑唆道: “上海学生为争取民主自由上街游行的结果是北京政府限制游行, ……这是赤裸裸的人治! 实质是统治者以维护交通秩序为漂亮的借口, 拐弯抹角地取消公民游行示威的自由!”

29日凌晨1时许, 北师大宿舍下面有人喊: “有人撕大字报!”并跑到学生宿舍区到处喊叫。不一会儿, 校园内聚集了六七百人。在个别人的煽动下, 约三四百学生冲出校门, 走上街头, 造成北京学生第二次游行。上街的人喊着“要民主, 要自由, 反独裁, 反专制”、“不做奴隶”、“自由万岁”等口号, 并于凌晨3时30分左右来到人民大学校门口。他们挤坏了人大学校校门, 涌进校园, 围着宿舍区高喊: “人大, 人大, 下来, 下来”, 口号声虽很齐, 但多数人大同学没有反应。师大学生见人大学生反应不热烈, 便向北大折去。

凌晨4时40分左右, 北师大学生撞开已锁上的南校门, 冲了进去。北大有些学生下楼围观, 也有些学生喊“我们要睡觉的自由”。将近早6时, 师大学生聚在燕南园东墙外及学三食堂之间的马路边, 一个个子不高、头发较长、南方口音的人站在东墙上进行煽动演讲, 提出4条: 一是废除游行法; 二是创立中国知识分子报; 三是成立北京学生民主联合会; 四是要求实行多党执政。然后煽动人去清华, 再去天安门。早晨6点25分左右, 师大400余名学生撞开清华校门, 进入学校。队伍在宿舍区15号楼一带, 一会儿唱歌, 一会儿喊口号。口号有“方励之万岁”、“要民主自由”、“打倒专制”、“打倒独裁”、“废除10条”、“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



由”、“罢课自由”、“民主高于读书”等。几名清华学生在宿舍窗口喊“我们要睡觉”，“我们还要上课、要考试”。游行队伍中喊：“罢课！罢考！”只有几名清华学生下楼围观，多数人没有动，游行队伍见无人响应，便于7点30分离开清华，又回到北大。队伍进入北大校园后，因仍然没有什么反应，便开始散去。

这次游行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薛德云，是贵州铜仁县一个无业人员。他曾于12月初跑到北京高校进行煽动，并化名马哲混入北师大宿舍区。在这次游行中，他带头喊反动口号，并在游行结束时说“元旦天安门再见”。薛德云的非法活动很快暴露，被依法逮捕。

的确，极少数敌对分子和极端偏激分子并不满足于两次没有影响的游行。他们千方百计利用广大学生的爱国热情 and 不满情绪及我们工作中的某些失误，准备在元旦大闹一场。

### 三、“示威去”

12月29日，北京大学出现《元旦大游行，进军天安门》、《去天安门者注意》、《首都学生大联合，元旦10时天安门前集合》等大小字报及标语。30日，署名“易冰寒”的大字报《关于游行的八项建议》，提出元旦游行的口号是“要求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统治”、“反对10条规定”。具体条件是“立即为上海游行正名，公布全国学生运动真象”；“恢复大字报的合法地位”；“恢复《中国》杂志和其它被禁止书刊”；“民主选举”等。北京师范大学一份署名“火山”的大字报说：“中国要民主，要强盛，靠一个政党独霸领导权是不行的。中国的出路在于多党专政”。另一份无署名题为《中国人在干什么？》的大字报说：“在中国，民主选举、人民



代表大会、民主党派、政治协商会议等等好听的东西是什么货色，睁着眼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些专制政治的花边，独裁统治的遮羞布，一度被撕得干干净净，……中国的统治者只懂得一种统治方法——专制和愚民。现在人民不愿意被愚弄，不再是愚民、顺民了。他们要起来，教给中国的统治者什么是民主政治，让我们担负起教育的责任。”

12月31日，署名“首都高校学生民主运动联合会”的大字报《元旦示威去!!!》，出现在北大、清华、师大等校。主要内容是：

“中华大地上新生的民主运动已到了严峻的关头，当局利用手中掌握的暴力与非暴力工具，妄图一举以高压将代表着民族真正希望的这一运动闷杀在摇篮中。

青年们，怎么办？难道我们真的愿意再一次失去希望，重新又回到痛苦不堪的沉默中吗？难道我们真的只能在专制的桎梏下象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活着吗？

我们第一次联合示威活动是在新年元旦，中午12点开始，下午5点结束，地点西长安街新华门，方式静坐示威。届时将由代表向当局提出如下要求：

(1) 由基层党员民主选举十三大代表，由代表民主选举中央委员会；(2) 由人民民主选举人民代表，政府成员由人大提议、审议和任命；(3) 允许私人 and 团体自主办报刊，彻底改变一家垄断新闻媒介丑恶局面；(4) 禁止政治迫害，释放政治犯，不得因民主运动而抓押青年学生。

……

注意事项：去新华门的途中不要举行游行，以免受阻，要分别抵达新华门附近，到时再聚集。”



在北京极少数人鼓噪元旦游行的同时，全国18个省市、28座城市的高校出现了大小字报和集会、游行，连拉萨也出现了大小字报。海内外各种敌对分子和敌对势力亦蠢蠢欲动，煽风点火，唯恐中国不乱。在好几座城市的高校内出现了“打倒共匪”、“国共合作、华东自治”、“反对一党专制”、“反对新宪法”、“在中国废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宁要‘四人帮’，不要胡耀邦”等反动口号、标语。10月份，上海还出现了反革命组织“中国人民卫民党”，首要分子是上海漆器厂工人史关福。其宗旨是“推翻中国共产党”。上海学潮开始后，史关福立即赶写反革命煽动信，准备向各大学散发。信中声称“卫民党支持这次示威游行”，煽动上海大学生“北联清华”，扩大事态，还拟定了反革命联络暗号，妄图策划更大的阴谋活动。12月27日史被上海市公安局依法逮捕。

北京部分高校也陆续收到一些反动传单和信件。北师大学生会负责人12月30日收到一封反动信件，信中说：“你们发动的‘一二九’行动首先肯定是革命行动。不过，我认为这只是个小小的初步革命尝试。我们应提出的标语口号是：（1）打倒官僚腐败政府；（2）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和自由；（3）要人民的公仆，不要官老爷；（4）反对物价上涨；（5）欢迎革命群众参加游行。”1987年1月2日，中国人民大学团委收到一封署名“南大觉醒的一代”的反动信件，里面说：“请让我们走到一起吧！集成洪流，同这个腐败的党斗争，彻底推翻这独裁的政权！”北方交通大学、民族学院、北京工业学院等校学生会于1986年12月收到署名“港九学生支援祖国民主运动委员会筹备会”的反动传单，传单中说：“我们要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这是1978至1979



年‘北京之春’民主运动所提出的口号，也是今年中国年轻一代的呼喊！……‘北京之春’即将迅速壮大为‘中国之春’了！”

1987年1月上旬，清华大学、北京建工学院等校收到夹在国外来信中署名“上海爱国学生联谊会”的反动传单，传单说：“我们被‘四个坚持’束紧了手脚，挖空了脑袋。我们无数有良知血性的民运先驱，以及年末为纪念‘九一八’国耻和‘一二九’运动的爱国青年被投入了黑牢。在中共玩弄的所谓‘社会主义民主’的骗人把戏中，连那些只能起着花瓶和橡皮图章作用的各级人大代表选举，也只能由中共党员干部全部和全程的包办……我们不怕贫穷和落后，……我们害怕的是我们国家没有民主，人民被剥夺了一切思想言论的自由，而任由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基于要维护他们既得的权力和利益，搞‘四个坚持’，以10亿人民为~~猪~~狗，把我们国家带到封建独裁、永远开发不起来的死巷里去，这才是注定了我们永远贫穷和落后、永远无法翻身的命运。”同时，台湾《自由中国之声》电台对潜伏在大陆的特务组织发出指令，要他们“选择适当时机一起举发”。台湾还指示特务组织，“运用种种关系鼓励青年学生勇敢参加，并给予大力支援”。

日益严峻的形势，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2月30日，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谈了政府对学潮的态度和看法。他说：“现在全国在校大学生200万人，参加游行的只占大学生总数的2%，许多人是围观。参加游行的主要是大学一、二年级的学生。他们关心民主和自由。但是，他们大多数没有明确的目的与要求。参加游行的绝大多数学生是热爱祖国、支持改革，愿意为振兴中华而努力。他们希望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进程更快些。学生中有些



偏激的情绪和行动，地方当局和学校当局对他们的政策是教育和引导。”“我们也发现少数人有违犯宪法的言论和行动，他们想利用学生的热情。我们是把这些少数人的言论和行动与学生区别开来的。”同时他也指出：“确有一部分学生受了错误思潮的影响，就是他们要照搬西方的民主，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同一天，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就极少数人煽动大学生元旦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发表谈话，指出：“全市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是热爱祖国，拥护党和政府，支持改革、开放政策的，是真诚希望在安定团结局面下致力四化，振兴中华的。极少数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喊着美妙动听的口号，实际上干着破坏社会主义的勾当。他们要造成全国大乱，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毁掉革命和建设的成果。他们的罪恶目的，一定会被广大人民和青年所识破和唾弃。现在，一小撮敌对分子的阴谋已经败露。我们正告这些人：如果你们胆敢在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在神圣的天安门广场捣乱，必将遭到严惩。”还是这一天，邓小平同志约见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指出：“凡是冲天安门的，要采取坚决措施。北京市政府既然公布了游行示威的规定，就是法律性质的，必须坚决执行，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前一段，我们对学生闹事，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影响了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疏导，包括法律的处理。”12月3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了关于保证天安门广场良好秩序的通知。所有这些，在大多数学生中产生了震动。尽管一些学生对事情的本质一时还看不清，但他们不愿被极少数坏人利用，不愿意社会动乱，因而对元旦游行采



取了不支持、不参加的态度。不过，也有少数比较偏激的学生，坚持元旦游行的主张。

1987年1月1日，元旦。入冬的北京，天气十分干冷。北京城的节日气氛仍然很浓，人们或游览公园，或走亲访友，或穿梭于商场。只有天安门广场附近，在平静庄严的环境中，带有一些紧张、不安的气氛。

这一天，天安门广场实行戒严。上午10时，首都3600多名优秀少先队员在纪念碑下，举行了“为了祖国的美好明天”主题大队会。整个会场庄严、肃穆。广场周围，除了许多围观的群众外，还夹杂着少数躁动不安的大学生。

由于游行组织者没有公开露面，混在人群中的学生三五成群，不断地寻来觅去。他们还纷纷抱怨找不到“中心”。直到将近中午1点钟，聚集在历史博物馆西北角的数百名学生，不顾公安人员的一再劝告，按照预定暗号，突然打出横幅游行。他们呼喊“修改10条”、“反对暴政”、“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口号。同时打出“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的横幅，以为这样就可以不受游行法规的限制。游行仅十几分钟，即被现场民警制止。53名学生被带离现场，进行教育审查。不久，天安门广场恢复了平静。这一天的游行没有造成学生预想的影响。

虽然白天少数学生的游行被平息，但事态在北大校园内继续发展。下午3时开始，北大校园三角地一带不断出现小字报，大约六七篇，其中说：“学生游行遭到镇压，警察打了学生”，鼓动学生去营救。许多学生围着观看，并有人大声宣读。

晚8点30分左右，北大300多学生听完新闻广播后，聚

集在32号宿舍楼前，高呼“还我同学”、“自由万岁”等口号，唱着《国际歌》。几分钟内，人数达1000多。人群向校长办公楼走去，沿途不断有人加入。北大校长丁石孙在办公楼前与学生会面，并讲到学校正在与市委有关领导联系，并已准备好车，准备把学生接回来，要围观学生等2个小时。这时，北大哲学系84级一位研究生拿过话筒，向学校提出4个条件：（1）无条件释放被捕学生；（2）对参与游行的同学要负责，保证不穿小鞋，不给处分，不记小过，保护学生权益；（3）新闻单位如实报道游行情况；（4）由校方与学生签订保证书。随后，这位同学提出大家先回去，留下学生代表等待联系结果。他的建议，遭到学生们的拒绝。

晚10时左右，聚在办公楼前的学生出西门向市内走去。途经人大时，人大学生500多人加入进来。当队伍行至黄庄时，约有4000多人。2日凌晨1点30分，游行队伍走到甘家口，北大副校长沙健孙追上队伍，向学生进行广播讲话。他告诉学生被扣学生已接回，希望他们返校。随行的团干部、学生骨干及团市委干部、“劝说线”警察等，也反复劝说学生，大部分学生接受劝阻返回学校。但是，仍有400多人突破警戒线，于3点30分游行到天安门。为了尽快把学生们劝回学校，北大领导租来了北京市公交总公司的汽车。多数同学看到司机师傅们不顾辛苦、寒冷，下班后还给他们出车，都很感动，并迅速上车。但也有少数学生在一旁喊“不许上车”、“都下来”、“坚持到底”，甚至从车上往下揪上了车的学生。看到这些，司机师傅们又气又急地对他们说：“你们违法游行太不好了，难道就你们是救世主，我们工人都是吃干饭的?!”在工人师傅及学生骨干、团干部的劝导说服下，学



生们陆续上了车，于凌晨5点30分左右开始返回学校。

《北京日报》在2日报道了元旦的游行情况，并指明：“这是一场由极少数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分子煽动的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制造动乱的违法事件，事前没有进行申请登记，违反了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和北京市政府关于保证天安门广场良好秩序的通知，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和交通秩序，将依法追究主要责任者的责任。”1月5日，《北京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他们是真正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吗？》，提醒大家“一小撮阶级敌人是惯于使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两面派手法的，我们的同学应该提高警惕。”那些“以为闹事时只要打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旗帜，就能表明自己与敌人是不相干的”人，“也未免太幼稚了。我们必须尖锐指出，他们的行动，就是帮了敌人的忙，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

《北京日报》一系列旗帜鲜明、措辞强硬的报道、社论和评论，刺痛了极少数敌对分子的痛处，也引起了一些对这次事件性质认识不清、对立情绪仍然很大的学生的不满。北大经济系的部分同学说：“《北京日报》严重歪曲事实，搞假报道，使用‘文革’语言，不是讲道理，而是扣帽子。”有的同学说：“以前要求新闻自由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这回结合《北京日报》的表现可有实际内容了。”4日，北大，师大共贴出大小字报6份，主要是对电台、电视台和报纸对学生游行的报导不满，集中攻击《北京日报》。北大的一份《倡议》提出：“将近日的《北京日报》于明日中午12点30分聚于此处烧毁，以此作为不违法的抗议。”5日中午，北大几个学生在三角地宣传栏前焚烧了这几天的《北京日报》。数百名学生围观，有的起哄，有的高呼“烧掉《北京日报》！”6日，《北



京日报》再次发表短评《不要害怕真理》，并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午，部分同学又要到三角地焚烧《北京日报》，被困干部、学生骨干制止。同日晚10点30分，人民大学内有一二百学生在学三楼前聚集，楼上学生敲盆敲碗，把《北京日报》点燃往下扔，发泄自己对当天《北京日报》短评的不满。

### 第三节 震后思考

#### 一、学生们怔住了

元旦游行以后，为了尽快制止闹事、平息学潮，党和政府抓住时机，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1月6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全体党员和干部、群众传达《邓小平同志关于当前学生闹事问题的讲话要点》的通知的要求，北京市各高校领导向全体学生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在去年12月30日约见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时的重要讲话。邓小平同志在讲话中，指明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于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坚持改革和对外开放，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并且正确阐明了中央当前处理学生闹事问题的方针。他说：

“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也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

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这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

中  
这个已  
收入  
主义制  
斗方向  
壮地坚

不能  
自由  
10亿  
个群

我们  
色的  
有希  
过去

能撸

这样  
王者

然，  
要能



邓小平 1985年 12月 1日 讲话

会主义道路。……

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要得到证明。如果我们搞到人均收入 4000 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到那时就能够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人类 3/4 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反对自由化至少还要搞 20 年。民主只能逐步地放开，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如果搞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自由化，脱离了党的领导，10 亿人民没有一个凝聚力，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怕外国人说我们损害了自己的名誉，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政局是稳定的，中国才有希望。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

“处理学生闹事是一件大事，领导要旗帜鲜明，群众才能擦亮眼睛。”

“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象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王若望猖狂的很，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

“……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使用。当然，使用时要慎重，抓人要尽量少，尽量避免流血。但他们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办法是首先揭露他

《人民报》部分骨干在学三然往下  
党和政  
、群众  
》的通  
平同志  
讲话。  
对资产  
坚持政  
性，并  
说：  
要争  
不能  
煽动  
三权鼎  
技术，  
离开社

们的阴谋，尽量避免流血，一个人不死最好，宁可我们自己人被打伤，但要把闹事的为首的抓起来。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

1月12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中国科技大学领导班子。中共中央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光召，在中国科技大学全体干部会议上宣布了这一决定：撤销方励之副校长职务，免去管惟炎校长、党委副书记、研究生院院长职务。这两人由中国科学院分别安排到北京天文台和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同时任命滕藤为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彭佩云兼任党委书记，组成新的党委。周光召在谈到改组科大领导班子时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方励之在不同场合散布了许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言论，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他的企图摆脱党的领导和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办学思想，给中国科技大学带来极为恶劣的影响。这些错误思想在这次科大学生闹事中充分暴露出来。作为学校主要负责人的管惟炎严重失职，使科大的思想政治工作受到很大削弱。他们已不能保证党和国家对科技大学的领导，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的贯彻执行，必须进行改组，以保证把科技大学真正办成一所社会主义的大学。”

1月10日至15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集党的民主生活会。会上，胡耀邦同志检讨了自己担任党的总书记期间所犯的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并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辞去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要求。与会同志欢迎胡耀邦同志的初步检讨，如实地肯定了他在工作中的成绩；同时，对其所犯的错误也进行了严肃

的，  
政治局  
受胡耀  
赵紫阳  
党的下  
政治局委  
同时指  
线，  
产阶  
社会  
经济  
巩固  
人民  
的任  
  
刘宾  
纪委  
  
状某  
国导  
各种  
在元  
维护  
“在  
一事  
国家



的、心平气和的、摆事实讲道理的批评。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并作出以下决定：“一、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二、一致推选赵紫阳同志代理党中央总书记；三、以上两项决定，将提请党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认；四、继续保留胡耀邦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时指出：“全党要继续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各项内外政策，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实行全面改革，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动员、组织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努力完满实现第七个五年计划的任务。”

对于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上海市纪委、安徽省纪委、中共《人民日报》社机关纪委分别于1月13日、17日、23日做出开除其党籍的决定。

对于极少数人利用学生推进民主的良好愿望和对中国现状某些方面的不满情绪煽动学潮、破坏安定团结、妄图将中国导向资本主义轨道的作法，广大群众是不赞成的。他们通过各种形式揭露极少数人的阴谋，批评大学生的闹事行为。早在元旦前夕，北京市科协召开专家座谈会，呼吁全社会共同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清华大学自动化系一位副教授说：“在清华园内，教职工谈到少数敌对分子煽动学生上街游行一事，心里感到不安。我们都希望有个安定团结的好环境，国家能长治久安。安定团结对各项工作都有利，对大学生来

说这就更难得了。希望同学们珍惜当前的大好机会，好好学习，掌握建设祖国的本领。”原北京工业学院院长说：“我们渴望国家能安定下去，搞好改革，这是人心所向。那种动不动就搞游行示威的作法是不恰当的。大学生关心政治是应该的，但应分清是非，多做对改革和四化建设有利的事。”北京地质学会地学专业委员会负责人、北京师范学院一位讲师说：“现在的青年学生思想敏锐、有热情，但对一些政治问题的认识比较浅，也易偏激。我们要牢记10年动乱的教训。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元旦游行之后，各界群众要求维护安定团结政治局面、严惩少数敌对分子的呼声很高。西郊乳品厂职工坚决反对学生上街游行。一位厂负责人说：“我们企业的发展，这几年最快，离不开安定团结的好环境。现在总有一小撮坏人想把全国搞乱，搞乱了对人民有什么好处？不要说全国，就是我们一个厂也经不起乱折腾。我们厂一乱，首都就要有1/3的订奶户喝不上鲜奶，有多少婴儿、老人、病人要受影响。这些，难道是人民的大学生应该做的吗？”房山县周口店乡某村党支部书记说：“听说有些大学生上街游行了，可千万别再搞运动了。我今年38岁，经历了10年动乱。现在又在村里担任领导工作，深知安定团结的重要。1965年，我们村的粮食亩产就已超过了1000斤，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折腾，一下掉到了700多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总算有了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加上党中央的政策对头，农民的积极性很高。去年，是我们村连续第4个亩产吨粮年，人均收入也接近千元。同学们关心改革，希望步子快一点，这些想法好，但实际做起来并不象想象的那么容易。实践证明，象我



们这样的大国，建设和改革只能一步步来，可不能再搞‘大民主’、搞运动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在《瞭望》周刊发表谈话，希望青年牢记我们国家苦难深重的过去，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和改善全国人民生活尽自己的责任。他说：“我从自己一生的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要民主，也要集中。我赞成民主集中制。如果没有这一条，大家要‘民主’，你照你的办，他照他的做，那么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单位就不可能正常运转。自由和民主不能是无边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绝对的民主和自由，都受到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的制约。”他还说：“现在青年人思想活跃，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思想应该活跃，但都要有一个东西管着它。那就是不要忘了国家。现在我们国家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保证了我们能好好工作，能发挥我们的力量，这是很值得珍惜的。我们思想活跃、思想解放，要用到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以及人民生活不断改善方面，这是我们的责任。”

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北京日报》先后收到300多封读者来信，就少数大学生闹事及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问题发表感想和看法。他们当中有工人、农民、教师、工程师、残废军人、学生家长等。这些信从历史、现实及理论等不同角度论证了在我国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是不得人心的，也是根本行不通的。不少人还在信中表示，少数大学生闹事是几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而我们的一些同志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市住宅公司的一位同志说：“我们曾经领教过旧中国人力市场上出卖劳动力的自由，那是令人不寒而栗的自由；现在的大部分中青

年曾领教过10年动乱‘四大’的自由，那是使他们付出沉重的难以补偿的代价的自由。”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几位老同志在信中说，旧社会到处是失业的自由，饿肚子的自由。10年动乱中“四大”式的自由使我们深受其害。国家被搞乱，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们期望青年学生，努力充实自己，不能盲目追求绝对的民主自由，要多学一些社会发展史，认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认清资产阶级民主与自由的虚伪性。

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国科技大学领导班子的改组，胡耀邦总书记的辞职，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的被开除党籍及社会各界群众对闹事的强烈批评和反对，震慑了极少数妄图继续扩大事态的敌对分子，也震动了那些头脑发热的大学生。学潮迅速平息，局势恢复稳定。

## 二、问题出在哪里

这次学潮，是极少数人利用部分学生关心政治体制改革、要求加快民主政治步伐的愿望，企图制造社会动乱，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进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政治事件。学潮平息以后，党内外很多人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为什么会发生将矛头指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性学潮，问题出在哪里？看法是多种多样的，除了认为高等院校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我国民主化程度还不很高等观点外，一些同志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其一，法律不健全，执法不严。邓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12月25日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



就指出：“建议国家机关通过适当的法律法令，规定罢工罢课事前要经过调处；游行示威事前要经过允许，指定时间和地点；禁止不同单位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串联；禁止非法组织的活动和非法刊物的印行。”“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学会按照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但是，尽管1980年后的学潮不断，1985年又发生“九一八”学潮，关于游行示威的法律法令始终没有拿出来。直到这次学潮在外地爆发并迅速波及北京以后，才由北京市人大通过并颁布了北京地区游行示威法规。尽管它是符合法律程序的和十分必要的，但由于它是在学潮中颁布的，难免引起部分学生的误解和不满，加重了他们的对立情绪和逆反心理。他们偏要和游行法规对着干，执意不经申请就上街，给极少数人煽动“12·29”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游行和北京高校部分学生元旦游行提供了条件。另外，各级党政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也表现出了软弱现象。1980年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取消了以大字报为主要内容的“四大”。但是，在以后的历次学潮中，都有人张贴大小字报。在这次学潮中，大字报张贴地区之广、数量之多，是1980年以来没有的。但是，对于这种明显的违宪行为，我们却不敢理直气壮地依法制止。

其二，新闻宣传舆论出现倾斜，这不仅表现在这次学潮以前，而且在学潮中也有表现。1986年12月25日，中央某大报在头版发表了《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文章，同时又在第8版刊登了《动机与效果何尝统一》的短文，强调“动机与效果的统一性，并不普遍地存在于一切事物中”。该文说“正义的战争，并不一定必然胜利”，幼儿误食鼠药

而身亡，“谁也不会认为幼儿是自愿饮毒自杀的”等等。文章还提出“动机与效果由于事物本身客观条件的变化”，可以“由不一致演化为二者统一”。这些观点立即被少数坚持上街的学生所接受，并成为同劝说他们上街的老师同学进行辩论的武器。他们说，只要主观愿望是好的，就可以干，不要问客观效果。主观与客观本身就是很难统一的，即使出现不好的效果，也不能归咎于主观愿望善良的学生。显然，舆论的倾斜，对于诱发学潮和妨碍学潮的平息，起了不好的导向作用。

我们认为，以上看法都对，但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问题的要害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泛滥和没有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看问题的性质，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回顾一下历史，不正是这样吗？1978年以后，理论界、文艺界的一些人在解放思想的旗号下，发表了大量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开始抬头。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及时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击自由化思潮的主张。党内一些同志对邓小平同志的意见未予充分重视，对反击自由化思潮顾虑重重，心慈手软。1981年以后，思想理论界开始宣传“社会主义异化”等错误观点。邓小平同志在1983年10月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由于党内一些同志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认识，使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半途

程度，  
的讲话是  
1986年  
反对资产  
反对资产  
的重要性  
政治思想领  
这场斗争的  
通知特  
是长期的  
反对资  
怎么样呢？



而废。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又开始泛滥，在1986年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并直接引发了这次学潮。现在看来，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是切中要害的。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同志讲话后，党中央在全国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1987年1月，中共中央又专门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若干问题发出通知，指出了这场斗争的重要性，规定了这场斗争的范围严格局限于党内，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企业和机关进行正面教育，农村不搞。这场斗争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根本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通知特别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同改革开放一样是长期的，因此不能搞运动。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起来了，进程和结果会怎么样呢？人们都关注着。

## 第五章 阿柴事件

“元旦震荡”后，大学生深层思想问题积淀下来。待1988年6月上旬北京大学柴庆丰案件偶发后，大学生的深层思想问题立刻“死灰复燃”，学潮不可避免地再次发生了。只是由于党中央态度坚决，措施得力，才未酿成大的社会动荡。

### 第一节 偶然中的必然

#### 一、“水过鸭背不透毛”

1987年寒假过后，高等院校和社会有关方面普遍通过多种形式向大学生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面教育。学生的思想或多或少有了变化，有的学生变化显著。

1987年2月13日至15日，共青团北京市委和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京西房山区举办了为期3天的首都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主席培训班，由于方法得当、感情融洽、内容充实，收到了超过预想的效果。培训班上，团市委和市学联发现学生掌握的有关学潮的信息很少且支离破碎，很难凭这点事实来理解中央精神，这与学生对学潮的关心程度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从而深切感到政治思想工作中的信息传递速度太慢，容量较小，这是《美国之音》和“小道消息”得以钻空子的重要原因。于是，他们有针对性地向学生会、研究生会主席通报了



几方面的“大道消息”：譬如关于全国学生闹事的详细情况。许多学生听到28个城市连续出现游行事件对社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造成的破坏后，理解了中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坚决态度。又如介绍了北京市关于游行的10条规定的产生过程后，学生了解到这10条是健全法制的正常步骤，并非是专冲着大学生来的。

团市委、市学联为促使学生正确反思，帮助学生认真地解剖了自身的一些弱点：一是顺境成长，容易自我感觉良好，对外界要求过高，产生省力干大事的思想。二是无心防右，这代大学生成长的历史过程中，全社会在极力反“左”，使大学生对“左”有较高警惕性，片面认为离“左”越远越好，对右的危害却很少重视。三是先验思维，大学生缺乏实践，很多事情都是在观念上完成的，习惯于先验思维模式，一切凭想当然，而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则是在反复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大学生理解中央政策难免有一定差距。这3条弱点一讲，在学生中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反响，与会者议论纷纷，表示欢迎这种科学的批评。

团市委、市学联在阐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大道理时，注意先晓以利害，再申明大义，学生比较容易接受。他们主要从4个角度晓以利害：一是社会态度，着重介绍学潮对大学生形象的损害。有个学生痛心地说：“我们本想唤起民众，结果换来了一顿‘臭骂’。”二是安定团结，着重讲了波兰等国家社会不安定造成的恶果。有不少学生说：“中国可不能变成第二个波兰，这样国家会大伤元气，最后倒霉的是老百姓。”三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不可能在闹事的“地震”中进行。四是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天

下大乱，中国就会重新陷入一盘散沙、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

培训班组织者不仅告诉学生一些答案，还提供观察社会的立场、观点、方法。他们着重讲了一个立场、一个观点和一个方法：一个立场就是跳出个人的小圈子，用人民的立场、感情和利益去认识学潮，认识资产阶级自由化，认识四项基本原则。一个观点就是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对外开放过程中涌进来的大量思潮和各种观点，都要接受这个观点的检验，看看它在中国是否行得通。一个看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就是要站在历史的高度，认清社会的发展规律，理解党和政府坚持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

培训班的这些做法是成功的，受到大学生的欢迎和有关方面的肯定，后来在一些高校进行了推广。许多高校在举办骨干培训班的基础上，广泛在大学生中组织了政治学习、专题报告、系列讲座；有的还根据中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重点放在党内的原则，组织学生党员和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开办“业余党校”；有的针对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掌握不牢的问题，开展了“学马列书系列活动”；有的为了沟通学校和学生的联系与了解，设立了院校长信箱，建立院校长接待日，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对话会，取得了一些效果。

针对大学生思想脱离实际，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弱点，各高校都加强了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1987年3月22日，首都39所大专院校的3000名大学生上街宣传选举法，发现市民的民主与法制意识参差不齐，认识到民主建设绝不是上一两次街就能解决问题的。北京联合大学经济管理系一位学生说：“我们总觉得中国民主化进程太慢，不明白中央为什么不加



快步伐。现在看起来，国民的民主意识还差得很远。有很多人包括我们青年学生并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所以民主建设急不得。”1987年暑假，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出现高潮，首都高校近11万名在校大学生中，参加科技扶贫、社会考察、军训、勤工助学、义务劳动、社会主义劳动建设营等有组织活动的就有5.1万人。特别是，共青团北京市委创造了“百乡挂职”的社会实践活动形式，选派39所高校500名学生到京郊11个区县的158个乡担任团委副书记、实用技术培训技术助理等职务，从而由过去的“走马观花”改为“下马种花”，既增长了才干，受到了锻炼，又受到了教育。参加社会实践的大学生通过到社会上走一走，看一看，干一干，思想逐渐由空想趋于实际。北京大学一位学生说：“只注重书本知识的学习以及自己缺乏接触社会、认识社会的经历，使我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往往是从书本、从理论出发，躺在床上，眼望天花板，谈论自己的设想。这次我到东郊房山区六渡乡学习、生活和工作了一个月，我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认识社会、思考问题的起点变为中国社会的现实。”

总之，通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大学生的思想或多或少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因为反自由化斗争中途停止，不少大学生的情绪还没有转变过来，深层思想症结并没有解开。1987年4月，北京钢铁学院一项大学生思想状况调查表明，76%的大学生认为闹学潮有利有弊，认为闹学潮影响了改革进程的只占4%，相反却有9%的学生认为闹学潮促进了民主进程。不少大学生坚持认为一党执政不如多党执政好，坚持认为资本主义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并说：“中国现在没有进行多党制和私有制的实践，怎

么能判定行不通呢？”还有为数不少的学生认为马列主义只能作为一种学派，不能作为指导思想，尽管这些学生大多没有认真学习过马列著作。大学生深层思想问题的积淀，为学潮的再度发生准备了条件。

有人曾用“水过鸭背不透毛”这句话来批评党八股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其实它也可作为对1987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总结。

## 二、从“救世主”到“救自己”

1978年高考制度恢复后，大学生倍受社会青睐，被称为“时代骄子”、“社会宠儿”。许多大学生也以“救世主”自居，上街游行，“为民请命”。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社会反响并不好，尤其是这一次行动，还受到相当一部分群众的严肃批评。大学生感到吃惊，感到委曲，为自己辩解：“我们是一片好心啊！”更多的大学生产生了对政治的冷漠情绪，说：“政治可怕，不可预测，我们还是敬而远之。”有的大学生在宿舍门口贴上了这样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莫不作声；国事、家事、天下事，不关我事。”有的大学生在自己的床头贴上了“莫谈国事”的床头铭。1987年10月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召开，多数大学生处于一般关心状态，只有30%的人把十三大作为经常谈论的话题。对政治的冷漠，使得一些大学生对学潮也厌倦了，认为闹学潮既没用，也没劲。大学生的“救世主”思想受到了严重动摇。

1987年7月对大学生是难忘的。由于社会上许多单位用工制度改革，北京、上海等地高校5000多大学毕业生破天荒地用人单位退了回来，第一次尝到了待业的滋味。这件



事向大学生发出了信号，改革已不仅仅在他们身边，而是开始改到他们自己头上了。大学生不再仅仅是改革的啦啦队，已成为具体的参加者和运动员。改革给人们带来的不都是轻松、欢乐，还有压力和危机。所以，大学生在政治热降温的同时，兴奋点迅速转向自身，由“救世主”转为“救自己”。

1987年8月，国家教委和财政部决定，1987年在全国本科高等学校新生中普遍实行奖学金和学生贷款制度，并重新修订颁发了《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学学生实行奖学金制度的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学学生实行贷款制度的办法》。1988年1月，国家教委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对大学生分配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普遍推行“供需见面，双向选择”的分配办法，从1993年起国家不再包大学生分配。对于这两项教育改革的重大措施，特别是分配制度改革措施，大学生表现出了十分矛盾的心理：既希望打破国家统一分配的束缚，又担心因此砸了铁饭碗；既欢迎供需双方见面，又担心“有路子”的人占了便宜。有的学生概括大家的希望是：“上不封顶，下要保底。”还有些大学生对于进入分配市场，让人挑来挑去不习惯，有一种失落感。这说明大学生虽然支持改革，但却缺乏心理准备，思想上并不适应，需要进行观念变革。过去，知识表明一种地位和身份，有了文凭即使无所事事也应有相应的待遇。教育制度改革后，知识要进入市场，只有当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被社会购买时，它才具有社会价值。当这种变化出现时，大学生产生疑虑、痛苦，是必然的，但需要给予引导，听任这种情绪发展是有害的。

改革在中国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它既取得了巨大成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大量实惠，同时也遇到了许多困



难，出现了一些曲折和失误。1987年冬，我国开始出现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一些群众生活必需品物价上涨幅度明显。与物价上涨相关的问题是分配不公，脑体倒挂——“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这个问题，都与大学生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引起大学生的强烈反响和不满情绪。不少大学生惊呼：“大学生贬值了！”“上大学亏了！”伴随这种不满情绪的发展，大学生中出现了三种倾向。一是“读书无用论”抬头，考大学的人少了，考研究生和博士生的人更少。北京一所高校1987年80名硕士生中有16人想考博士生，占20%。1988年150名硕士生中只有4人想考博士生，占2.7%。二是打麻将、跳舞、谈恋爱成风，许多教室、食堂布置得花花绿绿，成了舞厅；许多学校，都可以听到大学生扯着嗓子高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许多宿舍不分昼夜，展开“方城之战”；许多校园成了谈情说爱者的乐园。三是出现经商热。过去，知识分子信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大学生对张口闭口谈钱者嗤之以鼻。现在他们可不这样了。1988年3月一项调查表明，90%的研究生都直言不讳地说：“我现在关心的是怎么赚钱。”1987年初，“黄路”（赚钱）、“红路”（从政）、“黑路”（考出国留学）在大学生中还是并行的，而眼下“红路”和“黑路”明显冷了下来，大学生毕业后很少有人愿意留校，去科研单位和大机关的兴趣也明显降低，最愿去的是大公司、合资企业和外贸部门。北京某大学一名生物系学生毕业后到香格里拉饭店当导游，自称一天小费就180元，同学听了羡慕不已。尤其是，一些大学生在上学期期间便开始了经商活动。1988年寒假刚过，中国人民大学校内就出现学生办的咖啡厅、彩照扩印部十几个。



较为  
度明  
拿手  
这个  
烈反  
大学  
种倾  
生和  
16  
想许  
了以  
宿的  
小可  
言  
学  
大趣  
北自  
些中  
个。

北京师范大学的新疆籍学生吾尔开希，则倒起了羊毛，由于经营无方，亏了7000多元钱。以上三种倾向，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担忧。

道德水平下降、人际冲突频增，往往是追逐金钱的伴生物。从1987年冬开始，大学生与大学生之间的纠纷日益增多，大学生与社会青年之间的冲突也不断发生。社会青年(特别是那些歹徒)已不再将大学生看成谁都不敢惹的特殊公民，冲突中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向上大学生挥起拳头，甚至拔出刀子。1987年11月27日，北方工业大学2名学生因打雪仗而交恶，一名学生将另一名学生扎伤。12月3日，北京粮食学校的十几名学生与北京师范大学的4名学生发生冲突。北京师范大学的1名学生被扎死。12月5日，中国人民大学一名学生被社会青年用刀砍伤。同日，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学生臧伟在学校小卖部买东西时与2名社会青年发生口角，被其中1名社会青年用刀子扎死。12月6日，北京师范大学分院1名学生被社会青年用刀子刺伤。这一连串事件，在大学生中引起震动，其中臧伟被扎致死事件诱发了该校学生上街游行。12月7日，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千余学生打着“严惩凶手、保证安全”等横幅，抬着花圈，游行到东长安街经贸部。经贸部部长郑拓彬等领导与同学进行了对话。12月8日和9日，经贸部和北京对外经贸大学领导与学生又进行了两次对话，同意了学生提出的妥善处理臧伟后事、加强学校治安管理等要求。学生较为满意，校内恢复正常。

大学生从“救世主”向“救自己”的转化，有喜有忧：喜的是大学生的思想从天上回到了地上，从狂热转入实际；忧的是大学生在分配、物价、知识分子待遇、社会治安等问题上

的不满，成为新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大学生热点转向自己后，并不说明学潮的结束，而只是意味着发生学潮的诱因由以往的政治性问题，转为同大学生切身利益相关的具体问题。1988年春，首都大学生和青年教师在知识分子待遇问题上的小小骚动，便预示着这类学潮的开始。

### 三、到天安门广场擦皮鞋

1988年3、4月间，七届人大和七届政协一次会议在北京同时举行。会议气氛活跃，一些代表和委员慷慨陈词，对物价、党风、教育、知识分子待遇等问题提出批评和建议。有一位政协委员不过半小时的发言，竟然赢得几十次掌声。新闻媒介很快将这些情况披露给社会，引起了高校大学生和部分青年教师的强烈反响和共鸣。对代表和委员们提出的问题，特别是教育和知识分子待遇问题，他们早就有话想说，有感想发，只是1987年元旦震荡造成的后果使他们顾虑重重。眼下，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上都可以就这些问题进行批评，他们感到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1988年4月6日，北京大学10名研究生在该校三角地贴出《致七届人大和七届政协的公开信》，并附有签名榜，征集研究生签名。签名榜很快就被200多人签满。“公开信”认为，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除了少数代表的慷慨陈词、痛切直言外，教育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会议没有提出什么任何有关教育改革的有力措施”。“公开信”“呼吁两会尽快研究教育改革的出路问题，把这个问题真正放到战略重点的地位上加以考虑，制订出一套有利于教育事业全面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4月8日，北大青年教师在三角地贴出《致两会代表的公开信》，建议“大幅度提高大、



中、小学教师的实际工资水平”，“解决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住房问题”。4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青年教工联谊会部分会员在校内贴出《致七届人大新任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倾诉青年教师的苦衷。在大多数青年教师和研究生通过公开信形式向“两会”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时，也有个别研究生和青年教师采用其它不恰当的形式发泄自己的牢骚和不满。例如，北京大学一名青年教师4月6日在三角地贴出一篇题为《卖身启事》的大字报，称：“本人北大硕士毕业，留校任教，虽身材魁伟，仪表堂堂，然因囊中空空，至今孑然一身。现欲求有10万家资，岁入逾万之先富之士，予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甘愿入赘为婿。只须先付5万元给父母，以谢养育之大德，不敢再有他求。”

此外，有个别研究生已不再满足写几个文字，而是要有所行动。他们原准备4月3日到天安门广场静坐，但没有得到多少同学响应。于是他们又想出了一个可以造成国际影响的作法，即到人民大会堂前给“两会”代表和委员擦皮鞋。4月6日，北京大学十几名研究生来到天安门广场，以勤工助学为由，试图给人大代表擦皮鞋，被天安门广场管理人员和值勤警察劝阻。他们在不情愿地离开天安门广场时说：“我们有什么办法，只要能挣钱，我们不怕丢面子。”这些研究生返校后立即贴出《勤工助学何罪！》的大字报，同时贴出《生产自救》倡议书，称：“北京大学亮又亮擦皮鞋有限公司应运而生！本公司招聘工作人员，教师、研究生、本科生不限，扔掉知识即可。时间，4月10日上午。地点，广场。请自备工具。”4月10日，北京大学学生王丹等十几人，不顾学校劝阻，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因为受到阻止，而未拿出擦鞋工具。

这次小的骚动因为发生在“两会”期间，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4月13日，在国务院新任总理李鹏和其他三位新当选的副总理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英国广播公司和加拿大电视台记者专门向李鹏总理提出，如何评价北京大学出现的大字报和一些学生到天安门的举动。李鹏总理回答说：“大学生的意见我们是欢迎的。他们有很多意见是正确的，对政府工作有帮助。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对每个意见都赞成。”李鹏总理还说：“学生和中国公民都有表达自己愿望的自由，但要在法律和地方政府的有关规定的范围内。”

“两会”期间的小小骚动随“两会”的闭幕很快过去了，但高校内因关系到大学生切身利益问题而发生的不安定事件与日俱增。4月13日，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学生因学校校舍被占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向市公安局提出书面游行申请。4月20日，中国政法大学30多名青年教师因校舍被占造成住房困难，贴出署名大字报。4月26日，北京医科大学大多数学生因伙食问题而罢餐。4月27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5位青年教师因住房困难在校内联名贴出公开信。5月11日和12日，中国政法大学昌平分校部分学生因对伙食不满罢餐。5月19日，北京建工学院因外单位占用该校地皮，向市公安局提出书面游行申请。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因学生自身利益的问题而触发的学潮已很难避免。

1987年暑假以后，大学生中出现了对于毕业分配、知识分子待遇、物价、社会治安等问题的不满情绪。1988年寒假后，大学生中出现了一系列小规模、小范围的骚动。这一方面说明党和政府应当切实改进工作，减少失误，以缓解学生情绪；一方面说明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疏导和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和紧



迫性。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重要课题因种种原因一时难以很好地解决。反之，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又行动了。

1987年1月方励之被开除党籍、行动受挫后，方励之的妻子、北京大学物理系讲师、海淀区人大代表李淑娴活跃起来。她或在西方记者面前抨击党组织开除方励之党籍的决定是“错误”的，“不公正的”，声明方励之没有错，或在学生中传播方励之拒不认错、身体健康、坚持“战斗”的消息。特别是，她俨然以“青年导师”、“学生代表”的面目，频繁地出没于北大学生中，煽风点火，拉拢富有热情而缺乏经验的学生跟着她跑。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刘刚和历史系学生王丹很快聚集在她的周围。反自由化斗争不了了之后，方励之再也按捺不住了。他要和李淑娴“并肩战斗”。1988年5月4日，正值北京大学庆祝五四运动69周年和建校90周年之际，方励之与李淑娴粉墨登场了。夫妇俩来到北京大学校园内塞万提斯像下，“与北大青年会见”，同时宣布一手策划的“民主沙龙”开场。方励之拿着手提式话筒，神气活现地说：“我现在活得很自在，到处受欢迎。”并说：“不同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法”，因为“现代化不分国界”。李淑娴则攻击中国不民主、不自由，声称“愿做一粒沙子，为后人铺就一条自由之路”。“民主沙龙”为后来发生的“阿柴事件”和“北京风波”做了思想上的准备。经过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这样一番鼓噪，大学生的思想进一步混乱。据1988年6月的一项调查表明，大学生中对四项基本原则持怀疑、否定和主张中国搞资本主义的人数较之上年同期显著上升。这意味着，大学生一旦因有关个人利益问题而发起学潮，肯定要涉及政

治问题。

## 第二节 从刑事案件到政治事件

### 一、柴庆丰被害

1988年6月1日晚8时许，由方励之和李淑娴策划、由刘刚等出面组织的“民主沙龙”的又一次活动在北京大学校内塞万提斯像下开始了。这次他们请来的主讲人是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夫妇，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洛德夫妇的到来，吸引了数百名学生围听，也引起了海淀区的王建（曾因打架扒窃被劳动教养3次）、哈恩明（曾因盗窃被拘役6个月）、王建明（曾因敲诈勒索、偷窃被劳动教养2次）、王丽（女，曾因偷窃被劳动教养1年）4名无业社会青年的兴趣。尽管“大鼻子”说得挺热闹，他们却听不大懂，觉得枯燥无味。于是他们很快离开了这里，溜进一栋教工宿舍楼，干他们认为有味儿的事。不过，他们并没有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拿，便偷了一把菜刀，悻悻离开北京大学。晚10点多，王建等四人来到距北京大学一公里的京兰小吃店，借酒消“闲”。过了一会儿，无业青年王永联和中国科学院技术装备器材公司计算机系统工程公司经营部副经理刘斌（曾因流氓问题被审查3个月），先后来到了小吃店，与王建等4人一起吃喝。

同一天晚上，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代培研究生柴庆丰和韩鹰（在北京大学听课的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石油公司停薪留职工人）、国玺（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生）、张建军（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管理中心进修研究生）、王鲁安（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生）、邸双亮（北京大学数学系代培研究生）、贾全平（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生）共7人，在北京大学附属小学



招待所聚餐。11点多钟，2瓶白酒、6瓶啤酒喝完。韩鹰和国玺主动到京兰小吃店买酒。买酒时，韩鹰瞥了瞥正在喝酒的王建等人，哈恩明即起身骂道：“你他妈看什么?!”并从桌上抄起菜刀。国玺见状，将韩鹰拉出门外。韩鹰说：“我还没买酒呢”，又返回小吃店。韩鹰、国玺买了酒离开小吃店时，王建说：“他（指韩）喝多了，给他醒醒酒。”便与哈恩明、王建明、王永联、刘斌一起追出门外，用酒瓶打、用脚踢韩鹰头及身体各部，造成韩右上前牙冠折断和周身软组织损伤。国玺见韩鹰被打，急忙跑回招待所对柴庆丰等5人说：“韩鹰被人打了，快去吧!”柴庆丰等5人听后，立即起身赶去寻找韩鹰。

6月2日凌晨1时许，当王建看见来寻找韩鹰的柴庆丰等6人后，跑回小吃店附近兰旗营家中取回一支汽枪，并吩咐哈恩明、王建明、王永联各取来一把铁锨（此时刘斌、王丽已回家）。柴庆丰等6人找到韩鹰，在返回招待所途中走到兰旗营村时，被王建等4人截住。柴庆丰和张建军见状就地捡起几块砖头。柴庆丰身高1.92米，引起了王建的注意。他端着汽枪，在距柴庆丰2米远的地方，对柴庆丰说：“把砖头放下，不放下，我就开枪。”未等柴庆丰答话，王建就向柴庆丰面部开了一枪。柴庆丰用手捂脸将要倒下时，哈恩明又用铁锨朝柴庆丰头部猛拍一下。柴庆丰当即倒地，口鼻冒血。随后，王建等4人又手持凶器追打邸双亮、王鲁安。王建等4名歹徒行凶后逃离现场。王建、哈恩明、王永联三人在王丽帮助下逃往天津。6月2日凌晨2点左右，有行人途经于此，报匪警。20分钟后，公安干警赶到，柴庆丰已被送进309医院。凌晨3时许，医生为柴庆丰施行了开颅手术，



不幸的是，柴庆丰因伤势过于严重，经多方抢救无效，延至当天下午4点50分死亡。后经法医解剖鉴定，汽枪子弹从柴庆丰右眼睑内眦部射入颅腔，射断前交通动脉，致使脑底出血，压迫脑干，导致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心黑手毒的小个子王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射出的这一枪，引发了一场惊动北京的学潮。6月2日下午，柴庆丰生前所在系的同学获悉了柴庆丰死亡的噩耗。柴庆丰生前为人忠厚，很受系里同学尊敬，大家都昵称他阿柴。柴庆丰的死，使地球物理系的同学震惊、愤慨。晚上8点左右，地球物理系的同学陆续在校内三角地贴出《又一起人命案》、《人身安全感何在》、《讣告》、《我们明天就要死了》、《强烈要求》、《又一个无辜者》、《医院实录》等7篇大字报，向全校学生公布柴庆丰死讯，表示悼念之情和对社会治安状况的强烈不满，并发出了“行动吧，为了告慰屈死的灵魂”的呼吁。晚10点，北京大学校内歌曲比赛和电影等活动陆续散场，很多学生看到了大字报，并因地球物理系和法律系同学将系旗挑出，三角地骤然聚起数千人。大家议论纷纷，从臧伟说到柴庆丰，越说越激动。晚11点，在少数学生鼓动下，2000多学生冲出校门，上街游行。

在三角地贴出大字报的时候，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就召开了干部会议，介绍了柴庆丰案件经过，要求全体干部做好向学生的解释和说服工作。学生上街后，北京大学党、政、团各级干部随着学生队伍做工作，进行劝导，使大部分学生返回校园。6月3日凌晨，不听劝阻的600多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公安部，向公安部提出8项要求：一是尽快将全部凶手捉拿归案；二是给死者开追悼会，要求公安部长、

北京中  
组北大保  
是对死者  
如实报道  
公安部部  
陆宇澄与  
学生对公  
校。

在学

进行。6

共同抽调

紧张的说

喝酒的人

“小弟”即

结果扑了

可能性。

男1女。

年，形景

的恩济

斌抓获，

析，判

天津市

火车站、

山派出所

一个小旅

赶往天



北京市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海淀公安分局局长参加；三是改组北大保卫部与燕园派出所；四是要求在北大公审罪犯；五是对死者家属给予高额赔款；六是要求新闻单位对此次游行如实报道；七是公安部对此次游行做出公正评价；八是要求公安部部长向学生道歉。公安部副部长俞雷、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与学生对话，答复学生一定迅速缉拿罪犯，依法严惩。学生对公安部和北京市领导的答复基本满意，随即返回学校。

在学生游行的时候，柴庆丰案件的破案工作也正在紧张进行。6月2日凌晨接到报警后，市公安局和海淀公安分局便共同抽调80多名干警，组成专案组，迅速开展侦破工作。在紧张的调查中，群众提供了一个线索：6月1日晚在小吃店喝酒的人中有个叫“小弟”的。中关村派出所民警很快认定“小弟”即王建。6月2日上午9点半，9名干警直奔王建家，结果扑了空，王建一夜未归。王建的出走，增加了他作案的可能性。经进一步了解，6月1日晚在小吃店喝酒的还有4男1女。那个女的，很可能是王丽，因为她和王建已姘居3年，形影不离。上午10时，公安干警来到距兰旗营10公里的恩济庄王丽家，将王丽和王建双双抓获。当晚，又将刘斌抓获，下一步是捉拿另3名在逃犯。公安干警经过研究分析，判断3犯逃往天津的可能性较大。6月3日上午11时，天津市公安局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请求协助的电话，迅速对火车站、长途汽车站作了布署，同时派侦察员会同河西区尖山派出所开展工作，很快弄清了3犯果然投宿在曙光里的一个小旅馆，但今晨外出不知去向。北京市公安局立即派干警赶往天津，与天津市公安局的干警协同作战。3名罪犯住在



3号房间。3名干警住进了隔壁的2号房间，其余干警分布在旅馆周围和交通道口。下午6点30分，3名罪犯出现在旅馆门口，大摇大摆地走进房间。公安干警迅速出击，3名罪犯束手就擒。至此，不过40个小时，公安干警经过连续奋战，6名案犯全部捉拿归案。

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向公安部提出的要求已经得到答复，6名案犯也已全部落网，柴庆丰案件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在有些人看来，这只是开始。

柴庆丰案件迅速向政治事件发展。

## 二、借题发挥

北京大学三角地的大字报，是学潮动向的晴雨表。6月3日，三角地出现了20多份大小字报，内容多集中在柴庆丰案件本身，表达对柴庆丰同学的哀思，也有几篇带有明显政治煽动性内容，使柴庆丰案件呈现出向政治事件发展的苗头。一份题为《机不可失!!!》的大字报写道：“北大人，为了中国的前途，行动起来吧！有人将唾沫吐在我们脸上，我们不能只要他们把唾沫擦去。我们的同学被杀，我们怎能仅要求惩办凶手???放开眼光，看远一些，不能只顾眼前！”一份题为《谈杀人》的大字报将柴庆丰案件同大学生切身利益联系起来，说：“杀人有硬刀子杀人，也有软刀子杀人。高校学生频频被打伤亡，这是光明正大的硬刀子杀人。什么叫软刀子杀人？饭菜质量下降，价格上涨，学习负担沉重，这是软刀子杀人。”题为《万能的政府，无能的政府》的大字报，则进一步把柴庆丰案件同政府扯在一块儿，攻击政府是“无能的政府”，还煽动说：“所谓伟人们所以伟大，仅仅是因为我们跪着。站到天安门去吧，北大人！”



对于柴庆丰案件向政治事件发展的苗头，方励之、李淑娟等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感到兴奋。经过策划，他们决计利用李淑娟海淀区人大代表的特殊身份，加快柴庆丰案件向政治事件过渡的速度，把事情闹大。为了不惹人怀疑，李淑娟联络北大选区的其他几位海淀区人大代表，联名就柴庆丰案件致函海淀区人大常委会和海淀区人民法院，并于6月4日将这封信抄成大字报张贴在北京大学三角地，吸引大批学生围看。信的全文如下：

“我校柴庆丰同学惨遭歹徒杀害，全校师生义愤难遏，或撰文声讨，或进行抗议，锋芒所向，痛指恶徒。 780

柴庆丰命案绝非孤立，学生教师被杀被害之事时有所闻，而且愈演愈烈，大有逐步升级之势。在社会上一些亡命之徒面前，学生教师总是处于无辜受害地位。因此，我们强烈要求依法惩处6名穷凶极恶的罪犯，以保无辜者安居乐业，亡命之徒不至为所欲为。

柴庆丰案绝非偶然，高校之中（包括北大在内）殴打凶杀屡屡发生，这反映了社会恶疾的蔓延，其背景是社会风气和党风的不正，野蛮和愚昧践踏了知识与文明，践踏了法律的尊严。因此，旗帜鲜明地依法保护人民大众，这是战胜愚昧，扭转社会风气的必要途径。我们要求对6名罪犯进行公审公判，并届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以匡扶正义，铲除社会邪恶。”

这封信中“柴庆丰命案绝非孤立”、“柴庆丰案绝非偶然”的字样，足以使大学生将眼光离开柴庆丰案件本身，借题发挥，扩大事态。事实上，一些学生正是从这封信中得到启示，情绪更加激烈。

6月4日，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大字报20多份，借题发挥的明显增多。一份题为《化悲痛为力量》的大字报写道：“罪犯已被捕获，所提条件也有了答复，那么一切都过去了吗？现在已风平浪静了吗？不！这只是开端……同学们，正义而勇敢的北大人，团结起来，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把这场运动推向深入，去争取最后的胜利。”一份题为《不能满足》的大字报也说：“我们不能光沉溺于悼念之中，我们要思考，我们要行动。”题为《!!!》的大字报公然将矛头指向政府，煽动说：“是时候了，我们沉默了那么久，那么久！是时候了，欺骗一次又一次，把我们笼罩。我们以北大的名义要求发言。我们抗议，抗议淫荡的社会！我们抗议，抗议淫荡的政府！”题为《以观念的批判——人道主义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字报，攻击中国共产党，鼓吹建立“新的为自由而奋斗的团体”。

柴庆丰案件迅速向政治事件发展的动向引起了党和政府的警觉。6月3日，中共北京市委指示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市委教育部、市公安局、团市委等有关部门及时到北京大学了解情况。6月4日下午，中共北京市委鉴于事态发展，专门召开有市政府、国家教委、北京大学等有关方面领导参加的会议，讨论了如何处理柴庆丰案件的问题。会议指出，柴庆丰被打致死案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但在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鼓动下，可能会发展为政治事件，有关部门要给予高度重视，并作为当前的一件大事认真对待。当前这项工作的重点，一是做好家属工作，二是把学生的情绪冷静下来，稳定局面，避免事态扩大。同时，从校内外两个方面入手，大力加强治安保卫工作，确保首都的安定团结。会议



研究决定了9条具体措施，并成立了以市委副书记李其炎为组长的处理“六二”事件领导小组。6月4日晚，北京大学成立了以柴庆丰生前所在系为主，有学校和学生代表参加的治丧委员会，在工会俱乐部设置了灵堂，引导学生进行正常的悼念活动。

在党和政府积极工作的同时，极少数妄图利用学生情绪扩大事态的人也加快了挑起事端的步伐。6月5日，北京大学三角地贴出的20多份大字报中，煽动性和攻击性的内容继续增加。一份署名“湖南人”的大字报恶毒咒骂说：“柴庆丰同学被害，表面上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其实这是社会腐败、政府无能、贪官污吏横行的表现。现实的中国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尽管他披上了改革的外衣，罩上了经济发展的面纱，其实肌体已经腐烂，脊梁已被压垮，只剩下一些白白的肥嘴吮吸人民的血！”并鼓噪说：“同胞们，时机到了，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们应该把社会风气、党风问题、政治体制、贪官污吏、教育问题、知识分子待遇问题，加在一起算总帐！”一篇题为《并非离题》的大字报肆意攻击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说：“谁还相信被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的上一世纪的‘马列’？我800年前就不相信，你相信吗？右耳（指邓小平同志）相信吗？党风不正的根源在哪里？现在大家都有数，正如历代屡禁不止的贪官污吏现象要随封建社会一同消灭一样，本世纪内我们就不用幻想‘党风根本好转’了……<sup>NO!</sup>唯有放弃马列，实行多党制，真正废除终身制，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才会彻底。”还有一篇《悼柴庆丰杂感》的大字报鼓动学生不顾后果，起来闹事：“谚语：‘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不闹白不闹，闹了也白闹’。今天要在其后

加上：‘白说也得说，白闹也得闹’。弟兄们，动手干吧！”

6月3日以来，尽管政治煽动性大字报日益增多，但主体仍然是悼念柴庆丰同学的。这引起了极少数蓄意挑起事端的人的不满和不安，对写悼念文章的同学发起了攻击，进行冷嘲热讽。一篇题为《我们还在装孙子》的大字报，说什么哀乐我们已经听够了，‘强烈要求’提得差不多了，令人丧气的悼词已看够了”，大骂坚持正常悼念活动的大多数同学“装孙子”，“谴责”他们“为什么不动手”。还有的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坚持做学生疏导工作的校团委和学生会，咒骂这些组织是“狗”，企图将所有的正面声音和工作打下去。6月5日是星期天，晚上到三角地看大字报的学生很多，并有一些人分成小堆议论。晚上10点45分左右，在刘刚等别有用心者的组织下，分堆议论发展为集会讲演，商议要在柴庆丰死亡第7天（6月9日）下午1点开追悼会，3点出发上街游行，并提出释放1986年秋因反革命煽动罪被公安部门依法逮捕的北京大学学生李裁安、张晓辉等11项要求。晚12点，学生渐渐散去，但刘刚和少数偏激学生仍滞留在三角地，商议成立行动组织。这一天的事态表明，柴庆丰案件进一步向政治事件发展。

6月6日，在刘刚等人的撮合下，北京大学11名学生秘密组成“行动委员会”，煽风点火，策划闹事，北京大学形势急转直下。白天三角地贴出大字报20多份，言辞之激烈、情绪之偏激超过以往任何一日，政治攻击性和煽动性内容的大字报已占90%以上。一份题为《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的大字报，宣称中国最需要的“是民主，是自由，是人权”，并鼓动说：“历史的发展从来就是一个血与火的过程，想不



付出相应的代价，就别想取得任何实质的进步！”还有的大字报甚至鼓吹“中国需要的仍然是文化大革命”。题为《哥们、弟们、妹们和姐们》的大字报，则赤裸裸地煽动说：“不要把目光仅放在要严惩杀害柴庆丰的凶手的事情上”，要“为变革我国政治结构而战”。题为《几点看法》的大字报，则煽动北京大学学生“快行动起来吧，团结起来，去演说，去游行，撒传单，去向大众宣传……”一份题为《叶公与邓公》的大字报，公然诬蔑邓小平同志对民主、自由、科学、知识分子政策是“叶公好龙”。

北京大学的状况引起了一些正直而冷静的学生的焦虑。他们贴出大字报，要那些头脑膨胀的同学三思行事。题为《三思!!! 北大人》的大字报强调，改革“不可能在倾斜的社会环境中取得成功”，“动乱只能导致中国的自杀”。并告诫那些盲目自大的同学说：“北大是科学的园地，民主的先锋。但我们也应记住，‘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也是从北大烧起来的。‘文革’中，绝大多数北大人和其他人一样轻信、愚昧、狂热，教训是深刻的……所以，同学，请你三思，请你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经过这几天的鼓噪、煽动，那些本来怀有不满情绪的大学生已经亢奋起来，对正面的劝告根本听不进去了。共青团北京市委6月6日晚对50多位大学生的调查表明，多数学生认为，由柴庆丰案件引发的事态是很正常的，是同学们所希望并预料到的。学生上街游行不是坏事，可以促一促政府。6月6日晚8点半，“行动委员会”在三角地贴出题为《危机！中国!!!》的大字报，称中国正面临生存、政治、知识、言论、经济等全面危机，煽动同学们“不能再沉默了，不能再忍耐了，不能再旁观了，行动起来



吧！”

因为“行动委员会”在6月6号白天贴出“今晚10点半在老地方(指三角地)筹划送丧事宜”的通知,晚上10点15分左右,三角地学生显著增多,达千余人,连宣传橱窗顶上、树上也站满了人,十几个外国记者混在其中。10点半,集会开始,先后有10多人站到人群中一张方凳上讲演,但集会主持者和反复登凳讲演的是“行动委员会”的4个人。讲演的主要内容是如何组织上街游行。“行动委员会”的成员宣布要提前行动:“我们不能再等待了!本周三(6月8日)下午3点在天安门前集合,静坐示威”,并要求大家分散去,以防止官方堵截,还说:“如果广场被封,我们正好借题发挥,广场是人民的广场,或游行,或飞行集会,见机行事。”讲演的学生还提出联合各校一致行动。关于游行的目的、纲领、口号等问题由于争论激烈,没能达成一致意见。6月7日0时40分,“行动委员会”成员宣布:“我们这样吵来吵去,吵到天明也没个结果,明天中午看我们贴通知。”人逐渐散去。集会时,围观学生情绪狂热,不时为讲演者的偏激言论鼓掌叫好,而对主张冷静处理问题的讲演,则“嘘”声四起。

6月7日,是“行动委员会”最忙碌的一天。首先,他们讨论了行动纲领和口号。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为了不让政府抓住把柄阻止其行动并争取更多同学参加,他们研究决定了自认为切实可行的6条纲领:“(1)新闻自由,取缔报禁,允许民间办报,根据宪法制订保证人民言论自由的新闻立法。(2)修改‘10条’<sup>①</sup>。‘10条’与宪法相抵触是违宪的,要

<sup>①</sup> 指《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



求修改。(3)改革人大选举制，选出真正代表人民的代表，减少政府行政官员在人大中的比例，使人大真正成为人民的最高权利机关，加强人大对政府的督促、制约职能。(4)将教育真正放在战略重点地位，大幅度增加教育经费，加强基础教育。(5)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健全法制，保障人权，整顿社会治安，改善社会风气。(6)要求新闻媒介客观具体地向全国人民公布我们的要求，让全国人民评价。”6条纲领中，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新闻自由。因为“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新闻非公开化。我们此次行动最基本的要求是争取新闻自由。有了这个前提，什么问题都可以公开反映、讨论，问题自然会逐渐暴露出来。”他们拟定的口号主要有：“促进改革”、“加速改革”、“新闻自由”、“取消报禁”、“保障人权”、“健全法制”、“反对贪官”、“整顿治安”、“重视教育”、“修改10条”。其次，“行动委员会”成员分头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串联，得到一部分偏激学生的支持，决定联合行动。清华大学贴出的《告清华同胞书》煽动说：“如今清华是一潭死水，行动起来吧！清华，别老顾死学了，同学们去北大看看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贴出的《痛悼柴庆丰》的大字报表示：“我们坚决支持北大师生为国为民的正义行动。”此外，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高校学生也纷纷准备参加北京大学学生的行动。再次，“行动委员会”通知了北京各大新闻单位，特别是驻京外国新闻机构，同时通知了“一些开明的人大代表”，请求支持。关于以上3件事，“行动委员会”当天在三角地和其它高校贴出布告，予以公布。

6月7日这一天，北京大学三角地的大字报火药味更加



浓烈，由过去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转为谩骂。一份署名“燕园贫僧”的对联写道：“我欲重振华夏雄风，却原来是共产党（挡）路；你想达到小康水平，无异于现代化（画）饼；怎么办？”另一副对联写道：“合理不合法，见他妈的鬼，那狗屁‘10条’！（要民主合理，争自由合理，护人权合理）喝民血失节，沾国家失节，饱私囊失节，失节必失心，滚你娘的蛋，这无耻一党；时候到了。”大字报还将矛头指向校学生会和团委，一题为《官僚与官痞》的大字报叫喊：“我们强烈呼吁有识之士赶快出面，建立新的、完全自立的学生组织！我们强烈要求取缔学生会！！！”理由是“学生会、团委同党委一脉相承”。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高喊着争民主、自由、人权的人，实际上自己在反民主、破坏自由、践踏人权。从6月6日贴出的《三思!!!北大人》的大字报的命运便可见一斑。这篇大字报贴出后不过半天，便被那些人撕去，贴上了美国的《人权宣言》。6月7日，又出现了《休矣，汝之三思》、《“价改”的用心和危险，“安定团结”中的愚民和杀民》等数篇大字报，对《三思！北大人》进行围剿和谩骂。

至此，北京大学柴庆丰案件已发展为有舆论、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和政府发难的政治事件。

### 第三节 流产的示威

#### 一、“东风压倒西风”

1988年6月柴庆丰案件发生之际，也是敏感的物价改革措施出台之时。中国的改革进入“闯关”的关键阶段。因此，柴庆丰案件发展为政治事件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严



重关注。6月7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分析了形势，表明了态度，提出了方针，研究决定了具体措施，强调决不能让闹事者得逞。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后，中共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立即分别召开了市委常委、高校党委书记会、城区领导干部会和市委、市政府各部委办负责人会议，通报柴庆丰案件以来北京大学情况，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布置了具体工作。6月7日晚上7点半，北京大学党委、团委层层召开会议，将中央和市委指示精神迅速传达到每个干部、党员和学生骨干中，要求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团员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理直气壮地同闹事者进行斗争。北京大学党委还对党员提出4点要求，强调“共产党员要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党纪和校纪，不得做违反法律和纪律的事情，决不能参加任何违法活动。党员必须遵守党纪，不愿遵守党纪的人可以退党，违反纪律的要给以党纪处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的传达，转变了基层党团组织心中没底、学生骨干不知所措而干着急的状况。他们理直气壮地站了出来，并雷厉风行地通过各种方式制止闹事。这说明，党中央领导同志态度鲜明，对于迅速平息学潮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只有政治态度鲜明，才能稳定、扩大骨干队伍；只有政治态度鲜明，才能争取多数中间群众；只有政治态度鲜明，才能分化、孤立少数敌对分子和极端偏激分子。

6月7日晚上6点半，北京大学校广播站反复播放了党委书记王学珍和校长丁石孙的联合书面讲话，指出有些人“要把刑事案件问题转移到政治问题上去，提出要游行、静坐等等，这是不对的。”“希望北大的同学都能以改革开放事

业为重，顾全大局，为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作贡献。”

6月7日晚10点半，北大三角地部分学生举行第三次集会讲演，围观者千余人，进一步商讨6月8日下午天安门广场静坐的有关具体问题。北大党、政、团等部门组织了一大批干部、教师和学生骨干到现场做工作，将中央的态度和指示精神在学生中宣传。北京大学校广播站通过设在三角地的喇叭，反复广播了王学珍、丁石孙的联合书面讲话和北京市政府通告。通告指出，在依法严肃处理柴庆丰案件情况下，“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妄图把这一刑事案件转移成政治问题。这些人公然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政府，破坏安定团结，破坏民主法制，诋毁改革开放。这些人的反动言行，是违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也是违背北京大学广大师生员工的意志的。希望北大广大师生员工高度警惕，保持清醒头脑，明辨是非，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决不允许他们的阴谋得逞。”通告重申，“1986年12月26日，北京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3次会议通过的《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是根据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依法行使游行示威的权利，维护首都的公共秩序的重要法规。在此重申：未经批准的一切游行示威活动，都是非法的。北京市各级人民政府和全体市民都必须坚决维护、认真执行，决不允许极少数人利用任何借口进行违法活动。”

所有这些，在学生中，特别是在大多数只是有不满情绪但不反对党和政府的中间学生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他们感觉到事情的严重，纷纷散去。有位同学说：“没想到事情已经严重到了这种程度，说什么也不能再凑热闹了。”有的极端偏



三次集  
安门广  
了一大  
度和指  
角地的  
北京市  
况下，  
把这一  
党的领  
抵毁改  
本利益  
北大广  
帜鲜明  
“1986  
会第33  
)，是根  
维护首  
切游行  
市民都  
何借口  
情绪但  
们感觉  
情已经  
极端偏

激的学生开始倒戈。一位在6月6日晚集会上主张“光明正大、浩浩荡荡、高高兴兴游行去”的学生，完全转变了观点，急不可耐地多次跳上方凳，声明不同意上街游行。“行动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见事不好，未敢公开发表讲演。只有受方励之、李淑娴操纵的刘刚，见刚刚点起的火开始降温，便不顾一切地站了出来，继续发表煽动性演说，鼓噪6月8日下午仍要到天安门广场游行静坐，并增加营救张晓辉、李裁安的内容。他说：“1986年我校历史系被抓走两个人，我们要把他们营救出来，这样才能保证明天我们不被抓走。同学们，明天如有人被抓怎么办？（有人答：营救）北大被抓走的两个人，就因为写了青年马克思派宣言。他们的观点绝不会超过现在同学们的言论和大字报的观点。如果他们是反革命，应该被抓，那么我们都是反革命，都该被抓。我们要营救他们。他们制造一个反革命，我们就营救一个。”在刘刚等人的煽动下，有少数学生仍坚持要在6月8日到天安门广场静坐示威。

6月8日凌晨三角地集会结束后，北京大学团委分别找“行动委员会”11名核心人物谈话，耐心说服劝导，晓以利害，使其中部分学生有一定转变，表示不再组织到天安门广场静坐示威的行动，并于上午在三角地贴出《郑重声明》：

(1)“行委会”本不存在，只是一些热心的同学想以此名义把学生纷杂的意见引向正轨。鉴于目前各方面情况，有关行动已不可能达到。(2)原以“行委会”名义所发布的声明和行动方案全部作废。(3)凡今后用“行委会”名义发布的东西概由执笔者、发言者本人负责。(4)本声明发布之日起，所有活动，这些同学概不负责，概不组织。



上午，三角地贴出大字报 30 余份，反对静坐示威的达 20 多份，正面舆论占了上风。看大字报的学生纷纷说：“今天是东风压倒西风。”那些反对静坐示威的大字报注重以理服人，并签了自己的真实姓名，欢迎同学辩论，颇得许多同学好感。有的学生还在大字报上签名，表示同意。一份题为《是冷静的时候了》的大字报写道：“北大人支持中国划时代的改革，期望中国的振兴，但上街游行、静坐，偏激的口号，能推动改革的进程吗？我们认为：改革需要时间，不理智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只会引起社会的骚乱，改革的退步！”一位目睹 1984 年以来历次学潮的法律系学生在《民主之路》的大字报中说：“从近几年的学潮来看，我们除了高喊民主、自由的口号外，对建设中国的民主政治并无具体的见解，或想法还很不成熟，是所谓欲使君子之昭昭而实为昏昏也。当今社会，人民能力素质普遍低下，他们尚不能完全理解连我们自己都不完全理解的口号的含义。在这种情况下，去唤起民众，岂不是以己之昏昏，使人昏昏吗？我想这不应是一个成熟的北大人应有的行为。”题为《我要读书》的大字报写道：“近来每天吵吵嚷嚷的，据说是关心国家大事。我也是青年，我也爱国，可爱国不是需要空洞的激情与口号，而是需要实实在在的本领和知识。”主张静坐示威的少数人贴出的几份大字报，已显得心慌意乱。一份由“行动委员会”个别成员以“行动委员会临时总部”名义贴出的《紧急通知》称，今日下午“壮起鼠胆去天安门进行社会咨询活动”，“是咨询不是游行，不是静坐”，“夜幕降临，作鸟兽散”。对这样的“紧急通知”，绝大多数学生已不屑一顾。一篇无标题、无署名的大字报，赤裸裸地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擦亮了更多



同学的眼睛，认清了极少数借题发挥者的真实目的。这篇大字报写道：“太阳不敢出来，我们只有自己制造光明，已经没有任何改良的希望。整棵大树从树根到树梢已经全腐烂，任何维持现有制度的改革都将在惨痛的事实面前崩溃。这个国家必须经历耻辱，最大的耻辱，最大的打击，必须置其死地才能后生。当一切都成为空谈，成为不可能的迷梦，革命就成为唯一的手段，必须诞生新的思想，在崭新的旗帜下，展开争取命运的革命。我们现在的使命是为明天而酝酿动乱和革命，血将流成河！”

6月8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都广播了《人民日报》《改革要有安定的政治环境》、《北京日报》《改革需要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的评论员文章和《北京市人民政府通告》，在各界群众中引起广泛关注。有一部分群众因物价上涨，对大学生上街持同情态度，但又担心造成社会动乱，对极少数人乘机将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则表示反对。大多数群众赞成中央、市委的观点和态度，表示绝不赞成北京大学少数人的错误观点和作法。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说：“现在改革已进入关键阶段，一定要有安定的政治局面。尽管改革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对我们也有冲击，但我们绝不赞成北大少数人的那些错误观点和作法。”东城区百货公司的职工说：“现在群众对大学生很有看法，太狂，太过分了！一点点儿事就想闹场事，好象他们是救世主。”东城区交道口街道的居民说：有些人“借机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这不是一般问题，要严肃处理，民主和专政是相辅相成的，政府不能一味迁就手软。”

## 二、平静的星期三

6月8日星期三，是少数人试图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示威的日子。但是，由于党和政府坚定的态度，坚决的措施，以及广大同学的警觉，星期三并没有发生极少数人盼望的事情。

6月8日下午，北京大学三角地聚集了三四百学生，美联社、《美国之音》等外国新闻机构十几名记者混迹其中。但是，由于学校党、政、团干部、教师和学生积极分子的劝导，人群不久便散开了。这使那些西方记者大为扫兴。美联社的一位女记者焦急地问一位将要离开三角地的学生：“听说你们今天下午去游行，怎么还没去？”回答是令她失望的，只好悻悻而去。

6月8日中午，北京市协同公安部、武警部队封闭了天安门广场。下午1点以后，200多名学生陆续来到天安门广场东侧，其中半数是北京大学以外的高校学生。1点到4点，这些学生多在天安门广场东侧便道上散坐或游荡。北京大学“行动委员会”的几个坚持“行动”的人在观察动向。另有十几名手提摄像机、照像机的外国记者在等待着。4点40分，北京地质大学煤田地质专业的一名研究生，在历史博物馆西门便道讲演，招致100多名群众围观。内蒙古的一名上访青年挤入人群，与讲演者对话，并递交了两份上访材料。此时，现场值勤公安干警进行交通疏导，迅速疏散了人群。在公安干警疏导过程中，北京大学一名研究生起哄，扰乱公安人员执行公务，被带离现场。在接受批评教育后，这名研究生表示不再犯类似错误，10分钟后被放回。5时许，有4名外国记者又在原地故意与学生对话，造成百余人围观，后经疏导散开。晚7点左右，学生纷纷离开天安门广场，返回学



校。

当天晚上，北京大学三角地聚集起千余人，其中近一半是外校了解情况的学生。原定每晚10点半的集会，由于无人出面组织，学生们自然分成许多小堆，打听和议论下午天安门广场的情况。约有20多名外国记者十分活跃，在现场采访学生，让学生谈看法，造成越来越多的人围观，到11点左右形成集会讲演。先后有14人讲演，多数人着重谈自己对游行静坐和民主自由的想法。许多讲演者表白自己的动机是好的，说：“我们想上街游行静坐，想触动一下政府，教育人民，推动民主进程”，“但现在看来，一则市民的素质低，不理解我们，再则政府强大的舆论宣传，使人民更不理解我们。所以，游行或静坐的目的达不到。”刘刚因这次事件表演充分，做贼心虚，也跑到集会上为自己开脱。他说：“我听一个朋友说，昨天党员们开会传达一个消息，说有一个北大开除的学生流窜回北大闹事，请方励之回北大讲话，并且把这个情况和三角地的情况及柴庆丰的死联系在一起。我想这件事就是指我了。”他诡辩说：“我所做的，无非就是讲了一些话。在北大讲，在塞万提斯像前讲，在这里讲了几句，另外，请了方励之、洛德大使到这里讲了讲。”同时，他又表明了自己继续同党和政府“斗争”的决心：“我们不应闭上嘴，割掉舌头来保持沉默。据说中央有改革派和保守派，难道为了使改革派改革而使我们不说话吗？改革是他们的义务，如果不行的话，让我们来干！”中国政法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在讲演中，措辞偏激，将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称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在于中国社会制度本身。但是，讲演者中没有人再敢煽动学生上街游行。



### 三、完了？

6月8日晚，国务委员陈希同主持召开有国家教委、公安部、北京市委、市政府、北京大学党委等单位领导出席的会议，听取了近两天处理北京大学柴庆丰事件情况的汇报，商定了下一步工作意见。会议指出，尽管我们挫败了极少数别有用心者策划的天安门广场静坐示威活动，但闹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不能放松警惕，要继续深入工作。会议制订了8条具体措施，主要有：深入开展对极端错误和反动观点的批判，把思想领域里的斗争引向深入；做好宣传报导的后续工作，防止回潮；利用各种形式，深入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对重点闹事者要严加追查，严肃处理；北京大学要加强管理，堵塞漏洞，尽快改变管理混乱的状况。

6月9日，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北京大学等有关方面，根据6月8日晚国务委员陈希同所召集会议的精神，继续深入工作。北京大学学生情绪显著降温，整个局势趋于缓和。白天，北京大学贴出的大小字报数量明显减少，不过五六份，有的向校领导建议加强管理，有的斥责少数学生是向外国人“告洋状”，有的发泄对6月8日下午公安干警和武警封闭天安门广场、静坐示威未遂的不满。晚上，因北大校方加强了门卫和党团组织加强了学生的工作。晚10点半，三角地仅有三四百人，多在看大字报或走动。

晚10点50分，有一名自称是美国留学生的男青年和两名中国学生故意走到经常集会的路灯下聊天。一些学生围拢过来，守候在这里的刘刚招呼大家围成圈坐下，遂形成了集会讲演的态势。先后讲演的有7名学生，情绪已不激动，言辞也不太偏激，讲演内容主要集中在对柴庆丰事件的反思、对民主



等问题的认识和对参加闹事可能产生的后果的担心上。北京大学法律系写《民主之路》大字报的作者进一步谈了大字报的观点：“在中国目前情况下，上街游行，喊几个口号，对民主没有好处，反而对民主进程起副作用。”另一位北大学生说：“游行对民主进程起作用，但从这几年游行的历史来看，这种作用呈递减的趋势。”当这两名同学阐述这些观点时，没有出现以往的“嘘”哄。在讲演中，刘刚抢先发言，言辞已不象以往那样放肆，表示出对自己策划煽动闹事后果的恐慌，并极力将可能产生的后果（他鼓吹要发生捕人流血事件）的责任推给党和政府。总之，学生对集会讲演的兴趣明显降低：集会规模较前小，参加人数不超过400人，中间陆续有人退场；会场场面不热烈，讲演期间多次出现冷场；集会时间较短，从晚11点开始到次日凌晨零点15分结束，总共1小时零15分钟，是6月5日集会以来最短的一次。当最后一位讲演者提议明天继续来这里集会时，围观的学生纷纷说：“不来了。”

6月10日，北京大学三角地新贴出的大字报锐减，只有两份；持续5天的晚间集会停止，整个局势基本稳定。在三角地贴出的两份大字报中，有一篇对北京大学文化的精华和弊端及历次学潮失败的原因进行了较详尽的分析，吸引了许多大学生围看。大字报全文如下：

### 对北大文化深层矛盾的初步反思 ——又一次学潮失败后痛苦的自我解剖

真正的勇士是敢于解剖自己的，我们北大人正是这样的勇士。这次由柴庆丰事件触发的学潮又失败了！冷静反思的结论是：这次学潮的失败与前几次一样，是带有必然性的历史

悲剧，是北大文化深层矛盾的集中体现。几年来，每次学潮的失败，我们北大人总是责怪社会的不理解。究其根源，我们痛苦地发现，麻烦在很大程度上出自北大文化的劣根性。北大文化既发挥了中国的优秀文化，也继承了中国的殖民地文化。因此，我们很有必要通过学潮的失败来深刻反思我们时刻引为自豪的北大文化之弊端，借以抹掉罩在那些北大落后文化传统上的神圣光环，更清醒地认识我们北大人自己。

### 一、北大文化的精华

北大在90年的历史里，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在无数前辈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北大文化的精华，其中主要有：

1. 对北大文化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产生于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和北大历届学友的杰出成就。其实质是民族自豪、自强和自立精神在北大的具体体现。对北大人的民族自豪感引而广之，正是我们的民族自尊精神和爱国主义。在对外开放的今天，这种精神是一种极其难得的巨大精神力量，弘扬这种精神正是我们北大人神圣的历史性责任。

2. 追求主义的热忱。在中国历史上，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献身真理精神代代辈出，为追求主义而牺牲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正是这个历史的母亲生产了北大人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力量。追求主义的实质并非是追求抽象的理论，而是追求中国社会的光明未来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当前，我们正在闯改革险关，特别需要发扬北大人追求主义的精神。我们要带头奋起，勇于为改革成功牺牲自己个人利益。

3. 开放的思维方式。我们北大文化就像广阔无垠的太平洋，以开放的胸怀，吸收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江河湖海。我们北大的开放思维从根本上来讲，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以来，一



一切有识之士，希望通过开放振兴中华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感谢蔡元培先生开创的民主办学之先河。开放思维的本质是吸取一切利于中国前进的文化，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积极的自我扬弃，是有选择的拿来主义，是对中国成功之路的探索。当前，封闭的思想观念作为历史包袱，正在顽强地对抗着改革的前进。大力提倡开放思维方式具有极大的现实作用。

4. 预见性地超前思想意识。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总有一批能对未来有所预见的人，北大也曾经产生过这样的人。北大文化的产生，根植于五四运动时传播马列主义的民族精英。当时对中国未来的科学预见，导致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何谓超前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阐述，是对真理的追求、探索和实践。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着一个伟大的事业——改革，这个事业是没有旧章可循的。因此，科学的超前意识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亟需的。

5. 平等的校园氛围。实现世界大同，是中国古代人民的善良愿望；实现平等民主是近代社会的先进思想。北大在历史和现实基础上形成的平等思想，为80年前的封建中国带来了春的信息，代表了中国人民冲破封建等级枷锁的美好愿望，也为北大文化的逐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心理环境。平等思想从根本上讲，就是共产主义理想，就是我们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有识之士的奋斗宗旨之一。在中国现实条件下，不平等的事情还很多。人民的民主意识还不强，发扬北大的平等思想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以上讲了北大文化精华的几个内容。从根本上讲优秀北大文化所代表的是人民利益、社会进步和科学真理。这是北

大文化的真谛。

## 二、北大文化的弊端

北大文化有善美的一面，也有其丑陋的一面。这从北大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经过长达90年的扬弃，一些善美的被保留了、发扬了。一些丑陋的被抛弃了。一些新的善美的和一些新的丑陋的又注入了北大文化。发展到今日，北大文化依然存在着善美和丑陋的两个方面。只要头脑清醒的北大人都会痛苦的承认这个客观现实。这里，想提出现在的北大文化存在的10大弊端，以引起大家的讨论。

1. 具有殖民地文化色彩。北大建校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殖民地文化不能不影响北大文化。这几日，洋大人出入北大频繁，其意无非说点中国的坏话，这不足为怪。可怕的是，有些同学视洋大人为神明，以知晓洋人通讯电话为自豪，动辄找洋大人告状，有人还收取信息费。在与美国大使洛德对话中，有的人不惜以打自己母亲——祖国的耳光去取悦洋大人，而洛德则拿出80年前洋教士布道的嘴脸来表现。有的人认为《美国之音》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还得意地到处播放录音。这不禁使人问一句：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难道就没有汉奸?!

2. 极端的个人主义观念。这是目前社会非主流文化对北大文化的渗透，这种渗透严重影响了一部分同学的行为标准，还有个别人把自己的行为套上忧国忧民的外衣，其实骨子里却浸透了极端个人主义，这使他们成了全盘西化等盲目思维的物质承担者。这是很多人接受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深刻思想基础。极端个人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就是以自我为衡量真理的标准。



3. 可怜的救世哲学。这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畸形发展。我们北大人总是在喊要唤起民众，反对一切救世主，而我们自己又把现实的中国百姓视为愚民，需要我们来拯救，颇具君临天下的皇权思想。这说明，我们并没有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我们这种救世思想只能把北大人<sup>与</sup>社会、人民割裂开来，成为我们百思不解的“为什么学潮得不到各界人民的拥护支持”的答案之一。

4. 政治上的盲目兼容。开放为了清醒的吸收。常常讲自己最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北大人却又有着廉价鼓掌和起哄的习惯。北夫人都讲拥护宪法，而现在在北大喊违背宪法的反动口号、贴反动标语，大概也不会有人干涉，何等自由啊！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要开放，要平等，都不能开放到允许敌对势力破坏的地步。政治上的盲目兼容是丧失起码判别是非能力的表现，与北大民主科学的旗帜背道而驰。

5 不会尊重他人。这是对北大文化传统的背叛，只求别人对自己平等，却从不大看他人，形成了现在北大文化的一个重要缺陷，严重破坏了我们自己的形象。顺我耳者听，逆我耳者“嘘”，目空一切，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有的同学说，全国看北京，北京看北大。北大是全国中心，可谓自大之极！

6. 理想化的社会理想。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一些人对一切都要求甚高，要求社会单纯无瑕，无法理解许多现实问题的客观必然性。这反映了我们政治上的幼稚，思想上的简单，造成了对社会的强烈不满。

7. 行为的盲目超前。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行为。一些人总想把50年后该干的事，硬拿到今天来办，其结果是没人



理解，步步碰壁。这反映了现在北大文化主客观的严重分裂。

8. 否定一切的思维特点。否定，是思维的一种重要形式，但我们有的同学分析问题，习惯于以偏概全，习惯于否定一切，好象别人都是笨蛋，什么都不会干。这种思维的结果是导致悲观主义，使人失去前进的信心。

9. 自我矛盾的思想方法。这也是现在一些北大人特点。这次我们游行到公安部前要求部长承认游行合法，就是说，要求部长用权否定法——游行10条。谁都知道，我们北大人常问，权大还是法大？十分痛恨以权压法。而我们这次的言行发生了深刻的自我矛盾。象这种现象具有一定普遍性。仅以这次事件中的一些现象为例，说中国危机，再次爆发鸦片战争，洋人会把我们杀光，而又千方百计希望洋人支持学潮。独立思考与盲目行动，反对救世主和要做救世主，要唤起民众又与民众格格不入。这使我们需要反思北大人的思维方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10. 盲目逆反心理。凡是上面讲的不信，凡是中国讲的不信，凡是组织讲的不信，似乎已成了不少同学的心理定势。其实盲目逆反和盲目听从是同样可悲的病态心理，是一种亚精神分裂症，在这种心态下，推动社会进步只是梦呓。

以上讲了现在北大文化的10大弊端。这些弊端裹挟着北大文化的精华，侵蚀着北大文化的精华，扭曲了北大人在中国民众中的形象，甚至引起了老百姓的反感和愤怒。这10大弊端反映了北大文化与社会文化的矛盾和冲突。北大人的麻烦正是出在这里！过去，我们只重视了北大文化光辉的一面，

但从没有人敢  
不题，讲了出  
为了北大人的  
三、我们  
这次学潮  
反思，再反思  
被理解？为何  
实。我们要从  
题：  
1. 反思  
长目标，成  
验教训可以  
2. 反思  
为闹事的发  
别？学潮与  
处？  
3. 反思  
国际政治的  
对这些问题  
使用。比如  
有何差异？  
受不受社会  
多数人的利  
标准？民主  
世界上  
个讲北大文



严重分  
形式，  
否定一  
结果是  
人的特  
就是  
我们北  
门这次  
遍性。  
暴发鸦  
支持学  
要唤  
的思维  
国讲  
的心理，  
是梦  
着北  
在中  
10大  
的麻  
一面，

但从没有人敢讲北大文化的阴暗面。今天，我们冒天下之大不韪，讲了出来，恐怕有伤众之嫌。但是为了北大的发展，为了北大人 的前途，我们还是下决心讲了！

### 三、我们需要反思、反思、再反思

这次学潮失败了，下一步的主要思想活动应当是反思、反思、再反思。想一想，我们这几年为何常常碰壁？为何不被理解？为何不受欢迎？北大人应拿出勇气来正视这个现实。我们要从反思北大文化开始，至少再反思这样几个问题：

1. 反思北大人的成长道路。这个问题包括北大人的成长目标、成长方向、成长途径和成长过程。看看其中有何经验教训可以汲取。

2. 反思这几年学潮的教训。想一想，北大为什么总成为闹事的发源地？这几年学潮与解放前学潮在性质上有何区别？学潮与中国社会前途有何关系？北大再闹学潮有何好处？

3. 反思民主、自由、人权问题。这个问题是当代国内国际政治的焦点，也是这几年学潮的基本口号。但是，我们对这些问题并没有闹清楚，常常只是在混乱的意义上混乱地使用。比如，什么叫人权？美国和中国对人权的理解和使用有何差异？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老喜欢打人权这张牌？人权受不受社会条件制约？又比如，民主的实质之一是不是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生产力标准能否成为衡量民主的基本标准？民主的条件是什么？法制是不是实现民主的途径？

世界上第一个吃螃蟹的是勇士；不客气地讲，在北大第一个讲北大文化弊端的恐怕也是勇士。对以上观点，估计反对



的意见可能居多。但我们想，北大既然如此民主，所以也会容忍不同意见的存在，不至于扯掉这张大字报。

6月11日，北京大学校方适时地将三角地大小字报和标语做了处理，为时10天的柴庆丰事件基本平息。

党和政府在处理柴庆丰事件的同时，人民检察院和法院也在抓紧依法审理柴庆丰案件。6月6日，王建等6名案犯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批准，分别以故意杀人罪、流氓罪依法逮捕。6月18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柴庆丰案件进行公开审理，包括北京大学部分师生在内的400多人到庭旁听。6月29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6名案犯做出一审判决：主犯王建因故意杀人罪和流氓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主犯哈恩明因故意杀人罪和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建明、王永联因流氓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和7年；王丽因窝藏罪和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刘斌犯有流氓罪，因情节较轻，免于刑事处分。王建、王丽、刘斌不服判决，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7月1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裁定，驳回王建、王丽、刘斌3人上诉，维持原判。7月21日，王建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其他4犯被押往劳改场所进行劳动改造。至此，柴庆丰被害一事不论作为事件还是案件，全部结束。

柴庆丰事件的了结，并不意味着学潮的终止。因为柴庆丰事件平息后，导致柴庆丰事件发生的主要因素没有消除，或者说没有根本变化：一是大学生深层思想问题没有变。尽管柴庆丰事件后不少大学生在反思，但不广泛，也未能持久。他们的深层思想疙瘩没有解开。有些人经过柴庆丰事件的“速



成学习”，其观点反而系统化了。二是党内一些同志处理学潮的作法没有变，这就是学潮来了高度重视，学潮一过没事一般。柴庆丰事件结束后，党内有识之士曾建议把学潮的处理当作一项经常性工作来抓，建立和完善一套处理学潮问题的社会控制体系，其中包括领导体系、预测体系、处理体系、宣传体系等，但这些建议没有受到重视。党内也有许多同志提出：处理学潮不能治标，要治本，即要彻底铲除学潮发生的根源，如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清除腐败，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但是，这些建议同样没有受到重视。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猖狂活动没有变。四是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企图没有变。

以上“四个不变”说明了以下几点：一是学潮发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将千方百计为学潮的再度发生做思想、组织上的准备；一旦学潮发生后，他们将加以利用，并充当精神领袖和行动指导。三是学潮发生后，海外敌对势力必然伺机插手。

一场新的、更复杂的学潮在酝酿着。



## 第六章 北京风波

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和国外各种敌对势力经过思想上、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借胡耀邦同志逝世之机，在北京和全国挑起学潮，制造动乱，并在北京发动了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受了建国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

### 第一节 山雨欲来风满楼

#### 一、西方的“软着陆”

进入80年代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旋律，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潮流。国际资本主义反动势力利用和平形势和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大力推行“和平演变”的“软着陆”战略，拼命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十分复杂的情况。对待社会主义中国，国际资本主义敌对势力同样采取了“和平演变”的手法。特别是，美国的一些人把我国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或由体改委派人组建的“四所一会”，即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机构中的一些人，看成是对中国最高领导层、最高决策机关能起潜移默化影响的人物，不断在他们身上下功夫。美国经常以“国际访问学会”



名义，邀请体改委系统的人去美国访问。美国一位官员在推荐我国原国务院办公厅研究室一名研究员访问时写道：邀请此人访美，“有助于打开国务院神奇的至今尚未打开的大门”。一年内，仅此官员一人就推荐了体改委系统12人访美，成行了11人。

还在1986年，美国“中国改革与开放研究基金会”通过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谔接洽，仿照在匈牙利搞基金会的模式，在中国设立了基金会。至1989年5月，美国方面一共汇来250万美金，这些钱基本上用于4个方面。一是体改所及其下属机构一些人出访美国的费用开支和接待美方来人的开支；二是进口了50万美金的西方社科类书籍；三是拨出25万美金计划建立一个政治沙龙性质的俱乐部；四是用于一些文化事业。这个基金会的美方负责人曾表示，很想与我国领导人建立私人关系，就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交换意见。1989年5月，当这个美国人了解到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变化，他们需要联系的人离开了领导岗位，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不能实现时，便给基金会中方负责人来信，提出终止协议，关闭基金会，这充分暴露了他们的真实面目。

## 二、滚滚寒流急

在1989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比1986年更为严重地泛滥开来。方励之已不再躲躲闪闪，用隐讳的语言表达他的主张。1988年6月14日香港《时报》报道，方励之昨天在北京说，最大的问题是中共的独占体制，唯有变革公有制为私有制是根本方法。1988年9月16日香港《时报》报道，方励之在香港说：大陆的出路就是“资本主义化”，“整个的改弦更张”。1988年12月7日，“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了“未来中国

与世界”大型讨论会。金观涛在发言中说，20世纪“另外一个遗产是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它的失败”。《新观察》主编戈扬以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年龄最大者“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她说：“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是一种封建社会，它的头子必然是皇帝。”

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逐渐明确了他们的长远目标是多党制和私有制，近期目标是争取所谓必要的人权。在他们看来，没有人权，民主、自由及多党制和私有制都谈不上。1988年9月6日，香港《时报》发表了《方励之谈大陆知识分子处境》一文。方励之在文章中说：“大陆知识分子争取民主的长期目标是多党制的民主制度，近程的目标是实现必要人权，争取言论、思想、新闻等自由。”所以，自1989年1月起，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在海外敌对势力的配合下，掀起了以大赦魏京生、争取人权为主要内容的“运动”。1989年1月6日，方励之发出《致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公开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魏京生。信中说：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40年，也是五四运动的第70年，围绕着40年和70年，一定会有不少纪念活动。但是，比之回顾过去，更多的人可能更关心今天，更关心未来，期待着两个纪念日会带来新的希望。

鉴于此，我诚恳地向您建议，在这两个日子即将到来之际，在全国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及所有类似的政治犯。

我想，无论对魏京生本人做如何评定，释放他这样的已



经服刑大约 10 年的人，是符合人道的，是会促进社会的良好气氛的。

今年恰好又是法国大革命的 200 周年，不论怎样看，由它所标志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已受到人类的普遍尊重。因此，我再次诚恳地希望您考虑我的建议，给未来增添新的尊重。”

1 月 12 日，原北京自发组织“星星画会”部分成员在香港举办“星星画会十周年画展”。该组织头头王克平宣称，他已写了《重审魏京生》剧本，拟于 3 月份在法国上演，届时将在海内外掀起一个释放魏京生的高潮。1 月 21 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的刘小平在方励之的支持下，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要在中国争取人权。1 月 28 日，方励之、苏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等在北京都乐书屋搞了一个所谓“新启蒙沙龙”。方励之说：“现在中国主要的是人权问题，需要行动，号召大家起来争取人权。”1 月下旬，王若望称他准备在美国发起成立“中国人权保障大同盟”，争取在国内正式申请注册。2 月 3 日，“星星画会”部分成员在北京外交公寓举行义卖活动，为资助魏京生等罪犯家属筹集资金。2 月 8 日，中国民联成员倪育贤在美国成立了“促进中国民主化联络组”，准备发起十几万人的签名运动，同时与方励之联系，以呼应释放魏京生。2 月 13 日，经原北京自发组织“今天”头头北岛发起，由原上海自发组织“民主之声”骨干、中国民联成员陈军出面，联系了 33 名知名知识分子联合签名发出《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2 月 16 日，陈军在北京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散发了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和陈军等 33 人致全国



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的公开信。2月19日，陈军召集外国驻京记者和“中国现代艺术展”部分作者集会，宣布设立释放魏京生公开信签名联络处，同时策划在工厂、学校中征集签名，争取工人、学生的支持，然后将签名信提交全国人大讨论表决。2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包遵信等42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释放政治犯。3月8日，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许良英等42人发出给党和政府及领导人的公开信，要求“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请责成有关部门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3月24日，《光明日报》主任记者戴晴等42人发出致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公开信，“呼吁请释放魏京生等人”。

国家有关部门对方励之、陈军等人发起的签名释放魏京生事件进行了揭露。2月22日司法部负责人公开发表谈话指出，魏京生是1979年10月19日因向外国人提供军事情报、进行反革命煽动，而被北京市人民法院判处15年徒刑的。他说，人民法院是根据魏京生的犯罪事实依法作出判决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法院审判是完全独立的。在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如对判决仍有不同意见，应依照法律程序提出申诉，由法院依法处理。政府、政党、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改变法院的判决。方励之、陈军等人企图通过发起签名的方式，制造舆论，形成压力，影响审判独立的做法，是违背中国法制原则的。这次大赦魏京生闹剧到3月底收场。

其实，方励之等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导演大赦魏京生闹剧还有一个目的，这就是制造影响，挑动群众特别是青年学

生上街，制  
的政治要求  
启蒙沙龙”  
底批判的态  
为了挑起学  
青年学生中  
手扶植，由  
1989年5月  
分子到场青  
五四运动”  
与此同  
论坛”及各  
现，其中不  
干。象北  
刚、封从  
校学生自  
资产阶级  
年4月北京  
北京航空  
显示：学生  
党制，有  
马列主义基础  
鉴于  
的加剧及  
1989年3  
心忡忡地



走上街，制造动乱，对中国政府形成“压力集团”，屈从他们的政治要求。1989年1月28日，方励之在都乐书屋搞的“新启蒙沙龙”活动中曾说，这类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连开3次就要上街了”。为了挑起学潮、进而利用学潮，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加紧在青年学生中进行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由方励之、李淑娟一手扶植，由刘刚、王丹出面组织的北京大学“民主沙龙”，到1989年5月12日，共举办了17次。一大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到场散布自由化言论，攻击四项基本原则，鼓动学生在五四运动70周年和国庆40周年之际闹事。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一些高校中，“圆明园沙龙”、“自由论坛”及各式各样的“研讨会”、“讨论会”、“演讲会”纷纷出现，其中不少人成为日后动乱和暴乱中非法组织的头头或骨干。象北京大学“民主沙龙”的组织者和积极参加者王丹、刘刚、封从德、熊焱、郭海峰、杨志等后成为非法组织“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的头头。各种“沙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猖狂活动，毒害了不少大学生。据1989年4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5校对师生的政治见解和态度的调查结果显示：学生中有一部分人倾向于一党多派、两党轮流执政和多党制，有一部分人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有一部分人根本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1989年3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贴出题为《讨邓檄文——告全民书》的大字报，公然诽谤“共产党的政治就是空谈、强权、独裁、武断、权大于法”，要求“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原则”。1989年4月6日，北京大学贴出《时代的召唤》的大字报，鼓吹在中国“建立个

体制或者私有制”。很明显，经过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别有用心  
的策划和煽动，大学生不良的思想积淀和情绪积淀越来越厚，  
形成了“山雨欲来”的政治气候。

### 三、祸起萧墙

“祸起萧墙”是一句成语，指祸事发生在家里，后用来比喻  
祸事起因于内部。无庸讳言，1989年春天“山雨欲来”的  
政治气候的形成，同党和政府内少数人的腐败现象不无关系。

1979年以来历次学潮的发生，或多或少都与少数人利用  
大学生对党和政府内的不正之风、腐败现象不满有关。尽管党  
和政府一直在采取措施加强廉政建设，但由于种种原因，反腐  
败的措施不够坚决有力，反腐败的成效一直不明显。某些腐  
败现象日趋严重，各类公司风起云涌。投机倒把、偷税漏税成  
风，个别高级领导干部不仅支持家属或子弟搞不正之风，自  
己也以权谋私。

新疆自治区副主席托乎提·沙比尔支持非法倒卖活动，受  
贿1.6万元。海南省省长梁湘，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但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他丢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  
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犯了严重的以权谋私的错误：他纵容妻子  
和儿子倒卖房产，妻子出面在海口市预订了两栋房子，由儿  
子将其非法倒卖获取暴利；他违背省政府有关审批进口汽车  
的规定，亲自批准某公司进口一批汽车，他儿子没有参与进  
口这批汽车的经营活动，却借机勒索了一笔巨款；他利用职  
权，违反规定，为他尚未在海南落户的另一个儿子办理了从  
海南去香港定居的手续；他违反财经纪律，用公款为自己制  
做服装、支付个人宴请费等等。

党和政府内腐败现象的发展，严重恶化了社会风气，



博、卖淫、盗窃、抢劫、绑票、贩卖人口等丑恶现象重现；请客送礼、大吃大喝、滥发钱物、公款过节问题严重；修庙建寺、烧香拜佛、造墓堆坟等封建迷信活动猖獗；道德水准下降，是非观念扭曲。有一名大学生曾这样形容说：“过去一喊抓小偷，是小偷跑；现在一喊抓小偷，是周围的人跑。”

党和政府内腐败堕落者尽管是少数，但影响很坏，因而引起了广大群众、广大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的强烈不满和极大愤慨，并且已经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1989年3月，共青团北京市委对首都大学生思想状况进行了调查，党和政府内的腐败现象是大学生反映的热点问题。他们呼吁：“中央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坚决惩治腐败现象，甚至可以杀一批贪官污吏。”这种情况表明，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长期存在的条件下，无论因何种原因触发学潮，只要学潮发动者和组织者以反腐败口号相号召，就会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并且会参加其中。同一时期，共青团北京市委还对首都青年工人思想状况进行了调查，发现青年工人思想情绪十分复杂。他们的关注点依次为：腐败现象、分配不公、个人成长、企业发展、物价上涨。同时，青年职工“把腐败现象当作万恶之源，认为腐败现象导致了分配不公、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和宏观失控，是全社会的中心症结”。这种情况说明，青年职工自发闹事的可能性不大，但存在同情和参与大学生游行的心理基础。

鉴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严重泛滥、党和政府内腐败现象的加剧及国际资本主义敌对势力的渗透，共青团北京市委在1989年3月的《关于目前首都大学生思想状况的调查》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在外部的强烈刺激及频繁冲击下，发生大规



模学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与实际利益和社会问题相关的动荡很难完全避免。”对于这一点，甚至连一般学生也感觉到了。北京高校一名研究生说：“结论早已有了，人们现在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总觉得有一个大的事件将发生。”

## 第二节 在祭奠的旗下

### 一、导火索

1989年4月15日7时53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因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在北京猝逝。胡耀邦同志的逝世，使酝酿已久的学潮和动乱提前爆发。正如香港《明报》1989年4月21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所说，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早已酝酿于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日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表达对当局的不满。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则犹如向装满火药的桶里扔了一根火柴”。

中国人似乎有一种心理习惯，就是同情“弱者”。胡耀邦同志任总书记时，一些人对他指指划划，流露出不满情绪。在1987年“元旦震荡”中，有的大学生居然喊出了“宁要‘四人帮’，不要胡耀邦”的口号。但是，当胡耀邦同志辞职、特别是当他猝逝后，很多人顿生怜惜之心。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胡耀邦同志逝世的当天，就贴出了数以百计的大小字报和标语，到4月16日不过一天，全市20所高校贴出的大小字报多达300多份。其内容主要是缅怀胡耀邦同志的人格和功绩，对他的猝逝表示无限惋惜。但是，极少数别有用心者，却利用这个机会，以悼念为借口，通过大小字报进行煽风点火，将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有的大小字报谩骂共产党是“一代奸党”，是个“即将溃灭之组



任 任

相关的动  
感觉得到了  
似乎都在

委员、前  
京辞逝。  
暴发。正  
说，中国  
平纪念日  
然去世，

胡耀  
情情绪。  
宁要  
职、特别  
中国人民  
行计的大  
邦同  
及少数  
七小字  
制度。有  
贵灭之

织”，有的攻击老一辈革命家是“朽翁听政”、“独裁集权”；有的指名道姓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说什么“不该去的去了，该死的却没死”；有的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有的要求“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甚至提出“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有的发表《私有制宣言》，号召“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去迎接共和国新的明天”。

在校园内出现波动的同时，4月15日晚，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现了第一个署名“顾保忠”的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小花圈。到4月16日，纪念碑前的花圈增至20多个，还有不少条幅、黑纱、白花。4月1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大幅照片，报道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的花圈和群众场面。《人民日报》的这一举动，在高校许多师生中造成到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同志是党和政府提倡的错觉。4月17日下午，中国政法大学600多名师生有组织地抬着花圈，放着哀乐，举着旗子，徒步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这一情况，立即引起了王丹等人的注意。就在4月17日下午，王丹在校内募捐，然后买了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窥测情况，以便制造更大的行动，将学潮推向高潮。

4月18日零点30分，经王丹与李淑娴等人策划，由王丹出面，在北京大学三角地突然召集起2000多人。王丹说：“只要有旗帜，我们就出去。”很快有人拿来一条长15米、宽5米的大条幅，上写“中国魂——永远怀念胡耀邦同志”。接着，北大约有1000多学生出了北大南校门，走向天安门，途中有人民大学的一部分学生加入队伍。队伍在行进中高呼：“反对专制”、“反对独裁”、“打倒官僚政府”、“打倒特权阶级”、“打倒官倒”、“自由万岁”。队伍高唱《国际歌》、《妹妹你大胆往

前进》等歌曲。凌晨4点，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外国记者对北大一女学生采访。女学生说：“这个行动不单是因为胡耀邦，早就有酝酿，这次是导火线，目的是向政府施加压力，让政府听听学生的心声。”随后，4点30分左右，大批学生队伍进入广场，呼喊“打倒独裁”、“反对官僚主义”等口号。王丹等人在纪念碑前演讲，提出了事先与李淑娴等人商议过的“7条要求”，这7条是：

(1) 重新评定胡耀邦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2) 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为在两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平反。(3) 要求国家领导人及家属的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布，反对贪官污吏。(4) 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言论自由。(5) 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6) 取消游行示威10条。(7) 要求政府对他所承认的政策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适当改选部分领导人。

凌晨，大部分学生从广场转移到大会堂周围，约有1000人左右，开始静坐，提出向人大常委会递交请愿书。接待人员答应转达他们的要求。此时，王丹打电话给李淑娴要求发动学生来支援。李让王丹坚持住，由她去发动学生。李淑娴随即在北大“三角地”贴出小字报《天安门前传来的电话》，鼓动学生去支援。上午8点多，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局的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与学生代表对话。王丹、郭海峰（北大国政系学生）等3人，将请愿书交给信访局负责同志。对话后，有二三百名学生继续留在广场静坐。王丹等又称这次对话不能令人满意，又要求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出来对话。中午，王丹等人又降低了要求，说让全国人大代表出来也可以。这时，静坐学



北大  
邦，早  
政府  
进入  
人在  
条  
自由、  
资产  
识分  
的收  
除报  
遇。  
的政  
人。  
1000  
人员  
发动  
随即  
动学  
民生  
三百  
人满  
人又  
坐学

生收集每个人身上带的人民币，拟向全国各大专院校发电报，通报北京高校情况。王丹趁机煽动学生冲人民大会堂。下午3点，三四百名学生聚集在大会堂东门外，高呼“反对独裁”、“要民主”等口号。这之后，接待人员答复学生，人大常委会委员刘延东等3位人大代表将与学生座谈。晚7点50分，人大常委刘延东、人大代表陶西平、宋世雄3人来到人大大会堂准备和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学生代表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但王丹等人突然提出不对话了，要求人大代表在大会堂东门外当众接收他们的请愿书。经有关领导同意后，3名人大代表在大会堂东门外和北大学生代表郭海峰等2人见面，这2人递交了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的“10点示威要求”和北京大学学生的“7点要求”的请愿书。

恶心

## 二、“最来情绪的”冲击

在许多善良的人看来，只要人大代表接下学生的请愿书就没事了。王丹他们开始也是这么保证的。但实际上，王丹他们的真实意图并非仅仅是递交一份请愿书。所以，他们随后又将游行队伍带到中南海新华门前挑起了冲中南海的严重事件。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据北京大学一位同学4月22日贴出的《原来是个阴谋》的大字报披露说：“4月19日，当我怀着兴奋的心情与另外几个同学聊我们在天安门和新华门前的行动时，一位不是我们班、但是行动的中坚人物（王丹）说，新华门前最来情绪的就是拱起警察的火，只要警察无奈，一动手，我们就有借口把事情扩大。我问，那你们是有意让警察打我们了？他说，话不能这么说，但这样才能号召同学。”原来，王丹等人玩弄的是“以血醒民”的把戏。

4月18日晚，在北京大学郭海峰等人带领下，北京大

学及后来到达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队伍汇合，绕广场游行，呼口号，并将广场上的2000多学生带到中南海新华门前。晚11点35分，学生在新华门前静坐。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吾尔开希等人演讲。一部分人呼喊“李鹏出来”，并开始冲新华门，同时往劝阻的警卫战士身上扔瓶子等物。一些战士被砸伤。他们每隔半小时冲一次，一共冲了6次。警卫战士保持了最大克制，没有让王丹等人的阴谋得逞。冲击新华门，是建国后从未发生过的违法行为。4月19日凌晨3点40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同志召集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中宣部、中办警卫局、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公安局等单位的有关同志研究决定：以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名义发布通告，迅速整顿新华门前的秩序，要求北京市公安局迅速调集力量执行。4点15分，公安干警和武警分中、西、东3路，整顿新华门前秩序，并配备了3辆广播车，宣读市政府公告。市公交总公司按照市委的要求，调了4辆大轿车开往六部口。静坐的学生陆续上车返校。新华门前静坐的人群被驱散，其中有十几名香港和外国记者。王丹、吾尔开希等人并没有因这次冲击新华门未达到目的而死心，又策动了第二次冲击新华门行动。

4月19日晚11点，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的近万名大学生和围观群众，在极少数人的煽动组织下，从纪念碑下取走6条横幅、4个花圈，再次涌向新华门。4月20日凌晨，新华门前开始清场，但有100多人坐在原地不动，警戒线东西两侧围观群众约1万人。通过劝导，新华门东西两侧围观的人逐渐散去。在少数人仍不肯散去的情况下，公安干警采取措施，将少数人强行带上一辆公共汽车。

学生边上平  
产党”的口  
玻璃窗向外  
全部下车，  
司机一再劝  
学生送到北  
显然，  
冲击新华门  
事时都说，  
到这种在  
“感到十分  
用警察打  
然而，  
言政治”。  
在北京大  
地胡说什  
的大字报  
冲开手无  
打后脑、  
在校门口  
生，还打  
让他们干  
京师范大  
伤致死一  
国人民大  
弥天大谎



学生边上车边砸车，将5块玻璃砸碎，并有人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当车行至南礼士路口一带，有些学生从破碎的玻璃窗向外探身，有人被划伤。司机减速，学生硬扒开车门全部下车，有近30人到马路对面乘4路车返回天安门。经司机一再劝说，20分钟后，剩下的学生又上车，司机驾车将学生送到北京大学南门。

显然，李淑娴、王丹、吾尔开希这些人妄图通过第二次冲击新华门制造血案的阴谋又流产了。事后，外电在报道此事时都说，警方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有的报道还说，看到这种在美国白宫前都绝不会发生的事情在新华门前出现，“感到十分震惊”。就连一向最能造谣的《美国之音》也未使用警察打人的说法。

然而，李淑娴等人在又一次阴谋失败后，居然搞起了“谣言政治”。他们在首都高校内硬是造出了所谓“4·20血案”。在北京大学，4月20日当天就有人贴出大字报，耸人听闻地胡说什么“新华门前血流成河”。一份题为《法西斯的镇压》的大字报竟把谎言编得绘声绘色：“大批公安警察突然出现，冲开手无寸铁的群众，大喊‘打死他们，往死里打’。警察专打后脑、腰、肾、胸和其它要害。”在北京师范大学，有学生在校门口向行人讲演：“昨晚警察在新华门打人了，不光打学生，还打了老人、女人和孩子。从西单一直打到王府井，是上头让他们干的。”别有用心者还嫌不够，又抓住4月19日晚北京师范大学女学生郭向东去看演出归来在西单被无轨电车撞伤致死一事大做文章，说“共产党的军车轧死了学生”。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内还出现了“1000名科技工作者倒在血泊中”的弥天大谎。

由于极少数人别有用心的造谣，加之报纸舆论披露事实真相不够及时，许多大学生误信了“4·20血案”的谣言，情绪激动起来。李淑娴见火候已到，向王丹等人面授机宜：“下一步要求参加追悼会，很多人都有这种心理。这样事情就更大，还能推向全国。”为了确保4月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这天行动的成功，他们又精心设计了一个更能牵动人心的计划。

### 三、跪交请愿书

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公告，决定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4月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4月21日早晨，电台广播了《北京市公安局通告》和《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通告》，决定4月22日上午8时至12时天安门广场地区实行交通管制，以保证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顺利进行。王丹等人认为4月21日是最关键的一天，要提前行动。他们经过到各校串联，成立了“高校行动委员会”，并在各校贴出“高校行动委员会通知”，鼓动各校大学生于当晚10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誓师大会，然后统一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参加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同时向当局递交请愿书，并抗议所谓“4·20血案”。

首都高校的一些大学生听信了“4·20血案”的谣言，所以不少大学生对王丹等人鼓动的4月21日晚上的游行持支持态度。当晚9点半，全市有20所高校及天津南开大学共3万多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集合，举行了所谓“全市高校学生誓师大会”。大会由吾尔开希主持，他提出要以演讲的形式控诉“4·20血案”，并宣布了游行的目的和路线。一些学生准备了石块、白灰。晚9点45分，3万多学生从北京

师范大学出发  
“铲除官倒”、  
点50分，队伍  
4月22  
排在指定地  
起，由纠察  
生队伍排坐  
把本来作为  
治丧办负责  
到当时的情  
证大会会有停  
松墙以东，  
随后，治丧  
车即被一群  
们。其中3  
表。他们要  
场。学生代  
队伍开始往  
校的学生做  
生队伍全部  
这时，  
条件地保证  
是必须客观  
钟调一所高  
大学无线电  
等5名学生



师范大学出发，游行到天安门，沿途不断呼喊“反对暴力”、“铲除官倒”、“耀邦千古”、“民主万岁”等口号。4月22日凌晨1点50分，队伍全部进入天安门广场。

4月22日凌晨3点，在天安门广场，各校学生被分别安排在指定地点，打着校旗，有的学校的学生围成圈坐在一起，由纠察队员维持秩序，进出圈要检查学生证和校徽。学生队伍排坐在纪念碑北面、天安门广场西侧路隔离墩附近，把本来作为大会停车场的地方占据了。3点45分左右，治丧办负责警卫和交通指挥的领导同志紧急召集会议，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决定对学生的行动采取克制态度，但为了保证大会有停车场，须将学生队伍由纪念碑西松墙以西调至西松墙以东，至西华灯杆一线，停放车辆尽量不影响学生视线。随后，治丧办指派6名同志乘车来到广场西侧路。他们刚下车即被一群人围了起来，不断遭到谩骂，甚至有人用脚踢他们。其中3名同志来到纪念碑南侧学生队伍中，找到学生代表。他们要求学生队伍东移到纪念碑西松墙以东，让出停车场。学生代表同意回去做工作。随后，邮电学院、政法大学的队伍开始往东移动。治丧办的同志又继续向北大、人大等学校的学生做工作，到早晨天亮广场熄灯时，西松墙以西的学生队伍全部调到商定地点。

这时，治丧办的3名同志获悉学生的3条要求：一是无条件地保证学生人身安全；二是要求瞻仰胡耀邦同志遗容；三是必须客观报道“4·20事件”。如不答应这3条，则每隔10分钟调一所高校队伍向西移动。治丧办的同志向熊炜（清华大学无线电系85级学生）、郑旭光（北航社科系学生）、熊焱等5名学生代表作了以下答复：（1）通过广场上的扩音器向



广场转播胡耀邦追悼会实况；(2) 大轿车停车位置不挡住学生视线；(3) 只要学生队伍不乱，保证学生人身安全。同时，治丧办的同志还表示：瞻仰遗容问题，我们尽力向有关方面反映，现在不能答复；关于客观报道“4·20事件”之事，不由治丧办负责，我们可以向有关方面反映。多数学生代表表示理解，可以按这个意思回去做同学们的工作，但又表示，如果学生不听，他们也没办法。后来，人们看到的是，学生队伍继续向西移动，几万人的队伍拥到隔离墩附近，部分学生越过隔离墩上了广场西侧路。

上午10时，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追悼会。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致悼词。邓小平、李鹏、万里、彭真、聂荣臻、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王震等同志和首都各界人士4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并向胡耀邦同志遗体告别。

向遗体告别仪式开始后，学生队伍中高呼“对话，对话！”“李鹏出来！”的口号。这时，郭海峰、周勇军、张智勇（北京大学国政系研究生）3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要求向李鹏总理递交请愿书，并表示其他工作人员代接一概不给。在广场的高校学生代表开了一个会，有少部分人提出：绕广场一周就走。大多数代表表示不想走，要求和李鹏对话。11点40分左右，治丧办工作人员再次与东门外学生代表协商有关事项。学生代表说一定要见李鹏总理，当面交请愿书，并要求让学生瞻仰胡耀邦遗容。工作人员一再解释考虑到追悼会的规模，不可能在场的数万人都瞻仰胡耀邦遗容，并再次表示，一定把请愿书转交给李鹏总理，但是遭到拒绝。有一个学生代表提出，见李鹏总理是第一要求，其他要求可以放弃。这

这个困难不以经济而

时，吾尔  
叭说：李  
点 45 分  
11 点  
线拥，第一  
又来到大  
理。治丧  
请愿书交  
“好兄弟，  
是，郭海  
郭海峰等  
开始撤离  
理，通电  
贴大小字  
广场“真  
扬言“五  
同一  
件。胡耀  
京、长沙  
等城市高  
兰州的音  
学生在亲  
毁房屋、  
分子在王  
被洗劫一  
沙出现打



学时，面由示，生学。中荣士！”京李广一40事让规，生这

时，吾尔开希站在靠近大会堂东门外的学生队伍前，用喇叭说：李鹏已经答应12点15分与学生见面，后来又说是12点45分见学生。

11点45分，学生情绪激动，人群向大会堂东门外警戒线拥，第一道警戒线被冲开。12点15分左右，郭海峰等3人又来到大会堂东门外，竟在台阶上跪下，继续要求见李鹏总理。治丧办工作人员又出来表示，如果学生代表同意，一定将请愿书交给李鹏总理。大会堂一名工作人员对学生代表说：“好兄弟，我也跪下接过请愿书转交给李鹏总理行不行？”但是，郭海峰等人还是执意不肯。最后学生队伍中走出2人将郭海峰等人叫回到队伍当中。下午1点左右，广场上的学生开始撤离广场，并游行经新华门，呼喊“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等口号。下午，返校学生在校内贴大小字报，集会演讲。主要内容是介绍“4·22”天安门广场“真相”；号召无限期罢课，要“通电全国，统一罢课”；扬言“五四再见”，在中苏高级会晤期间组织全市统一行动。

同一天，陕西西安、湖南长沙发生严重的打砸抢烧事件。胡耀邦同志逝世后，除北京外，上海、天津、西安、南京、长沙、合肥、成都、哈尔滨、大连、重庆、杭州、兰州等城市高校贴出大小字报和标语；上海、天津、西安、杭州、兰州的部分高校学生还上街游行。4月22日，西安500多学生在新城广场集会，引起数万人围观，一些不法分子乘机烧毁房屋、汽车。同日，长沙4000多大学生上街游行，不法分子在五一广场和其它一些街道趁机打砸抢，约有20家商店被洗劫一空。从北京高校部分学生冲击新华门，到西安、长沙出现打砸抢烧，表明学潮已和动乱结合在一起了。

### 第三节 “4·26”社论前后

#### 一、一叶知秋

4月23日，北大、人大、北师大和政法大学等学生情绪比较强烈的高校又出现了新的政治趋向：

第一，少数人已经剥掉了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外衣，提出了赤裸裸的政治纲领。政法大学有一张小字报提出，现在不要再用“悼念胡耀邦活动”这个概念了。这次学潮是“以悼念胡耀邦为起因的爱国民主政治运动”，其政治纲领是建立多党制和私有制，在斗争策略上还要提些具体口号。

第二，一些大学生提出要占领舆论阵地，主要指学校广播站、校内刊物、大字报和新闻报刊等。人大有人打算用武力夺取校广播站。北大有人呼吁《人民日报》的青年记者和编辑为学生讲话。大学生非常欢迎《科技日报》，到处散发，并作为大字报张贴。同时，有人指责《北京日报》“从事胡编乱造”，指责电视台“主管颠倒黑白”，指责广播电台“把人民耳朵堵起来”。

第三，各种非法学生组织活动频繁，而合法学生组织受到难以承受的政治压力。政法大学有一张题为“北医的呼唤”的大字报，该报声称响应22日北京团结学生会的倡议进行集体罢课，其署名为“北医学生自治会”。与此同时，各校纷纷谣传合法学生会和研究生会的辞职消息。23日下午4:30分左右，有人打电话告诉政法大学，北大“两会”主席辞职了，而北大又谣传人大“两会”主席辞职了。有不少大字报点名道姓要求废黜学生会主席。

第四，部份教师贴出了支持学生行动的大字报，其主要

内容是表  
争取民主  
第五，

22日李鹏  
使学生既  
政府用假  
而政府没  
长街”。

第六  
骂邓小平  
学生名义  
的乖乖”，

第七  
活动。北  
进行募捐  
人捐款，  
学生到建  
法大学自  
之过；  
特权；  
袭制；  
膨胀；  
国。

从  
入一个  
由学生



内容是表示支持学生，反对镇压学生，并号召教师参加学生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

第五，大学生深信一些与事实不符的传言。有人传4月22日李鹏以答应见面为政治骗术，稳住学生，调走耀邦灵车，使学生既没有见到总理，又没有看上耀邦最后一眼；有人传政府用假耀邦遗容哄骗学生；有人传学生跪递交请愿书，而政府没人接，是“政府看热闹权倾国会，学生跪请愿泪洒长街”。

第六，有人恶毒谩骂邓小平和李鹏同志。有一张大字报骂邓小平是中国的太上皇，是政治上的两面派。有人以女大学生名义骂李鹏同志“不是男人”、是“智商才相当5岁儿童的乖乖”，还有人把李鹏同志照片画上黑框框。

第七，一些学生开始走向社会进行政治宣传和开展募捐活动。北师大学生在北太平庄等地街头张贴大字报、讲演和进行募捐，主要是想争取市民的理解和支持。确有一些过路人捐款，也有不少人在向学生询问有关情况。据反映，已有学生到建筑工地鼓动工人参加他们的活动，但没有成功。政法大学的大字报提出了开展宣传的口号：（1）耀邦下台谁之过；（2）政治公开；（3）惩办贪官污吏；（4）废除特权；（5）政治平等；（6）废除终身制；（7）废除世袭制；（8）官倒曝光；（9）注重人权；（10）反对通货膨胀；（11）人民军警爱人民；（12）依法治国、教育救国。

从以上7个方面的政治趋向看，这次学潮、动乱似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主要标志是：由上街游行转向集中罢课；由学生活动转向教师参加；由校内呼吁转向对社会宣传。尤

12条有过分？在今天仍有其价值。



其引人注目的是，全市性非法组织“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粉墨登场，并成为动乱和后来的反革命暴乱的直接组织者。

## 二、“高自联”一瞥

“高自联”是在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怂恿支持下，仿照波兰团结工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

胡耀邦同志去世不久，4月17日、18日，以“北大、人大、清华部分教师”名义写的《告同胞书》及署名南开大学的《告全国青年学生书》就明确提出：学生的行动必须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要成立学生自治会，全国成立学生自治联合体，无组织的行动将会一事无成。国家体改委的一名干部对

“主要搞臭团委、学生会，这样政府就没帮手了”。“为了不使学生运动流产，当务之急是帮助学生把联合组织彻底建立起来。这是这次学生运动的根本性转折，是关系中国未来的根本性措施”。“在共产党体制下建立第一个自发的学生联合组织将对整个中国政局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全国各地要在五四期间折腾起来，一下子就是百万大军。”4月19日，在北大民主沙龙上有人传达了金观涛提出的3点建议：一、当前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二、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应该首先联合起来。三、必须成立组织，采取非暴力和平请愿行动。他认为学生这种无组织的力量应组织起来去动荡和摧毁中共这一组织的存在。4月22、23日，还有一名自称美国记者的人，找到北大清华的学生头头说，他已经与美国国内联系了，“美国是支持中国大学生行动的，建议你们立即成立组织，成立了组织将会使你们的政府更头痛，成立组织非常重要。美国可以支持你们。”4月22日，反动组织“中

国民联  
发出《致  
来的组  
4月  
立“北大  
主运动。  
个结论  
的组织  
丹、杨  
日，由  
高校学  
会”，领  
成立“全  
400多人  
即“北  
第一任  
院学生  
待会，  
“临时当  
“高  
过“高自  
干的还  
领就是  
5月17日  
民主战  
政治目



“国民联”分子胡平、陈军、刘晓波等10人，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提出要“巩固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力求以一个坚强的整体进行有效的活动。”

4月19日晚，王丹在主持第16次民主沙龙会上，宣布成立“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委会”，来领导全市以至全国的学生民主运动。王丹称这是从历次学生运动流产的教训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没有一个有组织的、由各高校和各阶层民主人士联合的组织，是没有力量的。会上宣布筹委会常委由丁小平、王丹、杨涛、杨丹涛、熊焱、封从德、常劲等7人组成。4月20日，由丁小平召集各高校300余名学生开会，酝酿成立“北京高校学生联合会”。4月21日，在北大成立“临时行动委员会”，领导21、22日的游行及静坐请愿活动，并呼吁五四前成立“全国团结学生会”。4月23日，在圆明园，29所院校的400多人开会，讨论并成立了“北京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即“北京高校临时学联”，选举北京政法大学学生周勇军为第一任主席，常委有王丹、吾尔开希、马少芳（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等7人。4月26日上午，周勇军等人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成立“临时学联”并公布了其纲领。4月28日，“临时学联”定名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

“高自联”由于内部争权夺利等原因，经常改选，以后当过“高自联”主席的有吾尔开希等人，当过“高自联”常委和骨干的还有刘刚、郭海峰、柴玲等20人左右。“高自联”的政治纲领就是要在中 国建立西方化的政治体制，即资产阶级共和国。5月17日，王丹在美国《世界导报》发表了题为《中国，学生为民主战斗到底》的文章，说：“我们无意放弃这场学生运动的政治目的，在于向政府施加压力，以推进民主进程。我们也

不希望隐瞒我们的政治观点与政府的不同。我们公开宣布：我们提倡充分的言论、结社和新闻自由，最终要建立西方化的政治体制，清除陈旧的政治思想。”5月16日，吾尔开希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讲：“政府是一个由坏蛋和腐败分子组成的帮。党和政府是一回事，要反对政府就必定要反党。”4月下旬全面动乱升级后，“高自联”的具体政治要求是3条：一是迫使政府接受以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为突破口的7条要求，二是必须承认“高自联”合法，三是必须承认这次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

“高自联”的头头在这场动乱中扮演了主要策动者、领导者、组织者的角色。这伙人中有同国内外敌对势力有着密切来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严重者，有品学兼劣、求学无望、企图造反起家者，有头脑简单、思想偏激者。北大历史系一年级学生王丹，无心求学，一心从“政”。他在4月16日日记中写道：“现在气氛不错，大有去年6月2日之势。如果发展下去，有可能与五四相联，再次酿成一场学生运动。”

“我打算挟‘民主沙龙’之号召力，有所作为”。在1988年9月14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我算是与方励之彻底摺在一起了”。“我现在成了校内黄花校外香，国内黄花国外香”。“我作为北大学潮的学生领袖的身份，更是无可质疑了”。他要当中国的一代伟人。在方励之夫妇策划下，王丹一年内主办了17次“民主沙龙”，传播大量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从美国赶回国内参加动乱的刘晓波对王丹说：希望你和吾尔开希成为中国的瓦文萨，让王丹注意保持“一个好形象”，并说“民主运动要有民间的代言人、民间的发言人，你们现在的名声比方励之还要大。”4月17日，王丹最早策动北大1000多人上街游

行。4月18日，他在  
又成为北京  
北师大第  
上大学后第  
学，42分；  
70分；法  
倒卖商品  
校学生会  
才低劣的  
内外敌对  
4月21日，  
会、研究  
4月23日，  
主席。

此外  
女生未遂  
组长、清  
不及格，  
些人，居  
者评论北  
的领袖了  
三、  
胡耀  
市的许多  
紫阳同志



行。4月18日，他第一个抛出带有政治纲领性的7条要求。4月19日，他在北京大学率先成立团结学生会筹备会，5天后他又成为北京临时学联的头头。

北师大教育系一年级学生吾尔开希，21岁，共青团员。上大学后第一学期成绩单：数学，47分；英语，57分；生物学，42分；军事理论，80分；普通心理学，67分；中共党史，70分；法学概论，合格；体育，缺考。1988年以来，他非法倒卖商品赔了数千元。1989年3月，吾尔开希自荐竞选系、校学生会主席，因品学兼劣，被取消竞选资格。这样一个德才低劣的学生，却在动乱中一跃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哄抬下，他一夜之间身价倍增。在动乱期间，4月21日，他以“主席吾尔开希”名义发出通告：废除现行学生会、研究生会的一切权利，宣布全校罢课，停止一切考试。4月23日，他成为“临时学联”常委；4月28日，成为“高自联”主席。

此外，“高自联”常委、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邱军，因强奸女生未遂，受到留校察看处分。“高自联”骨干、特别联络组组长、清华大学学生熊炜，因学业太差，3年累计8门功课不及格，被取消本科生资格，等等。可悲的是，就是这样一些人，居然成为一些学生心目中的“英雄”。正如国外一位学者评论北京动乱时所说：“悲剧中的悲剧，是学生太相信他们的领袖了。”

### 三、旗帜鲜明的表态

胡耀邦同志逝世后，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央和北京市的许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曾多次向赵紫阳同志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便迅速制止



事态的发展。但赵紫阳同志只强调克制，只强调对话，始终回避对事情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4月22日追悼会结束后，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议他在4月23日出访朝鲜之前，召开一次会议研究一下首都局势，而赵紫阳同志不仅拒不接受，反而若无其事地去打高尔夫球了。由于赵紫阳同志的这种态度，使党和政府丧失了制止动乱的时机。

4月24日下午，万里同志听取了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领导同志的汇报。在他的建议下，当晚由李鹏同志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会议一致认为，当前的种种迹象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同时要求北京市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放手发动群众，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力争尽快平息动乱，稳定局势。4月25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完全赞同和支持中央常委的决定，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并对动乱性质作了深刻分析。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人民日报》于4月26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这篇社论在4月25日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提前播出。社论指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社论要求“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

乱而斗争！  
由于  
织者和策  
的大转弯  
是明目张  
原则的；  
出了“新  
的旗帜下  
党”、“拥  
岁”、“科  
取消了。  
的授意下  
裁统治”  
群众易于  
《学运问  
方式向理  
立真正的  
全国各  
动”。“  
援，促  
未改变  
发出一  
谓“赵紫  
年轻官  
加游行  
意，并



乱而斗争！”

由于《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旗帜鲜明，迫使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在策略上作了改变，在手法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在社论发表前，大量的大小字报、标语、口号是明目张胆地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社论发表后，非法组织北京“高自联”在4月26日发出了“新学联一号令”，要求各高校于4月27日“在拥护共产党的旗帜下游行到天安门”，规定的游行口号中包括“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坚持改革”、“民主万岁”、“科学万岁”、“人民万岁”等。攻击谩骂性的口号都被取消了。这是一场改变斗争策略的“一号令”。他们在方励之的授意下，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的颠覆性口号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等群众易于接受、赞同的口号。可是，在27日游行队伍散发的《学运问答录》中，他们则提出“学运的目的”“是以非暴力的方式向现行政府施加压力，促进政府体制改革，从而达到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府的目的”。“学运的近期目标”，“一是成立全国各学校学生联合自治会，领导和协调全国学生民主运动”。“二是通过罢课、舆论宣传等形式，争取社会各界的声援，促使政府就‘7条’与同学公开对话”。可见他们的纲领并未改变，只是策略手法变换而已。当时，日本时事社从北京发出一则报道，题为《年轻官员结成支持民主化集团》，把所谓“赵紫阳智囊团”里的一些人物称之为“中共中央和政府的年轻官员”，说他们“频繁地接触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参加游行的北京市内的各大学的新自治会代表，给学生们出主意，并提到在4月27日的大游行当中，学生们举着‘拥护社

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等标语，这也是遵照了这个集团的指示。”

《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的发表，使绝大多数干部感到心里有了底，行动有了方向，感到可以旗帜鲜明地开展工作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接连召开党内外各种会议统一认识；运用各种形式澄清谣言，安定人心；支持学校领导、党团员和学生骨干大胆工作，对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进行劝阻和疏导；积极开展各种对话活动，努力争取群众。

4月29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和国家教委、北京市一些负责同志同学生进行对话。4月30日，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同志也同市属学校学生进行对话。这些对话在当时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又认真做好工厂、农村、商店、中小学和街道的工作，稳住大局，防止动乱向社会蔓延。各省、市、自治区也按照社论精神，抓紧做好本地区的工作，防止北京事态的影响向外地扩散。

4月23日宣布罢课以后，北京“高自联”的头头们原来打算要“百日游行，无限期罢课”，而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这个劲头没有了。5月4日北京56所高校约2万名学生上街游行，游行气氛比4月27日明显缓和，围观的群众也大为减少。游行队伍到达天安门广场后，游行组织者发表了宣布游行告一段落的宣言。五四以后，经过各高校党政领导做工作，多数学生愿意复课，恢复正常教学秩序；愿意同政府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到5月5日，已有80%的学生复课了。

全国各地在《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发表后，局势也迅

速趋向平稳  
念活动制造  
《人民日报》  
全国的作用

一、中  
五四前  
秩序；愿意  
极少数人第  
书记的赵紫  
本来，  
政治局常委  
电通报于作  
完全同意常  
策。赵紫  
常委会上这  
论对动乱自  
仅过2天，  
社论有错  
受到其他  
在纪念五四  
自由化。  
5月4  
志的同意，  
通同政治



速趋向平稳。显然，再做一些工作，这场由极少数人利用悼念活动制造的动乱就有可能得到制止。这许多事实充分说明，《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是正确的，起到了稳定首都、安定全国的作用。

#### 第四节 动乱升级

##### 一、中央的两种声音

五四前后，北京高校绝大多数学生愿意复课，恢复正常秩序；愿意同政府对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极少数人策划的动乱接近平息。正在这个时候，作为党的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采取了出尔反尔的态度。

本来，在赵紫阳同志出访朝鲜期间，中央曾将4月24日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和4月25日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发专电通报于他，并征求他的意见，而他也曾发回电报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常委的决定和邓小平同志对当前动乱所做出的决策。赵紫阳同志在4月30日回国之后，在5月1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还明确表示，同意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和4月26日社论对动乱的定性，认为前一阶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仅过2天，在5月3日他突然改变了态度，指责《人民日报》社论有错误，提出要加以纠正。他的这一错误主张理所当然受到其他常委的抵制和反对。他还不接受政治局常委的意见，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缄口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5月4日下午，赵紫阳同志事先没有征得政治局任何同志的同意，在接见亚洲开发银行会议部分代表时，发表了一通同政治局会议、邓小平同志讲话和4月26日社论完全对立

没有说服力

的意见。这主要是：第一，在已经明显出现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第二，在大量事实证明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经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利用学潮策动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

己抄 1997

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是鲍彤事先为他起草好的。鲍彤还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当天下午就立即广播，并且要连播3天；又要求《人民日报》次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同时要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映。第二天，《人民日报》及某些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用大号字登载了这一讲话，刊发了《首都高校师生欢迎赵紫阳讲话》的消息，并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70周年》的标题下，从正面报道了北京“高自联”组织学生游行的情况。5月6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刊登《首都高校昨日起陆续复课，赵紫阳讲话引起积极反响》的报道，有意将学生的复课与赵紫阳的讲话联系在一起。

赵紫阳同志的讲话同中央的方针截然不同，这一点不仅在国内引起广泛议论，连国外的舆论都看得清清楚楚。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中说，赵紫阳的讲话“与一周前对学生们的严厉谴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是对“上周的评判的一大修改”。法国《世界报》5月6日也载文指出，“这位党的首脑（指赵紫阳）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势的发展变得对他有利了”。

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经过报纸的大肆渲染，在广大

干部、群众中  
和群众中的骨  
工作上感到无  
京市委有关部  
央明确方针，  
了两种声音，  
央保持一致，  
感到“被出  
北京市委、  
一致，对下  
当时，有许  
赵紫阳同志  
强烈要求下  
月4日讲话  
“我讲错了  
线工作的同  
了？只有“  
政府和各高  
看着事态起  
同上文  
策划者是  
重新活跃  
公司发展  
动知识界  
成员在北  
讲话有诚



政治局的斗争

干部、群众中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各级领导干部、党团员和群众中的骨干，尤其是高校的同志，思想上感到迷惑不解，工作上感到无所适从。不少高校的党政干部纷纷打电话给北京市委有关部门，询问赵紫阳同志的讲话为什么变调，希望中央明确方针，共同做好稳定高校局势的工作。有的说：“中央出了两种声音，谁对谁错，以谁为准？”有的说：“要我们同中央保持一致，同哪个中央保持一致？”学校干部和学生骨干普遍感到“被出卖了”，心情十分沉重，学校工作完全陷于被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处境非常困难，明知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对下还要违心地说是一致的，只不过是“侧重点不同”。当时，有许多事情需要及时向中央请示，可是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迟迟不召开会议。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强烈要求下，5月8日，勉强开了一次会。当有的同志反映5月4日讲话与4月26日社论精神不一样时，赵紫阳同志说：“我讲错了我负责任”。在另一次会议上，有同志反映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都说“被出卖了”，他又责问：“谁把你们出卖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有人被出卖”。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和各高校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感到压力十分大。大家眼看着事态越来越恶化，有些措施想实行也实行不了。

同上述情况相反，赵紫阳同志的讲话对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是个兴奋剂。极少数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看到有机可乘，重新活跃起来，遂使局势骤然逆转。严家其、曹思源（四通公司发展研究所所长）等人说：“现在出现了转机，要发动知识界支持赵紫阳”。5月6日下午2时，“高自联”部分成员在北师大开会，认为现在政府没有诚意，赵紫阳同志的讲话有诚意，要利用这一时机再次罢课。当晚，北大和北师



大“自治会”的头头宣布联合罢课，并号召全市高校重新罢课。5月8日上午，北大三角地贴出题为《北大筹委会关于复课的条件》的大字报，声称复课的主要条件是：“公开纠正‘4·26’社论，对这次学生运动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承认学生自治会的合法性”等。当晚，北大、北师大都发生二三百学生要求继续罢课的集会或游行。5月9日，北师大贴出署名“一小撮良心未死的中国人”写的《目前形势和任务》的大字报，鼓动继续罢课、组织宣传队上街、印制传单散发到北京市民手中乃至全国各地，企图进一步扩大事端。5月10日晚，一些人来到人民大学，向千余名学生发表演讲，煽动学生同党和政府的对立情绪。有的说：“从1989年4月27日开始，我们国家统治了中国人上千年之久的权威统治从此就要结束了。”有的说：“我们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挤压，使我们不可能得到一张安静的书桌。”还有的攻击说：“《人民日报》那篇社论和它背后依据的那种理论将永久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说袁木同志的对话充满矛盾，“是给我们民族丢脸”。这些人的讲演，在人大学生和青年教师中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一度平静的校园再度动荡起来。与此同时，北京许多高校纷纷传抄王若望4月25日写的《致邓小平公开信》，公开信攻击邓小平同志“倒行逆施”，镇压“民主运动”，信的最后用刻薄的语言写道：“现在你老是走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功臣乎？暴君乎？望乞三思而行，不可一误再误了。”这封公开信在学生中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 二、舆论界怎么了？

赵紫阳同志5月4日讲话后，一度平稳的局势又重新紧张起来。5月6日，赵紫阳同志对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和思想工作



的胡启立、芮杏文同志说：“对学潮的新闻放开一点，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这次运动不能归结为一小撮人挑动，不能归结为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不能归结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他还说：“不能违背潮流”，“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他的这番指示，当天就传达到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首都主要新闻单位。随后，经有关部门多次部署，传达范围更加扩大。赵紫阳同志的这个讲话，使舆论界迅速出现了支持动乱的错误导向。

其实，还在学潮初起时，新闻舆论界已出现倾斜。譬如4月21日，首都某大报发表题为《重要的是赢得民心》的署名文章，将矛头指向邓小平同志。文章说：“因为他曾为人民做过一点事，人民拥护他，于是就飘飘然了，眼里不再有人民，用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奸民意，居高临下，对人民发号施令起来，不是想着怎样为人民服务，而是琢磨着怎样对付人民，这是很可怕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他迟早会失人心的。”“如果背离了人民的意愿，即使他自我感觉是多么良好，终究会因不得人心而遗臭万年。”这张报纸在街头广为张贴。又如，4月22日《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拒不服从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擅自将刊有4月19日悼念胡耀邦同志座谈会内容的439期报纸提前付印和发行。4月26日，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常委会，鉴于钦本立严重违反纪律的错误，决定停止他的总编辑、党组成员职务，并对《世界经济导报》进行整顿。对中共上海市委的正确决定，赵紫阳同志不仅不支持，反而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严家其、包遵信等联合起草了给中共上海市委的公开信：《捍卫



新闻自由》。5月4日，北京200多新闻工作者到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并不断呼喊“有嘴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有笔不能写自己想写的新闻”、“首都新闻界要求洗刷耻辱”、“强烈要求恢复钦本立职务”等口号。

赵紫阳同志5月6日讲话传达后，新闻界更加混乱，舆论更加倾斜。

5月9日下午，近2000名新闻工作者前往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递交了一份由首都30多家新闻单位1013人签名的信件，要求“就中国新闻界近期发生的事情，与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进行一次对话”，以期将中国的新闻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北大、北师大等校近千名学生聚集在记协门口，声援递交联名信的记者。次日下午，又有北大、人大、清华、北师大、政法大学等10多所院校近万名学生骑着自行车，打着“声援首都新闻工作者”等横幅标语上街游行，先后抵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表示声援，致使北京主要路口的交通一度中断。在动乱重新走向高潮的关键时刻，胡启立同志等于5月11日至13日分别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国青年报》社等单位同新闻工作者对话，他说“新闻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此后，除少数几家新闻单位外，首都主要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的舆论导向进一步倾斜，对游行、示威等活动采取了充分肯定、积极支持的态度。

在北京的影响和舆论的错误导向下，外地已经平稳的局势又重新紧张起来。5月9日上午，西北师大、兰州铁路学院等校近千名学生打着“取消新闻封锁”等横幅上街游行。5

月9日，  
大学出现“  
高校罢课。  
上街游行，  
行的国际  
术节会场  
津，5月10  
《和平民主  
为了把本  
‘和平民主  
华东师大  
招待会，宣  
要求恢复  
在北  
乔夫5月  
三、“  
4月2  
生的座谈  
北京市委、  
的主要负责  
话。党和  
话，来沟通  
决问题。但  
应，在极  
设置了层层  
首先，



场游  
不能  
烈要  
舆论  
用工  
名的  
管宣  
改革  
在记  
人  
倚着  
行，  
示声  
向高  
新华  
工作  
组成  
家新  
赴一  
寺的  
的局  
路学  
行。5

月9日，山西大学等校近2000名学生上街游行。10日山西大学出现“学生联合自治会”的紧急通告，宣布即日在太原各高校罢课。5月10日、11日连续两天，太原数千名大学生上街游行，发生了冲击省委、省人民政府，冲击当时正在举行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and 民间艺术节会场的严重事件，在国内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天津，5月10日晨，市“高自联”和南开大学学生自治会联名贴出《和平民主进京》的大字报，声称“学生运动正处在关键时刻”，为了把本次学生民主爱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决定组织‘和平民主请愿团’骑车进京”。5月11日，上海复旦、同济、华东师大等校少数人组成的“决策组”，在复旦大学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组织“请愿团”，以上海“高自联”名义赴京请愿，要求恢复《世界经济导报》钦本立的职务。

在北京，极少数人正策划着利用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5月15日访华之机发起一次使事态更为恶化的行动。

### 三、“5·13”大绝食

4月29日，袁木、何东昌等同志代表党和政府同部分学生的座谈对话，在广大群众和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之后，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以及农业部、机电部、司法部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也先后同所属院校的学生进行了认真的座谈对话。党和政府希望继续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对话，来沟通思想，增进理解，通过民主与法制的正常程序解决问题。但是，党和政府的这种愿望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在极少数人的策动下，非法组织“高自联”的头头为对话设置了层层障碍。

首先，他们到处散布“政府没有对话诚意”的谎言，试图

完全否定4月29日的对话。他们说，4月29日对话的同学中没有“高自联”的人，那天的对话是经过事先排演的等等。事实是，尽管政府认为“高自联”是非法组织，但其成员包括头头作为学生仍然可以参加座谈对话。吾尔开希就接到了参加对话的邀请，但他根本没有和政府对话的诚意，而是携带了一份“宣布不承认这次对话会”的书面声明来到对话地点。当市学联工作人员批评了他的这一做法后，他又拒绝出席对话会，并向等在门口的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谎称政府不让他参加对话，煽起在场学生对政府的不满情绪。4月29日对话后，“高自联”又发表声明，散布“这次会议没有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带有欺骗的痕迹，不能代表学生的共同愿望”等谎言，宣布“不予承认”这次对话。5月1日，北大“自治会筹委会”召开有一两千人参加的“新闻发布会”，声称不承认4月29日对话会，继续对政府施加压力。

接着，在极少数人的策划下，“高自联”成立了所谓对话代表团，并提出相当苛刻、毫无商量余地、最后通牒式的对话条件，迫使党和政府接受。5月2日，清华大学贴出题为《走向谈判桌》的大字报，声称“我们现在应该走向谈判桌，而不是对话桌”，“谈判的前提条件是：‘高自联’是唯一能代表广大学生的组织，必须由联合会出面与政府谈判”；政府必须“由不低于政治局委员的人员出面率领代表团”参加“预备性谈判”，“由总书记、总理或不低于政治局常委、副总理的人员出面组成代表团”参加“实质性谈判”。这一情况表明，他们俨然要以反对党的架势同政府进行谈判。同日下午，在“高自联”组织下，70余名学生以北京40多所院校学生代表的名义，向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递交了咄咄逼人的对话



同学中  
等。事  
包括  
了参加  
了一  
当市  
话会，  
参加  
对话  
的基  
望”等  
治会  
承认  
对话  
的题  
为桌，  
代表  
政府  
预备  
的人  
他们  
高的  
自名  
对话

“请愿书”，单方面提出了12项前提条件，主要有：学生代表“由  
市高联出面联络组织”，绝不同意由各高校合法的学生会、  
研究生会指派学生代表；“政府方面出席对话的人员，应为  
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级别以上人  
员”；“对话过程中必须允许中外记者现场采访报道，同时中央  
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现场直播全部对话过程”；“对话  
双方必须对对话结果出具联合公告，并经双方共同签字证明”  
等。这哪里是什么对话，完全是摆出一副要和党和政府进行  
政治交易的架势，党和政府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要求。

为什么？  
是政府？  
还是？

5月6日下午，政法大学等4名学生向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信访局递交了一份以24所高校学生名义写的对  
话“请愿书”；之后，又有一些首都高校的学生通过各种渠道提  
出对话要求。5月8日，中办、国办信访局负责人对送交“请  
愿书”的学生作了答复，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将同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教师、党外人士接触并进行  
广泛的对话，并将继续请学校的学生会和学联收集广大学生  
的意见，搞好对话。5月11日，又有几名学生询问对话  
的具体安排，信访局负责人也做了答复。12日，递交“请  
愿书”的学生向信访局送了他们拟参加对话的学生名单。中共  
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与北京市有关方面就对话问题作了进  
一步研究，当晚即与递交“请愿书”的学生进行联系，并商谈  
了对话的有关事宜。13日凌晨2时，“高自联”头头进一步提  
出了对话的要求；凌晨4时，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答  
复同意。但天明之后，“高自联”又自食其言，取消了这次对话。  
当天上午，中办、国办和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再次通知  
他们，决定于15日同学生们进行对话。对此，“高自联”一方面

表示同意，一方面又在参加人数上大作文章，先是提出了一个 20 人的名单，政府同意后，又要求增加至 200 人，但还没经充分商量，他们就指责“政府对对话毫无诚意”，在接到对话通知仅 4 小时后，就抛出早已准备好的《绝食宣言》，发动了一场历时 7 天、前后有 3000 多人参加的大绝食。

5 月 13 日开始的绝食行动是早有准备的。在党和政府同学生代表保持经常联系、促进对话顺利进行的同时，极少数人就以“政府无诚意”的谎言，以极其卑劣的手段，煽动不明真相的学生参加绝食，以扩大事态。李淑娴授意王丹等人说，只要救护车一响，政府就得投降。5 月 11 日下午，北大三角地贴出署名为“46 楼部分研究生”的《紧急建议》，称“鉴于目前严峻形势，我们建议破釜沉舟，采取以下紧急措施：（1）集体绝食；（2）竭尽北京高校之全力于戈氏访华之日，游行进驻天安门，作最后拼搏。”5 月 13 日上午 8 时，北大又贴出署名“首都高校自愿绝食者”的《绝食宣言》，提出“绝食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真诚平等的对话。第二，要求政府对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并给以公开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绝食地点：天安门广场”。同日上午，北师大贴出《首都高校学生组成绝食团》的传单，声称“学生表示：倘绝食无效，将采取新行动”，即“在苏共领导人戈氏访华（5 月 15 日）之际再度表示抗议和民主行动”。

上述情况表明，绝食策划者和组织者的用心是十分险恶的：一是通过绝食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胁迫党和政府答应他们的政治要求，即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承认“高自联”为合法组织，承认这场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二是破



坏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正如“高自联”头头王丹所说：选在13日开始绝食，“正好可以借戈氏访华压他们”。

5月13日下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10余所院校数百名绝食学生在2000多学生的簇拥下进入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请愿。

#### 四、真假关心

首都高校部分学生绝食的第二天，即有十几名学生因体力不支而晕倒。绝食学生的生命牵动了整个社会，并由此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关心。

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打着关心学生的幌子，给动乱火上浇油，扩大事态，妄图坐收渔翁之利。5月13日晚，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在北大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煽动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14日，苏晓康等12人发出《我们对局势的紧急呼吁》，声称学生的罢课和绝食请愿“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要政府宣布这次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反对以任何形式”对学生“秋后算帐”；扬言如果政府不能答应这些要求，他们“将和同学们一道”“坚定不移地奋斗下去”。这个呼吁在当天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并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这些人还多次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煽风点火。14日下午，苏晓康等12人到广场，再次表示“如果政府不答应条件，他们将和同学们一起行动”。他们说：“全世界所有的报纸、电视台和通讯社都来采访我们，可是中国的就没有采访过一次”，“直到今天，最高级领导人还没有露面”。他们声称学生“比政府、比官员、比文化精英聪明得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15



日，严家其、包遵信等到广场发表演讲，诬蔑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无能的政府”，呼喊“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站起来了！”“愿和同学们一起渡过困难时期”。16日，这些人又聚集在北大三角地，召开所谓“中国知识界新闻发布会”，组织非法的“中国知识界联合会”。会上宣读了由严家其、包遵信等210多人签字的《5·16声明》，称“把这次学生运动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是错误的”，政府如果不接受绝食同学的政治要求，“将极可能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引向真正动乱的深渊”。

由于几家中央报刊对学生绝食和各界声援活动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也由于各届人士出于种种考虑展开了声援活动，加之“高自联”头头破坏了广场的播音设备，自己架设广播站，夜以继日地散布诸如“北京市工人已经总罢工”之类的谣言，这就使绝食学生的情绪总处于亢奋状态，沉迷于谎言之中，在广场苦苦支撑着。不少绝食学生骑虎难下，欲罢不能，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极少数人把绝食学生当“人质”，以学生的生命为赌注，要挟党和政府接受他们的政治要求。

在学生绝食过程中，党和政府继续保持了极其克制的态度，并怀着十分焦虑的心情，竭尽全力，在各方面做了大量力所能及的工作。

学校工作人员、各级领导干部直至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对他们进行耐心的思想疏导。绝食第二天，即5月14日凌晨2时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其他领导同志就到广场看望绝食同学，

劝说也  
进行了单独  
没有解决问  
记处书记  
责人在政  
等同志强  
以人们的  
动。5月16  
向聚集在  
高级会晤  
局为重，  
尽快回到  
5月18  
在人民大  
食人员解  
感不安”，  
的同学安  
的发展不  
转移。事  
希望同学  
在场的“高  
说什么对  
府。  
政府  
生的工作  
急救中心



劝说他们回校。14日下午，政府方面做出让步，与“高自联”进行了单独对话，但因“高自联”毫无诚意，对话陷于僵局，没有解决问题。15日上午8时半，李铁映同志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同志以及中央、国务院、北京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在政协礼堂再次与首都高校部分学生座谈对话。李铁映等同志强调：“目前整个事态还在进一步发展，有些事情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反复劝说同学们不要搞绝食请愿活动。5月16日凌晨1时，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负责人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发表广播讲话，指出，当前中苏高级会晤已经开始，这是举世瞩目的大事，希望同学们以大局为重，不要做有损于国家尊严和利益的事情，希望同学们尽快回到学校。但是，党和政府的这些努力都未能奏效。

5月18日上午11时至12时，国务院总理李鹏等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绝食学生代表。李鹏同志说：“如何使绝食人员解除目前的困境，党和政府对这件事很关心，也为此深感不安”，“建议由中国和北京市的红十字会负责把参加绝食的同学安全地送到各个医院去”。李鹏同志再次强调：“事态的发展不以你们的善良的愿望、良好的想象和爱国的情热为转移。事实上现在北京已出现秩序混乱，并且波及到全国”，希望同学们“尽快结束绝食，尽快到医院去接受治疗”。但是，在场的“高自联”头头王丹、吾尔开希几次打断他的讲话，并说什么对动乱的出现“应由政府负全责”，继续以绝食要挟政府。

政府要求红十字会进行救护、医治因绝食休克或致病学生的的工作。绝食当晚9时，北京市人民政府即派红十字会和市急救中心的两辆救护车进入广场附近，为绝食学生准备了食



盐、白糖和开水。医护人员到广场给学生送水送药，进行巡诊、治疗、接送病号等救护工作。在整个绝食过程中，先后有3500多人次晕倒或病倒。在市政府的协助下，红十字会和各有关方面先后调配了100多辆救护车，抽调了数百名医护人员，昼夜守护在绝食现场，并动员52家医院腾出近2000张病床，保证因绝食休克或致病的学生及时得到救护治疗。由于广场卫生状况日益恶化，为了预防随时可能发生的传染病大流行，市卫生防疫站工作人员在绝食现场及时喷洒消毒液。但是，“高自联”头头却别有用心，置绝食学生的身体健康于不顾，故意拖延对绝食学生的救护，企图扩大事态，搞政治讹诈。

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抽调干部、工人和车辆，通过红十字会，昼夜不停地为绝食学生运送饮用水，提供食糖、食盐；环卫局抽调了洒水车，配备了脸盆、毛巾，供绝食学生洗漱；医药公司调来充足的防中暑、防感冒、防腹泻药剂，交由红十字会分发；食品部门运来大量饮料、面包等，以备紧急抢救学生时用；商业部门调运了6000顶草帽，供学生白天避暑；北京军区应北京市要求送来1000条棉被，供学生夜晚御寒；为保证绝食现场的卫生，环卫工人及时搭起了临时冲洗厕所，还昼夜进行绝食现场的大清扫；18日大雨前，市政府又从公共交通公司抽调78辆大客车，从物资局调来400多块厚木板，供绝食学生避雨、隔潮。

所有这些，充分说明党和政府自始至终对绝食学生采取了十分关怀、爱护和负责的态度。在长达7天的绝食期间，没有发生一起学生因绝食而死亡的事件。

##### 五、黑云压城



行退  
后和  
会护  
张由  
病毒  
健搞  
过食  
生，  
备天  
御洗  
府块  
取

在事态急剧恶化的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于5月16日晚召开紧急会议。常委中的多数同志认为，面对险恶的形势，绝对不能退让，只能更加坚定地反对动乱、制止动乱；如果从“4·26”社论的立场上后退，承认这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必然要进一步强迫党和政府承认他们提出的一切错误的乃至反动的政治纲领，承认一切非法组织，进而在中国搞反对派、反对党，最终迫使共产党下台，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这是他们制造动乱的真正目的；不达此目的，他们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显然，这不是退让不退让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在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上，赵紫阳同志不听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仍然坚持退让政策。

——当天下午，赵紫阳同志利用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有意识地<sup>太！</sup>把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他在会见一开始就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第一次”公开透露中国党的这个“决定”。赵紫阳同志的这个讲话，在中央电视台反复播出，“晚间新闻”节目还采用“定格”的手法，<sup>赵的命</sup>将赵紫阳同志的画面固定在<sup>运自此</sup>屏幕上，达七八分钟之久。<sup>胡元</sup>

第二天，严家其、包遵信等人即发表极其猖狂、恶毒的《5·17宣言》。他们咒骂说：“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经死亡76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他们毫不掩饰地说：“昨日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sup>升！</sup>



“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港台的一些报刊也遥相呼应。香港的《快报》5月18日发表《倒邓倒李不倒赵》的文章，说什么“赵紫阳的讲话充满暗示，现时国内的乌烟瘴气，全因邓小平掌舵而起”，“现今群情汹涌要倒邓倒李，而赵紫阳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还说，“倘若倒邓成功，而中国的改革确能走上开明法制之途和实现民主，对香港来说，是一则喜讯”。在这一派呼啸声中，16日以后，咒骂邓小平同志、攻击李鹏同志的标语、口号、大字报铺天盖地。有人呼喊“邓小平滚下台”，有的叫嚷“不要太上皇”，“反对寡头政治，结束老人政治”。5月17日，北大三角地贴出未署名的《致邓小平同志的公开信》，征集签名，要求邓小平同志“公开承认4月25日讲话和人民日报社论是重大失误，以缓和当前危机”，当天就有近百人签名。清华大学贴出署名“经四班部分学生”、题为《他的声音颤抖，我们的灵魂颤抖》的大字报，攻击邓小平同志是“垂暮老人”，“凌驾于4千万党员之上”，胡说“我们推翻了‘两个凡是’，又遵（尊）起了新的‘两个凡是’”，“又售起了用邓小平讲话去开创现代化的童话”。有的人攻击政府是“流氓政府，无耻下流”，提出“李鹏下台，谢国安民”。有的呼喊“中国的瓦文萨你在哪里”。与此同时，“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的标语、口号出现于游行队伍中和天安门广场上。

事态的发展越来越严重。动乱的策划者正企图借混乱之机，乱中夺权。当时，非法组织“高自联”的头头完全控制了天安门广场，使之成为绝食请愿、游行示威的指挥中心。国务院有的部门中的一些人要求部长下台。北京市的一些新闻工作者散发传单，要求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向人民交待‘请



战‘真相’，诬蔑市委、市政府“对当前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一些人散发传单，宣称成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以取代市人民代表大会，鼓吹成立“北京区政府”，取代合法的北京市人民政府。

这期间，各种政治谣言满天飞。有的造谣说：“邓小平已下台”！“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于是就有人抬着棺材游行，烧毁邓小平同志的模拟像，并在天安门广场燃放鞭炮庆祝他们的“胜利”。5月17日，北京农业大学贴出两张无署名的《公告》，其中“一号公告”以极其恶毒的语言写道：“中国最大的独裁者因心脏病发作，于今晚6时在天安门广场逝世，享年85岁。他的死将给我们带来民主自由的中国”。极少数人还根据斗争策略的需要，以颠覆现政权为目的，把矛头对准李鹏总理。5月18日，北大三角地贴出未署名的《李鹏歌》，叫嚣“李鹏李鹏，不倒不行”，“再当总理，人民揍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首都局势越来越严重。一时间，似乎谁不参加游行谁就不爱国，谁不表示声援谁就是不关心学生死活。5月15日下午，严家其等人发动知识界大游行后，上街游行的人越来越多，声势一天比一天大，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几十万。参加游行的不仅是大学生，还有部分教师、科研人员、机关干部、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工作人员、工人和农民，甚至连中小学生和幼儿园的孩子也加入了游行队伍。据不完全统计，5月15日至19日，北京地区有人参加游行的单位有58所高等院校、31所中专和技校、130多所中小学、70多家新闻出版单位、50多家科研单位、60多家国家和北京市机关单位、10多个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200多家工矿企业。从外地来京

也说明什么？群众运动的高潮——259



声援的有各地85所高校数十万学生，还有四川工人声援团、蛇口人声援团等。“高自联”还组织学生到工厂煽动工人罢工。17日晚，北大、人大等校一些学生前往首都钢铁公司家属宿舍区，呼喊“请首钢工人声援我们”的口号。19日清晨，天安门广场出现署名“北京市工人自治会筹委会”、题为《首都工人宣言》的传单，声称“中共中央、国务院必须在24小时内无条件接受绝食学生的两条要求，否则从5月20日上午12时开始，全市工人将总罢工24小时，并根据事态的发展，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工自联”的成立和“总罢工”的煽动，使首都局势急剧恶化。

学生绝食和群众声援游行，使首都北京的生产、工作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陷于一片混乱之中。由于各界群众的连续数天的大游行，城区公共交通几乎瘫痪。17日以后，60多路公共电、汽车停驶，交通警察无法执行指挥交通的任务。有的不法分子擅自剥夺公安干警、交通干警的指挥权，随意拦截车辆，非法检查行人证件。还有的不法分子肆意辱骂甚至殴打公安和交通干警。报纸、邮件不能及时投送，垃圾清运、道路清扫和公厕清洗不能及时进行。全市人民的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这期间，社会治安遭到破坏，日益恶化。一些不法分子聚集王府井、前门等繁华地区，扬言“非砸不可”，伺机作案。其他地方的打、砸、抢事件连续发生，有的不法分子乘机抢劫银行。东四大街慧源百货商店遭到十几个痞子的行抢。广安门乳品厂一辆送奶车的3800瓶牛奶被一抢而光。一辆54路公共汽车在永定门车站被砸。6名歹徒在房山至良乡公路上抢劫由河北省进京的农民，说什么“听说北京乱了，我们

也要弄点钱  
院的办公机  
到市政府广  
流氓，组织  
的“敢死队  
校园，制  
状态中，  
市公安干  
序的繁重  
更为  
了全国的  
全国各大  
生的人数  
广，骚乱  
计，全国  
10.97万  
27个城市  
市300多  
绝食请愿  
就不吃饿  
出现攻击  
度的标  
机关的  
家的运输  
卧轨拦  
劲头。



也要弄点钱花”。还有的不法分子围堵、冲击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住所。一些流氓分子深夜窜到市政府门口用极下流的语言谩骂滋扰。极少数人纠集地痞流氓，组织了有100多辆摩托车的“飞虎队”和上千辆自行车的“敢死队”，经常疯狂地行驶在交通要道上，窜到一些大学校园，制造恐怖气氛。北京已处于日益发展的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中，随时可能发生更大规模的打、砸、抢、烧事件。北京市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已经越来越难于承担维护首都正常秩序的繁重任务。

更为严重的是，北京的事态波及到了全国，影响和破坏了全国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从5月13日至5月19日，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绝食学生的人数急剧增加。一些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波及面之广，骚乱之严重，是建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城市上街游行的大学生人数直线上升：16日为10.97万，波及21个城市近百所学校；17日为25.3万，蔓延27个城市170多所学校；18日猛增到52.5万，扩展到30多个城市300多所大学。上海、杭州、太原、成都等地的学生相继绝食请愿。参加绝食的学生宣称“北京学生绝食不停，我们就不吃饭”。在全国各地的游行队伍和大专院校校园中不断出现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标语、口号和大字报。有的地方多次发生冲击当地党政机关的事件，发生打、砸、抢、烧等严重违法破坏活动。国家的运输大动脉受阻，不少地方的学生强行乘车进京，甚至卧轨拦截火车，大有“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大串联的那股子劲头。尽管国务院办公厅于17日及时发出了《关于劝阻学生



强行乘进京列车的紧急通知》，但未能奏效。一些城市的火车站挤满了赴京的学生。他们强行拦截列车，不买票乘车，严重破坏了铁道交通的正常运行。

总之，自北京学生绝食请愿、特别是赵紫阳同志“5·16”讲话以后，首都北京和全国的局势越来越严重，无政府主义恶性泛滥，法制和纪律受到恣意破坏，许多地方实际已处于一片混乱和白色恐怖之中。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党和政府已经毫无退路，如果再保持克制、容忍的态度，如果还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那么就会再度严重贻误时机，就会导致全国范围的大动乱，进一步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就会变成一个混乱不堪的、没有希望的中国。

## 第五节 发布戒严令

### 一、重重阻挠

为了制止日趋严重的动乱，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17日召开会议，讨论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问题。会上，赵紫阳同志仍然主张退让。多数同志反对他的意见，认为绝对不能再退了，再退就会发生全国性的大动乱，几代人为之奋斗所取得的革命和建设的成果就会全部葬送掉。为了制止动乱，会议决定立即调集一部分军队进驻北京，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这是不得以而采取的措施，也是坚决、果断、正确的重大决策。但是，赵紫阳同志拒不执行常委会议的决定，并提出辞职。当受到严厉批评后，他撤回了辞职要求，口头上表示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出于反革命的政治

需要，  
阳反对，你  
改革研究室  
发表“告别  
透露给别人  
制改革研究  
达了所谓“  
窜到天安门  
的心情，  
免，李鹏  
施”；呼吁  
决死的抗  
发。当晚  
策略的几  
的手段和  
的政治要  
开中国共  
民代表大  
安、如惊  
宣传”。  
在这  
置党和国  
确意见于  
日凌晨，  
质问题、



需要，在17日当天就泄露了戒严的秘密。他们对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说，现在军队要镇压你们，别人都同意，就是赵紫阳反对，你们要做好准备。17日晚，鲍彤召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员，泄露了即将实行戒严的机密，随后发表“告别演说”，并警告与会者不得把会上密谋策划的情况透露给别人，否则就是“叛徒”、“犹太”。5月19日，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一位副局长赶到体改所，向正在开会的人传达了所谓“上边”的指示。接着，自称来自“体改委”的一些人窜到天安门广场，发表讲演，说什么“怀着极为悲痛极为愤慨的心情，公布一个绝对真实的消息，赵紫阳总书记已经被罢免，李鹏主持政治局工作，并决定今晚对学生采取强硬措施”；呼吁“实行全国性的罢工、罢课、罢教、罢市”，“进行决死的抗争”。这个讲演很快被印成《人民日报号外》广为散发。当晚，在北京站广场等公共场所还发现题为《关于学运策略的几点建议》的传单，指出“目前绝食对话已不是我们的手段和要求，应当改为和平静坐，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和口号，即：（一）紫阳同志不能走；（二）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三）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还说“对军队的到来不应采取惶惶不安、如惊弓之鸟的态度”，“要在他们到来之前反复向同学们宣传”。

在这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紧急时刻，赵紫阳同志仍然置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于不顾，置中央常委中多数同志的正确意见于不顾，坚持同中央正确决策相对立的错误立场。19日凌晨，他到天安门广场去看望绝食学生。他告诉学生，性质问题、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解决的。他还说“你们还年



轻，来日方长”，“你们不象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些话，既表明了他坚持同党相对抗的态度，又传递了他在中央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信息。当天晚上10时，党中央和国务院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关于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重大决策。在此之前，中央常委从维护党的团结的大局出发，决定由他同李鹏同志一道在大会上各发表一篇讲话，他不同意；接着，又请他主持大会，不讲话，他还是不同意；最后，请他只出席大会，他仍然以请病假为由予以拒绝，从而把他破坏党的组织纪律、破坏党中央的团结统一、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在全党、全国面前。

与此同时，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同动乱的组织者策划者紧密结合，及时调整策略，在当天晚上把绝食变成了静坐，造成学生既然已经停止绝食政府就没有必要戒严的假象，以迷惑群众。他们还及时组织力量，裹胁不明真相的人，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堵截军车，并继续大造舆论，混淆视听，扰乱人心。他们一方面恶毒咒骂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说什么“我们不要邓小平的智慧和经验”，一方面大肆吹捧赵紫阳同志，说什么“党无紫阳，国无指望”，呼唤“还我紫阳”。他们还阴谋集结力量，宣称要动员20万人占领天安门广场，要组织全国性的总罢工，扬言3天之后要成立“新政府”，企图挑起更大的动乱。

鉴于急剧变化的形势，5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根据中央的重大决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授予的权力，签署并发布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

自当谁支持？谁差后

取具体  
连续签  
但  
策划者  
部队在  
少部分  
城内，  
机关  
输和  
是，  
领导  
暴乱

后，  
采取  
社会  
继个  
一天  
领月  
卫暗  
要



取具体戒严措施”。北京市市长陈希同于当日根据国务院命令连续签发了3道北京市人民政府令。

但是，由于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事先被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所掌握，戒严令的实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进京戒严部队在所有路口被堵被围，不能及时按计划进入指定地点。少部分戒严部队克服重重阻挠，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同广大武警、公安干警相配合，在首都工人、市民、机关干部组成的维持秩序工作队的协助下，使首都的交通运输和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有所好转，人心逐渐趋于安定。可是，极少数人制造动乱的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目标丝毫也没有改变，事态正在一天天地向着反革命暴乱方向发展。

## 二、“国中之国”

国务院《关于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发布后，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部队在戒严之后仍然采取的克制态度，组织各种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颠覆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非法活动。他们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把广场作为所谓“学运乃至全民族的一个中枢”。天安门广场是新中国的象征，是中国面向世界的一个窗口。戒严令发布后，尽管在广场上静坐的学生几乎天天都有撤与不撤的争论和表决，但极少数人越发感到继续占领广场的重要，决心赖在广场与党和政府作“最后决战”。5月24日，“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在广场召开了所谓的“保卫”广场誓师大会。“高自联”头头王丹发表题为《光明与黑暗的最后决战》的讲演，叫嚷“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要我们坚持下去，这种无能的政府，也是一定会垮台的，坚

持就是胜利”。

极少数人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用心是十分清楚的。他们要把广场作为与党和政府进行最后较量的指挥中心。5月25日，北师大贴出一张《关于目前形势的几点看法》的大字报，内称“广场已成为一面民主爱国的旗帜，成为全国民主运动的震中和心脏”；“广场的学生队伍不能撤”，不然“就意味着学生自动地取消了做为先锋队的标志”，“这样，不仅使已经树立起来的大学生的权威和号召自消自散，也使各界、各层人民自觉地产生的保卫学生的行为失去明确的目标，这更不利于这场民主爱国运动向全国扩展”。27日，贴在北师大的另一张大字报提出：“精简天安门广场的队伍，使其组织更加严密，指挥更有效率，行动更加迅捷，继续发挥它的核心阵地作用和信息中心作用”。可见，极少数人就是要把广场作为所谓“学运乃至全民族的一个中枢”，一旦政府做出什么决定，就准备在广场上“作出强烈的反应”，“组成一个反政府的统一战线”。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戒严期间，拼凑“敢死队”去城外堵截戒严部队，调集痞子冲击公安机关和新闻单位，召开新闻发布会，罗织“飞虎队”四处联络等等，无一不是极少数人在天安门广场策划和指挥的。

极少数人继续把广场作为反革命舆论中心和谣言制造中心。在广场上，由极少数人非法架设的高音喇叭几乎一天24小时不停地进行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鼓动推翻现政府的反革命宣传；反复播放“美国之音”和港台一些报刊、电台的反共反华宣传和歪曲报道。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幕后策划者和敌对分子也通过广播为“高自联”等非法组织撑腰打气。广场上不断传出种种蛊惑人心的谣言，诸如“一些老

同志  
尖锐  
际上  
软禁  
借以

盾，  
们认  
人民  
寨”，  
埔军  
座“女  
个女  
“自由

要使  
舆论  
政府  
广场  
台”。  
心。

纲领，  
邓小



同志反对戒严”、“要求退党”、“军队内部在戒严问题上产生尖锐分歧和对立”、“中国外交部已宣布脱离中央政府”、“国际上已有30多个国家宣布不承认中国政府”、“万里回国后被软禁”等等，无一不是从广场传播到全北京乃至全国各地的，借以继续蒙蔽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群众。

极少数人以天安门广场为基地，不断挑起事端，激化矛盾，策划在广场制造流血事件，影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他们认为“只要不撤离广场，政府就会镇压”，“鲜血可以促使人民觉醒，使政府分化瓦解”。他们在广场建立所谓的“自由寨”，开办所谓的“民主大学”，声称要使它成为“新时代的黄埔军校”。5月30日，他们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树立了一座“女神像”，把美国的民主、自由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这个女神像是“高自联”要求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做的，开始叫“自由之神”，后改称“民主之神”。

总之，极少数人策划和组织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就是要使广场成为动乱直至暴乱的第一线指挥中心，成为反革命舆论的宣传中心，成为各种敌对势力的聚集地，成为向党和政府发起新的攻势的基地。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只要广场的旗子不倒，就可以坚持斗争，辐射全国，直到政府垮台”。这一语道破了他们继续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的险恶用心。

### 三、拼死挣扎

戒严令发布后，动乱的组织和策划者提出了新的具体纲领，最主要是两条：一是取消戒严；二是李鹏、杨尚昆、邓小平下台。

为达此目的，一些幕后策划者和指挥者迫不及待走到前

合亮相，直接拼凑或公开支持各种非法组织。继“高自联”、“工自联”、“绝食团”、“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等非法组织之后，他们又相继成立了“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他们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名义，明目张胆地打电报给一些部队，挑拨离间，进行策反。他们组织专门的舆论班子，筹办地下报纸，从事颠覆政府的地下活动。他们结成死党，集体进行地下宣誓，声称“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80年代中国的皇帝称臣”。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召集“高自联”的部分头头开会，提出退出天安门广场的几个条件，即“军队回去，戒严取消，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退休，赵紫阳复出”，并且准备组织所谓“凯旋在子夜的大进军”。

在极少数人的组织策划下，5月20日宣布戒严后，北京的大大小的游行示威活动一直没有间断。据不完全统计，至6月3日，有人参加游行示威的单位有：高校61所、新闻出版单位62个、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单位122个、民主党派4个，还有外地300多所大专院校的来京学生。其中影响较大的有5月22日、23日的所谓“首都知识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联合游行示威，25日的所谓“全市环城大游行”，28日的所谓“全球华人大游行”。动乱的组织者策划者寄希望于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达到他们推翻政府的目的。严家其、包遵信等首先发难。人大常委会委员胡绩伟起而响应，在他的支持和授意下，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发出《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征询意

见面。  
同内容  
义，强  
“建议”  
《告李  
国人大  
职务。  
紧急  
下台”  
摧”的  
手其  
援助  
这场  
舆论  
人民  
上百  
脑、  
日耗  
各参  
同时  
烧一  
一军  
万元  
援大



见函。他们采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或将几次不同日期、不同内容的签名拼在一起；或不讲真情欺骗别人；或盗用名义，强加于人，以达壮其声势、胁迫人大常委会接受他们“建议”的目的。严家其、包遵信还在香港《明报》发表什么《告李鹏书》，呼吁“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在极少数人的煽动下，一时间，“要求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取消戒严令”、“罢免李鹏”、“杨尚昆、邓小平下台”等口号此起彼伏，气焰十分嚣张，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架势。

海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和一些组织与个人也直接、间接插手其间，给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以大量的精神支持和物质援助。美国、香港、台湾的一些报刊也连篇累牍地发表有关这场动乱的歪曲报道，并为极少数的所谓“民主精英”提供舆论阵地，发表他们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讲演文章。美国、英国和香港的一些人，拿出上百万美元和数千万港元，一部分用于购买帐篷、食品、电脑、快速印刷机和先进通讯设备送往广场。据了解，广场每日耗资约10万元。另一部分钱被用于破坏戒严活动，每一名参加设路障、堵军车的人，每天都可以得到30元的报酬。同时他们还许下高价，收买暴徒去烧军车和打解放军，许诺烧一辆军车给3000元，抓住或打死一名军人给几千元。台湾一军政要员发起了“送爱心到天安门”的运动，带头捐款10万元台币。国民党一名中委募捐1亿元台币，设立所谓“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基金”。

原定在美国讲学到1990年的北师大中文系教师、“中国

民联”骨干成员刘晓波，为直接插手这次动乱提前回国。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后，他更加紧了活动。5月23日，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在动乱的中心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建议》的传单，一时被某些人奉为“指导学潮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传单叫嚣“伪政府必须辞职，李鹏必须下台”；煽动“全社会总动员”，以求“瓦解军管”；鼓动国营企业的工人们“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自治会”，民办企业要公开提出“企业的完全私有化”，以使“产权明确为私人所有”；国内8个民主党派要“有计划地公开地明确地向政府提出独立的参政要求，进一步成为真正的具有独立权利的民主党派。”这份以非法组织“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抛出来的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宣言书，根本不是北师大学生写的，而是出自刘晓波的手笔。进入5月底，许多大学生从天安门广场撤退出来，刘晓波等人心急如焚，从后台跳到前台。他在煽动大学生继续绝食和组织1000至5000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绝食之举流产之后，亲自出马纠合了四通公司的周舵、高新和词曲作家侯德建来到天安门广场，从6月2日下午开始搞了一个所谓48至72小时的有限度绝食。他们企图以此来煽动一部分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长期闹下去，为这场动乱注射强心针。

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和一些组织对动乱的支持和援助，使“高自联”等动乱的组织者、策划者更加有恃无恐，继续强占天安门广场，酝酿着更为严重的挑衅事件。

#### 四、“反腐败”？

“高自联”等非法组织头头素质本来就不高，在他们做了



“官”、掌管大批捐款后，便成为反官僚、反腐败旗帜下的官僚分子和腐败分子，引起了很多学生、教师、群众的不满，甚至一向对“高自联”等非法组织头头大加吹捧的海外舆论，也对他们提出了种种责难。

5月下旬，外省一位曾经两度进京声援的大学生，在离京前，怀着十分失望和气愤的心情，来到北京市政府信访接待站，留下了一篇题为《天安门广场啊，我为你哭泣》的长篇反思文章，揭露这次学潮的“组织者素质较差，其所作所为令人作呕。他们故弄玄虚，作神秘状，让人摸不着头脑，每一位都是碰不得、惹不起的‘总负责人’、‘总头头’，而且组织机构叠出，谁也不服气谁。据了解，广场上至少有四五个较大的平行组织，还有名目繁多的其它组织，令出多门，喇叭之间也互相干扰。他们一方面喊着打倒‘官倒’的口号，另一方面又对同学横眉冷目，恶声恶气。有一位同学，曾亲眼看到有一位组织者开张白条到物资供应站领取大量的面包、鸡蛋、饮料和榨菜，几个人吃不完后便白白扔掉。可与此同时，外地不少大学生却吃不上或吃不饱。我们看到在纪念碑上的组织者大吃大嚼，随意丢弃食品饮料。他们应每天公布捐款和捐赠物品的收支情况，让全体同学监督。更有甚者，竟敢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洁白的汉白玉台柱上，搂抱着姑娘嬉笑。”这篇文章在6月1日《北京日报》上全文刊载，引起了不少大学生的共鸣，也引起那些被揭露者的痛恨。他们于6月2日下午专门组织数百人到《北京日报》社“抗议”，造谣说这篇文章是北京市的专门写作班子炮制的。

就在那些被揭露者到《北京日报》社抗议的当天，香港《明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全文如下：

有学生领袖贪污腐化，一朝得势便一意孤行

过去一个多月，数以万计的北京高校学生在中国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但个别学生领袖却在海内外捐赠的7位数字的现金面前，显得动摇、退缩、甚至腐化了。

据学生反映，个别学运领袖以躲避当局追捕为名，住进了高级酒店的套间，喝的是易拉罐饮料，出入皆乘坐出租汽车。

他说，他亲眼看见他所在的学生自治会筹委会主席整天叼着外国香烟，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包括北高联和“保卫天安门广场总指挥部”也存在财务混乱、账目不清等严重问题。一位颇具威望的北高联领袖（指吾尔开希——作者注）的服装开始发生变化，由普通的T恤换成了清一色的进口西服。这位学生领袖曾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一位华侨10万元现金。不过，目前的广场总指挥柴玲和副总指挥封从德则十分廉洁。

接近市高联的人士说，学生运动的目标是反腐败和提倡清廉，但个别学生的贪污腐化，却损害了学生运动的形象。一些学校（如师大、人大）的学生领袖在拿到一两万元的捐款后，便以健康欠佳为理由而辞职不干了。

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为这种情况担忧。一位曾为学生自治会作顾问的青年教师说：“我之所以不敢过多与他们（指学生）打交道，就是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学生，热情一过，学生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

这位教师现在已经退出顾问团。他说：“他们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对别人的意见不闻不问。在内部开会时，常常各执己见，都以为自己是正确的，所以常常出现重大分歧。”

他  
前，可以  
他说  
是派车的  
到后来居  
领导鼻尖  
曾任  
了。他说  
治资本。  
时大吵大  
知情  
来的，但  
佳。  
北京  
为托福不  
争取美国  
也有  
来自河南  
自己的‘  
对策，都  
一面，我  
一位  
领袖在绝  
他还  
既享用  
也很难得



他说，个别学生领袖还抱有他种目的。总想坐第一把交椅，可以指挥别人，不太考虑斗争方式和意义。

他说：“我们学校为学生的行动提供了许多方便，尤其是派车的问题。学校是从保护学生出发冒风险派车的。没想到后来居然成为任务，稍有延误，个别学生领袖就指着学校领导鼻尖痛斥一番。”

曾任北大筹委会主席的一位中文系研究生2天后便离任了。他说：“个别学生领袖素质太低，总想争权夺利，捞政治资本。有的人甚至不懂得他们要争取的民主是什么。开会时大吵大闹，不尊重别人。”

知情人士还说，学运前期多位学生领袖是凭勇气站出来的，但个别领袖虽有胆识，却智慧不够，廉洁作风也欠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位学生领袖说，个别学生领袖是因为托福不过关，又苦于无出国途径，便利用学运捞“背景”，争取美国领事馆的同情。

也有一些学生批评个别学生领袖的官僚主义作风。一位来自河南的大学生说：“学生领袖以维持秩序为名，组织了自己的‘皇家’纠察队。我们想见他们一面，互相通气，商量对策，都被一一回绝。我们来北京3天了，也未见到组织者一面，我还是我们学校的头。”

一位北大学生告诉笔者，他亲眼看到一位北高联的学生领袖在绝食的第二天便吃面包，喝高级饮料。

他还说，群众捐的黄橙、牛奶、鸡蛋等，只能供这群新官僚享用，其他声援学生根本见不到，外地学生甚至连面包也很难得到。

记者走访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物资处，群众捐赠的大量汽水、水果、面包堆成了山，但管理却很混乱。捐赠者只能得到一张白条子的收条。由于接受地点太多，没有统一归总，所以，捐赠物品的数量无法统计。

一位管理员说，只要有北高联领导人批条，就可以随便取物品，但这种批条很多。

据说，北京饭店曾出现多宗冒领捐款事件。一些捐赠团体已表示暂时停捐观望。而大量的现金捐款，也使学生们为难，他们因害怕官方冻结而不敢存入银行，这更加剧了贪污的可能性。

已经有一些学生对这种行为感到失望，现任广场副总指挥封从德称，肃贪和加强财务制度已经成为学运的当务之急。

前文所提的教师说，一开始便没有建立这种监督机构是学运领导层的失策。尽管学运的意义重大，但学生领袖的廉洁问题，仍然是今后学运的教训。

因此，北京大学的一位学运领袖决心退出筹委会，成立一个监督委员会，专事监督筹委会工作。

香港《明报》在上面这篇文章中指责众多学生头头腐败，称赞“目前的广场总指挥柴玲和副总指挥封从德则十分廉洁”，而香港《新报》则披露了柴、封夫妇 2 人的腐败丑闻。6 月 1 日中午，柴、封 2 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当日凌晨政府收买人企图绑架他们，海外报刊就此做了报道。但是，香港《新报》根据“外高联”（外地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提供的录音带，在 6 月 3 日作了相反的报道，披露 6 月 1 日凌晨所谓绑架事件，实际上是“外高联”因柴、

封 2 人涉  
广场指  
遣与她一  
挥部 4 名  
至今未交  
柴玲  
外地高校  
常委王文  
但王  
坪，交待  
保学运形  
名批评他  
据了  
希因误信  
晚便有人  
款作逃亡  
据记  
提取了 70  
梅峰各取  
余下的 28  
2000 元，  
但郭  
挥，学生  
而柴  
命费”是  
结果



大只归便团为污指息是廉立腐分月，做生，，

封 2 人涉嫌贪污，拉他们去交待帐目。文章全文如下：

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柴玲日前点名说被人绑架，但查证是遭与她一起工作的人拉了去交待帐目，并从而揭发出绝食指挥部 4 名常委和一些前常委私自动用捐款约 8000 元，一些人至今未交回该笔款项。

柴玲和封从德周四中午召开记者会，指当日凌晨 4 时被外地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罢免之副总指挥连胜德、前绝食团常委王文、陈伟和一名工人绑架，但被她挣脱。

但王文表示，他们当晚只是把柴玲和封从德拉去高山坪，交待帐目，而整个过程均有录音。事后大家已协议，为保学运形象，不再将此事宣扬。岂料柴玲召开记者招待会点名批评他们，他不得不站出来。

据了解，在 5 月 21 日凌晨 3 时，前市高联主席吾尔开希因误信军情而作出撤离广场之决定，并因而被罢免，但当晚便有人提议，由于情势危急，提议每位常委提取绝食团捐款作逃亡之用。

据记者获得的录音带显示，当柴玲与其保镖邵岩从银行提取了 7000 元，而柴玲、张伯笠、李录（南京大学学生）和郭海峰各取了 1000 元，而王文和另一常委夏斌均各取 100 元，余下的 2800 元则仍在邵手里。此外，封从德因称手里已有 2000 元，所以没取款项。

但郭海峰在交待时表示，作为指挥成员，柴又是总指挥，学生都没撤，提前撤对吗？

而柴则说，前提是保护火种，而张伯笠亦强调拿取“保命费”是应该的。

结果是各人没有撤，但他们在 10 天时间里，都没有

把所取款项交回现时的广场指挥部。

据录音带显示，柴玲称，她把150元给朋友替她买衣服，另50给了天津同学作路费，而800元则给了一个叫凌华江(听声)的纠察队员买食品，而邵也给了他(她)200元。

其后，柴再支取1000元作保命费，而从天津来的马斌说要回去，柴给了他100元，另900元则给了张。

李录则承认把1000元转了去外头。至于其他人则未有在当晚交待所用款项去向，但据悉，郭的1000元还未动用，而共拿了2800元钱的邵岩则因母亲病重，回家去了。此外，录音带亦揭发另外一笔糊涂账，就是柴玲曾从财务部支取2万元，并把其中1.8万元给一名叫李晶的女同学去买通话机，并说这是她信任的人，结果李晶去如黄鹤，而余下的2000元亦没有在录音带中交待。

对于“高自联”等非法组织的腐败、官僚行为，甚至连“高自联”头头自身也承认不讳。6月3日，香港《明报》发表了一篇访问“高自联”头头程真和王志新的专访，题为《学运暴露了学生弱点》。程真在回答香港记者提问时说：“大学生滥用特权，可以随便拦车，可以坐车不付钱，形成一种特权主义。”程真说：“这次运动要求便是民主，但遗憾的是绝食团成立之后，指挥部的成员却是自封的，可以说没有进行选举。”王志新说：“部分学生的奴民意识在这次学运中表现出来，他们呼吁争民主、争自由，但本身却有权力欲，要支配别人。此外，还有不少占小便宜的学生。”他说：“在学生绝食期间，很多人自称学生指挥，亦有人自称是北高联常委，随意弄权。本来学生提出反对官僚，但当时广场上却出

观官僚  
主。“高  
多抱着  
5月底  
人。这  
慌，他  
暴乱之

一  
还  
决定采  
段阻止  
我不能  
航天大  
星之火  
学报里  
历史的  
洒热血  
以学生  
为主导  
能包括  
队)，才  
是因为  
有可能



现官僚主义。本来争取民主自由，但一些学生本身却不民主。”

“高自联”等非法组织头头在反腐败旗号下搞腐败，使许多抱着反对腐败心态参加学潮的大学生心灰意冷。因此，到5月底，在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越来越少，最少时只有数千人。这种情况的出现，使极少数学潮、动乱的策划者十分恐慌，他们除了不断制造新的热点外，还准备破釜沉舟，点燃暴乱之火，制造流血事件。

## 第六节 血染京都

### 一、是谁燃起暴乱之火

还在5月25日，“高自联”等非法组织召开战地讨论会，决定采取更激烈的行动。王丹对海外记者说，要采取一切手段阻止解放军进城。柴玲也说，学生总问我下一步怎么办，我不能告诉他们，下一步就是流血。5月30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人贴出一张无署名的小字报，题为《如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今中国时局可能性预测和分析》。小字报里有这样一段话：“如果共产党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要逆历史的车轮而行，就有可能使忍无可忍的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毫无畏惧地站立起来，旗帜鲜明地组织起来，组成以学生、知识分子、工人、农民以及社会各界其他爱国力量为主导力量的、将可能被称为人民军的武装力量（并且有可能包括有组织、有良知、有理性、向人民投诚的共产党军队），来与共产党的腐朽力量相抗衡、相斗争。并且还可能是因为一旦全体人民对共产党完全失去信心的话，进而就有可能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力量为方式，去团结包括

台湾国民党力量在内的各种力量来进行斗争”。极少数人扬言，“秋后算帐，非等不可”，要算党的帐，算政府的帐，并且准备了要镇压的干部名单。香港《明报》刊登了刘晓波和吾尔开希等人6月2日同“一位大陆民运领袖”的谈话录音稿。刘晓波说：“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中组织武装部队”。吾尔开希说：“我们需要的不是改革，改革运动已经进行了好长一段时间，甚至清朝就开始了，但从来没有真正成功过”。“我想，中国需要的是革命”。

为了挑起流血事件，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感到了社会渣滓的可用性，决心联合这股势力。于是，他们纠集本地的流氓地痞、外地的流窜犯以及未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网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的人，拼凑“敢死队”、“飞虎队”、“义勇军”等恐怖组织。

戒严令颁布后，为了有效地制止动乱，戒严部队采取不同的方式，每天都在有计划地向城里开进，陆续到达指定警戒目标。但是，由于“高自联”等非法组织精心安排，派出15路“敢死队”设置路障、堵塞进城的主要干线，使一些戒严部队蒙受了巨大损失。戒严部队某部曾在首都钢铁公司附近被围困了3天4夜，战士们无法睡觉，出去上厕所都要经围困他们的人同意。5月22日晚10时，丰台区大井附近被阻拦的执行戒严任务的某部队，奉命转移到数百米外的安全地带。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制造谣言煽动说：他们（指解放军）要把车开到天安门去，从而挑起事端。一些混杂在学生和围观群众中的不明身份的人，用事先准备好的砖头瓦块，突然袭击解放军战士，解放军指战员保持了高度克制态度，结果有60多名官兵受伤，17人住院治疗，其中有的重伤战士头

部结合达  
极少数  
的部队全部  
和反革命活  
以失败告终  
乱加剧，最  
电视台借片  
地途中，且  
人，其中  
门已在处理  
进城的开  
体，举行  
不仅在市  
人；还说  
午游行，  
工大学、  
容。一时  
被极少数  
二、  
6月  
程中，受  
小车辆，  
的军车轮  
殴打和绑  
需要  
群众发生



部缝合达9针之多。

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深知，如果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全部按计划到位，那么他们正在从事的种种非法活动和反革命活动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他们的全部阴谋就将很快以失败告终。于是，他们窥测时机，蓄意挑起事端，竭力使动乱加剧，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6月2日晚，中央电视台借用了10个月的武警部队的一辆吉普车，在返回驻地途中，路面有水打滑，造成翻车事故，撞死3人，重伤1人，其中没有一个是学生。这本来是一起交通事故，有关部门已在处理。但是，极少数人却借机大造谣言，说戒严部队进城的开道车故意轧死学生，鼓动不明真相的人去抢夺尸体，举行抬棺大游行。6月3日上午，北大“自治会”广播说不仅在市内发生了军车轧死学生的事，在温泉还轧死了8人；还说解放军要分东西两路进入天安门广场，号召学生下午游行，全市罢工、罢市，抗议政府暴行。清华、人大、理工大学、北京医科大学的“自治会”都在上午广播了同样的内容。一时间，人心浮动，气氛紧张。从这时起，暴乱的火就被极少数人点了起来。

## 二、暴行令人发指

6月3日凌晨，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警戒目标的过程中，受到一伙暴徒的疯狂拦截。从早晨到中午他们阻拦大小车辆，设置路障，拦截和破坏军车，电报大楼前和木樨地的军车轮胎被轧穿，永定门桥头的军车被推翻。暴徒们肆意殴打和绑架戒严部队官兵、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

需要指出的是，为了遵守我军热爱人民的宗旨，避免同群众发生冲突，不少戒严部队官兵都不携带武器，着便装步

行进入警戒目标。面对穷凶极恶的暴徒，可想而知，他们面临着多么大的困难和危险。从燕京饭店门前经过的战士被强行搜身；行进到朝阳门的400多名战士被暴徒用石块乱砸；在建国门立交桥上，有些战士的衣服被扒光，有的战士被打得遍体鳞伤；虎坊桥一带的进城部队被冲，战士遭毒打，有的被打瞎了眼睛；一些被打伤的战士在送往医院途中还遭到暴徒的拦截，急救车车胎被放气，伤员被绑架；被拦阻在府右街南口、正义路北口、宣武门、虎坊桥、木樨地、东四等路口的解放军战士，有的被打伤，有的钢盔、军帽、雨衣、水壶、挎包被抢。更为严重的是，一伙暴徒竟悍然抢夺戒严部队的武器弹药，并在天安门广场、新华门等处举办所谓战利品展览，让外国记者拍照。6月3日中午，六部口有一辆满载枪支弹药的军车被围，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多次解围均未成功。车上的枪支弹药如被抢走或发生爆炸，其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护首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武警部队施放了催泪弹，驱散了人群，夺回了弹药车。

在拦截、砸抢军车，殴打、绑架解放军官兵，抢夺武器弹药的同时，一伙暴徒疯狂围堵和冲击国家机关重要部门。他们冲人民大会堂，冲中宣部，冲广播电影电视部，冲中南海的西门和南门。保卫这些机关的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有数十人受伤。

随着事态的急剧恶化，暴乱的挑动者更加猖狂。6月3日下午5时许，“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在天安门广场分发了菜刀、匕首、铁棍、铁链子和带尖的竹竿，声言“抓住军警就要往死里打”。“工自联”头头在广播中大肆叫嚣，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还有一伙暴徒纠集了上千人，推倒西

280为什么不打军警？  
而不打政府官员？  
军警的暴力行为可恨！

单附近  
快等，准备打  
机，煽动更多  
企图造成一个  
权。正是在这  
不得不下决心  
选，平息反  
为了避  
时半发出《集  
起，请你们  
坚守岗位，  
个《通告》，  
数小时的反  
已经感到了  
头、路口，  
悍地拦截军  
师大、清华、  
真相的学生  
天安门广场支  
校发表广播  
百人打着横  
面对这种一  
6月3日晚  
在各主要路  
态度。而反  
枪、烧、杀



单附近一个建筑工地的围墙，抢走大批施工工具和钢筋、砖块等，准备打巷战。他们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砸、抢、烧，企图造成一个“百万人暴动”的态势，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正是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

为了避免伤害群众，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于晚6时半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这个《通告》，通过电台、电视台和各种广播器，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反复广播。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虽然已经感到了事态的严重，但由于好奇心的驱使，仍涌向街头、路口，而一小撮暴徒正是利用这种混杂的局面去肆无忌惮地拦截军车，殴打解放军官兵。当日晚上，北大、人大、师大、清华、北航学校“自治会”的广播，也不断地煽动不明真相的学生携带瓶子、菜刀、白灰、棍棒等赶往各路口和天安门广场支援。“高自联”头头吾尔开希也于当晚8点多在学校发表广播讲话，叫嚣要“与天安门同在”，随后带领三四百人打着横幅，走出校门，前往天安门广场作最后的顽抗。面对这种一小撮暴徒和大多数群众混杂在一起的复杂情况，6月3日晚10时前后，奉命向城内开进的各路戒严部队虽然在各主要路口都受到严重阻拦，但是仍然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而反革命暴徒却利用部队的这种克制，进行打、砸、抢、烧、杀。暴徒们将强行拦截的公共电汽车和过往的车辆

挡在路口，放火焚烧，阻断道路。许多军车被困、被砸、被烧。6月3日23点前后，建国门立交桥有30辆军车被围堵。北京煤炭工业学校以西有300多辆军车被围堵。6月4日凌晨以后，焚烧军车的暴行愈演愈烈。在北京的数十个路口的数百辆军车，被暴徒用汽油、燃烧瓶和土制喷火器引燃，火光冲天。有的暴徒手执铁棍，推着汽油桶，在路口堵截，见车就烧。据统计，在暴乱中，被暴徒砸毁、烧毁、损坏的军车、警车和公共汽车等车辆达1280多辆，其中军用汽车1000多辆，装甲车60多辆，警车30多辆，公共电汽车120多辆，其它机动车70多辆。一批武器、弹药也被抢。

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暴徒们对戒严部队官兵、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残害。6月4日拂晓之后，武警一支队的一辆救护车，拉了8名受伤的战士送往附近医院时，被一伙暴徒拦住，当场有一名战士被打死。他们还叫嚷要把其余的7名战士都打死。在前门大街的一家自行车店门前，有3名解放军战士被打成重伤，暴徒们围着狂叫：“谁敢救他们就打死谁。”在长安街上，一辆军车熄火，一二百名暴徒一拥而上，猛砸驾驶室，将司机活活砸死。在阜成门，武警战士李国瑞被暴徒残害后，尸体又被悬挂在立交桥的栏杆上。在崇文门，某部战士崔国政被一伙暴徒拉上过街天桥，从桥上扔下，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暴徒们狂叫，这是“点天灯”。在西长安街首都电影院附近，某部排长刘国庚被暴徒打死后，尸体被挂在一辆正在燃烧的公共汽车上，后又被暴徒剖腹。还有一名解放军战士被挖掉眼珠，割掉生殖器，尸体被扔进护城河。据统计，解放军、武警部队共牺牲数十人，有6000多人负伤。一些暴徒还对民用设施和公共

建筑物发  
门前和毛  
“高自联”  
向天安门  
三、  
对天  
警部队和  
6月  
重拦阻情  
缓缓推进  
达天安门  
雨点般自  
来的棍棒  
架和被持  
隔离墩。  
重伤11  
予“共和  
门到前  
个小时  
为  
部队在  
鸣枪开  
徒。当  
撞、人  
意看到  
压反革



建筑物发动了攻击。西城区的燕山等商店的橱窗被砸。天安门前和毛主席纪念堂西侧的松墙被点燃。特别恶毒的是，“高自联”头头郭海峰等6人驾驶一辆装满汽油的公共汽车驶向天安门金水桥，企图放火烧毁天安门城楼，后被抓获。

### 三、广场的悲与喜

对天安门广场实行清场，捣毁“震源”，是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6月3日之夜行动的基本任务。

6月3日夜，戒严部队在遇到暴徒和不明真相群众的严重拦阻情况下，保持着最大克制，坚定不移地向天安门广场缓缓推进。一支从军事博物馆出发的部队用了4个小时才到达天安门广场。这支部队的同志描述当时的情况是：头上是雨点般的砖头石块，脚下是各种障碍物，身边随时有暴徒打来的棍棒和捅来的钢筋，前边是火海浓烟，战士们冒着被绑架和被打伤、打死的危险推走着火的车辆，搬走横在路上的隔离墩。据统计，仅这支部队被打伤的官兵就有1100人，重伤116人，牺牲6人，下落不明2人。后来，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的王锦伟烈士生前所在的部队，从右安门到前门西大街，短短十几公里的路，竟艰难地行进了近5个小时。

为了迅速平息反革命暴乱，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情况下，迫不得已鸣枪开道，进行有节制的自卫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当然，由于围观的群众和在场的学生很多，有的被车撞、人挤，有的被流弹击中，造成误伤。这是党和政府不愿意看到、但却是戒严部队执行任务中难以避免的。不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暴乱就不能平息，那就会发生更多更大

的流血事件。据统计，暴乱中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北京地区高校学生36人，还有一部分是暴乱分子。

6月4日凌晨，各路戒严部队陆续开进天安门广场，在金水桥和大会堂一带集结待命。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避免伤亡，凌晨1时半，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想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障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这个《紧急通告》用高音喇叭进行了反复播放，时间长达3个多钟头。在广场围观的群众，听到通告后多数都迅速离开了。这时，停留在广场上静坐的青年学生还有数千，集中在广场南端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带。“高自联”头头王丹等见大势已去，顾不上他们煽动来的同学，乘一辆早已准备好的外国人的小汽车，赶往北京火车站，逃离北京。

在戒严部队的强大压力下，凌晨3点左右，侯德建、周舵与戒严部队接触，表示愿意自动撤出广场。戒严部队表示同意。然后，侯德建、周舵返回纪念碑，时间大约是4点。这时，广场上的华灯全部关闭。侯德建、周舵通过广播介绍了与戒严部队接触的情况。与此同时，广场上又广播了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随后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

关于迅  
严部队  
枪将“高  
周围的  
弱表决  
人便表  
前面，  
队、  
置了  
在广  
利、  
战士  
场任  
样，  
场又

反革  
4日  
恶毒  
内出  
就  
员、  
领  
兵



关于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的正常秩序的4点通告。之后，戒严部队由北往南，分两路向纪念碑方向推进，解放军战士用枪将“高自联”架设的两个高音喇叭打坏。与此同时，纪念碑周围的学生在“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主持下，以声音强弱表决，结果喊“撤离”的声音强，喊“留守”的声音弱。主持人便表示所有在广场的学生“逐步准备有组织地把大旗打在前面，逐步有秩序地撤离。同学和市民、工人、市民纠察队、北京的同学撤到海淀区去，往中关村走”。接着，他们布置了手拉手的纠察队，于凌晨5时许左右撤离广场。戒严部队在广场东侧南口开出了一条宽敞的通道，保证学生迅速、顺利、平安地离开。当时，还有200余名学生坚持不走，武警战士按照“通告”要求，强制他们离开了广场。到5时半，清场任务全部完成。在整个清场过程中，没有死一个人。这样，被极少数搞政治阴谋的人控制长达20多天的天安门广场又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 四、从无序到有序

天安门广场回到人民手中后，一小撮策划、煽动和组织反革命暴乱的人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仍在继续顽抗。6月4日，一个自称“中国保卫人权同盟”的反动组织散发了极其恶毒的《告全国人民书》，造谣诬蔑说“党内出了叛徒，军内出了叛徒，中央发生了反革命军事政变，政变的罪魁祸首就是杨尚昆、李鹏”，号召“尚能自由活动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七届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赴广东，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平息这场反革命武装政变”，“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团结起来，开赴北京平叛”，“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

6月4日后，大学生的情绪仍很激烈，有的学生行动



失去控制。他们有的抢占学校广播室，有的围攻办公楼，有的围斗、谩骂和殴打校领导，有的学校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哀乐，有的在校门口摆花圈、挂挽联。6月7日，“高自联”散发了《空校宣言》，叫嚷“全国总罢工、总罢市、总罢课、总罢教！对法西斯政权最后一击！”煽动学生“奔赴全国各地，发动全国人民，使全国人民起来，拯救我中华于一旦！”一些学校的“自治会”广播站延长了播音时间，大肆进行蛊惑性宣传。他们制造和散布“解放军戒严部队要接管学校”、“××军和××军打起来了”等离奇谣言，并煽动学生去“复仇”、去“推翻法西斯政府”。

全国许多大中城市也出现了同北京几乎一样的口号、一样手法的破坏活动。6月5日，各地不明真相上街游行的学生有近10万人。上海有7000多名大学生上街游行，呼喊“讨还血债！”“反对暴政！”等口号。一些学生在各主要路口设置障碍120多处，使全市交通瘫痪。6月6日晚，一伙犯罪分子乘上海市发生一起铁路交通事故之机，蓄意制造了一场烧毁旅客列车、袭击公安消防干警和武警战士的严重骚乱，造成沪宁、沪杭铁路中断。6月5日，成都高校一些学生上街游行，一些歹徒和少数学生与维持社会秩序的公安干警和武警战士发生冲突。一伙歹徒借机煽动不明真相的市民、学生焚烧和砸坏了100多辆警车、救护车、电车以及一些公安派出所和岗亭。一伙歹徒还放火烧毁了成都市最大的一家商场——人民商场，直接损失达亿元以上。

海外各种反动势力也不甘心多年“和平演变”的“成果”毁于一旦，进行猖狂的反扑。他们开动全部宣传机器，违背基本的新闻道德，大肆造谣，蛊惑人心，胡说什么“解放军血

洗天安门”  
了，“解放  
国实行经济  
面对  
委继续采  
央、国务  
“全体共产  
应党和政  
挺身而出  
北京市市  
吁：“希  
部队执行  
应有的  
商店、  
位，忠  
课，以  
迷不悟  
孤行，  
悔过自  
6  
首都反  
言。当  
砸、抢  
的罪行  
续为非  
恢复正



洗天安门”、“邓小平死了”、“李鹏被打伤了”、“杨尚昆逃跑了”、“解放军互相开火了”等等。同时，美国等国宣布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一时间，西方出现了一股反华逆流。

面对仍然十分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继续采取坚决措施，稳定全国局势。6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界爱国人士，一定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明辨是非，顾全大局，迅速行动起来，挺身而出，与制造暴乱的极少数人作坚决的斗争。”同一天，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发表广播讲话，向全体市民发出紧急呼吁：“希望你们不要听信和传播谣言，积极配合和协助戒严部队执行任务，为彻底平息反革命暴乱，恢复正常秩序作出应有的努力；希望你们以实际行动，保卫国家机关、工厂、商店、学校、医院等单位不受暴徒的侵害，并坚守工作岗位，忠于职守”，“希望大学生们珍惜宝贵时间，尽快回校复课，以实际行动反对反革命暴乱。我们还要正告那些至今执迷不悟的暴乱分子，你们必须尽快停止暴乱行动，如果一意孤行，负隅顽抗，必将受到严重惩罚，希望你们坦白自首，悔过自新，争取人民宽大处理。”

6月6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举行国内记者招待会，揭露首都反革命暴乱真相，批驳了解放军“血洗天安门”等政治谣言。当晚，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暴乱真相》，披露了暴徒打、砸、抢、烧、杀，特别是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解放军战士的罪行，在广大群众中引起强烈震动，人们纷纷谴责暴徒继续为非作歹，要求党和政府采取措施，尽快彻底平息动乱，恢复正常秩序。从6月4日到6月17日，北京市政府和戒

严部队指挥部相继发出紧急通告（5至15号）11个，包括勒令暴乱分子停止打、砸、抢、烧、杀行为，送还抢夺的枪弹，检举暴乱分子，不得设置路障，取缔“高自联”、“工自联”、“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外地赴京高校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通缉方励之、李淑娴、王丹、吾尔开希等动乱和暴乱的策划者、煽动者和组织者，不准张贴反革命标语、传单等。根据通告的要求，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公安干警连续作战，对那些继续为非作歹的暴乱分子予以强行处置，逮捕了一批暴乱分子。一些“高自联”、“工自联”头头先后落网。广大群众纷纷举报揭发，仅到6月15日即接到有价值的举报电话1224个。6月5日，方励之、李淑娴夫妇畏罪逃入美国驻华大使馆，暴露了他们的卖国贼真面目。在严厉打击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同时，北京市委、市政府积极组织力量，恢复社会正常秩序。6月8日开始，城近郊区党委和政府，在戒严部队、武警部队、公安干警配合下，发动群众上街清理路障，运走被烧毁的汽车、装甲车。到6月13日，北京市交通全面恢复。随着交通的恢复，首都人民的生产、生活、工作、学习很快恢复了正常。

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积极恢复本地区的社会正常秩序。各地在动乱和暴乱期间建立起来的非法组织纷纷被取缔或宣布自行解散，其头头和骨干有的被通缉和逮捕，有的投案自首。一些暴徒也纷纷落网。各地大多数高校陆续复课，交通、生产和生活秩序逐步走入正常。

6月9日下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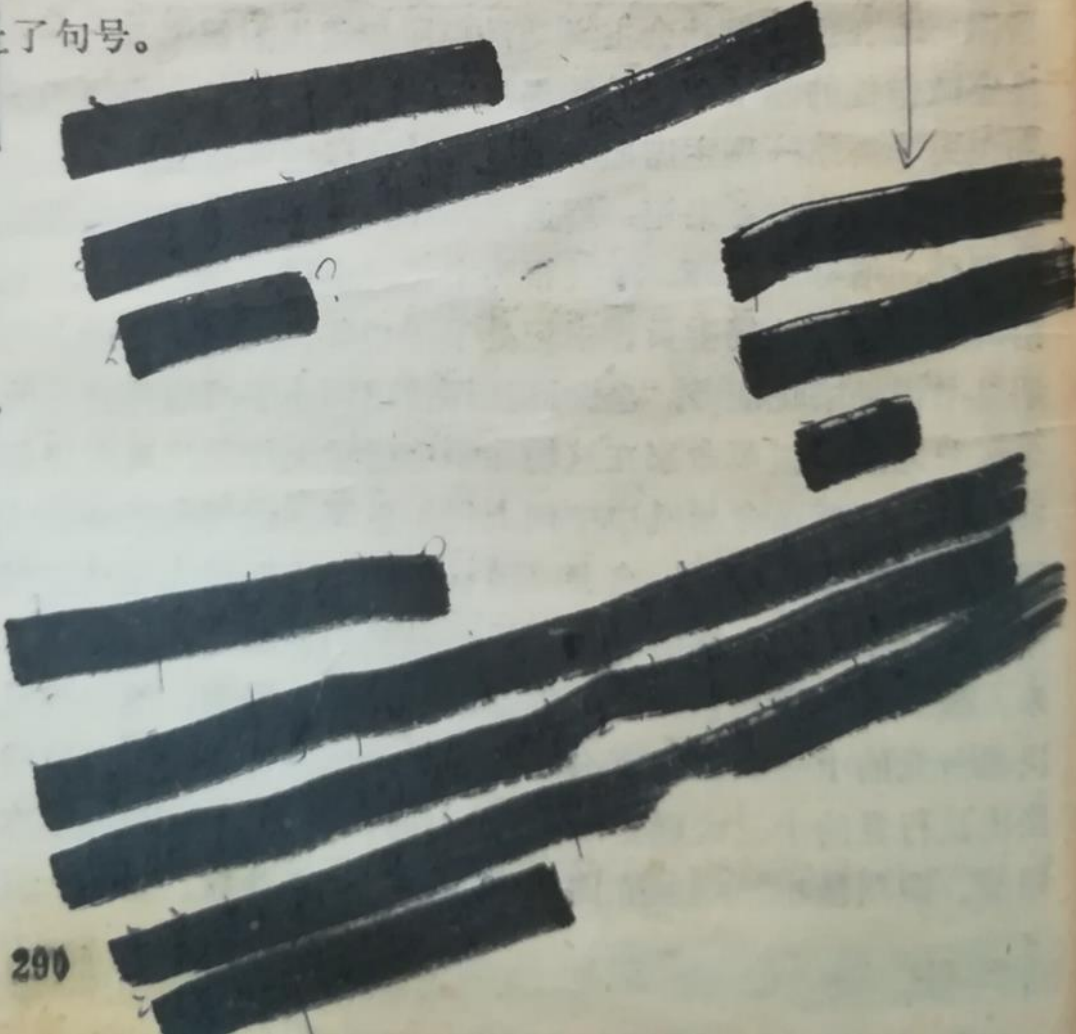


见了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我们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

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并通过了李鹏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全会决定撤销他的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审查。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书记处书记；免去胡耀立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职务，免去芮杏文、阎明复书记处书记职务。全会高度评价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场斗争中的重大作用，高度评价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作出的重大贡献。全会一致认为，邓小平同志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重要讲话，是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纲领性文件。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始终一贯

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毫不动摇、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能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当前，要特别注意抓好4件大事：一是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二是继续搞好治理整顿，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三是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决不辜负人民对党的期望。

至此，1989年春夏之交的学潮、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被画上了句号。



10  
为什么  
安定的  
质生活  
情绪？  
忽视、  
可以看  
境的景  
●最  
改革  
命暴  
讲，1  
不单  
断深  
革形  
10年  
米分  
件下



## 结 语

10年改革,10年学潮,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一连串的问号:为什么在尝尽了长期社会动乱之苦、实现了众望所归的政治安定的新时期,却出现了新的动乱苗头?为什么在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的形势下人们却又滋生出了新的不满情绪?为什么在最需要党来领导社会主义改革的时候却偏偏忽视、放松、削弱了党的领导?总结近10年学潮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到,产生这些问题既有我国国内的原因,也有国际环境的影响,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 ●最大的失误是教育

1989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同外国朋友的谈话中曾指出:改革10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同年6月,在平息北京的反革命暴乱之后,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明确地指出:“我对外国人讲,10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这一判断深刻地揭示了改革开放10年来思想政治工作严重落后于改革形势发展要求的现实,从党的领导角度道出了学潮现象历10年而不衰,且愈演愈烈的深刻原因。如果结合学潮的起因来分析近10年思想政治教育状况,可以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着4方面的问题。

第一，思想政治工作的立足点没有放在同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高度，缺乏对资本主义阵营开展“和平演变”攻势的高度警惕性。

例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反动势力具有非常强烈的政治争夺意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他们千方百计地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渠道扩大对中国青年一代的影响。自中美建交以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千方百计在中国高层决策圈子内的青年知识分子身上下功夫，频繁地邀请他们访问美国，试图在中国党和政府内部培植“亲美”势力。此外，美国的教育界、文化界、经济界也通过接收中国留学生、扩大文化交流和经济技术合作等形式，努力培养年轻一代对美国的“感情”。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方励之、严家其等也经常到高校讲坛上去散布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吹捧资本主义制度的观点、理论。而我们的某些领导人和理论家却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对人民进行抵制资产阶级影响的教育，使不少人忘记了世界上还存在着与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资本主义阵营随时随地都在千方百计地与我们争夺接班人，放松了政治警惕。

第二，政治教育内容单调、教育标准不明确。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教育中一个很大的缺陷是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放松了对青年进行辨别基本政治是非的教育。这就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失去了生动、充实的内容，而仅仅成为口号或宣言，形成了便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发展的理论空间。

近些年来，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过程中，理论界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研究成果少，而各种改头换面的

资产阶级自由化  
较严重  
是中学  
人眼花  
学引导  
大学生  
学3年  
化观点  
点根本  
无论怎  
凭什  
年的  
武器  
大大  
题上  
数竞  
学生  
50.2  
义不  
同学  
他们  
自由  
生表  
级自  
义的  
是一



资产阶级学说、流派则纷纷出笼，广泛流传于世，形成了比较严重的政治理论倾斜。大学生在政治理论课上听到的常常是中学时代就已听惯了的老一套，而在流行图书中又多是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的新观点、新学派。这样，在没有科学引导的情况下去涉猎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书籍，大学生的政治态度必然受其严重影响。一个大学生说：“上大学3年来，课外看的都是所谓政治‘精英’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书刊”，而政治教育中所讲的道理与这些书刊中的观点根本交不上火。有的学生说：“你们批严家其，批《河殇》，可无论怎样他们还有自己的理论，你们连自己的理论都没有，凭什么让人信服”。基层的政治工作干部也反映，在争夺青少年的政治斗争中缺乏系统、丰富、有强烈的理论色彩的教育武器，这种争夺与反争夺的双方互不交锋、各行其道的状况大大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使一部分青年在重大问题上不辨是非。1980年，北京部分高等院校学生竞选时，少数竞选人讲了否定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话，受到许多大学生的反对和批评；而1989年对某大学的调查则表明，有50.2%的青年赞成搞多党制，有50%以上的学生认为社会主义不好。北京反革命暴乱平息以后，一位学生干部反映：同学们普遍觉得邓小平同志讲话有水平，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他们认为。1989年学潮的实质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对立，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但其中却有少数学生表示：就是不喜欢社会主义，不喜欢共产党而喜欢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有个别学生混淆了当今时代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根本政治界限，认为：“方励之的行为可以理解，他不过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到美国大使馆避难也是正常的。当年



周总理不也到租界去避难吗？”有的学生认为严家其等人叛逃国外与当年孙中山在海外搞革命是同一性质。这些问题都表明，由于近年来放松对革命理论的研究、宣传和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导向，使大学生的思想混乱已经达到了非常惊人的程度。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建设被忽视。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科学的系统工程，需要有社会的载体和物质的依托。但是近些年来，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入，使少数社会科学研究和新闻出版等意识形态部门没有充分发挥积极作用，而是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

例如，前几年，一些报纸上公然批判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批评雷锋是木材的“材”，不是人才的“才”，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合理性；一些学者名流也向大学生灌输不顾国家和集体利益的成名成家思想，使青年的价值观、人生观、荣辱观都发生了混乱。在对解放思想、改革等问题的宣传中也出现了倾斜。比如：在宣传解放思想时，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少；在宣传引进外资取得的成就时，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少；在宣传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时，讲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党的领导少；在宣传民主建设时，讲民主要是在法制轨道上发展少；在进行改革的宣传教育时，讲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少；在宣传党的富民政策时，讲“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共同富裕”少；在宣传改革原有的所有制结构时，讲在实行多种经济成份的同时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少；在宣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时，讲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促进作用少；在进行现代化教育时，讲国情少；在宣传精神文明建



设时，讲理想、道德、法制、党风建设少；在宣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时，讲知识属于人民、知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少，如此等等。这种宣传舆论的倾斜，使青年知识分子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受到了不良影响。

第四，思想政治教育的队伍涣散。近几年，思想政治工作干部普遍感到在社会上没地位，工作没前途，“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口号更伤害了这支队伍的形象，使这支队伍不但得不到加强反而被削弱了。

有的同志说：思想政治工作是“抓起千斤，放下四两”。因此，不少政工干部都带有严重的临时观念，随时准备跳槽改行。10年学潮中特别是1989年北京的学潮发展为社会动乱、反革命暴乱的沉痛教训告诉我们：由于没有建设好一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生力军——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到了党和国家出现危难之时，一线工作力量明显不足，直至事态恶化。这说明，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 ●大跃进式的民主实践必致动乱

从1979年至1989年的10年中，无论哪一次学潮的具体诱因如何，到了一个相应的阶段，其主题总是归结到民主建设的问题上。毫无疑问，民主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正如事实明白无误地所显示的那样，学生们的激进行动并没有能够推进中国的民主建设，反而最终导致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大规模动乱和暴乱。这个教训是极为惨痛而深刻的。对大学生来说，究其原因，在于他们在民主建设问题上忽视了民主建设的内在规律，采用了

学潮这样的大跃进方式。

为什么大学生会采用这种大跃进的方式呢？为什么用大跃进的方式推进民主建设必然会导致社会动乱？分析起来，至少有5点原因。

第一，超前的民主要求。中国人民从40年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中深刻领悟到，经济建设是有规律的，违背这个规律，试图用大跃进的方式推进经济建设，必然受到惩罚。如同经济建设规律不可违背一样，民主建设也是有规律的，也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将要受到惩罚。民主建设属于上层建筑领域，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民主建设始终受到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而来的，经济水平不高，文化发展落后，直到现在全国还有数亿文盲或半文盲，封建影响很深，国民民主素质很低。因此，在这样一个现实条件下进行民主建设必然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过程，决不可急于求成，搞大跃进。

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就有论述。他说：“我们坚持发展民主和法制，这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针。但是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

遗憾的是，青年大学生并没有从我国经济建设的教训中受到启发，也没有领会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告诫。大学生看到了我国民主程度还不高的不足，并把民主程度不高归结为造成我国落后的终极原因，因而特别急切地想推进我国的

民主  
忽视  
并采  
也不  
  
的，  
一是  
民主  
是性  
护阶  
实党  
以排



民主建设。但是，他们急中失智，忽视了民主建设的渐进性，忽视了我国的现状，提出了很高的、完全理想化的民主要求，并采取了学潮这种大跃进式的做法，最后竟出现了他们自己也不愿看到的结果。

第二，模糊的民主观念。大学生的许多民主要求是超前的，而这种超前的民主要求又是建立在模糊的民主观念上的。一是他们不了解民主的阶级性，追求所谓超阶级的民主。民主是一种国家形态，是一种与政治制度相关的具体制度，是通过对一部分人的专政来实现的，因而具有极鲜明的阶级性。社会主义民主从根本上说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要维护这种权利就必须对各种敌对分子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资产阶级民主也是如此。它虽然以“全民民主”的面孔出现，但从实质上是保护少数垄断资产阶级权利的。对于那些“受共产党操纵”的活动，资产阶级政府会毫不留情地进行镇压。所以，在考虑民主问题时，绝不能离开它的阶级本质侈谈什么抽象的民主，这种做法只能给极少数敌对分子以可乘之机。二是他们不了解民主离不开法制，以为民主就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民主离不开法制的保障，离开了法制的民主必然导致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状态，给社会造成破坏，这已为历次学潮所证明。实际上，一些大学生所理解的那种为所欲为的民主，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行不通，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行不通的。三是他们不了解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企图将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民主制度搬到中国来。我们承认我国民主程度还不高，因此要大力推进我国的民主建设。但我们必须明白，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民主建设必须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进行。但是，有些大学



生受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较深，以为中国的民主建设就是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制、竞选制等一套做法。诚然，资本主义民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典章制度，其中的某些具体措施是值得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借鉴的。但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毕竟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是多数人的民主，后者是少数人的民主。所以，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绝不能照搬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否则，必然受到党和人民的反对，在实践中碰得头破血流。

第三，不高的民主素质。大学生往往以民主先驱、民主战士自居，责怪中国的老百姓民主素质低下，其实大学生自身民主素质也不算高。一是他们缺乏基本的民主常识。民主的基本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并保护少数”。一切其它有关的民主涵义都是从这个原则中引申出来的。然而，在历次学潮中，大多数学生都违背了这个原则——一方面，对于与己不同的意见，许多人从来都是群起而攻之，根本谈不上保护；一方面，吾尔开希在1989年5月19日电视屏幕上公开表示，在广场上的绝食和声援的学生是多数服从少数，即99%服从1%。这条99%服从1%的反民主原则，曾给大学生带来了巨大损失，错过了多次党和政府给予的缩小事态的机会。直到6月4日凌晨，天安门广场大学生在表决撤与不撤时才抛弃这条原则，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二是他们缺乏民主素养。大学生的弱点象他们的优点一样突出，诸如有激情而缺乏理智，遇事头脑容易发热，采取过激行动；有使命感而无责任心，往往以天下为己任，却做事不考虑后果，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拿学潮来说，一些大学生是抱着起哄心理参加的，



以为闹好了将来有人纪念，闹不好也不负什么责任。三是他们缺乏民主实践。大学生渴望推进中国民主进程，但缺乏民主实践的经验，这一方面在于党和政府为大学生提供的民主实践机会和途径还不多，一方面在于大学生不善于利用已有的、正常的途径学习民主、实践民主。

第四，错误的推进民主方法。中国的民主建设应当通过民主的方法来进行。但是，大学生在试图通过学潮推进民主建设时却采用了许多非民主的方法。在历次学潮中，大学生屡屡违背宪法，采用“四大”作法争取所谓民主；1987年后，违背有关法规上街游行；1989年的动乱中，极少数大学生则违反宪法和法律，组织非法组织，从事非法活动。这些做法已从根本上危害了社会的稳定与秩序，还谈何民主建设。

第五，被利用的“民主运动”。从几次学潮中可以看出，在学生所谓“民主运动”的背后，总有一股势力，开始时是在思想上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进而在各种场合挑动学生，最后粉墨登场，亲自指挥学生，控制着学生们的所谓民主运动。这股势力就是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及对社会主义极端仇恨的各种敌对分子。这极少数人的用心与大多数学生推进中国民主建设的良好愿望根本不同。他们是要利用学潮，达到打倒中国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学潮必然导致社会动乱。

总之，由于大学生民主要求激进、民主观念模糊、民主素质不高、民主方法错误，往往采用学潮这样的大跃进方式进行所谓民主运动，因而最容易被各种敌对势力所利用，导致社会动乱。因此，我们必须记住：同经济建设一样，民主建设绝对不能搞大跃进。

生  
化  
上  
大  
学  
向  
指  
己  
反  
对

##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持之以恒

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学潮的重要渊源，若要尽量减少或避免发生10年来这种弊大于利的学潮，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资产阶级自由化经过10年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在政治方面，鼓吹政治多元化，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出中国共产党应放弃“一党独裁”，实行多党制，走议会民主之路，用三权鼎立的两院制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经济方面，鼓吹经济私有化，全面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胡说什么公有制已经进入“死胡同”，深入改革的核心是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唯一的出路是“私有化”。在思想文化方面，全面攻击中国的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攻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宣称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个学派，不能作为指导思想，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等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资产阶级自由化经过10年发展，还形成了一种政治气候。这种政治气候，又造成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势力。这一势力的核心是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所谓“精英”，其社会基础则包括暴发户、各种犯罪分子、流氓团伙、“四人帮”残余及其它社会渣滓。在一定条件下，这股反动势力还会成立各种非法组织，同党和人民进行公开较量。

由于大学的特点和大学生的弱点，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总是把大学作为传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特区”，把大学



生作为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化的工具。10年间，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对大学进行了无孔不入的渗透：他们或是到大学课堂上讲演，或是在校内外举办各种沙龙，或干脆在校园里张贴大小字报，据此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使为数不少的大学生接受了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根本目的，在于掀起学潮，向党和政府施加压力，借以实现他们的政治要求。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还把每一次学潮看作培植自己信徒的基本途径，而那些平时情绪偏激的大学生很有可能成为他们的猎物。其原因何在呢？除了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外，还在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在宣传他们的主张时采取了一些欺骗性较强的手法：

一是利用我们党提出的口号和任务来散布自由化思想，这是他们的主要伎俩。他们以解放思想为名，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以改革的面目，主张全盘西化；以倡导忧患意识为幌子，向党和社会主义发起全面进攻。一句话，不管你提出什么任务和口号，他们只要觉得可以利用，就立即借此兜售自己的货色。二是利用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失误和腐败现象，挑动一部分怀着善良愿望的学生对党和政府不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们利用“文化大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问题，散布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情绪。这几年，他们则利用改革过程中党和政府工作中的失误，尤其是少数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向党和政府发难，引起了一部分大学生的共鸣。三是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相对增长和民主、自由、人权口号，煽动那些缺乏经验而又十分激进的大学生与党和政府对立。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力量有了较快增长，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得到局部调整和

缓和，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并没有解决。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闭口不谈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根本矛盾，大肆吹捧资本主义的“繁荣”，借以动摇大学生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同时，他们极力宣扬资本主义世界的民主、自由、人权，鼓励大学生中的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从而挑起一次又一次所谓学生“民主运动”。

我们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危害决不可低估。听任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就会动摇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扭曲改革开放这一强国之路的方向。资产阶级自由化还严重侵袭着党的肌体。10年来，一些共产党员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俘虏，个别党的高级领导人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支持者。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中国共产党就会瓦解和变质。鉴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对青年的严重危害，必须旗帜鲜明地、始终一贯地长期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绝不能手软，绝不能半途而废。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在我国，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外来资产阶级思想还不断对我们发生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仍会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难于很快充分显示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必然会长期存在，由此决定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也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我们只有完成好这个任务，四化建设才能得到可靠的政治保障。

### ●警惕“和平演变”

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反动势力从50年代以来，始终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他们主要采用了十大政治

策略

阶级自

义的理

得很早

深远

联改

主义

别对

们应

这样

利性

想旗

认为

1989

会主

堪。

治代

用各

内“改

对派

盟”，



策略来推行这一战略。

他们的政治策略之一，是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纳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轨道，力图使我们的改革开放放弃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这一点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讲得很明白。他说：“我们应该留心注意苏联体制中进行意义深远的改革的可能性”。这个所谓的“意义深远”当然是指苏联改革中的资本主义化。

他们的政治策略之二，是利用经济和科技优势压迫社会主义国家放弃政治原则。几年来，西方一直在对东欧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即“对那些使自己政权自由化的领导人，我们应该提供经济贷款、较先进的技术和作出债务安排；对不这样的人则应听其自然”。由此可见，国际反动势力的政治功利性是非常鲜明的。

他们的政治策略之三，是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政治思想旗帜。1987年11月，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国内两党都认为，有必要在全球范围内促进“民主制度”的迅速传播。1989年5月2日，《华盛顿时报》说，我们把人权作为与社会主义国家谈判日程上的一个关键项目，是为了让对手难堪。

他们的政治策略之四，是积极寻找和培植共产党内的政治代理人，提出了“拉拢对手后院的人”。因此，美国等国家利用各种渠道与中国党内部的人员发展关系，制造所谓中国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这实际上是他们的一个阴谋。

他们的政治策略之五，是扶持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反对派”。这几年，国际反动势力扶持起了在美国的“中国民主联盟”，支持了国内的方励之等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这场



风波后又收容了严家其等叛国分子。

他们的政治策略之六，是利用现代通讯手段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美国之音”是执行这种策略的工具。1981年，“美国之音”副台长尼古拉德斯有一段自白：“我应当破坏苏联及卫星国的稳定，促进他们的人民和政府之间产生摩擦，……我们要尽量在共产主义集团各国领导人之间打入楔子，使他们相互不满和互相猜疑，我们应当煽起民族主义的火焰，鼓励铁幕后宗教感情的复萌。”

他们的政治策略之七，是通过丑化共产党领导人否定社会主义的形象。他们采用造谣手法，从政治品质到私人生活等各个方面，把共产党领袖描写成“恶棍”、“杀人狂”、“精神病”，以此来瓦解人们的共产主义信念。

他们的政治策略之八，是以青年为重点，极力培养亲西方势力。为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推动在中国各大学建立研究美国机构，通过国际访问计划，每年邀请我国100名对决策有影响的人士访美。他们的重点是大学生和留学生。里根说：“要把接收中国留学生作为一项战略投资”。

他们的政治策略之九，是用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影响青少年。这几年，西方“黄色文化”对我国的渗透相当严重。

他们的政治策略之十，是抓住一切机会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他们进行了最露骨的表演。

在国际反动势力咄咄逼人地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时，我们反而丧失了政治警惕性，在关键问题上连退了三大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一步是放弃了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自动解除了思想武装。这几年在中国人眼里，似乎西方来的都

是朋  
构“惊  
国际反  
并取得  
略。在  
党，希  
代，多  
象王  
的吗！  
有一  
人大  
特区

究和  
包括  
人的  
西方  
对势  
动的  
可靠  
略目  
去，  
要确  
建设  
步明  
团员



是朋友，北京几乎成了在思想上不“设防”的城市。外国特工机构“惊呼”中国出现了搞情报的“黄金时代”。这一步的退让使国际反动势力得以相当放手地在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并取得了一定进展。第二步是放弃了争夺青年一代的政治战略。在五六十年代，我们具有很强的争夺意识，随时提醒全党，帝国主义预言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近几年来，谁一讲“争夺”就有人骂你左。象王丹、吾尔开希这些青年大学生难道不是被敌人争夺过去的吗！第三步是放弃了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斗争。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党的意识形态阵地和大学讲坛对方励之等人大开“绿灯”。有的地方简直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特区”。

当前，我们要以粉碎西方“和平演变”战略为出发点，研究和提出争夺接班人的政治战略的宏观构思，这个构思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要确立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战略方针，立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高度，从粉碎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政治需要出发，积极开展与国内外敌对势力争夺一代青少年的政治斗争，努力把握住当代青年运动的政治方向，确保一代代青少年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其次，要确立培养大批青年共产主义者的战略目标。共产党要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代一代继承下去，就要进行政治投资，培养大批青年共产主义者。再有，要确立青少年思想政治工作的战略地位，这就要把加强内部建设与创造外部条件统一起来。加强内部建设主要指，进一步明确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政治性质，充分发挥团员的先锋和模范作用，下大力量不断加强和改进团的基层

组织建设，努力提高专职团干部队伍素质，切实加强团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建设。创造外部条件主要指，党和政府把青少年教育摆到重要位置上来，积极为其提供强有力的法律和政策保证，要求社会各方面共同承担教育青少年的政治责任。

### ●“这个党不抓不行了”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中国现代70年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还比较严重，成为促发学潮的重要因素。因此，邓小平同志1989年6月16日同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十分严肃地指出：“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学潮是多棱镜。党内存在的问题，在10年学潮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其中较为突出的是腐败现象、党性不强、个别高级领导出现严重错误三个方面。

首先，党内少数党员干部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腐败现象。执政党的地位本来就容易使党员干部产生特权思想，容易脱离群众甚至腐败堕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面临着国际反动势力“和平演变”的阴谋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挑战，面临着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很容易产生腐败现象。正因为如此，邓小平、陈云等同志多次告诫全党，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同时，党中央和党的各级组织也采取了一些具体的反腐败措施，但收效不明显。这10年中，由于放松了党的思想政

治工作，沙  
级糖衣炮  
开放的“双  
都官复原  
殊化。改  
些党员干  
至贪污受  
声誉，有  
是大学  
显示，  
次学潮  
学潮发  
学潮、  
学生和  
的。非  
到医  
数学生  
(1)  
家比  
还有  
中国  
给人  
极加  
对势  
“文化



治工作，淡化了阶级斗争观念，一些党员干部丧失了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警惕，丢掉了艰苦奋斗的好传统，在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中打了败仗。粉碎“四人帮”以后，少数党员干部官复原职时抛弃了艰苦朴素的传统，利用手中的权力搞特殊化。改革由农村发展到城市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党员干部及其子女又拼命建公司，搞“官倒”，捞票子，以至贪污受贿、违法乱纪，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败坏了党的声誉，破坏了党和群众的密切关系，引起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大学生的强烈不满。据《半月谈》杂志1988年一项调查显示，群众最不满意的问题就是腐败现象。10年中，尽管历次学潮直接起因不同，但或多或少都与腐败现象有关，并且学潮发展到一定阶段，反腐败必成为重要内容。1989年的学潮、动乱，由于策划者打出了反腐败的旗帜，骗取了许多大学生和群众的同情与支持，参加人数之多是历次学潮中没有的。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晕倒被送到医院后向前去看望的中央领导讲的一番话，集中反映了多数学生与群众的心态。他说：我们绝不反党，原因有4条：（1）中国人口太多；（2）中国资源有限；（3）中国同发达国家比，科技、工业都相当落后；（4）中国人文化素质太低，还有许多文盲。所以在许多政党中，只有选择共产党来领导中国。但是最重要的是党在群众中要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给人以信心。他表示：只要共产党员犯法罪加三等，我将积极加入中国共产党。

其次，一部分党员和党员干部党性不强，面对国内外反对势力对党的猖狂进攻无动于衷。这一部分同志片面吸取“文化大革命”以及以前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阶级斗争观念

严重淡化。还有一些党员和党员干部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不说服、不劝导、不制止，听之任之，甚至立场动摇，提出退党。更为严重的是，少数党员和党员干部不仅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猖狂进攻无动于衷，反而随波逐流，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骨干分子。

再次，党内个别高级领导干部犯了严重错误，给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严重危害，对学潮、动乱、乃至暴乱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平息1989年春夏之交的反革命暴乱后，有人在总结教训时说：“党内不乱，社会乱不了。”还有人甚至说：“政治局不乱，政局就乱不了。”这话虽然尖刻片面，但有一定道理。邓小平同志早在1987年1月20日就指出：“为什么学生会闹事？根本上反映了我们领导上的软弱。”

值得欣慰的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认真总结了10年来党的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反腐败措施，已收到初步成效，同时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从组织、思想、纪律等许多方面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可以认为，只要我们党照此坚定不移地抓下去，就会大大提高自身战斗力，赢得广大群众信赖，并带领广大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夺取新的更大胜利。

本  
体撰稿  
(第三  
(第六



## 说 明

本书作者“船夫”，系共青团北京市委理论组的笔名，具体撰稿人是：马文余（第一章）、刘亚军（第二章）、李眉（第三章）、李京平（第四章）、陈喜庆（第五章）、周英（第六章）。全书由强卫、姚望、周英同志统稿和审定。